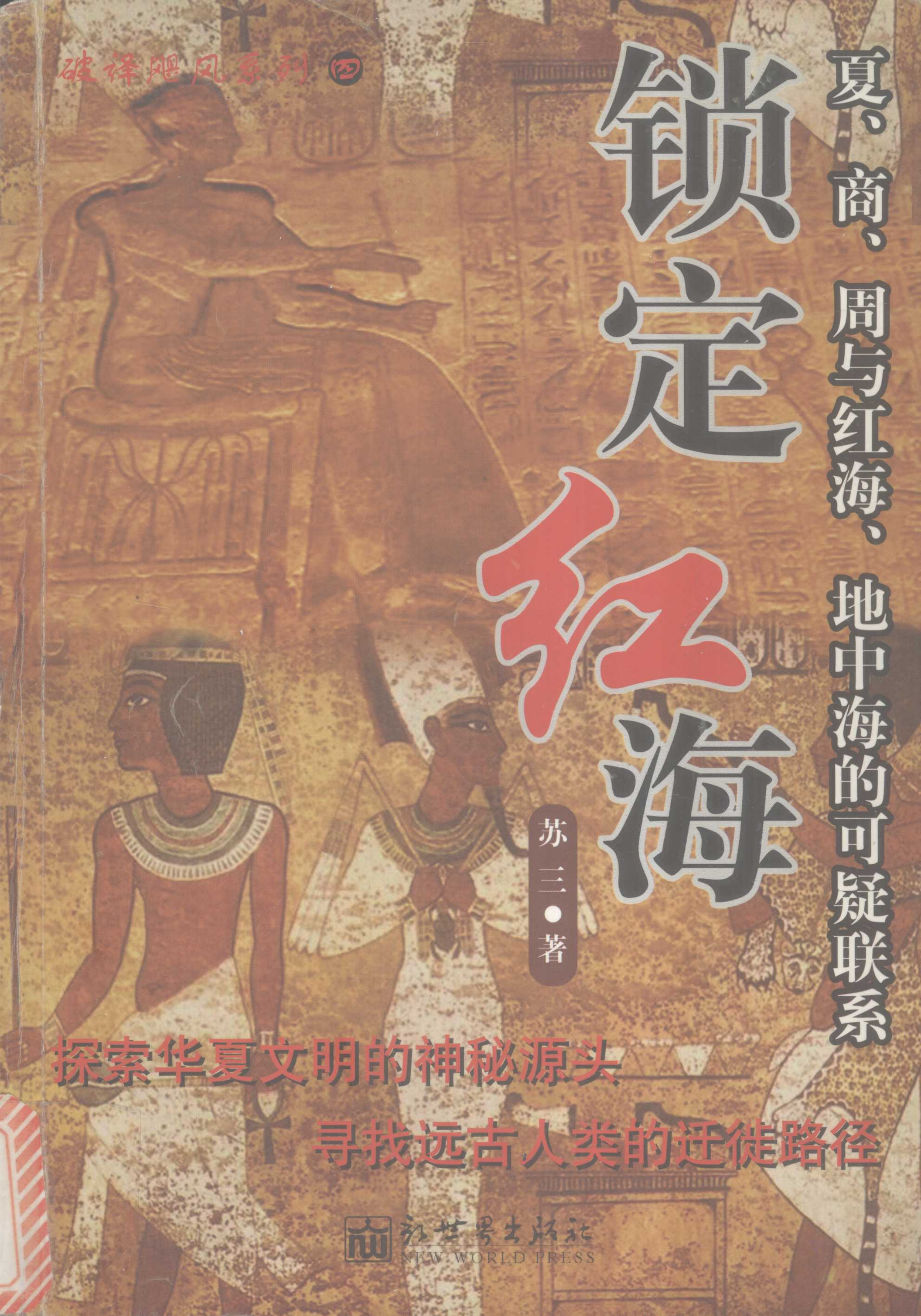


破译飓风系列 四

锁定红海

夏、商、周与红海、地中海的可疑联系

苏三 著

探索华夏文明的神秘源头

寻找远古人类的迁徙路径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将向何处去？

“在初听到中国文化来源于中东的时候，我是十分生气的，尤其是看到作者是一个女人的名字，一种汉奸卖国贼的感觉就愤然而起。以至于苏三的作品出来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不看。

但我终于还是看了，这一次，我感到了彻底的不同，我要感谢苏三。……”

你也许不赞同作者的观点　但你不能不关注这个话题

ISBN 7-80187-858-2

9 787801 878588

ISBN 7-80187-858-2/K·038

定价：38.00元

破译飓风系列

锁定红海

夏、商、周与红海、地中海的可疑联系

苏三 ● 著

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里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考古学家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1962）

整书都是瞎扯

K221
SS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锁定红海 / 苏三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10
ISBN 7-80187-858-2

Ⅰ.锁… Ⅱ.①苏… Ⅲ.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 三代时期
Ⅳ.k22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3710 号

锁定红海

作者：苏 三
责任编辑：程 军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址：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河北徐水彩虹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10*1000 1/16
字数：360 千字 印张：16
印数：1-8000
版次：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87-858-2/K·038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与小结》

2003年10月23日，我因无意中碰到一本三星堆的书籍而起考察文明源之念已有一年。这一年，我写了三本书。在第二年的开头，我写下了这第四本书。

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也有小的挫折与波澜，但总体而言很顺利。我得到了世界各地华人的支持。来自不同方面的热情支持与厚望既鼓舞了我，但同时也给了我压力，甚至我也开始考虑一些“学术”问题，偶尔我也考虑如何给自己的工作定性。

我对于我的工作很满意，当然，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少漏洞和谬误，很准确地说，我一面前进一面因学养的欠缺而在不断补课与修改我的路线。我甚至不愿意在其他地区再版时出版我的第一本书（即《三星堆文化大猜想》，简称《大猜想》）了。不过，那是我的第一步，尽管歪歪扭扭却也反映了我最初的大方向。假如为了展现我的思考全过程，我还是愿意把这本书的谬误也展示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份不错的“原始手稿”，它虽然不成熟，但奠定了研究基础，说明了我最初的宏观思路是正确的：把“西来说”的源头直接引向中东的南方，坚定地指向埃及文明，并且直接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埃及文明与犹太文化这两条主线贯穿了我的整体研究。以往的“西来说”多偏离了这条主线，止于中亚与两河流域，所以才导致了西来说的“灭顶之灾”，以至全军覆没。第一本书由于根本没有参考旧的体系反而奇迹般地避开了这个误区，也由于以往的“西来说”对于中亚和西亚对比得很充分，所以我更多想把注意力放在前人忽视的地区，这也算是一点矫枉过正的意识。

《大猜想》一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提出了世界上存在着四个大的文明板块，他们以每千年为期次第向外传播的规律，这记录在书末的“文明列表”中。另外一项具有重要价值的假设是，2500年前左右是人类文明的分水岭：之前是人类自由迁徙的原始浪漫时期，人类文明得到了广泛充分的传播与交流；之后是国家、民族与宗教的发展导致全球相对封闭的一个时期——这才是真正的“巴比塔效应”，这个分裂人类或者“反迁徙”因素的出现造成了战争与文明交流的停滞时段。没有这个历史分段，将无法把握人类文明的传播规律，认识不到这一点实际上将无法探索人类早期的文明扩散秘密，许多历史谜团将无法解开。

同系列中的第二本书《向东向东，再向东》（后文简称《向东》）创作也很偶然。由于在出版第一本书之前需要《圣经》资料的补充，在查询中我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圣经》信息。于是干脆另起炉灶，尝试以《圣经》为蓝本来解读中国文明起源。它比第一本书更加“系统”地提出了我的假设框架：中国夏商周文明起源于中东。考虑到大多数中国人不熟悉并且手边根本没有《圣经》，并且为保持《圣经》在《向东》中的相对连续性，我引用了大量《圣经》原文。一些读者由此批评我是“抄袭、巧要钱”。其实，引用和压缩这些《圣经》片段耗费了我许多精力，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说的“直接抄袭”。一本书厚到那样的程度对于市场是很不利的，并不是更能“赚钱”。我在跟香港的出版社谈到这一问题的顾虑时，提议再版时是否可考虑删减一些《圣经》引文，但他们一口回绝了。

第三本书《历史也疯狂》不是框架性的文本，是我的读书笔记与旅游散记，但这本书却是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一个偶然事件我与西北这条中国的“丝绸之路”有了特殊联系。对西北地区进行了一个月的实地考察，开阔了我的眼界，也更坚定了我的研究信念。同时，确定夏文化以及半坡文化的语言为早期的腓尼基文字，是这本书以及整个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这本书里，我也开始关注到中国本土的古代文化实际上有明显的“东方”与“西方”之别，它们又可以表述为“北方”（西方）与“南方”（东方），揭示了“西来说”在中国的两大主线，这一具体化过程对整个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第三本书开始，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由“夏甲”这里开始再次引起我的注意。我开始调校方向，从一般性的中东开始向具体的地区瞄准。文字语言与人种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始得以重视考虑。在第三本书的最后，古典“南部阿拉伯文字”与甲骨文的比较是我最为兴奋的一个发现，它为第四本书（也就是本书）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这本《锁定红海》的撰写依然是非常仓促的。许多长久以来困惑我的问题出人意料地在这本书中被我潦草地揭开谜底，我在动笔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些收获。我想当你们拿到这本书之后也肯定会有同感。

在最繁忙的一段时间里，我身体不太好，我甚至遗憾地想万一我突然去世，这些工作别人难以为继。现在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尽管体系紊乱、文字潦草，但主线已经清晰，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整体思路的来龙去脉，有兴趣的人可以基本沿着这个思路前进了。中国古代主要的宗教体系、语言、人种、神话、文学等都已“栏杆拍遍”。

整个四本书展示的是真正探索的足迹，而不是一个正确真理的宣告。我的书写就是一份仓促的“手稿”。我觉得这样处理很好，并且不以这样的“浮躁”为耻，因为我想及时让社会知道我的工作进展，也让更多的人来批评帮助我的研究。我的当务之急不是细密鉴别，而是建立宏观大模样，树立一个简要的框架，只有在完整框架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出初步的一些历史模型。所以，这里我也顺便提醒大家，阅读的过程中发现我的书假如前后有矛盾者，以后一本书为准，因为我的观点也在研究探索中不断修正，探索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随着新资料的获得我已经修改了许多内容，但是大方向没有改变。

心平气和地说，我的工作是一份为一项巨无霸工程初步收集资料的工作。认识到这个定位，我以后不打算对我的文字做过多的修饰，都会以最“毛糙”的形态出版，因为这会最大程度地保留“资料”。许多信息若按照规范的学术体例是必须拿掉的，但考虑到资料收集的不易与重要，我愿意放弃“学术”的“规范”考虑，不惜“以意害辞”。借用一下孔庆东给老那《城市蜿蜒》的“夸赞”：“刀工不讲究，玩意儿可是大补哇。”我要的就是这个“大补”。

糊里糊涂收集了一年多的资料，我这些研究到底属于哪门学科，或者说与哪门学科最接近，我自己最初并不是很清楚，或者干脆我认为这个根本就不重要。我确实一直把这个工作当“破案”，破文明起源的案，管他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假如非要我凑一个专业，我倒认为它可能是“文化人类学”。假如还想再保险一些，直接称呼为“人类学”就更可以了。“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或者干脆直接用 ethnology 也无不可），是分析和比较人类文化，如社会结构、语言、宗教和科学技术的学科；而人类学

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人类的，包括族源研究与人类体质以及他们的地理分布、流动等，不难看出这正是我一直关心的。“历史学”或者“考古学”甚至（汉）语言学都不能囊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它们在此只能作为“文化人类学”某一方面的工具而存在。我是这么看的。

尽管我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但是无论从哪方面都还是惊动了一些人，并且使一些行业问题凸显出来。比如人们往往会想，你一个外行侦探在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国家的专业人士上哪里去了？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不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太复杂，但我彻底回避也不可以，因为这会牵涉到我的诚信问题。不过我想“苏格兰场”的存在其实从来并不影响福尔摩斯们的存在，反之亦然，互补更好。当然我知道中国人并不习惯，中国人更喜欢“单位”。不过我认为“单位”对于青蛙倒是一盆正在升温的热水，所以有一些人愿意在“单位”之外试探生存，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应该给予一定的宽容的吧。科学，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区，都不一定与“单位”挂钩，科学首先需要的是自由与独立。

张光直先生也有“单位”，不过是在美国的“单位”，从他的许多言论中我获得了信心，尽管他并非是个文明同源论者。在提及钱穆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特点时，张先生曾经说中国历史学界“自我中心”和“向里面看”。他还说[①]：“中国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历史，却全是自己的历史。二十四史从头到尾不离开中国这个舞台。”“中国人独善其身的哲学，即‘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这种态度，显然也是应用到史学上的。自司马迁以来，一直到当代学界，中国也出了不少著名的史学家，但都是‘中国’史学家。中国古今学者中有几位对中国以外的历史或一般世界史做过重要的贡献的？”“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外国史上被哪国史学家尊为大师，也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国际上成为有地位的历史理论家。[②]”“中国史学一向缺乏研究世界历史的传统，积习所在难免影响到国人对国外各种多姿多彩而风格迥异的古今文明的忽视或轻视。[③]”“中国学者的一个习惯，是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④]”“研究中国史而不研究世界史这种作风，不但使我们成为世界史的文盲，而且常常使我们不能充分了解中国自己的历史。[⑤]”

张先生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不了解世界史，怎么会全面了解中国史！越向深处研究我越发现，中国（上古）史其实正是一门“世界史”。这样一个学科背景的扩大给许多传统人提出了挑战，同时给我这样喜欢读“世界史”的“杂人”也提供了一个机遇；从某个角度说，我是从“世界史”来看（上古）“中国史”，而我知道中国上古史的专家很少有习惯向外张望，他们大概太忙了，或者他们大概认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这个差异造就了我这个并不太了解中国史的“独眼龙”，同时中国某些相关学界也成为一个不了解外面世界的“独眼龙”。在这个研究领域内只要专业的学者不准备彻底改变思路，那么中国

---

①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59 页。

②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80 页。

③ 同上，154 页。

④ 同上，189 页。

⑤ 同上，59 页。

的读者可能就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迫地接受我这个外行“独眼龙”的不断“抛砖”，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专业学者的引玉。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我希望尽快得到改变，让我们在学习和反思中成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全人”。

苏 三 2005-1-19 于北京王府井

联系方式：susanxuxu@126.com
http://bbs.163blog.com
http://bbs.culstudies.com

目录

上部　越过千山万水

第一部分　遥远过去 / 2

阿拉伯世界与中国 / 2
特殊的阿拉伯半岛 / 6
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两个海湾 / 8
1. 东北角　波斯湾
2. 东南角　红海亚丁湾
也门人的历史 / 10
大名鼎鼎的“萨巴”来历 / 12
古老的麦因王国 / 13
萨巴王国以及中国的“西伯” / 14
也门地区早期陆续并列的其他王国 / 16
1. 盖太班王国
2. 哈达拉毛王国
3. 奥桑王国
4. 希木叶尔王国
综合的也门 / 17
中国与也门的交往 / 18
阿拉伯人名与中国商王庙号 / 21
面对也门历史对夏商周联想 / 24

第二部分　伊甸园与《诗经》乐土 / 28

到非洲去 / 28
从《圣经》说起 / 31
埃塞俄比亚简介 / 33
埃塞俄比亚的犹太色彩 / 37
天啊，但人！ / 38
“但”与“周”的关系 / 40
《圣经》挪亚与中国女娲 / 43
附：中国女娲的传说
寻找“乐土” / 45
“乐土”与“伊甸园” / 47
关注人类起源 / 48
寻找伊甸园 / 52
文明传播与“南岛”文化 / 56

第三部分　永远的示巴女王／59

神秘的示巴女王／59
示巴女王与“周”／60
“西王母”与“周穆王”／62
原始性意识与库克船长／65
作为女性的示巴女王／68
“孟那里克一世”／76
读《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78

第四部分　关注红海北段／80

夏与夏甲／80
深入埃及／82
公元前14世纪埃及“政变”／85
埃及与周边的可能联系／88
埃及与中国／89
不能遗漏的沙特／90

第五部分　猜想“焚书坑儒”／92

围绕秦始皇与孔子／92
两地宗教猜想与对比／95
“礼”与以色列家族／97
一些历史疑云／98
秦人信奉什么宗教／101
印度东北突现以色列失落部落／103

下部　遥问天上人间

第一部分　神话与天文星座／108

麻姑、天后与西王母／108
麻姑的传说／109
天　后／110
道教里的西王母／112
道教的一些特点／113
“牛郎织女”的传说／118

星空传奇／120
从“狗皇”到“盘古”、“伏羲”／124
图腾、“大熊星座”与“七星”／128
“大熊星座”的全球神话对比／131
解秘西王母“Queen Marichi”／136

第二部分 宗教之间／140

道教起源与发展／140
道教基本派别与信仰体系／142
道教与苯教的可能联系／144
象雄与苯教／147
苯教与佛教之争／151
卡尔雍仲／152
历史背景下的波斯袄教／154
围绕袄教源头／157
直面袄教／159
“天使”与“盘王”／164
“火之子”与“火神”／166

第三部分 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170

希腊神话背景简介／170
希腊神话主要人物以及关系／173
赫拉与其他主神／176
“盘古”“伏羲”与希腊神话人物／181
火神与盘古更多记载／184
“宙斯”与“玉皇大帝”／187
吴刚折桂与西西弗斯／192
“禹”与“鲧”的传说／194
月老红线／197
嫦娥传说来自印度神话／199

第四部分 几则全球童话与神话／204

来自德国的格林童话／204
几则童话与神话对比／205
中国也有《灰姑娘》／209
《汾河湾》和《武家坡》的希腊色彩／211
误解“神”“仙”?／212
精卫鸟是什么鸟?／215

第五部分 “酒神”与“萨巴”、“萨保” /219
葡萄种植的传播 /219
酒神文化 /220
宗教联系 /223
中国历史中的“撒保” /225

附：香港归来有感（2004-12-8）/229
之一.“挪亚方舟”与“亚若方彝” /229
之二.“夏甲人”与“客家人” /231
之三.古滇文化 /235
之四.在文明同源中猜想纳斯卡 /236

附：“三代”王表 /239

附：有关人类非洲起源新闻3则 /240

《代跋：从“严谨”说起》/243

参考书目及感谢网站 /245

上部 越过千山万水

第一部分 遥远过去

阿拉伯世界与中国

越来越多收集的资料显示，中国商朝前后的历史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肯定相关。从语言的扩散情况看，在大约3500年前全球人类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可以从语言研究方面得到一些证据。其实从后来中国有大批的回民这一事实就可以推导出这一结论，从那里到中国来并不那么困难，他们一直都有同样来到中国的动力与通道。

按照我的逻辑，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潜在的“回民”。从地理与气候上，我们没有明显的理由说，大约4000年前与近2000年内这个时段有什么根本的条件改变而扰乱了中东诸多民族一直向中国迁徙交流的规律。这些走向中国的渠道从远古至今一直都存在，只是我们不把唐宋之前迁徙过来的人们称呼为“回民”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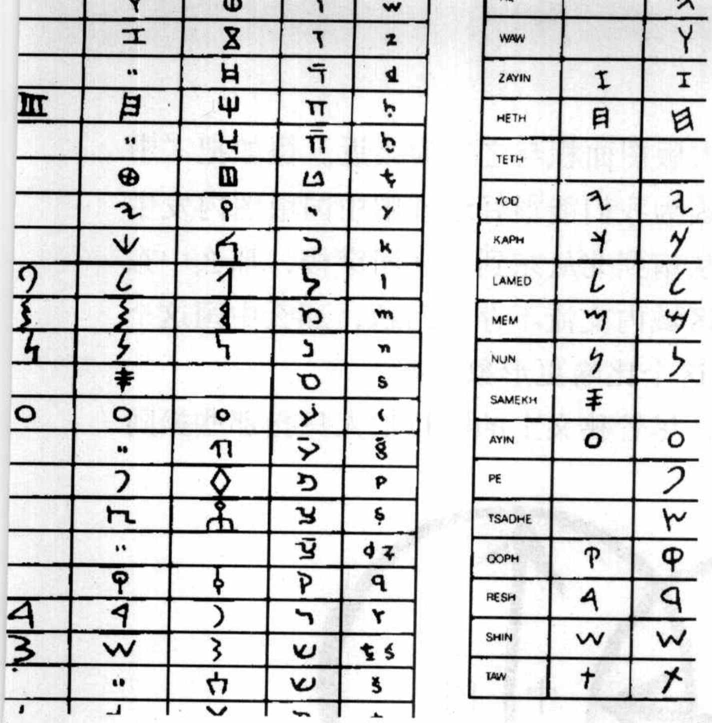
今天“回民”人口大约为900万，在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满族人口位居第三。如此多的存在量似乎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然，“回民”并非全部是从阿拉伯半岛来的，但这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回民”今天分散的地区也给了我们另外的启发。他们集中在宁夏、青海、新疆、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天津、北京等偏北地区。

从地中海西岸到东岸，从阿拉伯半岛到中国内地，有一种文字在广泛使用，尽管它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但总的来说围绕着“迦南文字”和“腓尼基文字”展开。这一语言痕迹提示我们，“阿拉伯化”实际上并非是随着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开始的一场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亚伯拉罕为“多国的父”（《圣经》语）一点也不是夸张，他子孙后代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像能力，以上提到的两种语言都与亚伯拉罕的后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祖先，阿拉伯人同样也承认他为祖先。

3300年前的中国脱离了“腓尼基文”的字母文字系统，转向一种发音的象形文字甲骨文，目前看“（原始）南阿文字①”是与其最接近的一种文字，两者有可能为同源。此外，“南阿文字”目前还有一个分支存在，它是埃塞俄比亚的国语：阿姆哈拉语（Amharic）。

有人说，我手头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甲骨文源于“南阿”文，倒有可能传播的渠道

① 本书“南阿”文字指公元前5世纪前后出现的South Arabian以及大约公元前1500年开始出现的前身：Proto—Arabic，主要指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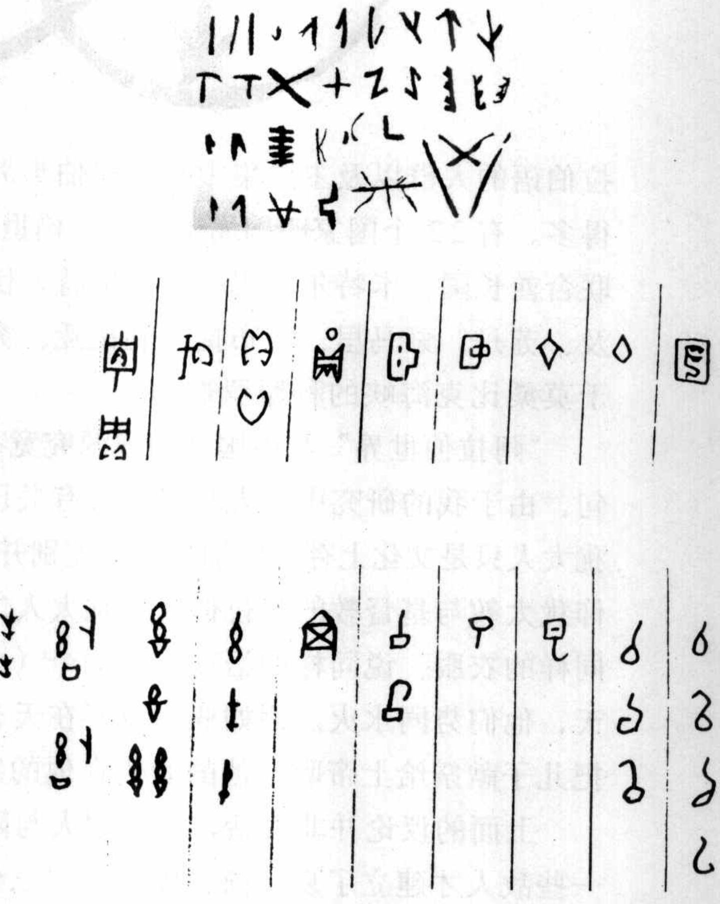


△ 南阿文字

是相反的。有人问道：为什么“南阿”文字不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呢？这个可能性也存在。

尽管一般人认为“南阿”文字起源于“原始迦南”文字，时间可能早到公元前1500年，但是通常意义的“南阿”文字出现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当然有可能从中国传播过去。成熟期的“南阿”只出现于南部沿阿拉伯海附近地区，这里正是通往中国的最近的中东港口，假如当初中东就是世界文明的核心，从这里出发并在东亚等地繁殖一些近亲文明是可以理解的。最终这种文字在埃塞俄比亚落脚，说明了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地区之间可能有过的密切文化、政治联系。

我之所以倾向于“南阿”为甲骨文的源头，主要理由为：1，甲骨文比“南阿”复杂，一般来说，源头应该简单；2，当时中东文明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文明整体更发达。当然，这些理由并不十分充分。其实“南阿”文字的许多符号在中国远古就存在，比如仰韶以及夏文化里就有出现。到底谁影响了谁，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已经可以确定的是，两地之间有联系。



△ 从《甲骨文字典》目录截取的甲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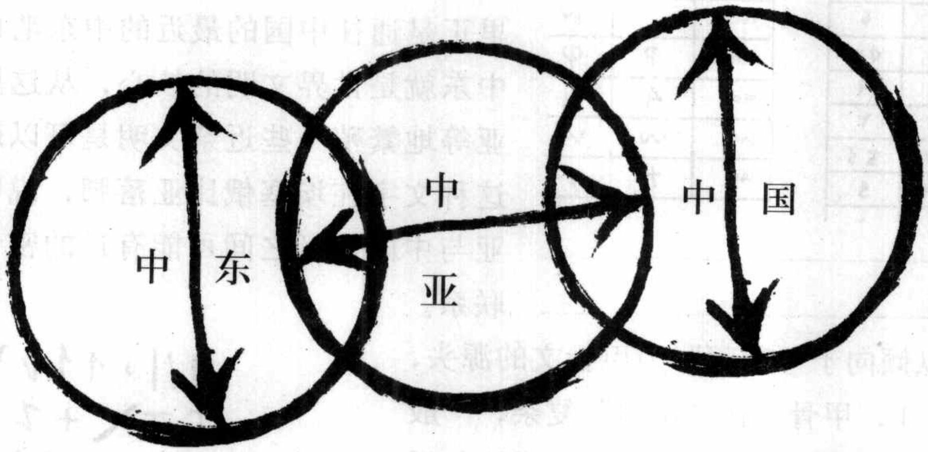
让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阿拉伯地区包括哪些国家，这个事实可以启发我们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因为文化的传播一般因为相对稳定的地理条件是有规律性的。当然完全以今天的“阿拉伯地区”来归结3000年前的“文明同化区”是不严谨的，但有参考总比没有好。史前史的委屈就在这里，总得用一些“不严谨”来替代空白。我们的许多有价值的线索都不得不建立在一些“不严谨”之上。好在我们知道这一缺陷，对之保持一定的警惕就可以了，因为并非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类比，某些地方我们还是有铁的证据。我们的任务是探索，是资料的积累，不是赌博，所以冒险不仅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

阿拉伯人聚居的阿拉伯半岛面积30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今日中国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只有3000多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

古代中东的核心发达地区，包括两河流域、波斯、埃及以及希腊，比今天的中国版

图大不了太多，估计唐代或者清代时期中国的最大版图面积与之较为接近。假如把“中东”考虑为一个整体有些假设就比较好理解了。因为我们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版图内发生的任何交流，中国人不怀疑远古时期中国人曾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来回穿梭，那么中东内部的交流也应当不存在问题。既然在如此大的区域内交流不存在问题，那么中国这个板块与中东板块之间的交流也不应该存在问题。这个比喻更形象一些。

今天的“阿拉伯地区”涉及到亚非欧三大洲，尽管狭义上的阿拉伯人只指那些操阿



拉伯语的人群以及主要集中在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人们，但广义上的阿拉伯世界却要广大得多。有22个国家明确属于“阿拉伯世界”，包括：也门、沙特阿拉伯、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特尔、巴林、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埃及、苏丹、索马里、吉布提、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位于莫桑比克海峡的科摩罗群岛。①

“阿拉伯世界”与中国文明起源究竟有无联系？有，并且关系很大。不过我得补充一句，由于我的研究中国人与犹太人有关已经深入人心，这个补充是必要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只是文化上存在区别，人种差别并不太大。在伊斯兰教兴起的公元7世纪之前，信仰犹太教与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真的并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分别，他们甚至穿同样的衣服，说同样的语言，有一个（大多数人认同的）共同祖先：亚伯拉罕。但在今天，他们势同水火。假如亚伯拉罕在天有灵看到今天的一切，他肯定认为还不如当初真把儿子献祭给上帝呢！他的后代在他的家园故土上你死我活争战不休，亲者痛仇者快。

上面的议论并非大话，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很可能在古代中国的土地上共同对付了一些敌人才建立了夏、商、周。在“三代”之前中国地区是有许多土著的，我认为红海附近主要以闪族为代表的人们来到中国建立了夏、商、周政权。当然，夏、商、周本身的更替或许就是他们曾经的矛盾与斗争的一种体现。

本书讨论的基础建立在这样的推论之上：**夏朝由夏甲后代建立；“商朝”与今天红海附近的也门、沙特地区有很大的联系（不排除与地中海东岸也有联系）；周朝由亚伯拉罕的一支后人建立，他们有明显的犹太痕迹。**

---

① 杨孝柏，《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阿拉伯卷》，555页。

夏甲被公认为阿拉伯人的祖先，这个女人有着耀眼而神秘的背景。她是“三代”的开始。

尽管中国人常常拿“5000年文明”来表达历史的悠久，但这只是个没人当真的文学概念，中国人自己比较认同的历史是从4000年前的夏朝开始的，世界上比较认同中国的历史从3600年前的商朝开始算起。并且中华文明的基础是由“夏商周”三代奠定的。假如我们认定中华文明确实与夏甲和红海文明有着广泛深入的联系，那我不得不说，中华文明实际上可能更多曾经属于阿拉伯文明。当然，是属于伊斯兰前文明。

我一直相信在中国与阿拉伯海之间存在着联系，也就是说，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包括西南部）与中东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海上联系。

在无动力时代到底人们是否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明代的郑和做到了这一点。他依靠的只是风力和人力，仅用大约2～3年他就从东非回到了中国。这正巧合了我曾经推测过的史前时期中东到中国一趟的时间：3年。这段海路不仅郑和实践了，1980年一位爱尔兰航海探险家也亲自驾驶了一艘原始无动力帆船沿这条海路借季风航行过。从南部阿拉伯半岛的阿曼起程，经阿拉伯海、印度、斯里兰卡、印度洋、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到中国的广州，共6000海里，行程220天，“这次了不起的航行再次证明了中国阿曼的古代海上贸易绝非‘天方夜谭’”①。

是否还有其他证据间接证明古代人远航的能力呢？张光直先生在《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中（440页）说：“实际上，从东北到华北的交通，可能更多地通过海岸的路线；在龙山文化时期，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在文化上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其相互间的联系，只能通过航海船只来进行。”

△ 这是穆斯林学者Al—Idrisi在大约公元1456年绘制的12世纪时期的地图。上面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红海的出现。当时的地球概念已经接近事实本身。这是一幅特殊的地图，它的特殊在于，它的方位采用的是上南下北，为了方便人们的认知，现在人们将其拼为与今天一致的上北下南上。中国自古的地图就是上南下北的特殊方位，看来与地中海的穆斯林人是完全一致的。这位穆斯林是西西里岛的居民。全球地图概念都起源于地中海（主要是希腊），这一现象应该引起中国史前史研究者的高度注意，至迟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初步的地图概念，这个起源来自哪里，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另外，古代人把海洋当作一条围绕地球的大河，这个地图似乎依旧有这个痕迹。古代有“七大海”的说法，它们是：印度洋、黑海、里海、亚得里亚海、波斯湾、地中海与红海，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古代文明的积累就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与海之间。

① 杨孝柏，《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阿拉伯卷》，370页。

特殊的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半岛与其他地方相比有其特殊之处。它地处古代世界两大文明之间，北部是“两河流域”，南方与古埃及相连，所以阿拉伯地区在上古深受南北两大文明的影响。甚至可以说，阿拉伯半岛串起了两大文明，承担起了两大文明的融合与传播的重任，这一传播通道不仅包括北方的西奈半岛，也包括了红海南端狭窄的曼德海峡。西奈半岛与曼德海峡由于承担重要的交流中枢功能，所以这两个地区在古埃及与两河文明辉煌时期也成为非常特殊的发达地区，他们也随着这两大文明的陨落而衰败。

假如由阿拉伯人向中东之外的区域传播文明，在许多方面肯定会给人许多“似是而非”的感觉，既像两河流域又像古埃及文明，最后就只能肯定他们属于独立的一种文明。比如在中国的某些文明经常因为这样的似是而非而难下结论，因为不能完全对应。再加上本土化，所以寻找古代的一些文明根源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尽管阿拉伯半岛的上古历史残缺不全，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那里曾经存在过的高频率人群流动现象，并且历史确实记载了他们曾经群体外迁的一些事实，不过很遗憾并不具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去向哪里。迫使这一事件的发生，我认为可能与沙漠化有一定的关系。

这里由于三面环水，所以还是“海上民族”的栖息地。地中海东岸善水的腓尼基人在环非洲航行之后被埃及法老称为“地中海的马车夫”。可以说沿海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到处都有腓尼基人的痕迹。甚至距离地中海最远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阿曼地区都是古代腓尼基人的落脚地，可见腓尼基人影响之大①。这一有据可查的历史现象也引发了另一问题：腓尼基文字为什么会广泛传播，甚至中国夏都（今天河南偃师）以及西北地区也竟然有腓尼基文字出现。这说明，他们人到哪里，他们的文明便传播到哪里。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向说，假如这些人自古与东亚地区的人们有密切联系，那么他们到哪里就会把部分中国本土积累的文明包括文字带向哪里。

假如不考虑详细真实的道路的话，直线距离今天中国最近的阿拉伯地区是阿曼湾的阿曼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们到中国境内的西北地区只需经过伊朗、阿富汗，大约只1000公里多一点即可进入中国境内。

距离阿曼湾不远处的也门与阿曼有着近似的民族与文化成分。但也门由于面临红海、与古埃及相邻、把守亚丁湾的进出口、生产香料这些优势，在3000多年前它很快成长为一个势力强大的国家，所以也门很可能选择了另外一个与中国的交接点：从中国南部与东部海路，进入中原。这个动力部分来自商业的巨大利润，也可能在沙漠化的威胁之下有寻找另外一个家园的急迫任务。

此外，应该重视阿拉伯半岛与中国的另一个交接点，就是地中海东岸地区与中国西北的陆地区域。

---

① 腓尼基原是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国家，但本书已经不拘泥于这个国家，多指一种与其可能有关的一种广义上的海洋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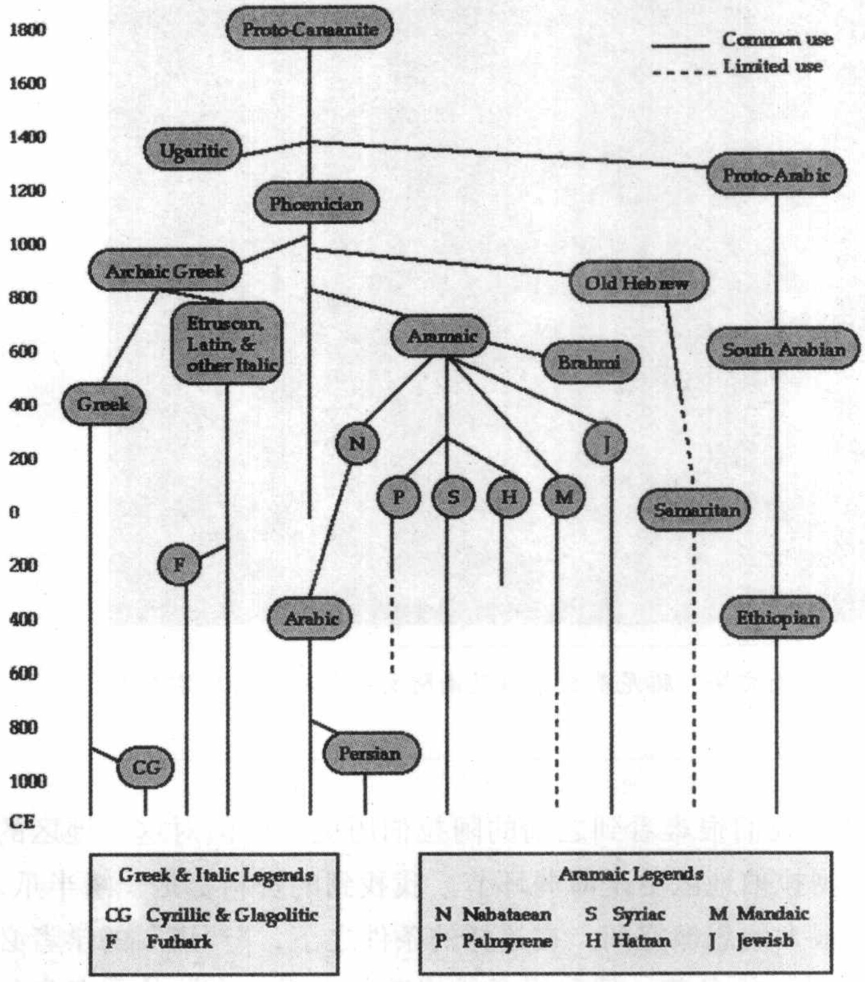
（晚期）南阿文字石刻。迦南文字、腓尼基文字以及南阿文字早期皆为从右到左的书写顺序，与中国古代相同。

由于7世纪的伊斯兰教运动，我们很难看到之前的阿拉伯历史，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历史研究不太充分，尤其是南部阿拉伯地区更是薄弱环节。我找到的资料都是一鳞半爪，拼凑不可避免。这也给我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严谨”的学者必须以放弃研究为代价去保全“严谨”的名节，但我愿意承担着“牵强附会”的恶名先行去探险。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一个概念：“南部阿拉伯”文字不是一般我们说的“阿拉伯文字”，它是一种具有象形特征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有一定继承关系的文字。“南部阿拉伯文字”与“阿拉伯文字”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字体系，尽管最初两者是同源的，那就是“原始迦南文字”衍生出腓尼基文字，然后才有了“阿拉伯文字”；而“南部阿拉伯文字”却与腓尼基文字并行发展为另外一个体系，这个支系的继承者为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

这些文字的现状与变化可粗略勾勒出一幅历史的演变轨迹。大约3700年前，腓尼基人和阿拉伯人曾经广泛深入到过中国西北地区，无论他们从地中海东部直接过去还是从阿曼湾经伊朗、阿富汗到达，中国的仰韶文化区与夏朝统治区均留下了阿拉伯半岛人们的“手迹”。当然，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迦南文字以及腓尼基文字都是从中国生发演变并流传过去的。

但是在中国的东部明显有另外一拨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力。这批人来自中国本地，还是外部的不同民族影响了他们，没有答案，总之甲骨文神秘地出现。实际上中国的甲骨文包含了许多现有已知的古老文字，它基本上遵循了中东象形文字的逻辑，但是就基本材料上（即相当于偏旁部首或者常用符号上）却明显囊括了“腓尼基文字”、“南阿文字”、



甚至“希腊文字”等。这个文字特征说明了在甲骨文字产生的时代，中国地区与以上这些文字的使用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有拼凑起来的证据就我自己看来已经是“铁证如山”：有文字上的，如甲骨文与“南阿”的神秘联系；有实物上的，如大量阿拉伯绥贝在河南殷墟的发掘，亚丁湾海贝在四川“三星堆”的发现等；红海到中国之间古代航海的可能性已得到多方面验证——也门人认为至少在商朝期间两地就有联系。南部阿拉伯地区（也门）在3000年前“香料王国”时期的突然崛起更是他们可以把政治势力扩张到远东去的重要证据。

△ 文字树示意图

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两个海湾

东北角 波斯湾 由于临近“两河流域”，阿联酋与阿曼等波斯湾地区10000年前就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迹象。8000年前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这一地区进入铜石并用时期，之后就出现了农牧业。请注意这里是距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地区，所有中国西北地区的文明发展都需要仔细鉴别是否与中东这一区域发生了联系，尤其是通过印度河流域而发生联系的可能。

考古发现阿联酋地区曾经有外来的彩陶，大约5000年前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制陶业。中国新疆地区常见的坎儿井在铁器时代几乎同时也出现于阿拉伯半岛地区。

中国西北地区的众多民族还显示出来自水边的海洋痕迹，当我们设想他们来自其他地区的同时，不能忽略波斯湾与阿曼湾。

在提倡多加关注也门地区与中国古代东部地区的联系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波斯湾地区与中国的海上联系。

“中国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5年）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泉州、明州、扬州等地南航向西经印度半岛西海岸至海湾，是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海上重要航线。中国的丝绸、陶器等，经此路销往阿拉伯半岛及其以远地方；阿拉伯半岛和海湾的香料、珍珠等运往中国，故亦称之为‘香料之路’。[①]”那么西汉之前两地之间的联系是否也采取过同样一条老路呢？

东南角 红海亚丁湾 也门与阿曼紧邻，在许多方面与波斯湾南面的沿海地区相似，但也存在区别。

“也门”（Yaman）的意思是“右边”，这是相对于“麦加”（Mecca）而言，“左边”是“叙利亚”（Sha'm）。从这个称谓上也可以看出它曾经在文化上是阿拉伯世界这一广大地区的一部分，并且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尽管也门地区水草丰美，但在今天占地面积却不够大。尤其是整个阿拉伯半岛地区缺少大的河流贯穿其中，所以始终没有如“两河流域”或者尼罗河那样的“大河文明”出现，以至于许多人对几千年前的阿拉伯文明一片茫然，他们只知道7世纪之后的伊斯兰文明与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创造的文明，而对上古的阿拉伯文明存有疑虑。当然这一地区文明的失忆还有其他致因。

很幸运地，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与商朝并列的朦胧的也门历史。也门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为麦因王国[②]时期。麦因人从事农耕和手工业，已经开始水坝和沟渠建设。他们还精于商业，商队足迹除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叙利亚之外，还远至埃及、东非及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地。公元前950～(前)115年，萨巴王国（Sabaean）取代了麦因王朝。[③]”

可以看出，麦因王朝覆盖了中国的“夏”、“商”两个朝代。而“萨巴王朝”则基本对应了中国的周朝。让我们对于南部阿拉伯半岛的注意力集中于与中国有过联系的“精于商业”和“沟渠建设”的麦因王朝。

假如这里有古老的文明，有充分的财富，同时还面临一些强敌，但由于地域狭小，他们就必须到外面去扩展殖民。从各个方面看，中国与中东的文明差距在大约4000～3000年前这个时期有大约千年的落差距离，所以带一支中东的人马到中国中原这里来征服发展合乎逻辑。当然，他们第一个应该发展的地区是印度，而不是东亚地区。世界史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印度的文明史总体早于中国。

这是一幅中世纪英国人绘制的地图。地图向来也是一种严肃的国家政治行为。比如这幅地图就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东方为上的所谓“T—O”式地图。今天的亚洲人一般习惯把亚洲放在世界地图的中心，西方人却更喜欢将欧洲（连带非洲）放在世界地图的中心，都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表现。

① 黄振，《列国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37页。

② 在不同的地方表述为Maa—naean、Minaean，又有译为“缅因”或“马因”。Maa—in则是也门以北地区。

③ 杨孝柏，《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阿拉伯卷》，2–3页。

也门人的历史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乌衣巷》道出了多少人间沧桑巨变。今天的也门除了那块土地，一切换了人间，今非昔比。也门因为扼守红海出海口这个交通要道，曾经在旧时代辉煌一时，它的光辉也曾经照耀到东亚地区。也门人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也进行了一次次的更替发展。

也门居民主要为阿拉伯人，卷发大眼是他们的主要生理特征。由于阿拉伯人属于欧罗巴人种，所以早期阿拉伯人或许还有肤白的特征。也门人一般认为自己是“盖哈坦”子孙，就像中国人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一样以证明自己的古老渊源。

根据考古学家的结论，也门地区最早的居民分为两个族群，其中一个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就消亡了，不知去向，他们属于阿德人、塞莫德人、泰斯米人等。今天居住在当地的是剩下的那个族群，据说是通过战争获得了胜利。这一族群又分为两大族：纯粹阿拉伯人与归化的阿拉伯人。“纯粹阿拉伯人”就是“盖哈坦子孙”，又称土著阿拉伯人。“归化阿拉伯人”指伊斯玛仪①的后裔阿德南的子孙北阿拉伯人而言，也称阿德南人。如希贾兹人、纳季德人等，由于他们是较晚时候迁入阿拉伯半岛的，故称归化的或入籍的阿拉伯人②。总体上看，今天的也门人是以上所有族群融合的结果，只是每个族群含量的大小不同而已。

我们对于“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的族群出现在也门地区并不感到意外，并且可以说我们在《向东》一书中已经很熟悉他们了。

现在来看看“盖哈坦子孙”的来源，其实他们也与《圣经》有关。《圣经·旧约》部分很可能是整个阿拉伯地区上古时期的一本家谱，所以大多数显贵都可以从中找到他们的痕迹。

《历代志上》1：17 闪的儿子是：以拦、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乌斯、户勒、基帖、米设。亚法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坍。③

上面的“法勒”是先知“亚伯拉罕”的祖先。根据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解释，《圣经》中的“儿子”可能是“后裔”、“继承人”或“邦国”之意。

《历代志上》1：25 法勒生拉吴，拉吴生西鹿，西鹿生拿鹤、拿鹤生他拉，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

“约坍”又翻译为“杰克丹”，历史学家说他就是也门祖先“盖哈坦”④。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也门地区的民族与亚伯拉罕同宗，甚至因为“以实玛利”的缘故，多数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传说“盖哈坦”有31个儿子。

---

① 即《圣经》中“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Ishmael”在《古兰经》中的翻译称呼。

② 参见郭宝华，《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11页。

③ 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7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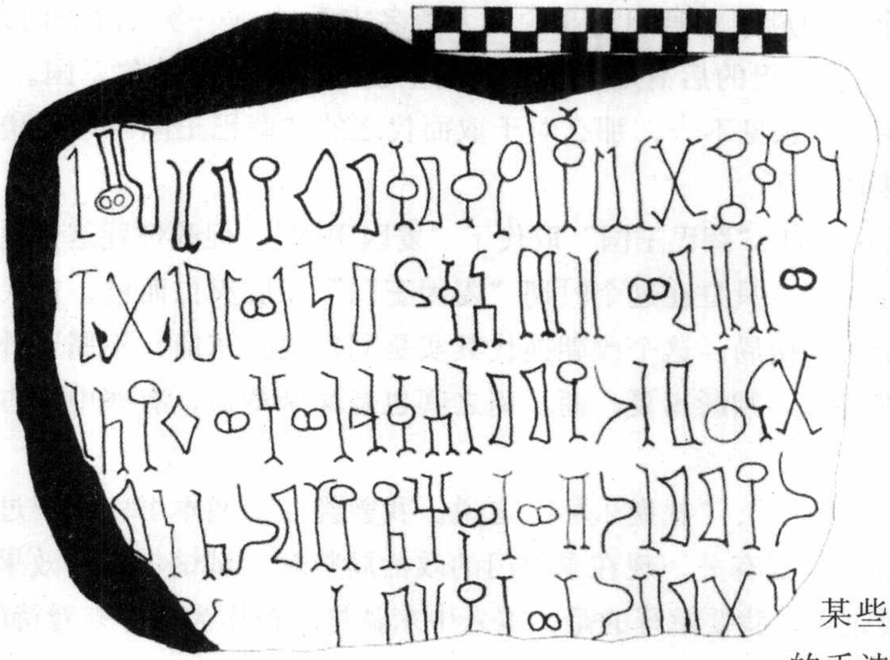
《历代志上》1：20 约坍生亚摩答、沙列、哈萨玛非、耶勒、哈多兰、乌萨、德拉、以巴录、亚比玛利、示巴、阿斐、哈斐拉、约巴，这都是约坍的儿子。

能够在《圣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家族绝非等闲之辈。按照年代推断，这是大约4000～5000年前，可以看出来“盖哈坦”的家族在当时声名显赫，作为同代的“法勒”只在《圣经》中写出了一个儿子：“拉吴”。

让我们简化一下也门的族群构成，大致是这样的：中坚力量是“盖哈坦子孙”，他们用战争赶走了早期的阿德人、塞莫德人、泰斯米人等。大约4000年前，他们迎来了后起的以实玛利人，成为今天的也门阿拉伯人。他们多属于闪族人。

除了《圣经》与《古兰经》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家谱之外，对于也门王朝的建立以及时间几乎是众说纷纭。

首先，学界对于公元前2000～1000年的“麦因王朝”的看法就不统一。大概情形类似于人们对于中国夏、商的看法，因为证据不足而模糊不清。不过中国学者都同意“麦因王朝”无论早晚都是也门地区的第一个王朝。由于我们的研究目标是在商朝，我们还是折衷一下不过多考虑4000年前开始的中国夏朝，商朝还是很有希望在也门这里找到一些证据的。这些王朝的建立者皆为“盖哈坦”后裔。比较肯定的是公元前14世纪“麦因王朝”已经存在。甚至还有一个说法是：麦因王朝就是在公元前14世纪出现的。请注意这样一个巧合，中国的商朝甲骨文至今发现的开端正是在“14世纪”的3300年前商武丁时期。



南阿文字石刻

《圣经》等宗教文本为了某些特殊用意会以象征或避讳的手法来表达一些历史事实。除了“以扫”的“殷”之外，我们在也门这里也可以猜想另外一些象征性联系，比如“红海”有可能就是《山海经》里的“赤水”，从而对应了“殷”。也门以与南亚和东亚的“香料之路”而“商业”发家，同时也门人以“精于商业”闻名，所以中国有“商”？有人会笑话我说，外国人怎么会说中国话，其实这里是个脑筋急转弯，那时候中国人就是“外

④ Y、J、G这三个音在中国许多地方可以互转，Y、J之间的转换比较常见，但它们与G之间不常见，但在今天中国南方一带却是常见的，比如“街道”、“解释”当地人多半都会发音为“街(Gai)道”、“解(Gai)释”。以上描述阿拉伯祖先而发生在《圣经》中的变音规律与中国地区奇怪地得到对应，这个特殊语言现象在两地文明同源的解释下就不奇怪了。

国人”，他们很可能说同一种语言，“商”在当时就是“商业”的意思，所以固定为一个朝代名称也未尝不可，我们就是他们的后人当然就继承了当时的称呼。或者说，三分之二的甲骨文至今也没有破解，说明甲骨文本来就很“外国”呢。

在历史书中获得这个信息非常高兴：与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游牧特色不同，南部阿拉伯地区农业占据重要地位！

一直以来，反对“西来说”的理由之一是“西方”（西亚或中亚）是游牧民族，农耕并不发达，而中国远古时期就显露出农耕社会的特征。南部阿拉伯半岛的农业特色假如还不能证明中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但起码已经破解了农业与想像中的游牧不对称障碍。

大名鼎鼎的“萨巴”来历

今天在也门，人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集团或机构以“萨巴”命名，学校、医院、通讯社，不一而足。“saba”有很多意思，其中之一是“奴隶”。其中一个传说是这样的，“盖哈坦”有一位曾孙叫阿卜德·萨姆斯，此人能征善战，在掌握王国统治大权之后改名为“萨巴·本·盖哈坦”，他常常将战俘沦为“奴隶”而得名。“希木叶尔（Himyar）和凯赫兰是萨巴的儿子，这两个人构成了盖哈坦后裔的两大著名支系，……今天的也门人，大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个人”①。萨巴的后裔建立了后来的萨巴王国与希木叶尔王国。

假如说麦因王国的出现大家意见不一，那么对于取而代之的“萨巴王国”局面稍有改变。因为它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有一种说法是，公元前630年“萨巴王国”取代了“麦因王国”。但我怀疑这个说法并不确切，萨巴应该早就存在了，只是在这个时期“麦因王国”彻底灭亡而已。古代许多国家都存在这样的王朝错落的格局。这个改朝换代其实是同宗内的革命，不属于外族入侵。假如将其置换到中国境内，判断出夏、商、周之间也是同宗革命，有些中国古代的问题就很好理解了。

中国在东周期间有“上天变乱”、“礼崩乐坏”之说。我曾经在前两本书中推测过这个政治变乱与中东的某些政治巨变有关。现在拿也门的政治局势套入试试，看看效果如何。假如有人指责我的假设过多，我要解释的是，本来中东就是应该作为一体来看待的，所有这么多的假设其实都基本相同更能说明他们的谐振一体性，或者说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中国夏朝始于公元前2046年，有人认为麦因王朝也始于公元前2000年之前。不过要补充一点的是，麦因王国并不局限于今天的也门，它也蔓延在沿红海的沙特一侧。

中国商朝始于公元前1600年，红海东岸的也门附近无相应事件，但红海西岸的古埃及有。

中国甲骨文出现于公元前1300年，也门“公元前14世纪”是一个特殊的强盛时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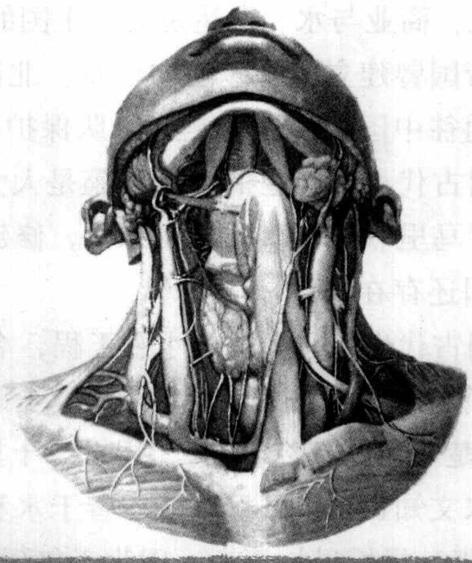
① 郭宝华，《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12页。

中国周朝建立于公元前11世纪，也门著名的“萨巴王国”出现于大约公元前10世纪。

中国东周“春秋”于公元前770年开始；“麦因王朝”同期衰落，一些控制区域纷纷宣告独立，王权失控。麦因王国在公元前630年被“萨巴王国”消灭。公元前8世纪开始，萨巴王国也卷入了一场持续近3个世纪的内战。种种迹象显示，红海南段的文明由此时期开始一落千丈。

在考察以上的对应时请不要期望能得到绝对的严丝合缝的接合，那是不可能的。首先是距离太远，即便是传递信息也有一个相对的时期，另外还有消化这些变动的时间；其次是在外的类似“总督”也有逐渐自行掌权的可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或许也是当时的惯例。中东的变动不一定会同时引起中国的变化，要辩证地看两地之间的连动关系。历史本来就很复杂，不能整齐划一。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不放过任何疑点的初级研究阶段，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并拼接描画可能的基本轮廓，还不是非要得出一个非此不可的严密结论。

民族与国家的成因积淀异常复杂。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不同的力量在转化、融合的过程中盘根错节，今天想剥离各方之间的不同关系，比解剖人体还难，起码我们缺乏足够的新鲜证据。尽管从表面上是那样简单，内里之复杂足以让一切习惯“严谨”的学者望而却步。相比起来，做个外科医生或许更容易一些。老实说，我现在的工作也仅只是从外部看到的凹凸表面，距离揭示内里清晰的细节还早着呢。



古老的麦因王国

“麦因王国”得名于它的都城“麦因城”，后来“麦因城”改名为“盖尔诺”，地理位置在今天的萨那以北地区。还有一个说法是，麦因建都于Karna（现在的名字为Sadah）。

他们的族源除了《圣经》上的资料之外，考古学家认为他们来自两河流域地区，与亚伯拉罕家族出走的路线差不多，其核心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国家境内。他们的祖先经过长距离的迁徙，把两河流域的文明在也门附近地区再进行一定的本土化，当有人把这些文明元素带到东亚地区的话，我们在几千年后从地下挖掘出来之后确实很难分清他们的源泉到底在哪里。经常有人说中国的某些文明遗迹确实有西亚的痕迹，但又不能肯定，部分就是这样的原因，长期的流变扰乱了我们的视线，三星堆就属于这样的一个例证，既有两河地区的文明特征，同时也有红海两岸的特点，让人莫衷一是，难下定论。

“1870年法国的东方学家哈利菲在焦夫地区发现了马（麦）因城废墟……马因人最初用腓尼基字母记录他们的社会活动，讲古阿拉伯语”[①]。这为中国夏朝为什么使用腓尼基

语似乎做出了解释！南部阿拉伯地区最初使用的同样是腓尼基文字。但当时世界上使用腓尼基文字的民族很多。

麦因王国到底是个过眼烟云的小国还是个让人不敢小觑的大国？它是否有足够大的政治与经济势力扩展到中国去呢？

麦因人在“希木叶尔文字出现后，改用希木叶尔文字，在阿拉伯半岛、埃及、沙姆发现的希木叶尔铭文说明，马（麦）因人曾占领了南起哈达拉毛，北至希贾兹的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区域，其势力一度扩展到巴勒斯坦南部和埃及东北部，取代了亚述人、腓尼基人、埃及人的地位”②。这个历史上所谓的“希木叶尔文字”就是中国已经很熟悉的“南阿文字”，它还有第三个名字叫“萨巴文字”（Sabean Scripts）。

麦因王国是一个“神权政体”。国王就是“大祭司”，称呼为“麦兹瓦德”，后改为“马利克”，就是“国王”，成为世俗体制。麦因王朝曾经有27位国王当政，世袭制，或兄弟继承或父子继承关系。国王的权力因为一个所谓“咨询委员会”的存在而受到一定的限制。以上的描述与中国的商朝统治结构基本一致，尤其是国王的继承关系。

农业、商业与水利发达是麦因王国的主要社会基础与社会特色，商业主要经营香料。这个大帝国曾建立了许多通向埃及、北部叙利亚以及东方印度等地的商道，也有人说商路一直通往中国！商队安全由军队保护，商道的沿途驿站后来被变为麦因人的殖民地。

也门古代最具特色的水利设施是大大小小的水坝，据史料记载有几百个，最著名的一个叫“马里卜”（Ma'rib）水坝，修建于示巴女王执政期间，大约为3000年前。当时麦因王国还存在。

中国古代也有几个著名水利工程，名列中国“四大古代水利工程”之一的芍陂(今安丰塘)至今还在发挥效应。此塘坝修建于周定王十年至十六年（大约公元前613年－前519年间），楚令尹孙叔敖督建，“周百二十里，灌田万顷”，当初坝周为60公里。这个灌溉工程的水文知识可以怀疑来源于善于水利的也门人。“马力卜”大坝比中国的安丰塘早大约500年，规模恐怕更大，因为千年后该水坝塌崩的连带效应造成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动乱，可见其大也。

萨巴王国以及中国的“西伯”

“萨巴王国”是也门上古最著名的王国，也最富有传奇色彩。因为“萨巴”（Saba）的名字实际上与“Sheba”相通，《圣经》中著名的“示巴女王”（Queen Sheba）就是来自红海南段的“萨巴女王”，只是翻译不一而已（在本书中为方便迎合两个系统的表述可能分别使用这两个名称，请注意她们实际上是同一人）。

“示巴”或“萨巴”与中国西北渭河流域的“西伯”可能有某种直接或间接联系。“西伯”为周人之祖。尽管《圣经》里还有一个更古老的支系名字直接就叫“希伯”（汉语拼

① 郭宝华，《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14页。
② 同上14—15页。

音 xibo)，但实际上此“希伯”在英语中为“Eber”。“示巴”（Sheba）的发音“ʃi:bə”才更接近中国“西伯”。

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具有“西伯”爵位[①]，他是一位商臣。“文丁杀季历”之后，帝乙（纣王的父亲）后来在军事危机下为了修好竟然同意周文王继承“西伯”爵位，并赐予其征伐大权，为以后商朝覆灭埋下了祸根。有学者说关于这一时期的某些事情，古籍与甲骨文上的记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某些东西被人从典籍中抹去了。

通过文献看，实际上“西伯”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是个爵位，而且更像是一个方国、民族或者地域的名称，将远在阿拉伯半岛的“示巴”作为其殖民母国引入参考，非常合乎逻辑。看看“西伯”在《史记·殷本纪》出现的语境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西伯昌闻之，窃叹。宠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 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羑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

很明显，“西伯”既可以代指“昌”这个人，也可以代指他的国家甚至地区。这与“示巴”在也门的情形相同。还有一个微妙的变化是，自从武王执政之后，似乎“西伯”罕见。它是一种政治“断脐”，暗示了周王登基后摆脱“西伯”（即“示巴”）的姿态，还是提示了我们商王朝本身是一个包含了“西伯”（示巴）利益在内的集团？或许两者兼具？也就是说，商王朝是“示巴”等多国势力的集合，其中包含了“示巴”（西伯）的势力，但“周”却只是“示巴（西伯）”这个集团的王朝，但是自从周开始以后，周人反而不再称呼自己为“西伯”。

张光直在《商文明》一书（183 页）有关“邑主”一节中说：“每个邑主都代表着他的族、城邑和或大或小的土地，该邑主与他的族和城邑三者皆以相同的名字命名，但是，在甲骨卜辞和金文中发现的诸如此类的名字都是按照他们的亲戚关系有等级、有区别地相互结合起来。丁山辨认出了 200 个此类名字，但是，他认为实际存在的远不止这些。张秉权挑选出了 173 位人地同名者。在这些名字中有些特别突出，有学者猜测这些人可能拥有更多的土地、更大的城邑和更多族众，相应地，他们在朝廷之上也就享有更多的发言权。”毫无疑问，西伯（昌）就是这样一个“邑主”。

假如东亚与阿拉伯半岛曾经有过直接的文明交流，则“萨巴”王国对应了中国的晚商、周时期。我还一直有一个怀疑，四川一带的“巴人”民族很可能就是“萨巴人”的简称，至于他们的相貌正如罗中立所画《父亲》，并且与三星堆文明有关；但他们是从西藏而入内地还是从商地而来这还是个问题，当然也有两源汇合的可能。

① 郭旭东，《走进殷墟》，16 页。

也门地区早期陆续并列的其他王国

盖太班（Qataban）王国　“盖哈坦”繁衍出几百个支系，其中的一个支系在大约公元前9世纪中叶建立了“盖太班王国”。关于它的出现和灭亡，历史学家意见不一，但是公认在公元前350年至前50年该王国曾经在也门地区大放光彩。他们的首都在亚丁以东地区，使用希木叶尔文字，语言与萨巴方言接近，政体等与麦因王国相同。

麦因王国灭亡后，也门地区主要存在的两个王国是盖太班王国和萨巴王国，他们之间长期征战，偶尔讲和，最后似乎于公元前25年被希木叶尔王国取代。对于这段历史，学者们依然没有取得统一，我们只能取得一个大概的印象。

哈达拉毛（Hadhramaut）王国　约公元前1020年，也门东南部产生了“哈达拉毛”王国。这个王国与其他王国相比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惟一让人记住的是它生产的香料，这也是它屡次被强国侵吞的原因。公元前300年，该国被希木叶尔王国彻底征服。

奥桑王国　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面临红海，曾经占据红海对岸的部分非洲土地。这个跨洲王国控制了南阿拉伯半岛到非洲大陆的海上贸易通道，辉煌一时。公元前7世纪，萨巴王国、奥桑王国、哈达拉毛王国以及盖太班王国因为领土发生大规模战争，奥桑战败，城市遭到洗劫，最后不得不求和，苟延残喘至公元前115年。

不知道上面的四国大战与中国人所说的“上天变乱”是否也有关系。我希望不要拘谨地把这个“变乱”的影响当作是一种直接的因素——那只是一个可能。更大的可能是，这个“变乱”由于恰好在红海通往中国的咽喉水道上，所有的信息和秩序，连同战乱本身带来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东亚地区的“礼崩乐坏”。某种格局从此被打破了。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或者想确定的是，假如两地之间确实是殖民地关系的话，那么它们之间得以维系的体制是什么？隶属关系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这个两地关系的研究非常关键，哪怕找到一些当时其他国家的殖民地成例进行借鉴观察也是可以的。

小小的也门地区曾经并立过无数王国，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夏、商时期也根本不是这两个王国独树一帜。据史料看，夏商存在时它们周围方国千万，这一点与也门地区的格局也取得了统一。

希木叶尔王国　与其他王国称呼国王的名字为“马里克”或者“穆卡拉布”不同，希木叶尔王国称国王为“祖”，如“祖·里丹”。佐法尔城是其首都。希木叶尔王国存在了640年，公元前115年建国，公元525年灭亡。

这个王国势力之大，超过了我的想像。

公元400年，希木叶尔王国统一阿拉伯半岛南部，有关国王的远征故事充斥阿拉伯文学，真伪难辨。据说在征服了波斯和中亚一些国家之后，他们还征服了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并留下了后代，至今在西藏繁衍生息[①]。怪不得有语言学家认为尼泊尔人的语言与远在甘肃的裕固族人接近，而裕固族又与藏区相连。种种迹象显示裕固族同胞来自海边——他们的一些重要仪式需要海螺。古代也门人既然能从也门攻入西藏，那么跑出藏区也当在意料之中。与此有关的一个穿凿附会的联系是：也门地区曾经传说有几个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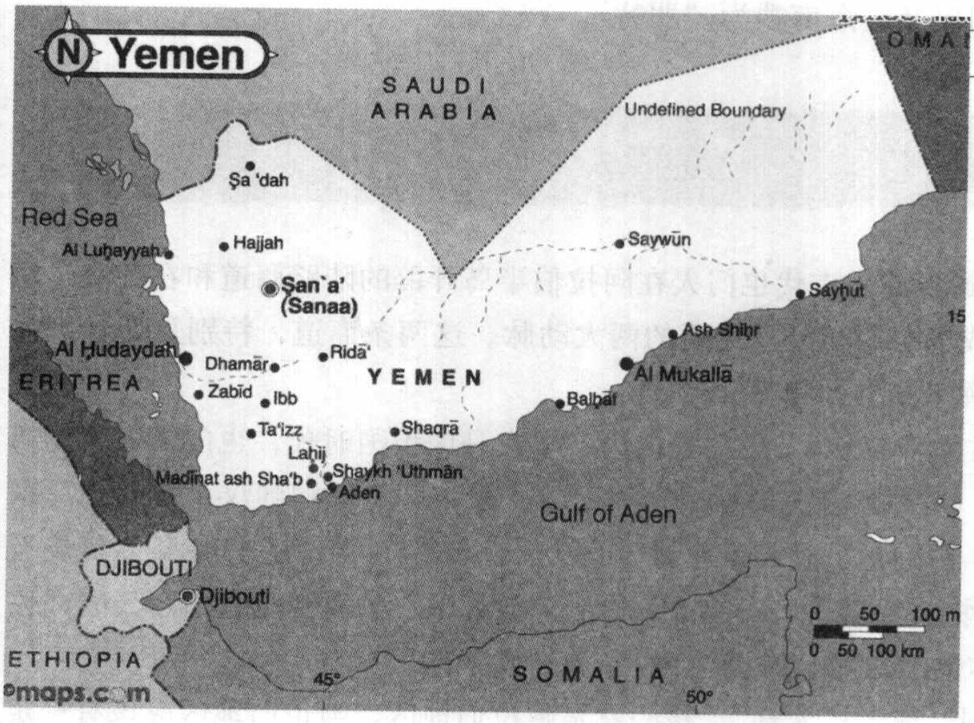
共娶一个妻子的“一妻多夫制”，西藏某些地区也有此古俗。原先我还以为是贫穷导致的，现在看来更多可以归结为一个传统习惯。另外，印度某些贫穷地区也有此俗。后来看这个风俗曾经风行全世界呢，细究之下，发现美洲土著、非洲土著、新西兰土著都有此俗。②

希木叶尔王朝的语言体系与麦因、萨巴王国都是一个因袭体系。

希木叶尔人主要信仰拜物教，星宿崇拜在他们的信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所谓“占星术”是也），所以这里天文的发达是必然的。中国在商朝晚期的甲骨文里就已经有日食与月食的记录了，也显示了天文的发达，另外“摘星楼”在晚商纣王时期的出现似乎也可视为星辰崇拜到达一定程度的一个体现。在伊斯兰教兴盛的7世纪之前，也门地区先后接受了犹太教与基督教。

综合的也门

也门人善于金银制造，玉石工艺、石刻也是其长技。在雕刻人像时，他们有把人眼做成宝石的习惯。这个使用宝石镶嵌人眼的习惯我们在《历史也疯狂》的中山国那里就已经见过一例。



今日也门地图

古代也门人使用的语言统称为“南部阿拉伯语”，也叫“希木叶尔语”。据说这个语言最初应该是象形文字，后来改革为拼音文字体系，演变为29个字母，它也被称为“木斯奈德”文字，并至少有3500年左右的历史。

5世纪之后也门文化开始衰落，与北方文化碰撞之后也门的语言连同文化彻底消失。公元575年，也门成为中国曾经的邻国——波斯的一个行省。

曾经觉得中国离中东很远，但从也门的历史看，中国与也门似乎只有一纸之隔。假

① 参见郭宝华，《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24页。
② 参见吴天明，《中国神话研究》，356页。

如不提远程海路的话，中国与也门之间，一会儿从西藏相连，又一会由波斯串起，无论如何也门与中国之间在古代不会太为隔绝。

南部阿拉伯半岛到底距离中国有多远？南方海路（最短）为大约“6000多海里”。陆地直线距离从霍尔木兹海峡到中国西北边境大约为3000公里，相当于新疆喀什到甘肃兰州的距离；假如涉过阿曼湾沿印度河则只需穿越1000多公里就可抵达中国西藏地区，相当于北京到湖北的距离。假如有一匹好马，最短只需要2天就可到达中国边境。假如是负荷沉重的商路，需要的时间自然很长。

也门处于一个非常奇特的地理位置，这使其在人类商业活动发展初期处于核心地位，并且曾经迅速发达起来；在没有飞机汽车这些现代化交通工具之前，曼德海峡几乎成为整个世界的交通命门。它位居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印度乃至中国之间，是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海上通道咽喉。世界上几个大区的远距离贸易必须通过南部阿拉伯地区，后来的罗马、希腊要到印度洋和东亚也要有求于辖曼德海峡之险的萨巴王国。这个突然而来的“运气”应该开始于大约4000年前。因为之前的消费人群还没有培育，商业概念还不完全，除了埃及与两河流域，4000年前的任何地区其实都接近真正的原始社会。加上这个地区出产香料，更是如虎添翼了。“腓尼基人”的海上优势加入也使这个地区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依靠商业通过海路纵横全世界。我的评价是，也门虽没有如两河与埃及那样发达的文明，但却成为奇特的商业“暴发户”，它的根基就是商贸经济。

古代埃及人称呼也门以及红海南端为“朋特”。

中国与也门的交往①

“也门位于东西方交通要冲，古代也门人在阿拉伯半岛开辟的陆路商道和在红海、印度洋开辟的水上商道，成为也门与外界沟通的两大动脉。这两条商道，特别是后者，在也门与中国交往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门盛产香料，销往世界各地。“也门人认为，早在马因王国时代，也门商人就扬帆动渡，抵达印度和中国。而中国有关最早中也往来的文献，则可追溯到汉武帝时代。东汉郭宪在《别国洞冥记》中列举了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年～前104年）焚烧天下异香，有沉光香（乳香）、涂魂香（苏合香）。” “涂魂国”的对音是也门今天的“佐法尔港”。当时中国人称也门国为“香国”，翻译为“勒毕国”。

汉前后所谓“条之国”或者“大食”，核心就是阿拉伯地区，与也门地区应该有一定联系。据说此国主要分为“黑衣国”与“白衣国”，这让人想起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特别尚黑或者尚白的风俗来，其间联系尚待深入研究。

《后汉书·西域传》言曰：“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蒙奇”就是今天也门的“穆哈”，“兜勒”是埃塞俄比亚的港口“阿杜利”。

① 本节内容多参考郭宝华，《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331－338页《也门与中国的关系》。引号内皆为取自本书。

北魏的使节所至国家，广及地中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各地，“各国使节也纷纷来华”。

“7世纪以前，中也间的贸易关系以海上间接贸易为主，也门商人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中发挥过重要的中介作用。中国的丝绸等商品，首先运到斯里兰卡，然后由也门、埃塞俄比亚和波斯等地的商人运到波斯湾、亚丁湾和红海。到达也门港口的中国商品或供当地需要，或沿海路继续北上抵达埃及，或转由阿拉伯半岛的香料之路北上，运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等地。”假如此类叙述为真实历史，可以推测阿拉伯海北岸国家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从上述中也之间的交往看不出航海技术方面有什么决定性的因素介入，换句话说，航海技术对中也交通不构成什么障碍，没有资料显示此时的航路是新开辟的。

中国的历史记录只能看到从汉朝开始的中也交往记录；之前没有记录并不等于没有联系。西汉时期人们在接受也门“香国”时没有显示出“友邦惊诧”，说明这种联系习以为常。向上越过短命的秦朝就是纷乱的东周。很可能在东周期间两地确实断绝了来往，中国人“忘记”了，并且由于中国文字的不完备以及地理概念的模糊，也没有留下明显的印记。但是，当时语言文字更发达的“西方”阿拉伯人却较为清晰地记得这些来往事件，所以他们承认3000年前中也之间就有联系！我看到的几本介绍也门的书籍提及也门古史时都提到也门人认为中也之间早至商周时期就有相互来往，但却并不具体。

善水的也门人以“南方腓尼基人”著称，就是形容他们的远航能力的。“(北方)腓尼基人”在4000年前就环非洲旅行了。“也门人认为，早在马因王国时代，也门商人就扬帆东渡，抵达印度和中国。”但是严谨的中国学者目前只愿意追溯到汉朝，偶尔有学者在公开的场合也以这样的描写一笔带过：“他们（麦因王国的人）甚至来到了印度和中国”。假如也门人的说法可靠，我愿意把“香料海路”最可能发生联系的时间定在麦因王国最兴盛的“公元前14世纪”。

对于也门人如何具体描述中也之间在马因时代的关系，我特别关心。但很遗憾暂时得不到，恐怕一般人也很难得到。不过我很快为也门人的说法找到了依据：中国商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中就发现了6800多枚阿拉伯绥贝！同时在殷墟中发现的贝类产地甚至远至“南非”海岸，它们的运送者很可能就是善水的“腓尼基人”！中国学者异口同声地赞同“三星堆”遗址文明来自北方的商朝或者至少两者同源，可是在三星堆中同样发现了来自也门附近海域的海贝。它们说明了商朝与红海入海口——也门的特殊联系。这些海贝除非长了翅膀飞过千山万水一头扎进中国商朝贵族的坟墓里，否则只能是也门附近的人带来的。

总体看，也门的“马因王国”与“萨巴王国”就像中国的“夏”、“商”一样，说有者言之凿凿，说无者形容其一阵风过。自己人说得热闹，外面人认为这不过是“敝帚自珍”而已。

中国大唐时期迎来了被伊斯兰教统一的阿拉伯世界。中国与阿拉伯人的联系空前繁忙。“回民”的说法就源于唐朝。南来北往的水陆商道同时大放光彩，也门的“亚丁湾”因为运送中国的货物而闻名天下，甚至被称为“通往中国之门”。我们当然也可怀疑这一

名称产生的时间是否可以更为久远。

宋朝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同样顺畅。来者为香，去者为瓷。“据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的外贸统计，广州一处所收乳香就达34万多斤”。

中阿之间最著名的联系发生在明朝，这也给许多人一种错觉，以为中国人从明朝起才具有远航能力，甚至以为两地的联系从明朝才开始。或许“中国人”是缺乏远航能力的，但是“腓尼基”人却从来就不缺乏这一能力。1405年，郑和率领62艘“宝船”带领2.78万官兵到达了包括也门在内的中东沿海。比较有意思的是也门国王那思儿回赠中国明成祖的物品，除了其他珍宝还有“猎豹、狮子以及麒麟（长颈鹿）”。这些物品应该不属于动物出口，而是“文化”引进。这种“文化引进”的源头应该不是在晚近的明朝，而是2000多年前。中国并不生产狮子，但是早在汉朝狮子的形象就很普遍了。

假如说“春秋时期”因为“上天变乱”造成中也交往的中断是理论推测的话，那么类似的情景有一个确切的记载可以进行比照。

郑和七下西洋后，明朝国策变为“不务远略”，突然实行了海禁。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如葡萄牙等却纷纷在此时大举“务远”，侵入亚非国家。局势不稳，中国与也门的往来就此中断。

假如不是距离今天很近，而且有文字记录，我们也不可能对“郑和下西洋”有所了解，即使是口口相传恐怕也只能视为传说。其实，即便是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也有许多需要清理的谜团，许多事实如今也变得“众说纷纭”起来。相对应的，3000年前的历史就更是一笔谁也理不清的糊涂账了。但毕竟我们还有想像的翅膀与逻辑工具，多少英雄好汉用血泪写就的历史真相不容如此轻易沉渊。无论多么困难艰险，一旦意识到这一任务，打捞历史就成为我们这些后人不可回避的义务。当然了，我作为个人更想知道：**我从哪里来**。

△ 郑和

今天我收到一封匿名读者来信，在谈了“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对中外旧石器的特点进行比较后，他说：“另外，郑和下西洋我认为是一次民族的自我确认，很明显按历史角度来说，在那个时代，很需要这样一次确认。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是明朝，正是中国刚摆脱蒙古族的侵略，民族刚刚走上复兴，我想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时代特征是相似的，极其需要一次民族的自我确认，所以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目地就是让他搞明白我们的民族到底是不是伟大。现在，凤凰卫视派船走原来郑和的路，不也正是在做一次民族的自我确认吗？但是很

遗憾，郑和没有到达欧洲，他并没有觉察到欧洲兴起的可能。……这次长途跋涉，可以说是失败了的，回来之后，中国依然在做自己大中国的春秋梦，直到清代。”我觉得这位读者的心得很有趣。

“民族确认”，我想他可能把我的行为也归类为“民族确认”了，因为他在上一封信中认为我的研究对于今天的“复兴”是个贡献，这很出我意外。近几天我与一个自称是“民族主义者”的年轻人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联系，他同样对中国的“复兴”抱着强烈的责任感，但是却激烈反对我的研究，或者说他不能接受我的研究结果。他说即便我的结果是正确的他从情感上也不能接受，不过他捍卫我说话的权利。他还说，假如这就是科学，那他诅咒所谓的“科学”给他感情上造成的伤害。他大概只希望情感上的“复兴”，认为科学可以不参与“复兴”，或者说“复兴”与科学发展无关。唉，假如他生活在古代有多好啊，那儿距离无情的科学还有一段安全的距离。我知道他首先是应该诅咒我的，因为他的一个伟大梦想在我的出现之后濒临破灭了，或者说受到了损害。月亮假如没有望远镜那是多么美妙的存在，科学使完美与古典浪漫受到了威胁。第一个踏上月球的科学家不知道是否听到过来自月神崇拜者的诅咒。世界有冲突，此事古难全。我打碎了许多人的美梦，但是也有人以为我给他们开启了另外的历史浪漫旅程。

我确实处于越来越多的矛盾声音之中，无论在宗教领域还是民族领域，或者学术领域，我不断听到截然不同的声音，有把我当成当代伟大圣人的，也有把我当成讨厌的学术骗子的。来信的读者多数是赞扬我的，少数是批评我的，网络上的情形则相反，形成了鲜明对照。对这一反差我的解释很简单，给我写信的人多半是我的真正读者，因为他们写信基本上都是开口就说读了我的书云云，并且我的电子邮箱地址就附在书的《后记》里。而网络上的人多半只是看了几眼网络新闻就开始发泄观感了。我对此并不担心，那怕只有一个人喜欢我的书就够了，更不用说已经有那么多的人在支持我期待我。同时，经过这些纷乱，我深切感到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由截然相反的观念支撑的，矛盾与冲突充斥着这个世界，我既不能平复关于中国文明历史的争论，也不能平复关于我的研究的争端，它们将永远继续下去，所以我终于放开了。

阿拉伯人名与中国商王庙号

在阿拉伯世界人名后面加“丁”这个发音习惯很常见，“丁”的意思是“宗教”，如“塔吉丁”、“萨法丁”、“萨拉丁”等。

核查中国的商王列表，18 代（30 个）商王中竟然有 7 人名中有“丁”。请注意，他们与阿拉伯地区的命名顺序都是一样的：名后带“丁”，“丁”出现于名字的最后，一个例外都没有。他们是：“太丁”、“沃丁”、“仲丁”、“祖丁”、“武丁”、“康丁”、“文武丁”。

对于这个“丁”或许还有人认为我又在牵强附会，因为在商王名字里，“天干”序号反复出现，“丁”只是“甲乙丙丁”之“丁”。这个“丁”是属于“天干”，但同时不可否

认，还有一种可能——它正是因为“宗教”（或“信仰”）的含义才被纳入“甲乙丙丁”的“天干”序列。①

我在《历史也疯狂》一书最后一文中说过，“甲”就是“太阳”崇拜，“乙”就是“蛇”崇拜。也就是说，“丁”这个字在具有“天干”顺序含义的同时不排除它有以“宗教”、“信仰”的本意进入商王的命名习惯，并且位列“第三”。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因为第一个原因就轻易抛弃这条线索。

我觉得以往在研究史前史时，人们过分强调“严谨”，过分注意学术研究方法在伦理层面的价值，惟恐被一些无聊的人指责为“牵强附会”、“胡说八道”，而不敢利用现有资料大胆试错，轻易否定了一些本来已属难得的证据，结果使得史前研究裹足不前。我再一次强调，史前研究由于资料难得，需要多使用所谓“牵强附会”的“加法”，而不要使用“严谨”的“减法”，否则就是自取灭亡，自寻短见。中国人恐怕过多注意“小心求证”这一端，而忘记要“大胆假设”了，这可能正中了朱大可先生所说的“中国史学界正在成为猥琐考据或庸俗实用主义的天堂”的结论。

假如上面的“丁”大家认为是特例而不足为证，我们还有其他的例证可以继续补充论证。假如仅只因为说服力薄弱而放弃这些证据，在我看来简直是犯罪。其实中国“天干”的起源本身还是个谜，或许弄清楚“天干”的起源后，商王名字里的“丁”的意义也就清楚了。

商王名字里还出现了“甲”，“乙”，“丙”等一系列“天干”。按照张光直的一种推论，30 位商王很可能并非出自严格的一个家族，而是几个王族轮流执政，那么被称呼为“丁”的这个家族可以考虑来自一个家族之内，他们因为统一的一个信仰或者一个命名习惯而出现于商王的队列之中。其他称呼为“甲”的可以考虑有“太阳”崇拜，称呼为“乙”的可以考虑有“蛇”崇拜，名字带“丁”的一方面可以考虑是某种宗教的特指，比如“萨满教”等。“干支”体系的运用被商的后裔非常看重，这似乎是一个与商朝基本同期而起的一个文化现象。

有关“丁”的疑问可以继续留意，它不是惟一得到怀疑的问题。商王名字中还有更为惊讶的发现。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再说他们是巧合似乎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太多了，加起来他们将是四个元素的巧合：两个字以及他们的顺序。

同时期也门贵族和国王都有叫“祖”的习惯，比如也门人说“祖·里丹”，意思就是“里丹”这个地区的“领袖”、“国王”等。“祖”的意思为“最高领袖”、“大酋长”等。商王里面竟然有5 人次以“祖”命名：祖乙、祖辛、祖丁、祖庚、祖甲。

“祖”的使用规律只出现于也门人名的前面，而这5 个中国商王名字的“祖”竟然也全部出现在名前，两地的命名规律一模一样、分毫不差！“·”这个分字符是现代人发明的标点符号，假如商王知道我辈的标点使用方法，那么以上中国商王的名字将是：“祖·乙”、“祖·辛”、“祖·丁”、“祖·庚”、“祖·甲”。继续的推论是，中国在商朝期间有十个按照天干分出的不同地区或家族。实际上很可能是九个州围拱于一个核心的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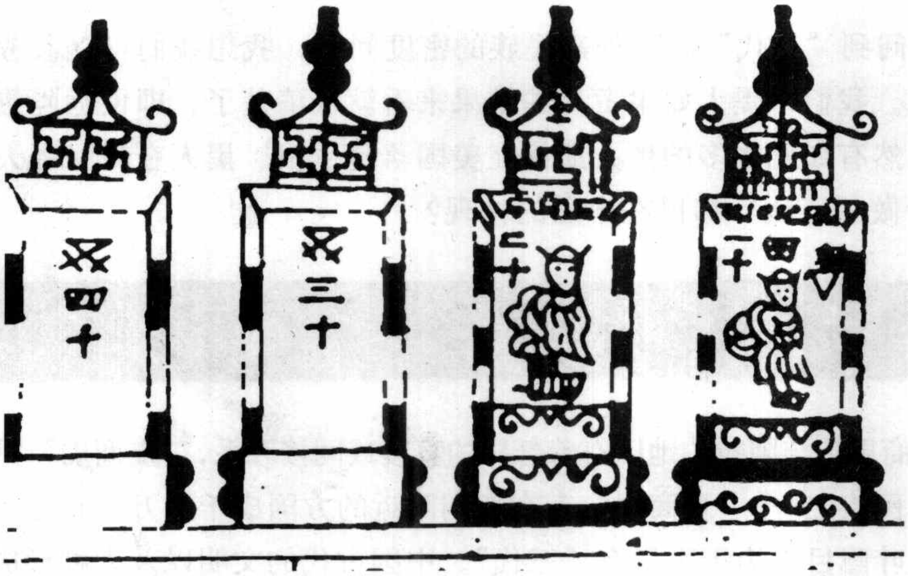
① 我还注意到商王名字全部避开了“地支”序列，但是商朝却姓“子”，为“地支”序列的首符。这其中一定有讲究。

无论是“丁”还是“祖”其实都能看出来，这都不是商王的名字。除“汤”之外我们还知道“纣”实际上就是“帝辛”。所以上面提及的多是商王的封号，更能看出来“祖”实际上就是类似“大酋长”或“国王”的一种称谓。我猜想，或许在商朝时期，某些“大酋长”具有祭司的身份，某些朝又没有这个身份，所以他们的名字有一些分别。我们知道“武丁”在为王的同时也具备“大祭司”的身份，在甲骨文里不断出现的由他主持甲骨占卜的记载也部分证明了这一点。

许多人说从商朝的宗教信仰系统里隐约可看到“上帝”崇拜的痕迹，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商朝的“上帝”古音接近“Shadai”，与同期犹太人的发音接近。还有人认为甲骨文的组字规律里似乎隐藏着《圣经》的某些宗教意味，甚至有专著出版解释类似的见解（指“Genesis and the Mystery Confucius Couldn’t Solve”、“The Discovery of Genesis”），比如“贪婪”的“婪”指一个（女）人在林下受到诱惑，就是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对照也门当时的情况，应该说这是比较可信的。很早也门地区就接触到了犹太教，不过他们主要还是拜物教。这也合乎中国商朝的情况，因为占卜是犹太教不允许的，商朝却同时盛行占卜。不同的文化因素有时会统一在某种文明中。无论如何，中国的商朝宗教是个可深加探索的重要领域。

至此，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得出结论，中国的商朝从文化到政治王权以及经济命脉，甚至宗教，与也门“麦因王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两地文字的关联，殷墟中阿拉伯绥贝的大批出现，还有明显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的石雕人像在殷墟的出土，都向我们表明：中国商朝一定与古代南部阿拉伯地区有着频繁联系！

或许有人会在这里希望我评价半年前出版的《向东》一书的体系，因为这里的叙述与那本书里的“夏商周”起源有一定差距。本书采用的是直接的世俗话语，而《向东》一书采用的是《圣经》的宗教话语体系，两者采用不同“语言”描述同一件事情，表面



△ 水书里保存的古文字

上看起来可能南辕北辙，但事实上可能存在着许多我们尚未看见的关联。企图否定《圣经》的联系不仅为时尚早，而且从逻辑角度又像是在犯“严谨”的错误。不要急于去否定那些没有充分根据否定的资料，包括《圣经》。《圣经》不仅是我们几乎惟一的资料来源，而且某些部分还是相当可信的资料来源，我会一遍遍重读《圣经》来补充我的思考。

估计会有人再次提出人种问题，我有个简单的说法。中国西部与东部的居民有同宗的成分，他们最终有些差异也是正常的。人种或面貌的成因很复杂，首先是因为环境的相对隔绝造成的各自特点。3000 多年的时间内中国人与中东人发展成目前各自的样子更是有情可原。同时还要加入人口流动的因素。至于中原地区的人种形成，每一次来到中国腹地的人们都会把男性战俘杀掉，留下女性，久而久之，中原的人种特点显示出的实际上是这个地方的女人原有的特点，而不是后来到达这里的（男性）征服者的人种特点，这个因素一定也要考虑进去，因为“夏商周三代”之前中国地区是有人的。

中国的西部地区，主要指新疆人，他们部分人在我看来属于以色列在 2700 年前“失落的 10 个部落”，他们是整个家族全部迁徙而来的，男女配偶多是原汁原味的欧罗巴人种。这就是中国境内东西部差别形成的主要原因。一般回民则因为在婚姻中不与外族通婚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他们的人种特点。实际上大家多数都是同源，只是到达中国时间的早晚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才使几个群体看起来不同。几千年来不同的饮食习惯相信也是可以改变一些面貌特征的。假如说“回民”是唐以后从阿拉伯地区而来的人，那么中国汉人很大一部分就是从 4000 年前一直到唐代的早期“回民”，两者的区别只取决于时间早晚与混血程度。

但无论如何，我关注“差异”胜过关注“统一”，为什么东亚地区有相对统一的特点而与外部形成整体的差异，我认为大约在夏前后可能有一个民族曾经在东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由于这个群体的人口基数很大，所以大多数的后来者都被他们同化为今天的所谓蒙古人种。我推测他们为夏人，或者距离夏很近的之前的一批人，是来自红海的黑白混血人。

假如有人问到“三代”时期外来民族的密度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参考美国建国后的外来人口问题。我们以黑人奴隶贸易的结果来看就很清楚了，即便远隔重洋，即便黑人极力抗争，依然有如此之多的黑人最终在美国落地生根。黑人在美国今天的成分或许可以约略可以看做“三代”移民在中国的体现？

面对也门历史对夏商周联想

无论“夏商周”与阿拉伯地区有着怎样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夏商周”只是中国在 3000 年前的国家或民族之一。“夏商周”存在期间附近的方国成千上万，它们三者仅只是最大而已，不可一叶障目以为天下只有“三代”。中国古代的文明以及人种形成要比我们想像到的复杂得多。

张光直先生曾经说：“据顾祖禹（1624-1680 年）的统计，夏禹时代有国万余；到建

立殷商的成汤时，存者三千余国；至灭商的周武王时期，商余一千八百国；东周初年（公元前771年），存一千二百国；迄春秋末年（公元前481年）仅剩下百余国，而可称大国者唯十四”[①]。

一言以蔽之，当时的世界“小国林立”，并不是今天想像的那样统一，它反映了原始社会的自由散漫状态，更给人口的频繁自由流动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当初的也门地区实际上也差不多，几个王国错落并立。

常常翻阅“夏商周”三代王表，我产生了一些迷惑，但也有了一些新的设想。

从现有的“三代王表”看（参见本书结尾“附表”），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统一共性。比如“夏王”多为单字，商王多用“天干”，周皆为“王”。从夏商周一直到秦来看，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中国的统治者一直在“升格”：夏、商从王表上看其实他们都没有被称呼为王，他们只有名字，很可能这个期间的首领只是相当于酋长类；但是到了周，“王”出现；到了秦则更是由“王”而“皇”。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最直接的答案是，东亚在逐渐强大，东亚在逐渐脱离某种势力而走向独立。一直控制他们的人是谁？以什么方式达到这个控制手段？这是个问题。

另外，关于三代之间的宗亲关系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假设。我则直接去他们的名字里去寻找共同点。三者宗族里都有名“Qi”者，夏为“启”，商为“契”，周为“弃”。另外一个是“kang”，夏王有“太康”、“仲康”、“少康”；商王有“太康”和“康丁”；周王直接有“康王”。以上皆可视作三者之间的文化关联。名字，尤其是帝王的名字或者封号，肯定是当朝文化的一种象征。

我有一个特别重大的设想：中国“三代”不是一般的联姻，他们是同宗的，后来才慢慢分化为不同的“国家”。

并且，上面我们提到过的三个“Qi”实际上为同一个人，“商朝”就是由“夏启”的另外一个后代发展而来。“商契”12代后有“商朝”，而这个数目“12”恰好与“夏启”之后的夏王到“商汤”的数目基本一致，15人。“夏启”实际就是“商契”。从商契到商汤大约12人平均一代为大约33岁，从夏启到商汤大约每代平均为26岁，都比较可信，并且我尤其倾向于后者。

可以假设这个“Qi”有很多儿孙，以至支系还延续到西伯周朝。“周弃”之后“十一代祖先”加上“古公dan父”、“王季（季历）”和“文王”才有周朝。周朝在“三代”最后，理应“Qi”与周开国帝王之间有更多代才合理，最好是20代左右才更符合我的推理，但遗憾的是只增加到15代，这将意味着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前的“夏启”到“周武王”的大约1000年间是由15人跨越的，确实有些牵强，但据说文王百岁（可查具体），剩余大约900年由14人平分为65岁。此间还需考虑，由于“文明”的发展，时代愈近帝王的年岁应该愈长，商武丁一人在位的时间就有59年。但是我还有一个更充分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缩短，实际上它是由于历史的“模糊”造成的。依照《圣经》来看，有继承权的人才入家谱，没有继承权就不写下来。周朝距离夏朝最远，在夏朝时周朝无望为王，到了

①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13页。

商朝依然还有遥遥500年，转眼1000年就过去了，这对于周人详细回忆他们的祖先造成了困难；尤其是假如过分在意自己的族系会被看做嫌疑谋反就更会加重这个困难。商朝与“夏启”之间只有十一代，他们的世系很快就能追溯出来，但周却因为距离遥远而模糊了很多代，只知道最尊贵的“Qi”是他们的祖先，最近的几位祖先也记得，所以这个“15代”可能只是个大约数。

对于“Qi”这一推断我还有一个怪异的资料提供，我知道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让大家接受（甚至是逻辑的接受）都很困难，但我还是要告诉大家，在此后的一本书里大家将不再会为之感到突兀。在地中海的马耳他小岛上有一个古老的神庙，它的名字叫“Hagar Qim”。它的时间一般推断为4500年前左右。前者可以翻译为“夏甲”，后者可翻译为“契”“启”“弃”“齐”等等，合起来就是“夏启”。当然推断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夏朝的国母“夏甲”是可笑的，但是不敢猜想这或许是与“夏甲”有关的祖先一支也是“不严谨”的。到底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要等到夏甲的身份彻底清理之后才有结论，不过对于他们之间为什么可以发生关系我有一个简单的结论：通过腓尼基人，而夏甲很可能就是腓尼基人的一个祖先[①]。

三代的族源之近是可以想像的[②]。实际上夏、商两代都在河南偃师建都，相距只有几公里。第一代的商成汤在这里建都，是不是可以推测他们两者本来就相安无事呢？也许商就是夏的一个支系，后发灭夏而已。

另外，当时存在于中国的方国成千上万，为什么单单强调记录了此“三代”，或许正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紧密的族源关系，所以只记录自己的家事，无关的就根本不记存，并且也只有这个民族有记录历史的习惯（如犹太文化），所以我们今天只看到了“三代”。连南方三星堆那样的方国竟然没有人记得，不失为一个旁证。

假如以上推论成立，则我们只需要证明“三代”任意之一与红海的联系，其他两朝的族源也就昭然若揭了。

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末代君主夏桀的名字“履癸”是夏王中惟一包含“天干”的，他是夏王中的最后一位，与商王的取名方式一致，具有文化上的承上启下作用。这说明了什么？要么说明了“天干”文化的起源在夏商变化之际，要么说明了他们夏与商的同源，或许还暗示了在这个期间发生了大的历法变革。“天干”的出现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天干”的来源在哪里，是个关键。遗憾的是至今还是众说纷纭。不过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先生在《国文语原解》中认为，“若从两方面尽搜罗其异形异音而校合之，安比二十二文，非即腓尼西亚之二十二母乎？[①]”不仅梁启超认为干支系统与西方可能有关，而

---

① 即便腓尼基人并不严格等于阿拉伯人，但实际上这两个民族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由于他们处于不同的时期，并且前者的称呼更多重视了海上职业，引起了对他们两者的误解，在许多情况下，腓尼基人就是阿拉伯人，但阿拉伯人却并不等于腓尼基人。

② 作者此文大约写于2004年底，但在此书付印前夕读到张光直先生《商文明》一书，其中338页引用陈梦家的话：“窃疑夏之十四世，即商之十四世，而汤武之革命，不过亲族间争夺而已。”似乎与作者的观点一致。张先生自己认为：“但是，值得怀疑的是，夏代帝王为商代先王，特别是从我们所描绘的新考古图景。”实际上张先生否定了三代直接更替，而同意他们是一种并存关系，或者换句话说：商是夏的小国，周是商的小国（339页）。

且直接把腓尼基（即腓尼西亚）文字直接与我们的文化对应起来就很有意思。难道他也注意到中国的文字与腓尼基有关？这个问题不得而知。郭沫若则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中认为，十二地支起源于巴比伦[②]。不过爱国学者为这些说法感到气愤，提出了另外的干支在中国独立起源的解释。

对于商代王表，张光直先生有一个推论非常有意思。他说："关于商代庙号世系的问题，过去有种种说法。在我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商王的庙号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比如，丁和乙、甲在隔世代上的相互交替。我当时在耶鲁大学教书，与一位专门研究亲属制的语言学家朗斯伯利（Lannsbury）同事，我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启发。怎样解释商王的王位继承问题？中国历史上的王位继承都是从父系的父子相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齐、宋、晋等国的传承都有变化，但又不很清楚，不能拿来做解释商代的基础。但是在人类学上，有各种进化程度不同、类型不同的等级社会，可以供给我们关于王位继承的法则和蓝图。这些蓝图不是只有父死子承，还有很多花样。我参考这些蓝图，根据中国古代文献和考古的材料，提出商代的王室分为两个大支，这两支隔世轮流执政，这样就解释了商王庙号的丁和乙、甲隔世代有规律分布的问题。……商代的王位继承以及上古史的许多问题，都是很复杂的，它要求我们有开放的心胸，客观的态度去处理。当然商代王位继承的各种说法都不能完全解释材料，这个问题还在讨论中。[③]"

对于这个隔代相传的模式倒是可以试错。也许是也门地区当时的两个小国联手建立了中国的商。因为当时生活在萨巴王国附近的小国确实不止一个，这是条很好的思路，可以一试。

① 参考网易科技报道网络版转《中国青年报》文章《天干地支的发明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把中国文化与腓尼基文字联系起来，日期是2005年3月12日。

② 参考网易科技报道网络版转《中国青年报》文章《天干地支的发明者》。

③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198～199页。

第二部分　伊甸园与《诗经》乐土

到非洲去

“南阿”文字在非洲也有一个使用者，并且这个使用者目前竟然将其尊为国语，我们当然不应该放弃这里。

穿过大约15英里的曼德海峡，我们从也门来到了红海西岸。这一片中最大的国家就是埃塞俄比亚，他们的国语叫阿姆哈拉语(Amhara)，一般我们会见到解释说它属于闪族语系，似乎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尽管经过3000多年，阿姆哈拉语看起来与它的根源“南阿”差距遥远，但是想想我们有多少人认识我们的甲骨文就知道这个变迁是可以理解的。这片非洲丛林里埋藏着我们尚未知道的秘密。即便是面对他们的地图我也有掩饰不住的兴奋。

ሀ	ለ	ሐ	መ	ሠ	ረ	ሰ	ሸ	ቀ	ቈ	በ	ተ	ቸ	ኀ	ኈ	ነ	ኘ	አ
h	l	ḥ	m	ś	r	s	š	q	qu	b	t	č	ḫ	ḫu	n	ñ	ʾ
[h]	[l]	[ħ]	[m]	[s]	[r]	[s]	[ʃ]	[kʼ]	[kʷ]	[b]	[t]	[ʧ]	[h]	[hʷ]	[n]	[ɲ]	[ʔ]

ከ	ኸ	ወ	ዐ	ዘ	ዠ	የ	ደ	ጀ	ገ	ጐ	ጠ	ጨ	ጰ	ጸ	ፀ	ፈ	ፐ
k	ḫ	w	ʿ	z	ž	y	d	ğ	g	gu	ṭ	č̣	p̣	ṣ	ẓ	f	p
[k]	[h]	[w]	[ʔ]	[z]	[ʒ]	[j]	[d]	[ʤ]	[g]	[gʷ]	[tʼ]	[ʧʼ]	[pʼ]	[ts]	[ts]	[f]	[p]

▶ 经过3000多年演变的南阿文字：阿姆哈拉语。

从地中海东南角一直到红海中部地区，这里的西岸延伸着亲切的埃及版图。依次向南排列的国家，在今天称为：苏丹、厄里特里亚、吉布提和索马里。我们关注的主角“埃塞俄比亚”隐藏在后面，它与红海之间隔着三个国家：厄里特里亚、吉布提和索马里。由于厄里特里亚、吉布提相继独立，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实际上成为一个内陆国家。我在本书里更多是以古代的埃塞俄比亚地区来叙述的，所以在下面我们将尽量不提其他几个国家的名字，但在这里可以对他们先做一个简要了解。

◐ 今日红海沿岸国家地图。红海面积为44万平方公里。它的特殊之处是这是个世界上盐度最高的一个海，原因是周围缺乏河流将淡水注入其中稀释。从而也能看出两岸属于相对干旱地区。

历史上埃塞俄比亚以北的国家，连同它自己的一部分，都曾经是古埃及的领土，分分合合，一直到今天。

以上几个国家中索马里(Somalia)比较大。它的古国名曾经叫“邦特”(Punt)，其实也是“朋特”，它同样以香料闻名天下，盛产乳香和没药①。据说“邦特国”建立于公元前1700多年前，与中国夏朝同期。索马里属于农牧并重国家。这里的宗教与埃塞俄比亚很相似，现在国民主要为穆斯林，但也有少数天主教徒。这个国家由于在也门的对面，实际上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地区，但本书会集中于它的临国，让埃塞俄比亚做它的代表。

1993年厄里特里亚独立，历史上该国曾经长期受埃塞俄比亚统治。吉布提和索马里也长期以其他形式与埃塞俄比亚发生联系。这几个国家在人种、语言、宗教信仰、地理环境方面都很接近，他们与红海对岸也门相似的地方是也生产香料，并且在一些特殊时期双方一起成为跨海王国的一部分。

今天人口只有30万左右的吉布提（Djibouti）历史上一直属于苏丹治下。1977年6月27日宣告独立，定国名为吉布提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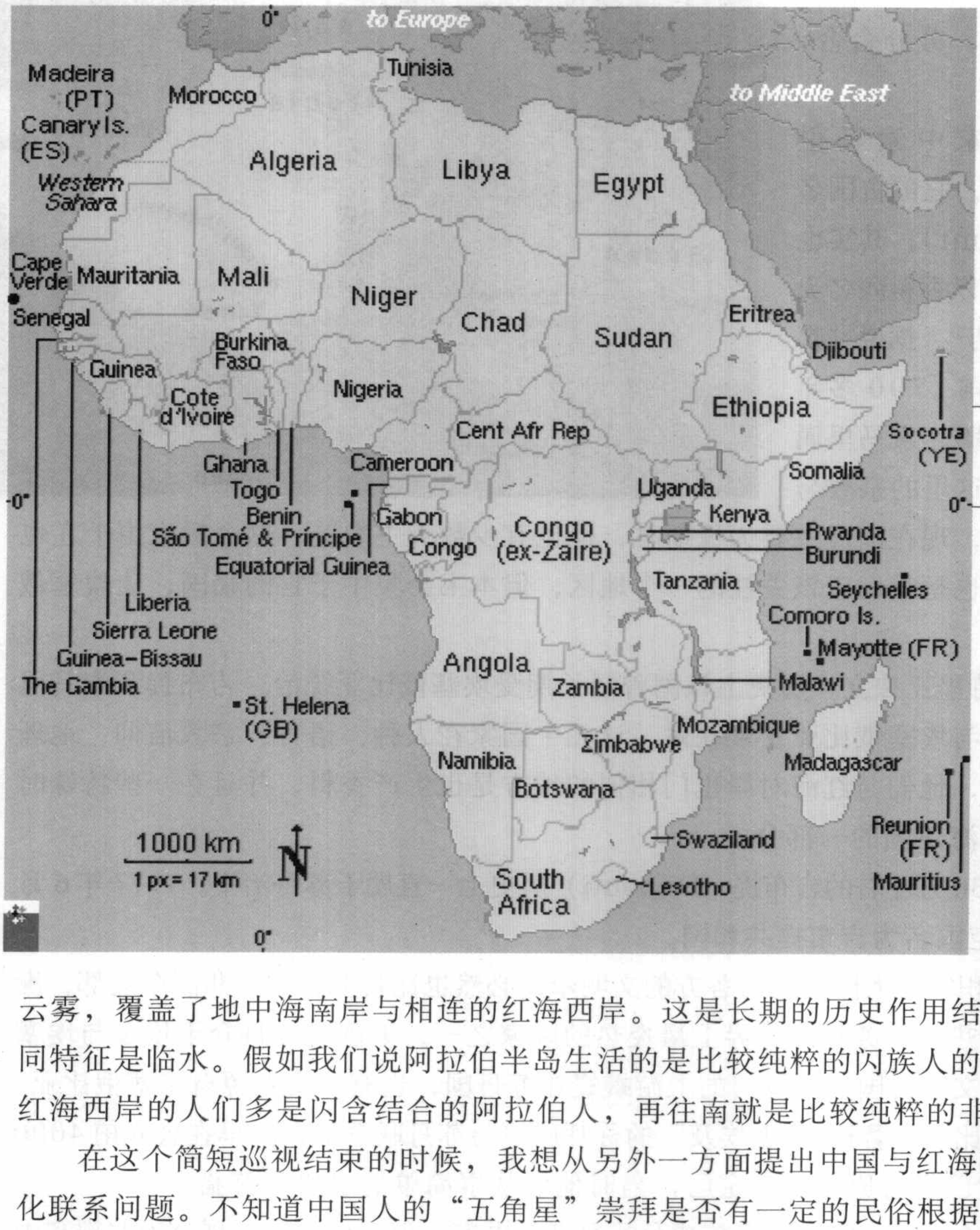
苏丹是非洲面积第一大国，它与各方的文明牵连必然也比较多。位于非洲东北部，濒临红海，由于地处热带，苏丹是世界上最炎热的国家之一。地理上苏丹介于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之间，是个文明古国。尼罗河的上游蜿蜒在苏丹国，也有分支发源自埃塞俄比亚。事实上苏丹以“努比亚”著称，“上埃及”的称呼应该与苏丹联系最大。早在公元前4000多年，苏丹境内就已经有原始部落定居，当时他们从事简单的农耕和狩猎。

苏丹有600多个部族，是非洲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国家，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北部和中部的阿拉伯人、南部的非洲土著黑人。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部分人信奉基督教和拜物教。

① 从中国的“乳香”(frankincense)和“没药”(myrrh)取名上不难看出，这两个字多半属于外来语。“没药”很明显就不解释了，“乳”则来自第一个音节“ran”。

当你在苏丹看到一些人与中国人相像千万别惊讶，本来古埃及（包括苏丹）许多雕像完全就是蒙古人种的模样。几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苏丹的一位领袖出现在电视上时，我差点喊出声来："这不是个标准的中国大爷嘛，什么时候跑非洲当国家领袖了。"当时的惊讶转换为今天的认真探察，其中有太多类似的感性经验在支持着我。

假如你深入查看以上几个国家的文化与历史时，你会发现他们如此接近。何只是它们几个，我在查整个非洲北部沿海国家概况时，从索马里到大西洋岸边几乎都大同小异。其实不用奇怪，它们不仅今天同属于阿拉伯或伊斯兰文化区，在大约4000年前他们在文化与种族上的密切联系就已经开始了，比较确切的证据是，他们大多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原始迦南语或腓尼基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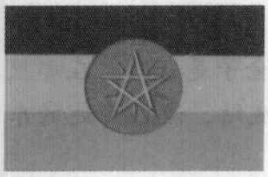
◀ 整个非洲北部沿海国家

从地中海到红海的西岸地区，在人种上也不属于非洲尼格罗人种，而是属于带有阿拉伯色彩的欧罗巴人，他们似乎是被海风吹过来的薄薄一层云雾，覆盖了地中海南岸与相连的红海西岸。这是长期的历史作用结果。这个区域的共同特征是临水。假如我们说阿拉伯半岛生活的是比较纯粹的闪族人的话，那么北非包括红海西岸的人们多是闪含结合的阿拉伯人，再往南就是比较纯粹的非洲黑人了。

在这个简短巡视结束的时候，我想从另外一方面提出中国与红海南端这一地区的文化联系问题。不知道中国人的"五角星"崇拜是否有一定的民俗根据，但"五角星"绣上中国的国旗应当不是偶然。红海西岸的几个国家，吉布提、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他们的国旗也都由"五角星"组成，尤其是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国旗上的五角星与中国同样：黄色、五角。并且吉布提、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三国在国徽上也放置了"五角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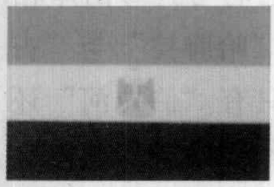
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一地区古代“星宿”迷信的延伸。当然了，世界上用“五角星”做国旗装饰的还有很多，比如美国，不能都看做是一种民俗或文化延伸，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在大卫盾以“六角星”以及犹太文化的象征闻名天下的同时，“五角星”曾经以“所罗门星”而著称。不过，在今天的犹太文化或者西方文化中，“六角星”被认为是神圣的，而“五角星”却因具有异教的性质而偶尔被视为邪恶的象征，实际上被六角星群体视为异端。《圣经》中的所罗门确实也有与异教徒妥协的严重嫌疑。

△ 也门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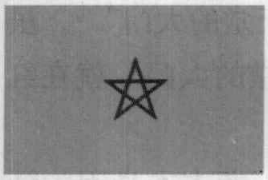


△ 埃塞俄比亚国旗

埃及与也门今天国旗则不约而同地选择另外的图案：红、黑、白三色横条旗，两国的国徽也同时都选择了“鹰”。从这些共同点可以看出红海两岸密切的文化联系。埃及与也门之间的文化渊源由此可见一斑。周围地区或者历史上有紧密联系地区之间的国旗要么在色彩上接近要么挑选相仿的图案，都展示了文化的联系。



△ 埃及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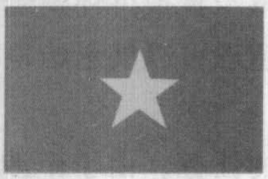


△ 摩洛哥国旗

从《圣经》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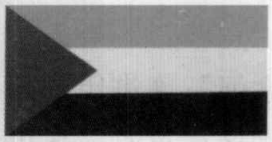
挪亚三个儿子之一“闪”的后代就是今天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以及周围地区包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内的族群。

“含”是挪亚的另外一个儿子。含族多被认为生活在今天的非洲，准确地说是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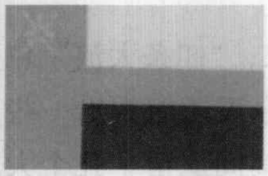
△ 索马里国旗

位于北非的埃塞俄比亚居民历来自认是“含”的后人“古实”这支的后代，他们今天还说一种“古实语”（ Cushtic langu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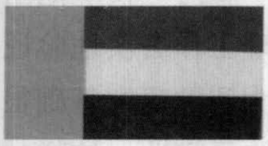
△ 苏丹国旗

较近的古代埃塞俄比亚是以“阿比西尼亚”的历史名称与也门发生联系的，他们入侵了也门。但实际上北部埃塞俄比亚人就是从也门迁徙过来的阿拉伯人。一般认为“萨巴文化”在红海两岸都有深远的影响，甚至他们就是一个跨海国家。一些正史说，也门居民在公元 6 世纪移居来到“库施”或者“古实”。



△ 阿曼国旗

《历代志上》 1：8 含的儿子[1]是：古实、麦西[2]、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腓拉、撒弗他、拉玛、撒弗提迦。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但。古实生宁录；他为世上英雄之首。麦西生路低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希人、迦斐托人（从迦斐托人出来的有非利士人）。[3]



△ 叙利亚国旗

---

① 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716 页解释：“儿子”可能有“后裔”、“继承人”或“邦国”之意。

② 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716 页解释：“麦西”指“埃及”。

③ 1:8 The sons of Ham; Cush, and Mizraim, Put, and Canaan. And the sons of Cush; Seba, and Havilah, and Sabta, and Raamah, and Sabtecha. And the sons of Raamah; Sheba, and Dedan.

△ 吉布提国旗

以上提及的人、民族和邦国多数出现在北非和地中海东岸地区。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含族后裔。上面《圣经》引文中的最后一个“示巴”才是我们熟悉的“示巴”(Sheba)。大致可以推测，这个“示巴”祖先距今应该有五六千年的历史。

许多人推测《圣经》里的“伊甸园”的位置似乎与“含”后裔的居住地有些关系：

《创世纪》 2:10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

2:11 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希底结，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

看到 “哈腓拉”与“古实”时我很兴奋。并且结合出产我认为它们与红海西岸相符。但我也看到了一个否定：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解释说，这里的“哈腓拉”与“古实”都不是我们上一段所指的名字，两者应该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只有“伯拉河”还是我们熟悉的“幼发拉底河”，甚至“珍珠和红玛瑙”居然也可以被译作“发香的树脂”。说实在的，我很是怀疑红海与“伊甸园”有些什么联系，因为红海的入海口“亚丁湾”就叫“Gulf of Aden”；另外，“Saba (sheba)”一词也可以指“通往天堂的大门”①。虽然我们不知道“天堂”（伊甸园）在哪里，但起码我们已经知道了“天堂的大门”就在红海南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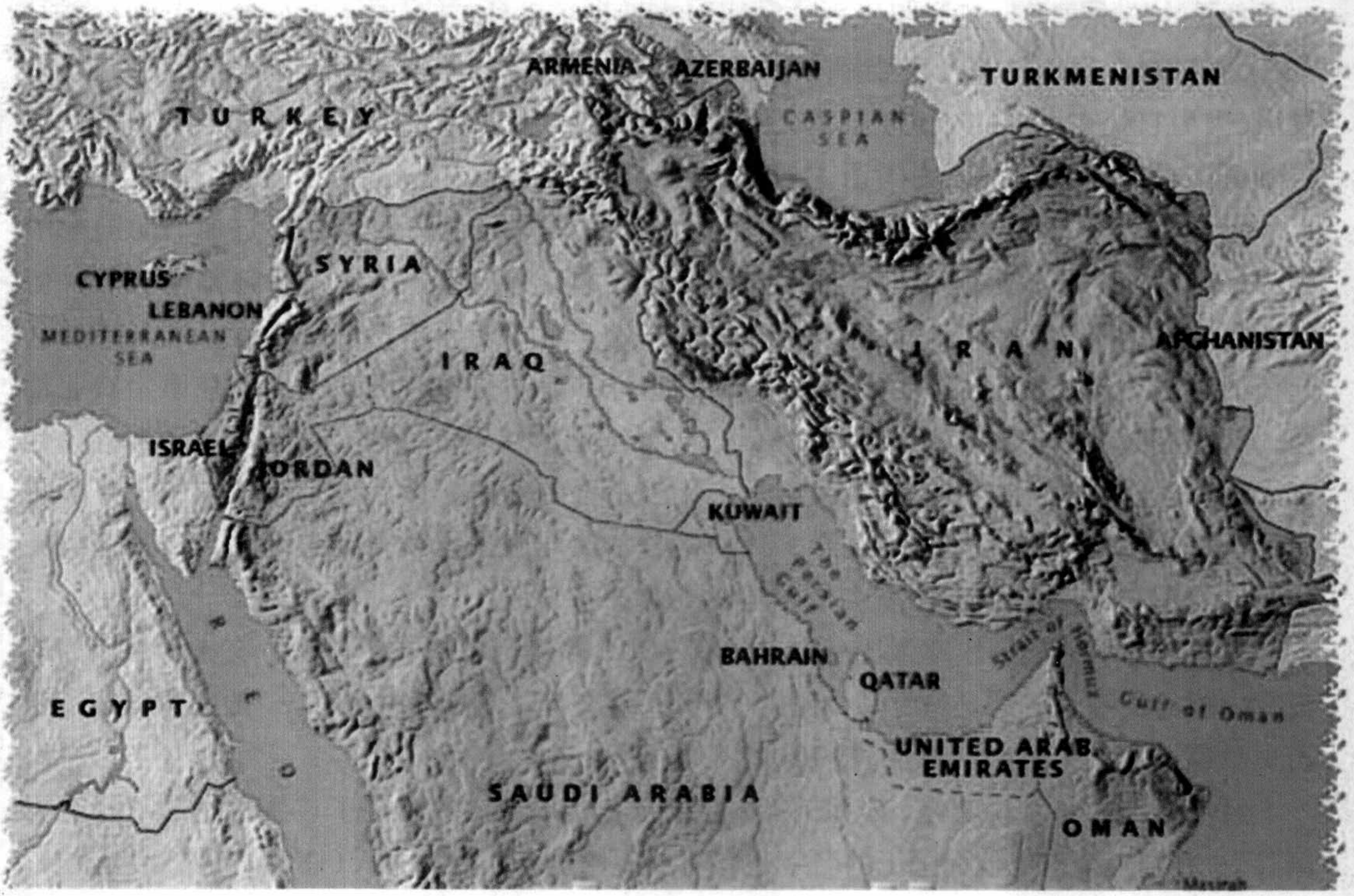
我对“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的这一解释持保留意见，《圣经》考古本身因为证据不足充满了争论，当然也包括《圣经》考古。对待史前我们确实应该一直报持怀疑态度。我实在还有其他的一些推测与此联系在一起，到底何种推测更有道理可以展示给世人分辨。

寻找伊甸园不仅是个宗教目标，而且是许多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任务。由于牵涉到印证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许多结论，寻找伊甸园也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解决掉这个问题，会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假如给我一个胡乱猜测的机会，我愿意把波斯湾、红海都看做“大河”凑进伊甸园必须的“四条大河”，因而“伊甸园”也就在阿拉伯半岛及其以北附近地区。这是一条思路。

当我们视线南移，尼罗河当然也是条“大河”。红海与波斯湾退出来，“四条大河”包括“两河流域”的两河、尼罗河，还有一条隐河——它消失了，但是今天还能看出一些痕迹，它是从西奈半岛的阿巴湾一直延伸到叙利亚境内的一条大河，其间遗留了几个大湖如基尼烈湖、盐海等，还有断断续续的河流连接着这条“河”。这条“隐河”仅从地图上粗看也应该有近2000公里长。我很愿意放弃目前的中国史前史的推理工作去实地验证这条“隐河”。表面看这与我的工作无关，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的研究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圣经》。验证《圣经》的历史可靠性就是在验证我的研究的可靠性，这样的工作我很乐意做。

① 拉尔夫，《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73页。



△ “隐河” 地形显示从叙里亚一直到红海曾经有一条河流，现在只有几个湖泊在原来的河床附近。

《圣经》考古中对于伊甸园比较著名的一个推测是，伊甸园已经被海水彻底淹没，具体位置在今天的波斯湾。园中的四条河流分别是大家熟知的“两河”；另外两条河基训河和比逊河，前者是注入波斯湾的库伦河，后者是已经干涸的沙特阿拉伯沙漠中的一条河。这一猜想的提出者为密苏里大学的尤里斯·扎林斯。伊甸园被淹没的时间为大约7000年前。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可信之处，并且同时为相邻不远的也门附近为什么也叫“乐土”并不十分矛盾，而且假如由于海平面抬升而导致淹没这里，那么两河流域就成了一条直通土耳其的航道，所以挪亚方舟漂落于那里的高山并非没有可能。

假如说基督教中的伊甸园是不清晰的，那么伊斯兰教则给出了相对清晰的伊甸园范围：麦加东南25公里处的阿拉法特山。阿拉法特山就是“相会山”，阿丹（亚当）与哈娃（夏娃）的相会处。此处海拔228.6米。来朝圣的人们必须到此停留一天才算圆满，此举称“站阿拉法特山”。此处距离今天的也门国大约500公里。

关于伊甸园的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设想是，核心就在今天土耳其的阿拉腊亚山一带。

埃塞俄比亚简介

尼罗河发源地之一是“古实”。一般人认为就是《圣经》里说的那个“古实”。“古实”就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

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土地面积大约110万平方公里。人口6千万左右，有80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由此可以推断历史上该地区人口流动性很强，因为它处在世界的交通要道上，北连文明核心埃及，南部扼红海出印度洋与太平洋咽喉航道。尽管阿姆哈拉语为国语，但这个国家通用英语。

这个国家的文明一般认为起源于北方，许多移民来自红海对岸。不过他们的国家中心却越来越向南移，这是由于首都不断南迁导致的奇特现象。其中一个迁都原因是，他们一旦建都，不久就会把附近森林草木毁坏一光，草木皆无了再继续搬迁，直到最近兴起植树造林才停止了迁都倾向。中国商朝频繁迁都是不是也有类似原因？在原始农业社会，草木植被就是能源，一旦能源枯竭就只能继续迁徙。不过，假如商朝频繁迁都，为什么周朝就没有发生同样问题呢？我给一个比较牵强的答案，因为他们受不同的文化影响而对于植树绿化有较为不同的概念。比如维吾尔族同胞据说就很注重绿化，而某些民族又没有这些传统，所以当然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一般历史资料认为埃塞俄比亚是个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人肯定认为这没有中国的文明长。这是错觉。中国的“5000年文明”是文学性语言，一般在“外边”被历史学家严肃介绍时中国也是“3000多年历史”。

经常看到的一种说法是，公元前10世纪左右埃塞俄比亚出现了“强大的孟尼里克王国”。一直到上个世纪他们国王的名字还有叫“孟尼里克二世”的 （1889～1913年在位）。一个王朝世系保持这么长久真是传奇。

非常奇怪的是，这里竟然是世界上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国家。有人说大约公元42年基督教就已传入。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国教。由于地理隔绝，埃塞俄比亚以及周围邻国的基督教与西方的基督教有相当的差异，简单地说这里的基督教更原始一些。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基督教都是欧洲经过改革的基督教，假如想了解最初的原教旨基督教，或许选择埃塞俄比亚是个好主意。我曾经看到过这里的一些视频资料，发现难以区分这里的基督教与佛教甚至伊斯兰教的文化元素，假如没有解说，一个陌生人很有可能猜不出来那里的神职人员到底是属于那个类别的宗教。这个现象非常有趣。

说到埃塞俄比亚与基督教的特殊联系，有一个故事举世皆知，那就是牵涉到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约柜丢失事件，这也是为什么埃塞俄比亚又被称作“新锡安”（The New Zion）的原因之一。据说这个约柜至今保留在埃塞俄比亚的一处神秘教堂，并且有专人把守，游客根本见不到，甚至连点风声都听不到，那些守卫绝对虔诚而严守秘密。

有人说约柜是偷来的，也有人说这是件礼物赠品。《圣经》中示巴女王曾经拜访所罗门，日后她生下一个儿子。他成人后到耶路撒冷拜访父亲所罗门，约柜作为父亲的礼物而来。回国之后，这位先是名叫“Bayna-Lehkem”，后来又因长相酷似祖父而被所罗门改名为“大卫”的孩子，最后成为“孟尼里克一世”。他建立的王国又叫“所罗门王国”（the Solomonic Dynasty）。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 1892～1975）是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 。19世纪，“孟尼里克二世”的孙子（Lij Iyassu）因为与穆斯林的牵连被基督教背景的贵族赶下了台，接着“孟尼里克二世”的女儿被立为王。最后她把王位传给侄子“Ras Tafari Makonnen”，加冕后国王改名为海尔·塞拉西。从照片上看这位

最后的国王五官不像黑人，但肤色不白，肯定为闪、含混血。假如能证明中国（特别是“王”姓者）与这个家族的DNA关系较世界其他地区（如欧洲人或南部非洲人）的血缘为近，则可说明一些问题。

◀ 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 1892～1975）。

最后的国王留下了这样的感慨和名言：“Until the colour of a man's skin makes no more significance than the colour of a man's eyes there will never be peace.”这个具有闪族血统的国王想必对种族矛盾有着特别的复杂感受吧。非常巧合的是，随后的埃塞俄比亚人像中国人一样推翻了君主，他们在1974年接受了共产主义。后来又多年内战，厄立特里亚于1993年获得独立。1995年5月，“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

所罗门的后代在埃塞俄比亚建立的王权标志为“狮”。所谓“犹太之狮”（Lion of Judah）的传统象征一直在埃塞俄比亚保持到上个世纪。因为所罗门属于“犹大”家族的“犹太人”。相当长时间内古代中国的王权也恰好为“狮”。中国并不出产狮子，狮子的图腾一定是来自多狮的非洲，我曾经为这个神秘来源伤透脑筋，曾经猜测它们来自埃及。现在我有了一个新的推论：“狮子”图腾或许起自中国周朝，来自埃塞俄比亚非洲地区的“萨巴王国”（或者“所罗门王朝”）。

▶ 狮子图腾 中国的“狮子”文化到底来自哪里？

▶ 印度的狮子造型，这其实也是印度的国徽原形。

上面的事实再一次推导出这样的可能："周朝"之"周"来自"Jew"（犹太人）。这里我也再一次想起中国周朝时期"雍城"的来历，"雍城"可能就是"Zion"（锡安）。"雍城"在陕西，周人（Jew）的起源也在陕西，"西伯"季历也在陕西，犹太人——萨巴——名字为"新锡安"的埃塞俄比亚，两地之间的文化特征越来越多地获得对应重合。这条线索令人振奋。"所罗门"的"所"又被翻译为"苏"，这为周朝之前就存在的"苏"姓找到了根据，甚至"苏妲己"的贵族姓也越发让人怀疑她的得宠是否只是因为美貌，还是因为她本身就有强大的后台？我甚至想推测，传说中的"苏妲己"实际上就是Jew的一股势力，说苏妲己诱惑并毁灭了商纣实际上是一种隐讳的说法：所罗门（在萨巴）的家族势力在中国推翻了商纣。"苏"与"西伯"可能为同一家族，或者同一政治势力的两个分支。

埃塞俄比亚也被认为是世界上少数文明延续不断的文明古国之一。示巴女王的出生地就在埃塞俄比亚。一种说法是，在她之前还有97位国王。说明示巴女王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王族。加上97位国王的统治时期有人认为埃塞俄比亚的文明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①]这个线索可以与《圣经》中含族之后的"拉玛的儿子""示巴"联系起来。

"早期的居民是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移入的萨巴（古也门）人。公元前975年，孟尼利克一世称王。大约公元前200年（一说前500年），在北方的阿克苏姆出现著名的阿克苏姆王国。公元330年，基督教传入该地。13世纪建立阿比西尼亚王国，政权中心向西移至冈达尔。17世纪后，中央统治逐渐瓦解，地方君主各行其政。"这大概就是一般在网络上能够看到的关于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介绍了。这个介绍似乎漏掉了一个重要内容："公元前8世纪，建立努比亚王国"，他们短暂统治了整个埃及，并且据说就在这个王朝后在埃塞俄比亚的境内遗址发现了我们最熟悉的中国古代物品：鼎。

大名鼎鼎的"露西"南方古猿化石发现于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阿法尔地区。公认的人类发源地"东非大裂谷"以及支谷也纵贯该国。

在节日方面，无论是南部阿拉伯地区还是红海对岸，大多与埃及接近，除后来的伊斯兰教节日之外，他们还有一些类似中国清明的"踏青节"与"河神节"的节日，让人起疑。

① "ETHIOPIA：ANCIENT LAND OF AFRICA" By YAW DAVIS

埃塞俄比亚的犹太色彩

非常多的信息共同指出，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所谓“孟尼利克一世”（ Menelik I ）就是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的儿子，他名字的另外一种翻译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有“梅内利克”，也有翻译为“曼涅里克”的。这位“埃塞俄比亚王朝”的开国之父“孟尼利克一世”应该说有犹太血统。

矛盾的是，他出现的年代比传说中示巴女王拜见所罗门的日期（ 我目前推断为公元前950年 ）要早5年，据说他在公元前955年登基。考虑到这是有关史前阶段的历史，5年的误差或许可以谅解，先存疑。

所罗门在以色列登基和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970～931年，“孟尼利克一世”是所罗门的儿子在逻辑上应该没有问题，只是不该母亲是示巴。一定是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发生了错误。

所罗门生于公元前991年①，成年登基。推理他与示巴见面时应该是41岁，此时的所罗门具有生育能力是肯定的。对“孟尼利克一世”身世有如下推理：

1. 是所罗门与示巴的儿子，但儿子的有关日期有误。
2. 是所罗门的儿子，但不是名为Makeda的示巴女王的儿子。
3. 不是所罗门与示巴的儿子，但是以色列人。
4. 根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示巴的儿子。
5. 以上所有的可能性都不存在，是地道的含族人。

根据其他方面的情况综合看，尽管在推断“孟尼利克一世”的父母到底是谁上还有问题，但可以肯定他就是犹太人，因为这个犹太血统的王系一直延伸到上个世纪，都显示了强烈的犹太背景。或许我们以后可以继续清理这个问题。

红海南端两岸地区自古有着浓厚的犹太色彩，不仅传说所罗门的后代在这里繁衍，而且所罗门之后两百年以色列国覆灭时大批的犹太人也曾流散到这个地区，这些都是已经澄清的历史事实，以至于埃塞俄比亚地区被称做“第二个以色列国”(Beta Isreal)，或“以色列之屋”（ House of Isreal ）。这些都不是传说，是正史。也门曾经有一个犹太人社区，他们声称自己是“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毁坏耶和华盛殿之后逃出耶路撒冷的一支犹太人直系后裔”②。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国曾经从埃塞俄比亚（借道苏丹国）用飞机接走了大约7000名犹太人，这个行动以“摩西计划”（Operation of Mose）而闻名。1991年又有大批犹太黑人从埃塞俄比亚飞往以色列。如今留在埃塞俄比亚的正宗犹太人据说已经不多了。这些人很多是黑人，公认他们就是所罗门的后裔，与示巴女王有关。比较巧合的是，我自己在以色列国旅游时还真的见过一些犹太黑人，他们当时穿着以色列军服，不用说国籍没问题。

---

① 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468页。

② 《圣经·士师记》18：1。

许多人有寻根攀贵的喜好，中国的“孟”姓寻到伟大的“所罗门”我会予以完全的支持。可以肯定“孟”姓为真正的“黄帝”之后、贵胄之门。“苏”姓则可以直接攀亲“所罗门”（“苏莱曼”）。或者以后的历史研究将证明这些推理并非全是玩笑。

天啊，但人！

在搜索以上资料的过程中，我无意中碰到了一些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令我震惊的大好消息，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小矛盾，这些矛盾是由于资料的“过分充实”造成的。

一则来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文章指出，以色列的“但”部落在古代曾经来到过埃塞俄比亚地区！

顺着这个线索我们是否可以做出另外一个猜测，上面的“孟尼利克一世”是以色列12支系之一的“但人”后代？示巴女王本来就有犹太“但人”的血脉？让我们再回到同期的周朝，我们发现具有“西伯”爵位的“季历”父亲叫“Dan”(亶)，其孙也叫“旦”，春秋末期的贵族老子据说也姓“旦”，也有人说他只是名字叫“旦”。这些中国的“旦”贵族是不是“萨巴（西伯）王国”的以色列“但”家族呢？除此之外别忘记他们还使用了一种相近的文字呢！难道所有这些都是偶然的？

我是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网站[1]看到上面这则消息的。其实我只要知道所罗门的儿子在埃塞俄比亚曾经登基就足够解决我的许多推论了，“但人”家族在埃塞俄比亚的出现使我在惊喜之余开始手忙脚乱。我需要分析这两个派系的发展关系。

一开始我就推测过周朝具有犹太人色彩，也说过说“周”就是“Jew”，但两者怎么联系起来一直是个问题。当我因为“南阿文字”确定把目光应该锁定红海南端的时候我又在想：是不是我的推论哪里出了问题？是“牵强附会”过分了吗？因为那里似乎离犹太人很远啊。所罗门的儿子在埃塞俄比亚已使我欢喜不已，而这个刚刚获得的“但人”信息则使我又惊又喜，我的种种迷惑顿时烟消云散！

埃塞俄比亚地区与古代也门具有多重的犹太文化色彩，尽管也门今天属于典型的穆斯林国家，对岸也几乎全是具有穆斯林色彩的黑人。这些表面的假象蒙骗了所有崇尚常识的人们，包括学者也不敢如此大胆“猜测”——我当然不仅仅是凭空“猜测”，只是大家对“概率”的认识不同才会有人认为我“逻辑缜密”，而同时另外一些人认为我凭空胡扯。在基本条件下的大胆猜测，是刺穿历史迷雾的最好利器。

假如以色列“但”人来到埃塞俄比亚，则更能证明我以往的两个推测都是正确的：夏、商、周既与红海南端的“萨巴王国”有关，也与以色列人有关。以色列人通过“萨巴王国”的通道在中国建立了“周朝”，所以说中国的周朝应该既有阿拉伯色彩也有犹太色彩，难解难分。可以肯定地说，周朝是闪、含结合的族群。

按理说示巴女王就是个黑人，所以在中国周朝起码不会出现肤色歧视。事实上，中

① 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tw/ngm/feature/0107/story6.htm Candice S.Millard 甘蒂丝．米拉德著(攝影／乔治·史坦梅兹)

国彝族（完全可以怀疑曾经有过“夷族”的称呼）曾经有过黑彝白彝的说法，违反我们常识的是，在传统社会里“黑彝”的地位更高，是统治者。

河南省光山县出土的周朝（春秋时期）的黑人头像。这些尊贵的黑人很可能是从埃塞俄比亚远道而来的犹太人后代，他们是中国周朝的贵族统治者。

进一步的研究我发现这个所谓“但”族来到埃塞俄比亚的传说不是作为“失散的十个以色列部落”。假如说真的有“但人”家族流落到埃塞俄比亚，我认为多是在约书亚时期以色列人土地不够分配的情况下“但”族长期“寻地居住”①而来的。《圣经》里没有说明他们迁往哪里，甚至没有明确说“但人”离开，只是在后来《历代志》提到其他族群的时候独独“但人”这个家族不存在了，这才暗示了“但人”的离开。在《向东向东，再向东》一书208－212页我介绍了《圣经》中的“但”人出走，他们因分地不均而从中东出走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200年。我觉得解释为大部分“但人”集体有组织地离开是比较可信的，依然有少部分“但人”留下来了，因为后来的参孙就是个“但人”。至于外迁是从红海的海路还是从中国西北的陆路，我并不十分肯定。假如是水陆并进的话，我假设从印度河进入中国昆仑山是个比较可行的捷径，从那里他们顺塔克拉玛干河到达河西走廊，然后逐渐发展到陕西一带。从海上而来的船队也可以与他们汇合，他们可以先期有一批人到达萨巴，与那里联姻达到融合，实际上成为但人的一个中转站。海路本来就是萨巴人最擅长的。当然我给出的只是主线发展。

这里应该提出的一个细节是，在中国西北，很早就有一个民族叫“有部”，而且周人的祖先后稷的母亲正是一位“有部氏”妇女姜(嫄)!

我在本系列第一本书《大猜想》中推理：“但人”建立了中国周朝的一个根据是周王族中有人叫“旦”，有人说这太牵强附会，可喜的是，《历史也疯狂》中我已经找到新的证据：这个家族不止一个人叫“dan”，“周公旦”的爷爷就也叫“亶”(dan)。按照上面推测，“但人”离开中东的时间与中国周朝的“古公亶父”出现基本同期。

“但”家族的一个光荣是与“参孙”联系在一起的。大力士“参孙”是“但”族后人，他曾经在以色列做士师20年②。参孙头发的故事肯定也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头发被剃而失去了力量，他最后被剜去双眼并与敌人同归于尽。在东亚的中国人一直视头发如生命。春秋时期（东周）曾子言：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损。清时这一身体发肤的伦理命题验证到了极致：留发不留头。可见中国人对于头发的特殊观念有些特别起源，“参孙”如此惨痛的“教训”可能一直让中国人视发如命。当然，中国人用的是另外一套孝道伦理来说明这个传统：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参孙前后是以色列历史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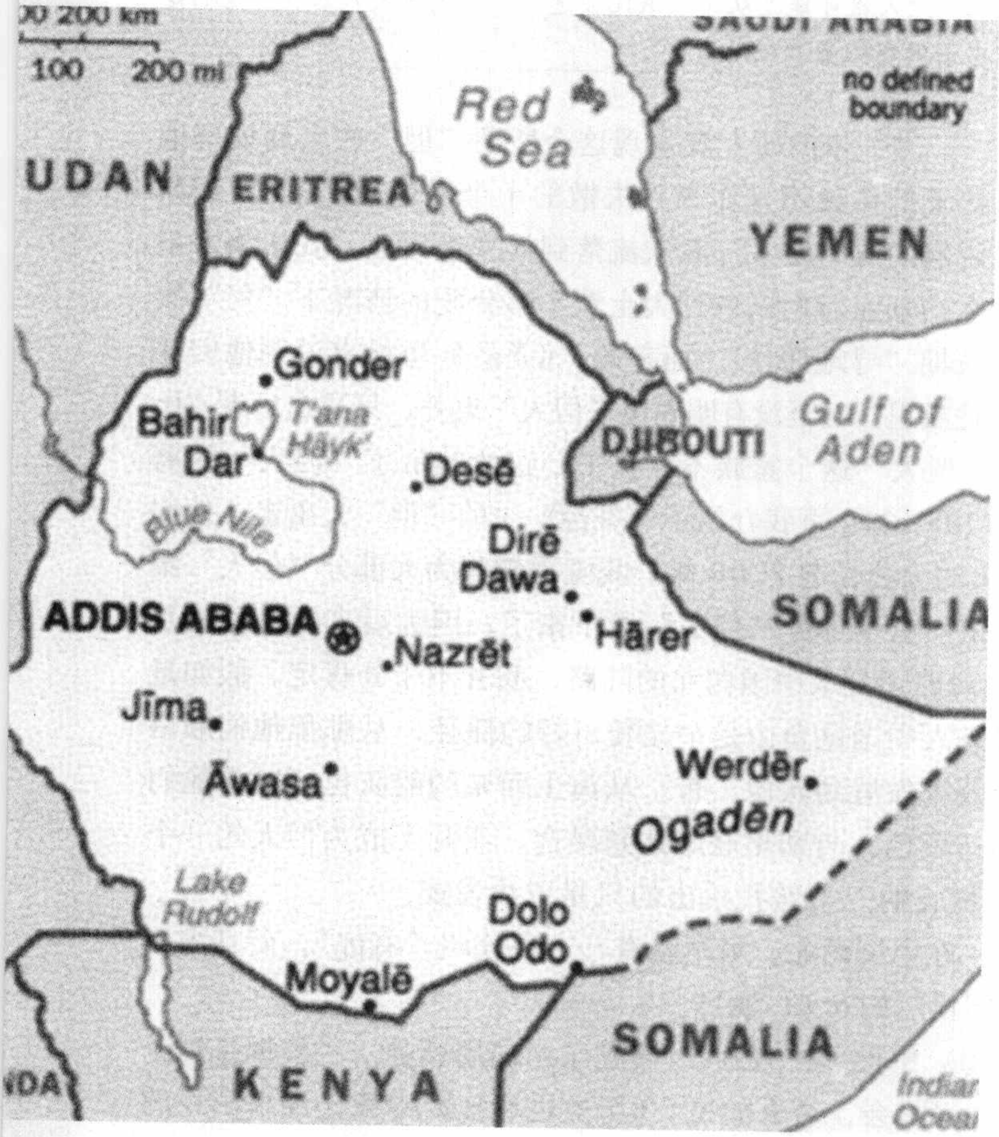
① 《圣经·士师记》18：1。

② 有关“参孙”事迹参见《圣经·士师记》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

淡的一个时期，当时比较强盛的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是一个海上民族，生活在地中海东岸南部沿海地区。

参孙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1世纪。

这期间以色列族内还发生了一起大事，“便雅悯人”被其他以色列人追杀殆尽[①]，我认为他们也大部逃亡。



埃塞俄比亚地图

《圣经·士师记》20：41 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便雅悯人就甚惊慌，因为看见灾难临到自己了。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转身往旷野逃跑，以色列人在后面追杀。……20：44 便雅悯人死了的有18000，都是勇士。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往临门磐去，以色列在路上杀了他们5000人，如拾取麦穗一样。追到基顿，又杀了他们2000人。

20：46 那日便雅悯死了的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和畜生，并一切所遇见的，大批用刀杀尽了，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

以上的“旷野”在临近红海地区。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解释上面的“600人”时说：“这些人若没有逃脱，便雅悯支派就全遭消灭了。前往拉亿的但人也是600人。”

“但”与“周”的关系

我最近看到的一条信息是，埃塞俄比亚的以色列“但人”是在参孙于公元前11世纪失势时逃亡至红海南端的。

最大的可能是，“但人”确实到过埃塞俄比亚，后来所罗门的后代又在这里立国也是事实。两者并不冲突，只是谁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是，所罗门让当时没有居所的

① 《圣经.士师记》21：15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

整个“但人”家族护卫他的儿子一起到埃塞俄比亚去了。

最后听到以色列人在埃塞俄比亚的消息是，大约上万黑人分两批在上个世纪末被以色列国从埃塞俄比亚接走，即便是黑人他们也被认定为以色列人。

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小问题。假如我们承认犹太人之后在中国建立了“Jew”朝，则“但人”建立周朝似乎说不过去，因为严格意义上讲“但人”不属于“犹太人”，他们应该叫“以色列人”。但幸运的是，今天“犹太人”是所有“以色列人”的代称，或许这个代称是从3000年前就开始的，那么这个小小的矛盾也就消失了。就是说，“但人”与所罗门的后人共同建立了周朝，并将这个朝代取名为“犹太人王朝”，不过在中国真正的统治者是“但人”家族，政治上很可能属于“示巴王国”的附庸，因为这个家族继承了“西伯”（也就是“示巴”）爵位。最初“但人”很可能相当于“总督”管理着一片方国，他们政治上与红海的“萨巴王国”或“所罗门王国”息息相关，但同时也必须受到当地势力强大的商朝的统治。秦始皇之前从来中国无“帝”（emperor）只有“王”（king），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否则，秦始皇就不会兴师动众地自命为“始皇帝”了。另外这还说明了秦始皇很清楚他之前的中国只是殖民地，而只有从他这里中国才剪断了与中东母国的脐带。

张光直先生在《青铜挥麈》275页这样论述三代时期的王族发展：

> 在王族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会产生某种需要，得让族中一位男子离开王都，到外地去建立新的城邑。他或许是王的手足，也可能是王的叔伯或堂表兄弟。大批人民会随他出行，这或者为了减轻人口压力，或者为了开垦新的土地，也可能是去戍守边防。无论何种原因，他离别时都要带走以下物事：（一）氏族的关系和徽号；（二）属于一个或几个氏族的数群宗族成员，他们既是农业、手工业劳动，也是兵士的来源；（三）对于新领地的管辖权；（四）标志新政治单位的新名称；（五）保证他同太宗的仪式联系得以延续，并作为他新独立地位象征的仪式符号和道具。他将在新领地中建立新的宇宙，最后还要把自己的牌位放进去，以作为新宗族创立者的标记。于是，一个新的支系开始繁衍。作为次一级的宗族，它必须对自己原来所属的大宗表示归顺。它的政治地位和仪式地位也相应要低一等。这种分化过程还会重复，从而形成第三级、第四级和以下各个支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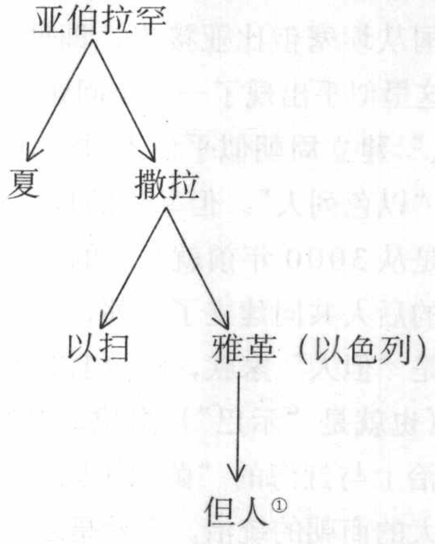
但族从以色列的分裂正是类似的情形，把但人当作类似的情形推测还会解开前面其他的许多疑惑。比如，当但人从以色列离开时，带走了大批人，他们是可以保留他们的氏族称呼的比如“但”（Dan），所以我们在周人祖先里发现好几位叫“旦”（Dan）的人，但是他们的朝代却被称呼为“周”（Jew），表示对于上一级宗族的归顺。

在我的整体推测中，“三代”中的夏商周曾经属于同一个宗族，不管有多少其他民族的联合与加盟，他们来自亚伯拉罕的这一根系是统一的，并且是主流。

夏之离开以色列正是第一次的分化，留在原地的正宗是以色列。后来的“以扫”也是同样的原因被分化出来。但是以扫的支系地位高于夏人。所以当“以扫”的家族来到东亚时夏人必须款待和迎接他们，因为“以扫”属于王族出身，夏根源上就不是，母系是妾。夏商并非礼让对方以政权，政权的交替还是经过了复杂的武力比拼。

后来“但”家族出现于东亚时，假如他们打着“以色列”或“Jew”的旗号，以扫按照宗族就必须让着“但人”，因为“但人”尽管并非在同代人里面属于王族，但他们是雅各的直系后代，身份还是比以扫更高。这点还需要研究，到底是王兄的身份高呢还是王

之庶出的身份高。下图可以显示三代之间的可能关系：



看来当时的宗族制度非常严格，这保护了战败者都没有被赶尽杀绝，他们一旦表示投降让位就可以被保留下来，甚至当权者会与前朝战败者结亲，原因是他们具有高贵的身份地位，比如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不降低身份周人还会与商人后代的宋国君主联姻。

周朝开始后，可以判断狭义上的“犹太”家族在但人站稳脚跟之后也来到了周地，并且具有很高的地位，以至于国家被称呼为“Jew”。因为在总根系上当时最高的统治者是“Jew”，但人尽管可以保留自己的姓，但是王朝却为了表示归顺于“天”就叫“周”。这合乎上面张光直先生的表述。

周朝的“昭穆”两元制很可能与这些有关，比如“昭”代表犹太人，“穆”代表搀杂有一定阿拉伯色彩的但人；或者是但人代表了Jew，而另外一个支系是阿拉伯萨巴贵族。假如以上的推测是正确的，夏商两朝就属于穆人，因为在《圣经》里，夏甲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从这个意义上，我更赞成三代是一种错落存在的关系，既不是同时出现于中国，也不是互相的突然取代。甚至，每一代分化出来的新人，比如商与周人，来到东亚时，都引起了上一带同宗者的高度警惕，或许新来者本来就带着“老家”的君命也是可能的，命令前者让权于后者。但是从传说上并非如此，例如封神榜之类的演义，显示出商人的无德逼迫周人推翻商人，事实如何就不知道了。

需要说明的是，三代即便如此，也不能说中国人就全部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中国境内三代之前有人存在，而且即便在三代期间其统治阶层中也不全是以上提及的亚伯拉罕后人，情况会非常复杂，我们只能提出以上主线，并在这个之上去推测人种的问题。

假如确实是但人成为周朝的主人，并且他们在周前就来到中国发展，那么他们肯定带来了新的宗教，不同于商朝祖先遗留下来的宗教。由于商人很可能是任何神灵都拜的人，所以除了以前他们知道的神灵也欣然接受了但人带来的新宗教，并且这个新宗教很可能还是强加于他们的，因为那可能是“天命”。

为什么商朝武乙曾经射天辱神，许多人认为不太合理。其实套入以上的模式就可以推理。原本商朝是信仰自己的萨满神灵的，突然在3500年前一神教出现，尤其是但人与犹太人的到来打破了商人的宁静生活，而且带去了他们一点也不愿意接受的新神棗所以在考古中会发现商人既信仰“上帝”同时又有多神崇拜。最让商人不高兴的是，很可能但人对他们提出了一些过分的政治要求，甚至狐假虎威对他们造成了危险。然而在严格的宗族制度下，商人必须听命于后来者，所以会忍气吞声，但个别统治者会带出情绪来。

① 与“但”同父异母12兄弟中有继承王位的约瑟以及真正掌握实权的犹太。

武乙是商朝倒数第四个商王，距离商朝灭亡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此时商周的矛盾公开化，所以射天辱神就不仅仅是对神的不满，而是一种影射。

从这里再一次扯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对于周人的愤恨可能同样是与武乙类似的心理。秦这里表示着中国文明的成熟以及与中东的断根，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旧的宗族制度的挑战。而秦王朝之所以那么快地灭亡，也可能不简单地是大家看到的景象，恐怕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广泛冒犯旧贵族的问题。

当然以上是猜测，部分比较有说服力，部分就比较牵强附会了。

《圣经》挪亚与中国女娲

根据目前暂时掌握的情况判断，中国“夏商周”的起源主要来自中东红海两岸。家谱可以参考我的《向东》一书，与今天中东国家的对应则基本如下：**夏朝发源地在沙特阿拉伯，周朝的发源地与红海南段的“萨巴王国”或“所罗门王朝”有关。商朝可能与以上两者都有一定的关联，但我更倾向于它同时是一个与“商业”有着特殊联系的王朝，“商”这个称谓可能并没有其他的高深来源，仅只因为“商业”。**[1]

以上区域由于当时在古埃及帝国的边缘，深受古埃及文明影响，从语言文字到政治宗教，皆可参照古埃及的历史进行中国“三代”研究。舍博就约，中华文明假如主要指“夏商周”开创的文明，基本上可以说中国文明属于“埃及文明板块”。但由于阿拉伯半岛夹在“两河流域”和埃及之间，所以来自红海的中国文明实际上兼具以上两大文明的特点，但埃及文明为多，因为埃及直接面临红海。中国文明整体有明显的红海特点。

夏商周应该是一个善水民族，所以确定中国地区的“西来”陆路成立之外，东部的海路也是重要的通道，尤其是商朝来自沿海山东更说明了这一点。

从民族构成看，“夏朝”可以描述为希伯来人后代，也属于一般所谓的早期阿拉伯人，具体为夏甲与亚伯拉罕之后。“商朝”与“夏朝”有所不同，其父系依然为亚伯拉罕，但母系可考虑为《圣经》中以撒后代。该王朝与阿拉伯南部地区的“麦因王国”有关，其成分除了以撒后代之外，还有挪亚支系的“盖哈坦”人。以上两朝全部为挪亚之后闪族人，与今天的以色列人共祖但不同族。中国“周朝”主要建立者为3000年前曼德海峡两边的也门人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估计人种上多有黑人。

综合看，中华文明为挪亚子孙所建。中国地区的部分神话传说应该来自中东。所谓中国人为“女娲”后代可能为一讹传，“女娲”（Nüwa[2]）实为“挪亚”(Noah)；换句话说“女娲”不是个女人，是个男性祖先。并且中国这一传说应该是捏合了亚当与挪亚的事迹最后合二为一。其中的“七崇拜”痕迹明显提示了西方《圣经》的根系。

我曾经推论的“远古战争中长期杀男留女的混血结果”使今天的人们更接近于中国

---

① 我会在下本书中更加全面地论述这个问题。

② 一个希木也尔国的国王名字就叫“Dhu Nuwas”，这样的名字出现在也门使我很意外，不知道“女娲”是不是真的来自阿拉伯地区的一个重要王族的名字，然后就谬传为中华始祖。存疑。

"三代"之前的土著，后来中国人无论是什么种族实际上都会很快湮没于最古老的居民之中，因为他们数量最大。我最近还找到一个人类学的支持。台湾学者李光周先生是李济先生的公子，他曾经研究恳丁遗址的网坠与纺锤，结论是，男人打渔专用的网坠变化很大，而女人专用的纺锤却相对稳定没有变。"他推测男人可能是从各地来的，女人是本地生长的"①。并且，在欧洲也有类似的习惯与例证。比如在爱琴海附近的征战中，希罗多德说，"那些先驱者不带女眷，他们杀光了当地的男人，然后娶那里的女人做妻子。他说，这场大屠杀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米利都的部分妇女不和她们的丈夫一起吃饭，也不称呼他们的名字。"②

附：中国女娲的传说

女娲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与伏羲为兄妹，人首蛇身，相传曾炼五色石以补天，并抟土造人，制嫁娶之礼，延续人类生命。她神通广大，化生万物，每天至少能创造出70样东西。《太平御览》：女娲正月初一创造鸡，初二造狗，初三造羊，初四造猪，初六造马，初七用黄土和水，仿照自己的模样造出了一个个小泥人，后来觉得太慢，于是用一根藤条，沾上泥浆，挥舞起来，泥浆洒在地上，就变成了人。

《独异志》：女娲与伏羲为兄妹。宇宙初开，天地之间只有兄妹二人，昆仑山下，天下未有其它人民。相议想为夫妻，又自觉羞耻。兄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同意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请您将天上的云都合起来一团，要不就把云散了吧。"以是天上的云立即合起来，他们俩就成了夫妻，中华民族都是他们俩的子孙后代。

《淮南子》：洪荒时代，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大打出手，最后祝融打败了共工，水神共工因羞愤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不周山崩裂了，撑支天地之间的大柱断折了，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起火，洪水喷涌，龙蛇猛兽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空前大灾难。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她选用各种各样五色石子，架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石浆将残缺的天窟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埋塞向四处铺开的洪流。

女娲造人

①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199页。

② 《安纳托利亚 文化繁盛之地》147页。

寻找“乐土”

“乐土”对于中国人也是一个神话。尽管这个词汇让中国人总是沉痛地想到70年前日本人在中国提出的“王道乐土”。因为日本与中国实际上文明大致同源，“乐土”在中国与日本有同样的美好文化内涵，偶尔一些美好的字眼被用在罪恶的地方，这很遗憾。其实日本最初的古语恰好是“西方乐土”，它向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美丽的乐土在“西方”。我们还有一个更熟悉的佛教常用语：“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东方国家不约而同地颂扬“西方”绝非偶然。西方，不仅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的精神寄托，而且是古代文明世界。一些因为这样或那样原因离开了西方的人们会长久地思念那个地方。“西方”最终成为一种神话。

“乐土”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哪里目前还不清楚，但《诗经》里就已提及。日本的“西方乐土”也应当来自中国才合逻辑。所以这个“乐土”的概念应该产生很早。

对于中国典籍我所知甚少，但由于《硕鼠》的关系我通读了《诗经》，《山海经》也大致浏览过一遍。并且我了解到，中国先秦的一些文体大多可以在红海两岸找到相同根源。中国的《诗经》无论在以色列文学作品中还是在古埃及文学都能找到类似作品，在埃及叫“歌谣”，在以色列有“雅歌”。即便是《论语》在古埃及也可以归于一种“教喻体”对话形式，地中海东北部的古希腊也盛行这一文体，都可能为同源。

《诗经》中的《硕鼠》很隐晦，是主动的隐晦还是被迫的隐晦不好判断，是被故意误解还是今人的愚钝导致误解也不好说。或许它根本就不隐晦，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往那方面想过而已。当初在中学时学习这首诗歌时，它是以揭露阶级剥削与反剥削的面目出现的。革命时代过去了，我可以自由读解。

硕鼠硕鼠，
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
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
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
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
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
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
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
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
无食我苗。
三岁贯女
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
适彼乐郊。
乐郊乐郊，
谁之永号！

《硕鼠》为《诗经》之《魏风》。“魏”地处于今天山西芮城东北一带，《魏风》创作时间为春秋初期，大约公元前7世纪。

《硕鼠》起初引起我的注意在于其中的“三岁”。我在《向东》一书中已经解释过，此“三岁”可能为古代“一番”，就是从红海到中国内地之间的一个来回的航海时间，相对固定，一般不超过“三年”。与其对应的是，《圣经》记载所罗门派大船队出去搜寻珍宝来回一次的时间也是三年一次。后来看陆地行程一个来回也不超过“三年”。清朝锡伯族人从中国东北调遣至新疆伊犁、喀什戍边，单向行程大约使用了一年三个月，人员约4000。从以色列到中国西北地区距离相差并不太远，“三年来回”说法也基本成立。

“三岁贯女”就是中东殖民统治者“三年”来收取一次贡纳。此诗尽管埋怨三年一期的被迫贡纳，但这个诗人未必明白三年一次的贡纳是交给谁的，或许他认为那些直接的收集人就是受惠者，所以他的愤怒是直接冲他们的，或许他明白真正的受惠人实际上也不影响埋怨吧。在悲愤之中诗人明确地表达了另外的情绪，实际上许多《诗经》作品都表达了另外一种情绪：思乡。类似的诗歌很多，但以往中国学者都把那些近乎绝望的思乡情绪解释为思念中国的某地。另外，我认为这些诗歌的作者多为贵族，他们思念远在中东的家乡，所以绝望而无奈。

在这里我有一个推测，中国的“三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未必是同族同种，很可能统治者是新贵，而被统治者多为已经本土化的旧人，所以在考古方面会得出一些结论，整体看现在的考古发现此时人种已多为所谓的蒙古人种，而那些欧罗巴人种或者尼格罗人种相对罕见。这个概率上的结果会导致更多的误解，直接导致了“中国文明独立说”大行天下，实际上所谓文明的传播者主要看那些上层的统治者而不是被统治者。这从几百年前欧洲殖民者在太平洋岛或者美洲的殖民过程就可以看出。

《硕鼠》表达了诗人的愤恨，最重要的是说出了理想：离开你这可恨的地方，我要到那迷人的“乐土”去。导入“西方乐土”，则诗人的理想实际上在“西方”也。所以此诗

是一首怀念“西方”的思乡曲。

逝将去女，
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
爰得我所。

逝将去女，
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
爰得我直。

逝将去女，
适彼乐郊。
乐郊乐郊，
谁之永号！

我一定会离开你到“乐土”去，“乐土”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到了那个“幸福的地方”再无话说。请注意三段共同使用了一个“乐”字来形容那个令人神往的地方，那个地方无论怎样形容都离不开“乐”这个美妙的特征。实际上，“乐土”、“乐国”、“乐郊”就是同一个地区的三种不同叫法而已。

那么中国《诗经》中的“乐土”到底在哪里？

“乐土”可能就是今天也门国附近的红海地区！

也门在古代的别名就叫“幸福之地”，或者也有翻译为“天堂福地”、“阿拉伯的乐园”(Arabia Felix)、“绿色也门”等。古代的“seba”其中一个含义就是“通往天堂的大门”。“天堂”应该就是“乐土”，“天堂”就是“伊甸园”，“乐土”就是“伊甸园”。

“乐土”与“伊甸园”

也门濒临的“亚丁湾”因为古代与中国之间的频繁海上商业联系曾经被称为“中国走廊”等，可见两地曾经有过的紧密联系达到何样一个程度。中国《诗经》的“乐土”所指为“幸福之地”的“也门”决非无稽之谈。中国考古界现在要弄明白的不是两地3000年前是否有海路商业联系，而是这一海上往来起于何年，是3000年前、5000年前、6000年前，还是7000年前？这一点非常关键，它会解开中国东部包括“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的真正起源，它们应该都属于典型的海洋文明。

由于“亚丁湾”（英文名字）叫“Gulf of Aden”，有西方人推测这里就是古代苏美

尔语中的“亚底诺”或“天堂”，也就是所谓的“伊甸园”（Eden）。

“伊甸园”本意是“人间乐园”、“幸福之地”。故而，我认为2600年前中国《诗经》之《硕鼠》所表达的“乐土”不仅指也门国土，也暗示我们：也门这里的“亚丁湾”就是“伊甸园”的一部分，《圣经》所谓“伊甸园”与也门相距不远。假如我特别大胆一些的话，我甚至可以猜测“也门”就是“伊之门”、“伊甸园之门”。既然也门地区在3000多年前曾经与中国嫌疑使用同一种语言，那么他们一定有一些相通的语音遗留下来，我们直接把“yemen”这个发音转化为我们熟悉的汉语就可以了。这很简单，但需要脑筋急转弯。不过，我们还是运用传统谨慎的思维继续前进吧。

乐郊乐郊，
谁之永号！

是啊，回到“伊甸园”，谁还会有遗恨！

通过比较从“Eden”（伊甸园）与“Aden”（也门的亚丁湾）的读音，可以发现它们非常相像，分别只在第一个元音，而这一差别很有可能是当初以拼音文字命名时人为误差造成的。要知道，语言出现可能已有上万年的历史，拼音文字的出现也不过是在几千年前，“E”与“A”的差别只是个“落实”为文字时出现的问题。想想粤语与普通话的巨大差别，或许就可以“谅解”这一差别了。

在古代，阿拉伯半岛或者阿拉伯某些特殊城市一直被中国人意译为“天方”、“天房”，它们也蕴涵着“人间天堂”的含义，与音译的“伊甸园”同义：天堂。“房”者，“堂”也。“天房”即为“天堂”，“乐土”就是“伊甸园”。红海东岸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可能都是“伊甸园”。伊斯兰文化似乎更倾向于“天堂”就在红海东岸这里。或许，正是因袭了这个文化，我们的祖先在《诗经》中正是把“乐土”也定位于红海东岸这同一个地方了？

这里我也指出另外一个嫌疑，“迦南”（Canaan）在俗语中也有“所向往之地”、“天国”、“乐土”的含义。假如说同有“乐土”称呼的亚丁湾两岸与地中海东岸的迦南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分别在红海的两端，另外，他们同属于闪含人聚集的地区。有关“迦南”的分析将在我的下一本书中进行讨论，本书集中于红海南端的“乐土”。不过可以预先告知的一个线索是，部分红海南端的人们，比如一些索马里人就认为他们是腓尼基人后裔，而腓尼基人实际上属于迦南人。

关注人类起源

我越来越觉得，假如我要关注文明的起源，似乎也要稍微关注一下人类起源才更全面，尽管两者并不是同一概念，但他们之间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关于人类起源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多地区起源，一种是非洲单一起源。自从DNA

技术参与以来，“非洲单一说”占了上风，这使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学者十分难堪，中国人的DNA与世界各地区的DNA从目前的实验室结论看只有非洲老祖母的痕迹，没有其他祖源，并且时间已经推进到十几万年前。起码目前的情况如此。我们可以等待更多的研究结论。其实我个人很怀疑其他地区也零星有些起源的，只是他们人数过于稀少，尚未构成规模，或者说独立文明还没有出现就受到了冲击。但即便其他地区有人类的起源，也不影响我的结论，毕竟我是研究文明起源的，我关注的核心是最近一两万年的文明成因与流向。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接受DNA技术之下的中国人“来自非洲”的结论，但比较奇怪的是他们依然不接受中国文明来自非洲那个方向。有人认为在中国与中东同时发展了文明，甚至早于中东发展出文明。当然这并非没有可能，但是概率不大。仅只从逻辑上讲，假如按照“夏娃理论”（即人类只有一个非洲源头，并且大致起始于十几万年前）从非洲出来的人类一直向四面八方扩散。由于他们没有发达的组织纪律，也没有国家、民族概念，那么这个自由迁徙的态势就应该一直存在。什么时候这个状态才会停止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最为关键。它将触击文明产生的的源流问题。比如我自己认为人类一直相对自由迁徙，第一次在中国方面的受阻我设定为中国人认为的夏王朝的起源时间，即大约4000年前。但真正的形成严重的致命阻隔应该是在东周时期。所以，在这个模式下中国的夏商周应该有浓重的外来色彩，或者说有外来的极大可能。

强调中国文明独立说的人通常把现代人迁徙的中断表述为大约2万年前。我认为他们这样推测不符合逻辑，因为假如人类一直在全球自由迁徙的话，他们为什么在2万年前突然改变方向不能得到圆满解释。在这个时间里，全球气候或地理只因为第四次冰期的结束而变得方便，而不是不方便，所以把人类迁徙假设为在2万年前突然停止迁徙就显得没有道理。但是假如不让人类在2万或1万年前停止向中国走来，势必中国的文明起源就不能纯洁。

彻底否定DNA的猜测，根本不承认DNA科学，那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相信也存在这样的观点，只是他们不会说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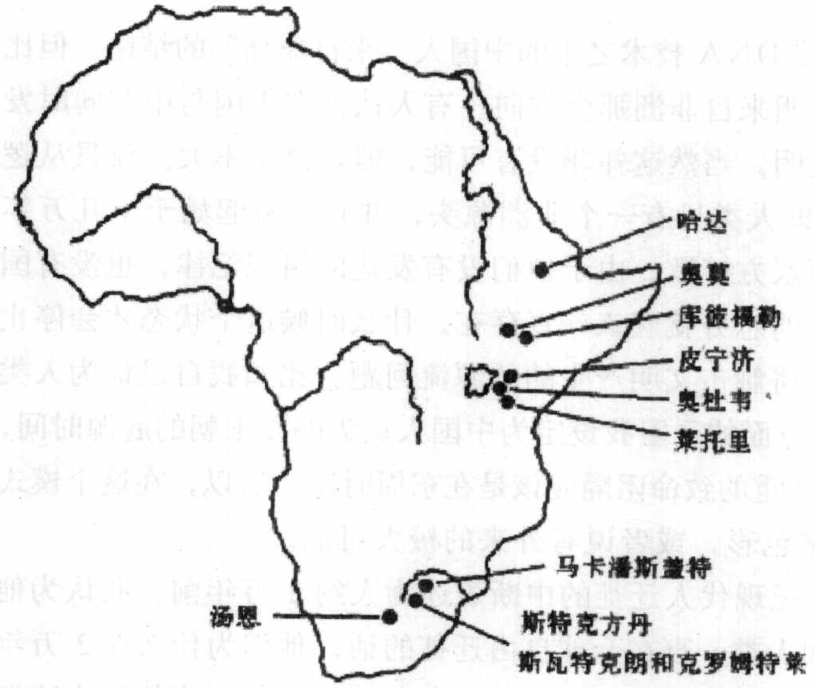
从以上就比较清楚地可以看出来，史前研究实际上是联系文明时期与人类起源的一个中间环节。所以，一味避开人类的起源也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使问题更全面一些。

多数人认为，全球现代人类主要从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地区的东非大裂谷起源是个不争事实。我的基本看法是，假如“非洲单一说”不完全正确，那么“非洲”起码应该是人类起源的主流。中国几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或者一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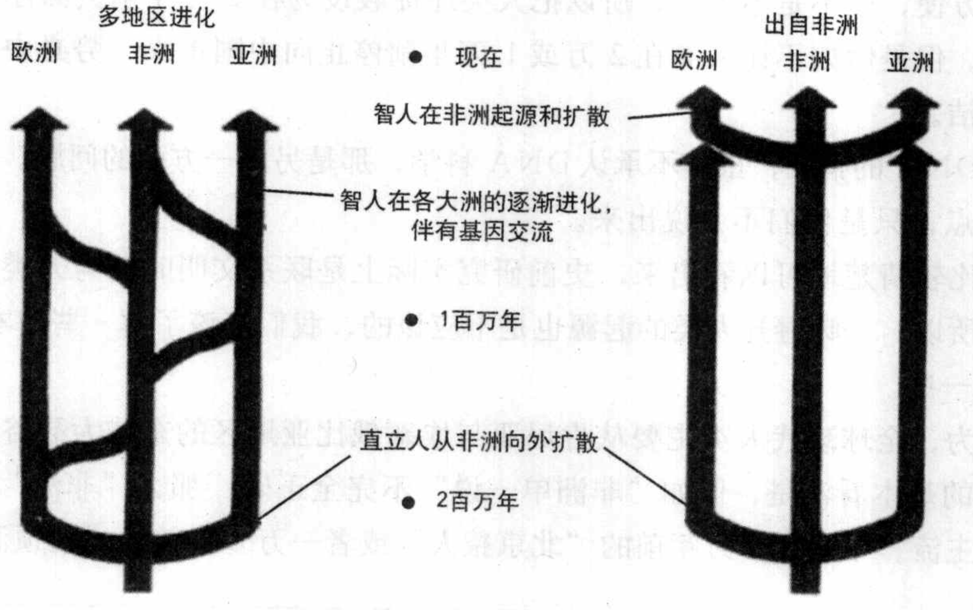
① 一个有关“山顶洞人”比较有意思的补充是，德国的魏敦瑞曾经对保存相对完好的山顶洞人进行形态学分析后认为其中的老年男性为原始蒙古人种，其他两位是成年女性，一位属于美拉尼西亚人（澳大利亚东北一带），另外一位属于爱斯基摩人。但中国人（吴新智）却认为他们一概都是蒙古人种。（前面资料引自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48–49页）。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看法发生分歧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分歧也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为什么每次类似的分歧都会是中国人将结论引向自源说。这是特别值得深思注意的。

DNA 与今天的中国人没有关系，全球包括欧洲与美洲，都只与非洲有关。所以，我们暂时必须顺着这一思路继续我们的推测，有新的证据之后可以继续探讨。

专家考证，非洲大地在大约1200万年前发生了地质巨变，一道巨型伤疤出现在非洲东部，把原本同根的猿人分为东西两群，随后的几百万年中，东部地区的猿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获得了进化，成为猿人，最终成为能人、智人、现代人。现今发现的猿人化石绝大多数出现于东非大裂谷的东部地区以及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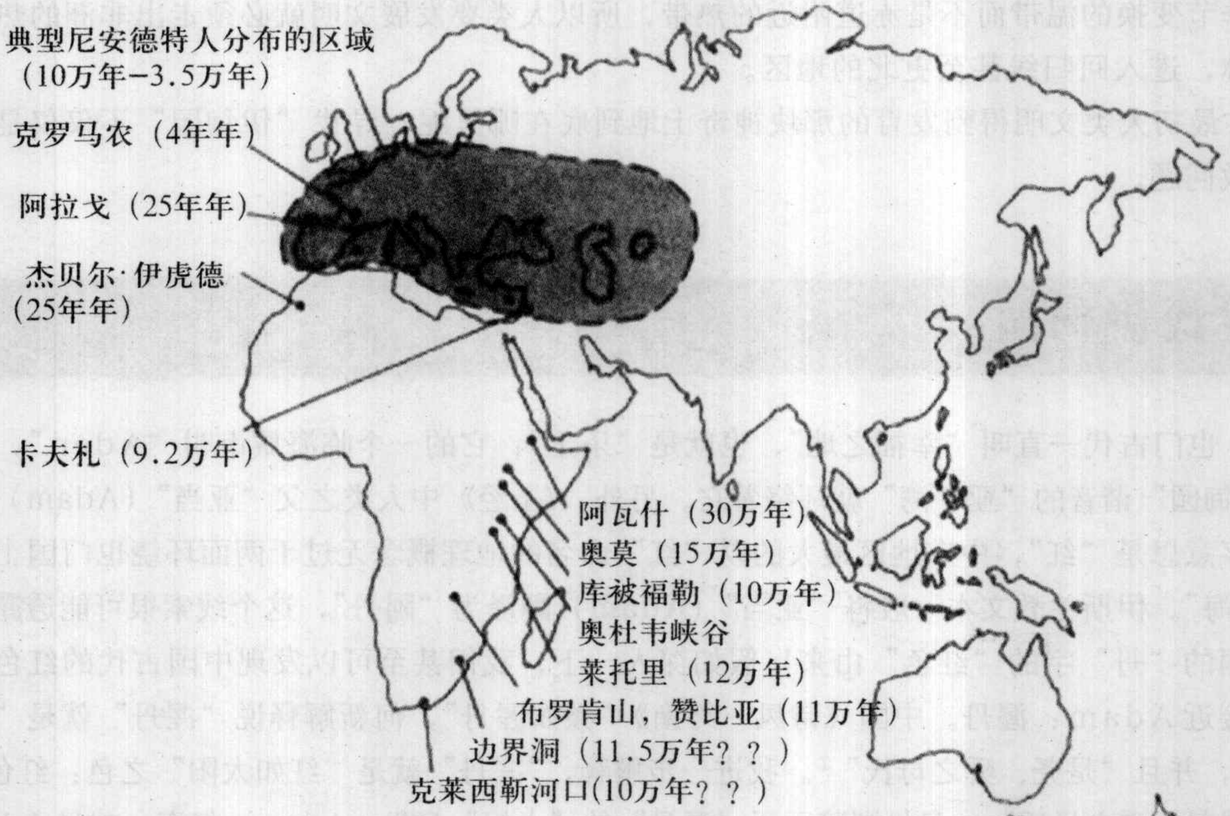


◀ 图为主要化石地点，第一批早期人类化石是从1924年开始在南非的洞穴中发现的。其后从1959年起，在东非（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开始有许多重要的化石被发现。——引自美国理查德·利基1997年著《人类的起源》



▲ 现代人起源的两种观点 左边的是"多地区假说"。直立人群体在接近200万年前从非洲向外扩张，定居于整个旧大陆。地区性群体之间的基因交流在整个旧大陆维持着遗传的连续性，从而在有直立人群体的地方和谐地发生了朝向现代智人的进化趋势。右是"出自非洲假说"。现代智人在近期产生于非洲，很快扩张到旧大陆的其余部分，取代已存在那里的直立人和远古智人。——引自美国理查德·利基1997年著《人类的起源》

“东非大裂谷”穿越了埃塞俄比亚，其北段叫“东支”（“Great Rift Valley”或“Eastern Branch”），并延伸进面积只有23000平方公里的袖珍小国吉布提，红海就在“大裂谷”北段，与其成90度“丁”字。发现“露西”化石的埃塞俄比亚“拉法尔地区”尽管中间隔着厄立特里亚，但该地区与也门也可称得上隔海相望，之间只有15英里水路。



化石分布图，显示与现代人起源有关的化石的发现地和年代。尼安德特人局限于暗色区。最早的现代人标本发现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东。——引自美国理查德·利基1997年著《人类的起源》

为什么非洲东部的猿人进化为人类而西部的猿人却踏步不前呢？一般的解释是，因为“东非大裂谷”为东部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地理条件。

埃塞俄比亚地形多样，既有低于海平面120米的盆地，也有海拔4618米的非洲第四高山－Ras Dashan；既有“非洲屋脊”，也有发源于此的30多条大河，并因此而得名“东北非水塔”。这里有适宜各种动植物生存的地理条件。

Ras Dashan是埃塞俄比亚第一高峰，通常被译为“达尚峰”，Ras表示地形，Dashan是它的名字，我踌躇再三不愿意放过这个提醒读者的机会，“Dashan”与中国的“大山”的对应太严整了！另外，中国最古老神圣的山莫过于泰山，从秦始皇开始每个皇帝都要到泰山封禅，而泰山的古称也恰好是接近的“岱山（daishan）”！这很可能是异地命名。另外，埃塞俄比亚最大的湖泊名叫“Tana”，中国有“塘”（tang）、“汤”（tang）之称，都与湖泊有关；英语中所谓“dam”意思为“坝”，其实依然与“塘”有关，中国的“坝”

在古代也有名“塘”者；“Tana（埃塞俄比亚语）”、“tang（汉语）”、“dam（英语）”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它们三者发音的接近，而且同时与“水”有关。不要忘记与甲骨文最接近的“南阿”文字惟一存活的支系就在埃塞俄比亚国内。这些语言上的关联绝非偶然。

埃塞俄比亚的古老是全球公认的，人类起源于这里，文明也起源于临近一带，很合乎逻辑。但人类文明的核心似乎离开埃塞俄比亚向北移动，原因是什么呢？促使这个结果出现的地理与气候条件是，农业是文明产生的最主要基础，而最适宜农业的地区是具有季节变换的温带而不是赤道附近的热带，所以人类要发展文明就必须走出非洲的热带丛林，进入回归线甚至更北的地区。

最初人类文明得到发育的那块神奇土地到底在哪里呢？寻找“伊甸园”不仅仅是个宗教问题。

寻找伊甸园

也门古代一直叫“幸福之地”，也就是“乐土”；它的一个临海城市叫“Aden”，与“伊甸园”谐音的“亚丁湾”就环绕着它。另外，《圣经》中人类之父“亚当”（Adam）的名字意思是“红”，中东地区最大的以“红”命名的地理概念无过于两面环绕也门国土的“红海”。伊斯兰教文本一般将“亚当”（Adam）翻译为“阿丹”，这个线索很可能透露了中国的“丹”字的“红色”由来！假如深入一下，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红色甚至接近Adam：渥丹。中国《诗风·终南》“颜如渥丹”，何新解释说“渥丹”就是“太阳”，并且“是尧、舜之母氏”[①]。我进一步解释，“渥丹”就是“红如太阳”之色：红色；而“尧、舜之母氏”的身份则暗示了“渥丹”的“人祖”身份：Adam。红海，就是Adam之海，今天的“红海”取意译，而非音译。而红海的出口处，自然就是Adam湾，但这次音译却由于时间的长久而成为“Aden”，或许在口语里分别不大，但是落实为英语字母时他们看起来有了些微的差别。

从以上不难看出，也门的“亚丁”（Aden），“亚当”（Adam）的红色，还有今天的“红海”就出现在人类起源之地附近，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一个线索，很可能这是最初同一个称呼在地名与人名甚至族名的体现。正如“西伯”后来在中国的现象，既指一个人，也指一个国家与地区。

假如“伊甸园”是指1万多年前的“人间乐园”，那么全世界再找不出第二个比这一带更有竞争力的地方了：从名称根据以及人类起源之地来看。这一地区的种种嫌疑也从中国的文献中得到侧面证实，比如“乐土”概念，“女娲洪水”传说等。

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疑惑也一直没有解开，放在这里求教于社会。中国的“普通话”或者“中国官话”现在被外国人称呼为“Mandarin”，而连接也门与埃塞俄比亚的狭窄水域恰好就叫“曼德海峡（Bab el Mandeb Strait）”。我甚至想如果“曼德海峡”足够著名的话，很多从这里来到中国的人们可能会被早前已在那里的人们称呼为“南边的

① 何新《诸神的起源》49页。

曼人”，久而久之可能就成为“南蛮”。我对“南蛮”的起源还有另外一个猜测，“麦因人”也可以转换发展为“蛮人”，并且“蛮人”出现于中国南方也对应了“南阿”人到中国的地理条件。至今生活在埃塞俄比亚还有一个奇怪的阶层或民族，Mana，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匠人群体，擅长金银铜铁以及其他工艺。不知道他们是否是古代的一个遗留宗族，而他们的翻译也应该接近“曼人”或“蛮人”。

亚当和夏娃

进一步清理“乐土”或者“伊甸园”，可能会引向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结论。以上的种种联系如果还不足以说《圣经》中的“伊甸园”就指这一带，那么也肯定离此不远，论据如下。

大约7000年前的挪亚生活的地点一定临近大海，不是地中海就是红海、阿拉伯海附近，不是迦南就是也门一带，两者必居其一。我更偏向后者。中国地区发现的具有神秘内涵的海贝多来自“亚丁湾”附近①，这些海贝似乎具有极其神圣的意义，可能就是与古代的“伊甸园”或者人类的祖先传说有关。中国外来的海贝多有来自非洲以及阿拉伯海和红海如亚丁湾这里的。从距离人类发源地（东非）最近，以及闪、含两族在红海这里交界等判断，我也倾向于“伊甸园”就在今天红海附近。

证明红海与“伊甸园”的关联，或者证明伊甸园的地点，对于推断中华文明源可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有可能不仅是挪亚后代，而且我们的部分祖先可能真的来自“伊甸园”。当然这个荣耀和传奇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历史真相，哪怕来自地狱我们也要承认事实，但万一来自神奇的“伊甸园”毕竟更让人喜悦。

从原始社会的发展看，文明最初阶段的积累首先是人类组织的成立、部落的出现。简单讲，人群的数量必须扩大到一定的程度，文明才能被催生出来。从猿类通常的二三十个到人类的二三十人成群结队地采集繁衍，再到人类可以突破这个原始的数量界限，达到50人、100人、甚至是300人的族群，肯定会连带催化组织能力、语言、等级、私有化、政治、宗教、军事和其他文明的出现。量多体大，意味着复杂化，意味着所谓文明的形成发展。从这一规律看，最初的文明应该出现在人类的发源地附近，这是我特别倾

① 地中海岸边的古埃及因“海贝”与“健康”谐音而被人们当作护身符，它在中国似乎多与葬礼联系在一起，所以我怀疑这是冥币的一种，或者是为求“重生”的含义。

向于也门——埃塞俄比亚一带为伊甸园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这个判断也确实来自目前DNA与考古结合得出的结论。哪里是人类的发源地，哪里才有可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伊甸园”。

对于伊甸园的地点我还有一个假设。从《圣经》看，人类是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我认为“伊甸园”有可能指埃塞俄比亚包括索马里附近的人类发源地。索马里与也门分居“亚丁湾”南北两侧。所谓人类被驱逐出去可能是从非洲大地驱除出去的。这就不影响“亚丁湾”的命名合理性。当然也会存在异地取名的可能。无论如何，红海距离“伊甸园”肯定很近，比地中海更有条件成为伊甸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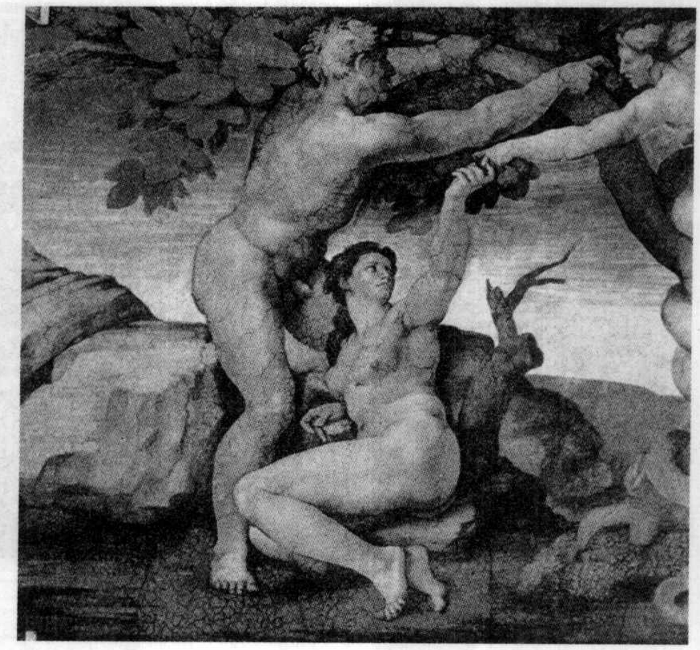
另外一个假设是“伊甸园”在阿拉伯半岛，或者就在“乐土”之“也门”，这里距离人类发源地也很近。也许是当时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化过程被拟人化为“上天生气”的驱逐，人们开始四散逃亡了，所以被传说为驱逐出“伊甸园”。

我的最后一个推测是，广义的“伊甸园”位置就在今天中东的核心地带，其北部边界为底格里斯河流域，西至小亚细亚地区，南至尼罗河。“伊甸园”的“四条大河”中缺少的那条是正待确定的从红海北部“卡巴湾”延伸至叙里亚的一条古河。这一区域内不仅有世界上最著名的两大文明：两河流域与古埃及文明，而且距离非洲的人类发源地很近，如前所述其中的某些地名本身就接近“伊甸园”；还有，挪亚也恰好把自己的第三子分配在这个区域之内，最重要的儿子“闪”被分配在其中核心的阿拉伯半岛。这个地区的核心地带位于北纬10～35度之内，最适宜生存与农业生产。

炎热的赤道地区不会是文明的发源地，一旦有宏观地理意识，文明人就会知道他们应该去寻找气候舒适的环境。美国人文地理学家索尔（CarlO.Sauer）是研究人类农业起源的专家，他提出过六个适合农业发展的条件，其中之一是“农业起源地的地貌和气候应是富于变化的，植物和动物品种多且繁茂”。毫无疑问四季炎热不变的热带肯定不利于农业发展，温带或亚热带地区则很符合农业起源的条件。经过各种衡量，文明人挑选了回归线发展——这也是“北回归线现象”的合理解释。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农业都是文明的象征。

今天的科学已经证明了人类主要起源于非洲，假如要发展农业他们就必须离开非洲，向回归线一带迁徙。中东是人类脱离发源地的必经之地，这里也有广阔的天地，所以他们在这里几乎盘桓了近万年才开始向四面八方远征。我相信“伊甸园”只能在中东这个区域内。考古学的研究基本也支持了这个假设，因为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地区就在中东一带，中国大约晚于中东千年左右，从大约9000年前开始，这一顺序合乎一系列逻辑。

结合《圣经》我们猜测，发展到大约7000年（也有人说是大约5000年前），挪亚支系成为中东最大的部落，他的3个孩子雅弗、含与闪被安排在跨越亚非欧的中东地区。“雅弗”大约在土耳其地区，很容易得出他们是欧洲白人祖先的结论；“含”被安排在埃及等北非地带，DNA测试证明，古埃及王国最早的领袖就是黑人——科学给这个古老的分配做出了有力的支持，说明《圣经》的许多记载是可靠的，通常认为含族是黑人。闪族人被安排在整个阿拉伯半岛地区。



伊甸园

从地图上看，含族的势力非常庞大，尽管我们今天看到闪族侵入了北非，但是含族同样进入了阿拉伯半岛地区。含、闪在红海两岸的交流从来没停止过，而这个交流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人种，我认为所谓蒙古人种很可能主要来自红海地区的混血结果，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是，今天中国人的面貌十分接近于大约3000年前的古埃及人，而当时的古埃及人正是含、闪两族混血的产物。所谓蒙古人的铲型门齿或者婴儿臀部的"蒙古斑"都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只是概率大小而已，所以这不能作为中国人特殊化的证据，更何况DNA也证明了中国人的起源来自于非洲。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个可能，最初来到中国的人群早已经形成了所谓的"蒙古人种"，但是后来给东亚带去文明的人无论他们是什么人种，都被同化为人数最多的"蒙古人种"。创造最先进文明的，或者带去最先进文明的人，未必是最大的人群。

《圣经》的人名顺序有一定规律，通常最后出现者为"上帝拣选"的人，用世俗的话说，他们可能是王位或者类似家族权力的继承人。在《圣经》中"闪"总是在三兄弟中最后出现，这意味者"闪族"的崇高地位。他们被分配在阿拉伯半岛的事实也连带说明了一个问题：被"闪"所分配的阿拉伯半岛是最重要的地区，是上帝所钟爱的地区，是神圣地区，是"伊甸园"的所在地区。所谓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时间应该在文明起源的最初阶段，可以假设为大约一万年前左右。既然我们今天已不能准确地判断7000年前的挪亚生活在什么地区，那么从亚当时代经历了几千年后的挪亚时代也许同样不知道具体的"伊甸园"所在。不过，他们应该知道大约的方位，起码应该比我们今天知道得多，否则我们就不会在《圣经》里看到那些线索，而驱逐出"伊甸园"的禁忌就更被淡忘了。所以"伊甸园"在挪亚时期肯定已经可以住人，并且那里依然被称作"人间乐园"，依然叫"伊甸"。或许他们是为了避讳而故意改为稍有差异的"亚丁"？

红海沿岸及附近区域保留了许多神秘与神圣，现在我们只知道其然，而不完全知道其所以然，一些传说或者奇怪的事情也一直都只在闪、含两族之间地区发生。还有红海东岸的"麦加"，至少有4000年的神圣历史。距离红海北端几百公里的耶路撒冷更是几个文明的源头所在，看似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争端，实际上可能是含族与闪族的一些古老争端的延伸。

仔细想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红海沿岸更加引人注目。从红海沿岸向陆地延伸500公里包含了中东的所有神圣地区，这里比任何地方更容易引起争端。主要因为这里有最为古老的文明源头，它因为过分神圣而异常敏感，它的历史源头决定了它的今天与未来。还好，中国与这里保持了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

△ 挪亚方舟考古遗址

我不奇怪7000年前就有人从中东远航而抵中国，证据就在《圣经》里，挪亚方舟的传说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事实说明在那样久远的时代人们就有了舟船。有人怀疑《圣经》的可靠性。可是从现有的某些说唱文盲可以念诵长达几十万字节的史诗来看，一个民族只要有语言，不需要有文字都可以把历史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据专家称，人类语言大致应该有3.5万年的历史①。所以对《圣经》的怀疑起码不能从文字产生的时间长短而论。在中国，具有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就发掘出过巨大的独木舟痕迹，说明人类使用船的历史无论在哪里都很久远。由于随时可以上岸，一个善水而喜欢探险的人完全可以带着他的家族从红海一直划着独木舟到达中国的河姆渡甚至东北的红山文化区域。当然，这个“一直”其实不是在几年内完成，人们可以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一代接力赛。

从挪亚家族曾经乘大船避难看，这个民族从大约7000年前就十分善水。“挪亚方舟”的尺寸换算为今天是：长138米，宽23米，高14米。这应该比较夸张，当然，也有可能是完全准确的。

从这个传说看，大约7000年前他们的居住地发生过大灾难，或地震或水灾，或者是其他自然灾害，导致该地区面貌与挪亚之前的可能会有部分改变，甚至出现“大河”变为“红海”，大城陷于深海。所以今天按照“伊甸园”特征全部按图索骥匹配是很困难的。这场灾难也可能是是场罕见的海啸。猝不及防中，许多临海文明被淹没了，而正在海上的挪亚一家人却获救了。2004年尾发生在印度洋的海啸有一个案例就是这样。

文明传播与“南岛”文化

我不擅长人类学，主要是因为没积累。“擅长”都是后天积累而来的，所以我从来没把“专业”当回事。真理的描述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核。导演陆川的话放在这里最合适：你可以流利地讲出一个谎言，你也可以结结巴巴地说出一个真理。我延伸一下：你可以很专业地犯一些初级错误，你也可以很不专业地说出一些正确推论。

人类的发源地主要集中在东非大裂谷以及南非。这里有几个现象联结在一起构成了非常重大的有关新石器时期的假设。

第一，人类发源地集中在东非大裂谷的东面以及南非。

① 参考里查德·里奇，《人类的起源》第七章《语言的艺术》。

第二，文明的成长是以人口数量聚集到一定的程度为始的，所以最初的人类文明不能离开人类发源地非洲太远。

第三，今天的所谓“南岛”族群包括非洲东部的马达加斯加群岛，但一般认为是从东南亚或者台湾附近传播过来的文明。我认为非洲的“马达加斯加群岛”可能也是南岛起源的一支，也就是说，“南岛文化”并非单一的文化起源，这一猜想部分得到DNA技术的支持①。

第四，假如要从非洲走出来，第一站就是中东地区。

从我的体系看，地球赤道以南地区（从非洲东岸到美洲西岸）几乎都归属“南岛”范畴。赤道至“北回归线”地区属于“南岛”与挪亚后代的混杂区——包括闪、含两族。北回归线以北地区多属于挪亚后代掌控，从亚洲到美洲很少例外。

以上这三个“大致”区域反映了文明从非洲的向外传播是横向的，并且基本有序。我觉得这个“有序”本身就值得研究。它是一种人类早期的家族或者部落约定，还是人类最初借助自然风力航海的结果？是约定俗成的结局，还是一种南北的自然方便（如按照星座指引下的横向迁徙结果）？

上面的三个板块只是大致划分，实际上从阿拉伯海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只要是临海地区似乎都有“南岛人”的痕迹。南岛人，犹如浪花一般飞上每一处海岸。他们是一个善水民族，他们比挪亚的后代更善水，他们甚至能在极其原始的无动力条件下访遍澳大利亚与太平洋中的岛群。其实我怀疑闻名于世的腓尼基人中就夹杂有南岛人的成分。

尽管从地图上看“南岛”区域比其他两个地区占地更广大一些，但实际上挪亚的子孙却占了实地的便宜，因为地球的陆地多在北半球，“南岛”区域在大洋的小岛之间。中国的版图多在挪亚的影响区，但沿海也受“南岛”文化的影响，日本也一样。所以在北半球所有区域几乎都能听到类似于挪亚方舟的故事版本，中国、美洲都一样。关于挪亚洪水故事的深入调查研究可能成为“南岛”与“挪亚”之间关系的关键问题。假如“南岛”地区同样有“洪水”传说，则他们两个族类同源的可能性极大；假如相反，则可以说明，在挪亚时期他们就已经泾渭分明。至今全球发现有洪水传说的民族大概有200多个，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更为详细的专门研究“南岛人”与“洪水”故事传说的分析，暂且存疑。这应该是人类学关心的一个领域。

---

①《新疆古代居民线粒体DNA研究》（62页）似乎也得出了与我一致的观点：“过去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的证据似乎都证明太平洋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群岛上人种可能起源于东南亚岛屿（可能为中国台湾省），并称之为通往波利尼西亚（Polynesia）的“特快列车”。但是经过Hagelberg E（1977）和她的同事们成功地从美拉尼西亚群岛上与当地文化有关的古代埋葬的遗骸中提取出了线粒体DNA，并在古DNA中没有发现原来所说的9个碱基的确实现象，如果这一发现是正确的话，可能表明古美拉尼西亚人不是“特快列车”上的乘客，而只是先前存在的古美拉尼西亚人种的积累。这毫无疑问地对占优势的考古学观点提出了挑战。”关于澳洲人种，同一本书的63页有：“最近，Gregory J（2001）等人在PNAS上发表了对古澳洲人的线粒体DNA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们测定了10个古澳洲人的序列（6000—15000年）。其中，LM3的序列与第11号染色体的mtDNA插入片段同源，这个序列可能来自于现代人类线粒体组最近的祖先。这个结果表明现代人起源的最早的已知mtDNA谱系在澳洲出现过，与现代人的发育分析显示LM3位于东非洲的最深的分支上。而其他的古欧洲序列则与现代人相近。这个结果对普遍认为的人类的非洲单一起源说提出了质疑。”好在人类起源与文明起源还不是一个概念。

以挪亚时代为文明规模化的起始点，人类文明开始广泛传播，并在大约4000年前左右达到稳定的高度。在北半球，这个传播过程大约在2500前左右受到阻碍。因此文明生成历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大约7000年前的极其原始期，7000～4000年前的相对活跃期，4000～2500年前的极其活跃期，随后突然进入“停滞期”。而南半球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有所不同，可能在又2000年后随着欧洲的探险者才进入另外一个时段，原始文明传播期在这时才宣告彻底停顿。有关南岛文化可能在下本书中有较多的涉及。

回想数千年前人类在极其原始的条件下波澜壮阔的探险壮举，让人不禁感慨万千。当然其中有碰撞有流血，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只有人类才有那种无所畏惧探知未知世界的浪漫与勇气。我常常想，这些勇敢的祖先中有多少人是在完全预知有去无回的冒险之下对大自然进行义无返顾的挑战的？我对这样的勇士充满了敬意与好奇，也因此，如何把古人的伟大浪漫还原给世人几乎成了我终生的宏愿，这个愿望之强烈让我自己开始变得无畏而疯狂。偶尔，我觉得我已经与这些古人合二为一，我能够感知他们，理解他们。我只是在“顺应”他们，所以我才发现了他们的奇迹。

让今天的“文明世界”反思祖先、反思生命的意义、体味生命具有的原始张力、考察文明的痕迹与未来发展，成为我自做多情的一份责任。越研究远古的人类生活，越对今天的所谓“文明”感到沮丧，我甚至怀疑今天的文明到底是在走向下滑的无力、还是在走向希望的巅峰？而我与读者之间的隔膜到底多少是知识本身的缺乏，多少是因为昨天太瑰伟以至于今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想像从而不敢相信？对此我真的没有答案。但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第三部分 永远的示巴女王

神秘的示巴女王

一般认为示巴女王对所罗门那次著名的神秘访问发生在公元前950年，有人推测说那是一次带有重大政治目的的国际访问。《圣经》中的示巴女王更像是作为埃及女王出现的，最有可能是“上埃及”女王，即统治尼罗河上游地区的女王。萨巴王国当时是跨海大国，她的身份一会儿是红海东岸的女王，一会儿是红海西岸的女王，当然也涉嫌就是上埃及女王。一般认为萨巴王国的建立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不过他们当然不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支政治势力，这个家族一直以某种方式存在着。

《圣经·列王纪》 10:1 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她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她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她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或作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燔祭〕，就诧异得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义。”

10:10 于是示巴女王将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她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

10:11 希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或作乌木，下同）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作栏杆，又为歌唱的人作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

10:13 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她。另外照自己的厚意馈送她。于是女王和她臣仆转回本国去了。

这个著名的故事被中东的各种文本一再唱诵，几乎家喻户晓，《圣经》、《古兰经》都予以记录。我认为10:11句记录的时间依然与示巴女王有关，否则此句不应该出现在《示巴女王觐见所罗门》章节中，而其中的“俄斐”有推测就在下列地区，并且可见这个区域当在示巴女王的治下：阿拉伯半岛南部、非洲东北海岸、印度等。

“俄斐”就是示巴女王的出生地，在埃塞俄比亚地区。萨巴王国的领土包括今天也门

以及红海对面的埃塞俄比亚地区。

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却说："从所罗门三年一次的商船航线（10:22）看来，它该是在比阿拉伯海岸更远的地方"。但或许三年一次这个商船航线在远航的同时，也顺路到较近的顺路地区，而"俄斐"正是中间的一个顺路也是可能的。

郑和到阿拉伯地区的时间来回是2～3年，所以我的推测是所罗门的船队目的地是东亚，而中国（"西伯"人所建立的"周"）或许就在示巴女王的统治之下。有人说，示巴女王到以色列国去是寻求政治支持的，一个以商业起家的国家需要在广大的地区获得世界超级大国的安全承诺（先不考虑这个国家是以色列还是埃及，总之在《圣经》描述中那是世界最大的帝国）。他们达成了协议，所罗门不仅馈赠给示巴女王犹太人的后代，还有另外的"厚意馈送她"，其他的政治外交肯定也获得了顺利解决。

关于这段历史迷雾重重，所罗门的身份也是个谜。犹太后裔的英国人拉尔夫正在力图劝说我们相信：所罗门其实是古代"下埃及"的一位法老。假如真相如此，那么这两位国王发生在2950年前的交往难道是古代上、下埃及的联姻和亲？很明显当时的"下埃及"势力大过"上埃及"。但是有人说示巴并非主动来献身的，是所罗门用他那独特的智慧诱惑了尚是处女的示巴。

从种种神话或宗教文本里可以看到当时的所罗门王国是第一强国。有人说示巴女王治下的王国是当时的世界第二大国。很遗憾这些传说在今天都还无法得到真伪的验证。

示巴女王与"周"

"周"可能来自"Jew"。

"周朝"到底是属于所罗门的王国还是属于萨巴王国，这也是个问题。或者"周朝"谁也不属于，它们之间只是一种密切的政治关系？

示巴女王由于拜访所罗门而生下一个儿子。结局等于两国联姻，其后的萨巴国民中出现了所罗门的后代，许多萨巴贵族从此具有犹太人血统。今天在埃塞俄比亚地区都有这些犹太后裔存在。假如示巴女王的儿子登基接替了母亲的职位，则中国的周朝统治者的人种以及文化背景就比较清楚了。

▶ 示巴女王 在阿拉伯世界人们称呼这位传奇女人为"碧勒姬斯"或"别尔基斯"。(Bilqis)，并且示巴女王没有去拜见所罗门，而是相反所罗门主动南下拜访了示巴女王。在他们这里故事发生了改变。拉尔夫认为这个古埃及贵族妇女就是传说中的示巴女王。

从强大的萨巴王国与所罗门的以色列国看，当时他们想联合控制一些远方的殖

民地还是很容易做到的，一方有政治实力，一方有交通便利与经济实力。但到了公元前8世纪，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色列国被亚述征服，萨巴王国与其他三国在也门地区展开激战，持续多年，死伤与俘虏动辄以千计或数万计。中国人在同一时期的公元前8世纪发出“上天变乱”的哀叹。

萨巴王国使一切平定下来获得初步的统一是在公元前540年。有人会推论说，萨巴王国假如真是周王朝的殖民统治者应该在这个时期到中国收回辖权。但我的看法是，经过中国的“春秋”战乱，中国的各诸侯已经羽毛丰满，不可能再重新回到“旧社会”，连近在眼前的周王朝他们都不放在眼里了，中东的故旧能算老几？另外，既然已经“礼崩乐坏”，“道德时代”终结，按照祖制办事当然不再可能了。作为加倍的反动，中国地区的贵族诸侯不仅不会继续听命于老东家，而且会故意堵塞一切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在这一点上他们应该意见一致：合力对外，反抗中东统治者，甚至故意毁坏以往的历史证据。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本土文明应该从东周算起，只有从这时起中国人才真正开始独立。

晚周至秦国时期，中国进入了外部闭塞、内部分化与发展的时代，西北的陆路通道可能断绝了，东南沿海的一切港口可能也被锁闭了。人类自由浪漫迁徙时代彻底结束。

中国的再度开放是在汉代。经过几百年的封闭，在文字信息本来就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忘记了以往的历史，只留下了模糊的传说。汉代由于文字发达，所以我们能详细了解汉与西域的联系，陆路与海路在汉代同时打开。

中国与中东之间的隔绝关系经过几个世纪的断裂之后又成为了白纸一张，一切都是崭新的描绘，瓜葛不再。“萨巴王国”已不能对中国构成任何威胁，这个神奇的“香料王国”在公元前2世纪正在迎接它末日的余辉，也门的新时代即将来临，中国的新文明已经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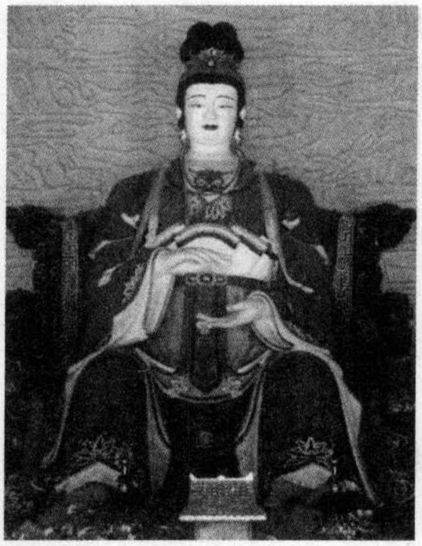
公元前115年，在经过多年的争斗之后，希木叶尔王国终于取代了萨巴王国。

与中国的秦朝政治与文化大革命形成对应的是，阿拉伯半岛在公元7世纪由于伊斯兰运动把以往的历史也全部灭绝。这样就在两头彻底抹去了曾经有过的历史痕迹，两次的“大革命”发生的时间不同，但是结果却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失忆了。

但历史并非扫荡了一切遗留痕迹。比如“中国”这一词汇“Sina”，我推测“Sina”一词的基础是在“夏商周”时期奠定的，并且与那段复杂的历史有关。中国“夏商周”使用的语言都可以说与一种叫做Proto-Sinaitic的语言有密切联系，它是腓尼基文字以及“南阿文字”的上线。中国被称为“Sina”合情合理，很可能意味着中国早期与地中海东岸地区或腓尼基人或希伯来人有着神秘联系。它也可能是“Sinai”（西奈半岛）的异体，也就是说中国的一些祖先来自西奈半岛这里。那么，假如“秦”一词源自“Sinai”，则可说秦始皇与以色列或者中东可能有直接关系，“西奈”是以色列人的圣山，以其而立很有意义。“秦”（qin）的最初来源可能为“Sin”。

“西王母”与“周穆王”

中国周朝时期有一件事与两个人一直引起史学的争论。这就是“周穆王”西巡拜访“西王母”的事件。这个“西王母”会是声名显赫的示巴女王吗？


△ 西王母

“周穆王”之所以称为“穆”很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我还是想提请读者注意，从阿拉伯地区到中国转化的汉人除了许多人转姓“蒲”（取Abu）、“苏”、“李”、“安”等等，姓“穆”会更容易理解，因为在阿拉伯地区以“穆”打头的名字实在是太多了。另外，在也门某些古代国家首领就是“穆卡拉布”。“穆王”这一称呼就有双重的理由推论来自也门附近的“穆王”。

周穆王生活在西周时期，此时为太平盛世、礼仪社会，距离“礼崩乐坏”还有相当长的时间。首先是国内的稳定给他的出访造成了合适的条件。然后是外部国际条件。当时所罗门王国（无论在埃及也好在迦南也罢）以及萨巴王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国，它的所属国首领到外面去做国际访问，安全应该绝对没有问题，而且还会在沿途得到很好的招待。当今哪个小国愿意没事招惹美国呢？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列子·周穆王》（段二）“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贻后世。”

《穆天子传》（卷二）“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国隆之葬，以诏后世。”

关于周穆王西游昆仑，有人说此“昆仑”为中国新疆“昆仑”，那里在古代是有一些发达的古城，但是足够远到周穆王见西王母的“十九万（周）里”吗？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从南部阿拉伯半岛出发有一条文明传播道路是从印度河北上进入中国昆仑山的。或许这个地方有过很重要的中转，昆仑是萨巴王国的一个必须中转站。按照中国的说法，西王母就位于中国新疆的昆仑山附近。但是我认为这个地方不足以有个级别高到让中原穆王亲自探望女王的可能，因为这里距离人类的整个文明核心地区太远，穆王应该从这里沿印度河继续前进。我推测，故事中的“赤水”应该为“红海”，而“赤水之阳”恰好就是红海之东的也门。而“昆仑”也有可能是阿拉伯半岛某地。实际上“昆仑”在中国古代就代指过“阿拉伯”。比如“昆仑奴”就是指来自阿拉伯海附近的“黑奴”。或许正是有太多的阿拉伯海附近的黑奴沿上述路线而到达中国的昆仑山一带，所以中国才有“昆仑山”这个名称也未必。

周穆王翻越的“流沙”很可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可能是“阿拉伯大沙漠”。他赶往探望的人很有可能是当时全球共知的示巴女王。也可能正是由于示巴女王的名气太大，才导致东亚的一国之君动身拜望。

“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意思为：登上高丘仰望红海对岸的黄帝宫殿所在。不过这个确实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猜测。

我以前推测过“黄帝”可能是“雅各”或“约瑟”，“颛项”可能为“约瑟”或“约书亚”的音译。这几个被我推测的人物都因与埃及“牧羊王朝”的关系而曾经生活在古埃及。这提示我们，当时尽管海路畅通，但大多数人可能自西北陆路而进入中国内地，蒙古人一直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也是一个证据。从DNA测试看，今天的蒙古人与新疆居民（例如维吾尔人）的血缘关系很近，是不是连带说明了一些问题呢？这个基础是新疆的部分居民就是以色列人的后裔，而他们早期又生活于埃及的“牧羊王朝”，与蒙古人其实同为“炎黄”后裔。

以上似乎太为曲折，从另外一个中国境内的曲折故事可以比较看看，并且这个故事与其既有关联也很有趣。

我认为内蒙古赤峰一带的“夏家店文化”与亚伯拉罕的后人有一定的联系①，不是因为“夏家店”与亚伯拉罕之妻子“夏甲”同音，当然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考虑，主要是因为3000年前那里恰好还生活着一个叫“燕亳”（Yanbo）的民族，我认为它很可能与“亚伯拉罕”（汉语拼音Yabolahan，英语Abraham）直接有关，“燕亳”就是“亚伯”。在大约3000年前，黄帝的后代据说被周人安排在今天的“燕地”，也就是天津附近，他们之间相距大约300多公里，不算很远，我的意思是，很可能“黄帝的后代”与“燕亳”或许是同一群人。围绕这个话题还有更多的疑云或证据。历史上的“吐谷浑”既是人名也是国名，“吐谷浑”也是来自中国东北的“鲜卑人”，我认为“鲜卑”或许是“希伯（来）”人，只是另外一个叫法而已。在这同一个地区，有双重的理由怀疑他们是同一个根源，一个是来自“亚伯拉罕”的“燕亳”人名，另外一个是来自“希伯来人”的“鲜卑”族名；前者来自人名，后者来自族名，但后来都演变为族名了。难道这仅只是巧合吗？对应得如此工整？还有这个地带更北的一个“西伯里亚”没有提及呢。东北亚方向可以总结为一个“西伯文化圈”，怎么去解释他们的关系与现象，我认为结合起来看才是好办法。

这一文化区中的族群属于什么人种呢？苏轼题唐画诗《书韩干二马》曰：“赤髯碧眼老鲜卑，回策如萦独善骑。赭白紫骝俱绝世，马中岳湛有妍姿”。看来唐宋期间鲜卑为“赤髯碧眼”的白种人。不过在今天的汉人中间已经很难看到“赤髯碧眼”之人，只有在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才有一些痕迹，与中原地区的汉人通婚以及他们的四散迁徙是这样的人种特征消失的主要原因。唐代诗人岑参有诗曰：“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也似乎说明了中国北方多为同一类人。并且，特别提到“紫髯绿眼胡人”的音乐之“悲”，在中国境内最著名的“悲声”恐怕就是刺人骨髓的新疆音乐了。

今天的“慕容”姓是“吐谷浑”支系的后代，对今天依然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慕容”家族进行DNA对比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或许从这里我们能找到“黄帝”的线索也未可知呢。对于今天的萨巴犹太人后裔与中国的周族后裔进行大规模的DNA比对，或许也有意外的收获。据说中国的“王”姓多是周人血脉。当然“子”姓可以假设为商人看看。

① 李先登，《商周青铜文化》，177页：“夏家店下层文化可能是夏商时代燕亳族的古代文化。夏家店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建立一个姓氏DNA对比基因库肯定也可以解决一些民族起源与迁徙史问题。

许多人猜测过周穆王事迹的真伪以及游历道路，但始终没有达成共识。甚至有一位温玉春先生从地名角度论证了“穆传”故事发生在山东省，这就不是“西巡”而是“东游”了。他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对应地名。据说“他的论证很有道理”。我也说说我的看法，说不定更有“道理”。

我在《历史也疯狂》中强调指出，我同意山东是商人的大本营，他们本为“东夷”，后来才入主中原，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肯定了商朝的起源肯定与也门附近地区有紧密联系。商朝看似“东”来，实际上绕了一个弯子，宏观上找根源依然属于“西”来。古人死后埋葬一般头朝向远祖的故土，而“东夷”人据说都朝向东方，连山东的也如此，这说明他们承认他们的祖先来自海上，因为山东以东就是大海，并且他们来自再东的土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那里没有同期比中国更高级的文明，只有绕一个大弯到中东去才符合逻辑，并且那时的人们没有清晰的地理概念，这可能是他们“短视”大海源头的原因所在。古人迁徙时有异地取旧名以纪念故地的习惯，把故乡的名字在新地方重新取一遍，作为第一站落脚的山东这里有些地名与“西方”的故地应该是相同的。假如周穆王实际上西游到了也门方向，温玉春先生却发现他们到了山东，确实是可以“很有道理”的。

异地取同一个地名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比如西晋末年汉族南迁，身在南方怀念北方桑梓，政府为了安抚思乡北人不得不在南方州郡设立了许多原为北方的州郡名称，如“南兖州”、“南徐州”，“南雍州”等。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发生过大面积在北方命名南方州郡的事情。可见仅只依靠地名相似是一种“孤证”，“很有道理”未必等于“真理”。当然任何严肃的探索都是值得赞扬的，但有力的反驳却是残酷的。温先生的考证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之“西”的有些地名在山东被再次命名了，并且这个文化现象可能潜在说明了古代曾经有东西方人口的大规模迁徙。这个判断前提是，周穆王确实“西”游，而不是“东”游至山东。

我前面是说过，商人死后头朝东是一种“短视”行为，忽略了真正的根源在“西”。那么这里怎么古人就清晰认识到了穆王是“西游”了呢？因为穆王没有走五迷三道的海路，他去时走的陆路。

穆王“西游”时间为公元前989年，穆王在位55年，出游时间为“穆王13～14年”。看来出游时穆王正年轻力壮，“西游”所用大约两年。古代阿拉伯地区一些探险家和旅行家一般类似距离的陆路行程，假如不出意外也是大约2年就可以来回。如公元10世纪一位名叫伊本·法德兰的阿拉伯人去莫斯科以东的萨格里白（疑为“萨格勒布”）传教就是经过11个月抵达的，而作为国君准备充分想必就更便捷迅速一些。从各方面判断，我认为穆王西游是历史事实，而他所拜见的“王母”有可能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示巴女王，时间上很接近，路途假如很近也根本无需花上两年时间！

示巴女王与所罗门联姻时间有人推算为公元前950年，其时女王还能生育，起码年龄在大约12～60岁之间，有传说她当时仍是处女。公元前989年距公元前950年相距39

年，穆王拜见示巴女王在先，所罗门召见示巴女王在后。他们之间的年龄有点悬，但基本解释得通，需要更多的资料才能圆满解决某些疑点。假如其中一个年代有误就会把我们引向歧途，不可全信，也不可全否，还是给以后勘误留一点空间。否定得太快太坚决本身就是一种“不严谨”。

还有一个史料使以上的疑问得到解决。传说萨巴王国的国王在所罗门召见示巴女王之前都是女王，所以穆王很可能见到的是前一任或前两任女王也有可能。关于示巴女王的传说本来就可能是几位示巴女王的共同事迹，但我们一般讨论的女王则是一位名字叫Makeda的女人，是她前去拜访了所罗门。

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认为穆王西行应该是可信的历史事实。他在《中国通史》中说“穆王是个大游历家”，“一个天子不会冒险远游，当是西方早有通商的道路”等。我倒是认为，穆王未必是出于单纯的游历取乐，很可能还有其他重要的非“去”不可的理由，他进行的是一种国事访问。他本身名“穆”就很可疑地道出了回到故土根据地的信息。实际上后来示巴女王亲自到所罗门王国去也可能带有秘密的政治目的，有人说示巴女王的国家在那段时间发生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需要借助世界第一大国的国王出面摆平，他们通过联姻最后达成了协议。

据说，陈梦家曾经在殷商卜辞中发现有“西母”①一词，不知是否是“西王母”的简写。这个话题颇可深究。这就说明，不仅周朝有“西王母”，商朝晚期同样有“西王母”。而萨巴王国与麦因王国一直都实行的是女王制，到Makeda这个示巴女王之后才改制。

西方关于示巴女王的猜测也有很多。比如关于她的身份就有“公主说”、“女王说”、“神妓说”。关于她的国家则有“上埃及”“下埃及”或者“萨巴王国”说。翻开他门的严肃史书一般都能看到“示巴女王”与“萨巴王国”的评说。在众说纷纭之下，英国的拉尔夫专门写了一本《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其中的一个片段说，由于示巴与所罗门的特殊关系，他们俩生下一个叫“梅内勒克”的儿子，从此两国关系“密切得超乎人们的想像”②。

“萨巴王国”与“周朝”的联系不可低估。他们基本在同期共“始终”：大约公元前10世纪前后建立王朝，在大约公元前8世纪同时“变乱”。然后一个疑点是，它们都由一个发音近于汉语拼音为“xibo”的贵族建立了国家王权。还有，与中国甲骨文最接近的文字就出自萨巴王国的“南阿文”。

原始性意识与库克船长

中国古代有为了祈求播种丰收而要求夫妻在对应时间进行交媾的传统，并有相对公开的交合仪式，它们隆重而严肃。原始社会一直有许多类似的有关性与天感应的神秘传统，红海南段、古埃及都有“神妓”的说法，在印度则可能转化为“欢喜佛”——人们

① 吴天明，《中国神话研究》247页，自陈梦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燕京学报》1936年29期）。
② 拉尔夫·伊利斯，《所罗门 示巴女王之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6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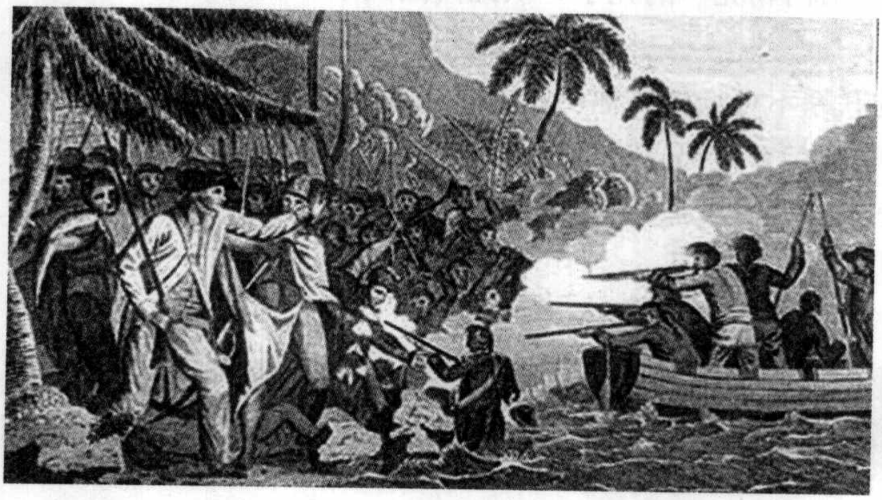
颇不习惯地在清净的佛寺看到一些男女交媾的雕像，只不过由于来自远古而被教徒们视若无睹，甚至在特殊的地方某些教徒仍以特殊的方式在人间继续神圣的身体奉献，人们也当它与淫荡无关，只以秘宗相对待。今天部分国家依然有类似的传统，并且就在中东边缘地带。200年前的太平洋岛国上也保存着“神圣妇女”的传统，这些人既神圣又“淫荡”，据说她们只与神交配。

这些全球广大区域同时出现的有关文化现象既可以解释为一种文化的统一性在时间地理中的传播，同时也说明了在原始条件下女性的特殊地位来自她们神圣的生育能力，性活动本身被赋予神圣感。在古代，某些交配活动是被看做神圣、纯洁的，而不是淫荡的。

中东地区许多古代女性，尤其在阿拉伯半岛，可以一妻多夫①。有人可能想到这是母系社会。但这与母系社会的特点稍有不同，因为它表现在性爱领域内女性的绝对优势，一般的母系氏族似乎只提到婚配的自由以及母亲地位的尊贵。在今天中国残留的母系氏族社会里女人没有多夫的特权，但中国的西藏地区有一些残留。西藏距离南部阿拉伯半岛最近处只有1000公里。

谁能想到今天把全身都包得严严的妇女在上古时期的阿拉伯地区竟然可以一妻多夫呢。不特这些妇女可以一妻多夫，而且据说在远古实际上是男子戴面纱，女人倒是袒露面容的，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某些地方还有男人面戴面纱的习俗。同一个地区，世界大转换，这就是历史，让人目瞪口呆。所以切忌拿今天的现实去僵化地比对昨天的历史，起码以今天的穆斯林妇女和示巴女王时代的妇女相比是绝对错误的。同时，拿中国封建时代的妇女地位去和儒教产生之前的“三代”时期的妇女对比也是完全错误的，差别判若云泥。

或许库克（Cook）船长的故事②更能说明交配在远古或者原始社会所具有的神圣或怪异——有别于今天的意味，同时也可以方便地解释原始人或者古代人的思维与今天的巨大差异。



公元1778~1779年，具有传奇色彩的英国船长“库克”带领“发现号”与“决心号”在太平洋上的小岛间来回穿梭。他曾经领导过三次环游世界的探险活动，他绘制了新西兰、东澳、巴布

① 不要绝对化地认为每个妇女务必多夫，尤其不要认为这样就不存在一夫多妻了。两者都是僵化的思维结果。在一个商品经济已经出现稳定地位的社会里，只要有经济实力人们就可以用金钱改善环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传统是可以被时时修改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

② 马歇尔·萨林斯著，张宏明、黄向春、刘永华译，《历史之岛》，19页。

亚新几内亚海岸地图，他发现过许多新岛屿，穿越过南极圈与北极圈，是一位经验丰富卓有成就的航海家。当库克来到终结他生命的那座太平洋小岛时，那里的许多原始土著第一次看见外来者。他们把这些开着机动大船具有明显优越于他们文明的白人当作曾经远去的祖先重新归来，为表示热烈欢迎，行动之一就是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妻女姐妹送达船上给官兵们享乐。但库克船长曾经下令严禁这些事情的发生，不是出于道德，而是怕淋病蔓延，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那些土著妇女遭到拒绝时会愤愤不平地表达不满，不过当这些妇女与那些白人交媾后也证明了那些白人只是普通人，但多数上船要求交配的妇女多多少少怀着有所获益的目的，不是世俗的物质目的，而是希望有“神圣”的后代。被具有处女情节的现代人深为诟病的部落头人对于处女“破瓜”其实可能也有着同样的诉求，但发展到后来很多文明人开始反感甚至反抗。一旦这些处女怀上头人的后代，整个家族都会沾光，这些头人的后代在母系家庭里也会一直得到很好的照顾。其中的道德伦理完全不是“文明人”所能理解的，今人的愤愤不平有时候更像是“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滑稽。古人与今人有完全不同的思维逻辑。

原始社会的某些诉求在今天的人看来是交叉或者矛盾的，但事情就那样发生了。库克船长大概是惟一拒绝与当地女人性交的人，有人说他与头人的妻女睡过觉，也有的说没有，总之似乎只有他没有得到验证具有人身，最后他被当作“罗诺”神而受到当地人的崇拜。在后来发生的的一场至今众说纷纭的事件里，更加“矛盾”的逻辑产生了。库克船长被土著所杀，他的肉被土著人烤着分吃了，但他的骨头至今仍保存在神圣的祭坛上受人崇拜。

按照现代文明人甚至干脆是英国殖民者的叙述，库克当然是被野蛮人恶意残杀的，并且遭遇到了分尸的悲惨结局。但是当地土著的解释可能是相反的一个文本：由于他们极其崇敬库克，所以其中的一个土著在某个神圣的巡游过程中想用匕首刺探这个“罗诺”神的反应，不料他竟然像人一样被刺后流血倒地而死。据说库克在被刺时的尖叫声让土著人很是疑惑，因为这看起来更像是个普通人嘛，神不应该这样。不过土著们依然把他作为神明敬奉起来，至于吃他的肉当然也是出于神圣的考虑，或许那是他们认为的“唐僧肉”呢。文明人继续精明地推论：那些夏威夷土著早就想找机会刺杀库克了，所谓“神圣”只是一个故意设置的阴谋而已。

后来又发生了一场混乱，双方都有死伤。奇怪的是，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有许多土著妇女络绎不绝、兴高采烈地爬上英国舰船要求献身。这个交杂着血腥和淫乱的场面以无比的荒诞展现在我们面前，让现代人感到不可思议，以至于有关的争论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假如我们愿意放弃现代人的固有僵硬逻辑，其中的许多事实或许是可以理解的。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的性活动是十分混乱的，或者说一直都处于相对自由浪漫的阶段，比较规范的婚姻其实并没有多长的历史，并且婚姻也并非是一项十全十美的性分配制度。性这个话题，在古代既神圣又随意、既开放又敏感，真是让人说不清道不明，同时这一观念会在某些方面影响到政治制度。

古代的“神圣”交配甚至可以引起我们对于人类起源的许多猜想。地球猿人或野蛮

土著与外星文明人交配产生了现代文明，这样的神话一直流传，似乎许多原始部落都有一些神话是有关他们远去的祖先的，并且他们始终在等待着他们回归，而库克船长只是“回归”的一例而已。起码这是关于人类起源的一种说法。无论是太平洋群岛还是美洲的土著最初不是抵抗而是热情迎接外来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同时也给世界上每个文明区域的远古殖民一个可以参考的文本。这个案例可以引进中国的“三代”加以借鉴，不要一定认为殖民的发生就意味着流血和战争、抵抗和压迫，有时候文明差异本身就是一种威力，它可以不战而胜。没有证据显示古代人比今天更热衷战争与杀戮，就杀人效率看今人比古人先进多了。惟一改变的是今天的人有太多其他的美味而不再吃人肉了，而古人由于环境的恶劣却不得不背上食人族的恶名。

“库克之死”作为一个符号长久地受到争论，直到今天依然是殖民、航行探险以及宗教歧义的最好标本。这个符号是个悲剧，它以一个人甚至数人的生命为代价，但是对它的不断解读也让人们不断警惕不同文明形态的极端差异。

“事实比想像更离奇”这是句西方人熟知的话，我希望中国人也好好记住，起码会在理解史前历史时增加一些理解力。

我相信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横亘在所谓的文明人与原始人或远古人类之间，他们的逻辑差异足以构成世间最大的荒唐，这是两个不可沟通的世界。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上古的历史真相不容易被今天的学者发见的原因所在，因为后者太“严谨”了。理解史前社会不仅需要彻底洗脑、换脑，而且需要给各种逻辑可能留出足够的出口，“以虚胜实”是最大的法宝——这其实是一种技术上的“谦虚”，以免自己犯“严谨”的错误变成保守分子。在史前研究方面，张光直先生说过，在证据并不确凿的时候做假设时不要建筑僵硬的“钢筋水泥”，要改用“塑胶”。我真为这个主意叫好！

作为女性的示巴女王

接近3000年前的中东世界有太多的话题围绕着示巴女王，而这个历史人物曾经是萨巴王国最大的主角。无论有多少文字恐怕都说不尽其中的诡异与神奇。[①]我甚至想写一本《示巴女王》的专著了。

I am black but comely,
O ye daughters of Jerusalem,
As the tents of Kedar,
As the curtains of Solomon,
Look not upon me
because I am black

① 本章多有参考Torrey Philemon“Makeda, Queen of Sheba”

Because the sun hath scorched me.
(Bible : Song of Solomon)

这首《圣经》中的“所罗门之歌”到底是在说谁呢？一般认为主人公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示巴女王”。

“萨巴王国”是“示巴女王”的领地。“Sheba”或者“Seba”拼写成的“萨巴王国”可以翻译为“天堂与和平之地”。另外，“示巴”这个词汇还有“星辰”的意思。这个词汇还有更多的有趣含义。

萨巴王国以富庶、精于农业的水利灌溉和香料贸易而闻名。它进入青铜时代是在公元前3000年，比中国早大约1000年。这里距离“两河流域”近在咫尺。

一种学说认为，萨巴人是《圣经》里“古实”的后代，其特征为身材高大、富有号召力，生理方面既有卷发者（woolly-haired）也有直发者。今天的中国人身材不算高大，但头发正是如此：既有直发的也有卷发的，但卷发者属于少数。

有人说萨巴人是闪族人，也有人说他们属于含族。多种迹象显示他们皮肤不白，换句话说是深色皮肤。在埃塞俄比亚史诗《王者的荣耀》（the Kebra Negast①）中牧师向“萨巴人”说：“Ye are black of face – but if God illumineth your hearts, nothing can injure you”。

由于地理上的相对隔绝，萨巴王国从一开始就度过了500年最初平安富足的生活。示巴女王不是开国之母，其前至少有5位国王，包括“Iti'amra”和“Karibi-ilu”。可以肯定这个王国应该建于公元前11世纪，与中国周朝基本同时开国。示巴女王本人出生于公元前1020年的俄斐（Ophir）②。尽管“萨巴王国”建国于公元前11世纪，但示巴显然来自一个更加古老的王族，很可能与麦因王国的皇室有亲族联系，根据另外一个信息源，她之前还有97位国王，那些人肯定不是萨巴王国的国王们——这个现象让我想起前面有关“夏商周”祖先“Qi”的分析，假如三朝同祖确实其中的某些计算结果是不同的，中东这里也一样，看你从哪里算起。

① 根据拉尔夫《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97页）的说法，《王者的荣耀》最早发现的是用埃及的科普特语和阿拉伯语写成的。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古埃及文献，其中的“埃及”全部被置换为了“埃塞俄比亚”，正确的原貌应该再被还原回去。并且其中还提到有人说所罗门的埃及妻子与示巴女王为同父姐妹，示巴女王世界为埃及公主。不过拉尔夫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古埃及没有黑皮肤的法老，我不能同意拉尔夫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埃及的法老中可能有过黑皮肤的法老。

② 依据http://www.windweaver.com/sheba/Sheba2.htm “Makeda, Queen of Sheba” by Torrey Philemon

《王者的荣耀》指出，古老的法律条文规定了萨巴统治者必须是女性，而且必须是处女。据说“萨巴王国”的千年统治都是女性。这也是示巴女王觐见所罗门时是个处女的根据。不过也有人说尽管示巴女王的母亲是个女王（Queen Ismenie），但他父亲也做了国王，在公元前1005年父亲死后她以15岁登基，维持了6年处女之身，随后统治了萨巴王国40年①。一般来讲她那时还没有结婚。②

“萨巴王国”时期女性地位如此特殊，竟然只有她们才可以为王，并且她们可以一妻多夫。看到这里许多读者可能都想知道中国三代时期的妇女地位如何。假如一致则我们的证据又多了一分，假如相背，则我的整个推理有可能是错误的。

很快我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确认，即便是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上也告诉我们：商代时期的妇女地位非常高！我还幸运地碰到两位专家，他们告诉我这个问题已经是定论，无须继续考证。

我甚至得寸进尺，产生了疑问：中国“三代”的统治者真的都是男性吗？尤其是商武丁时期，为什么至今发掘出的商代最大墓地却是位女性？“武丁”有可能就是“妇好”本人吗？或者这是她的两个不同名字与封号？同期的示巴女王就有许多不同的名字，她最常见的名字叫“Makeda”，她名字还可以是“Magda”，“Maqda”以及“Makera”。

无论这个猜测结果如何，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妇好墓的陪葬之丰富大家都认为可敌君王，这一事实曾经使男尊女卑了2000年的中国人大吃一惊，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女人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宠爱？如此多的财富被陪葬那么这个国家到底还有多少家底能让国王陪葬？最让考古学家惊奇的是，从许多迹象看妇好是位领兵打仗的“将军”。现在的问题是，她真的仅仅是位将军呢，还是学者们实在不敢往别的地方想而遏止了想象力？她为什么不可能同样是位女王呢？一个国家放着那么多人不用为什么偏让一位娇弱的王妃出去打仗？

商朝开国之母“简狄”为一女性，夏朝也有迹象显示开创者为女性，因为国性为“姒”。联系到萨巴王国的女王传统，这些紧密联系不可小觑。以前有人把这些解释为母系氏族公社，看来也可以有其他解释，这两人就是女王！后来我们看到的三代庙号，都是在东周或汉代之后按照当时的伦理或社会逻辑的重新排序，未必是真相本身。

不过对妇好是国王的推测连我自己都承认依据不足，因为妇好墓没有墓道，是一个长方型墓坑，而一般的君王应该有四条墓道。并且据说从甲骨文中已经推测出武丁有三妻，妇好只是其中之一。不过我还是愿意存疑。古埃及的哈特苏普女王死后，人们由于不满她的统治而砸毁了她的许多雕像，那么一个具有复杂身份的妇好可能死后也会有折中的安排。或许妇好的首领地位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武丁成了傀儡？这也是一种可能。另外，有四条墓道的皇室风俗还不知道是从哪代商王开始的。假如是从妇好之后才开始的呢？起码我还没有听说过夏朝有王墓发掘过，所以夏朝可能根本不存在“墓道”的说

---

① 依据http://www.windweaver.com/sheba/Sheba2.htm“Makeda,Queen of Sheba”by Torrey Philemon.

② 根据这些推论，公元前989年西巡的周穆王还是有可能见到名叫Makeda的这位示巴女王的。当时她的年龄大约是22岁，并且已经为王。但是这个推论并不符合与所罗门的会见。或许，有关所罗门的时间推论是错误的，所以还导致了他们儿子出生时间不符合的局面。

法，商朝的墓地大规模发掘似乎也是出现在殷墟[①]，并且也正是在殷墟王陵发现了带墓道的“十”字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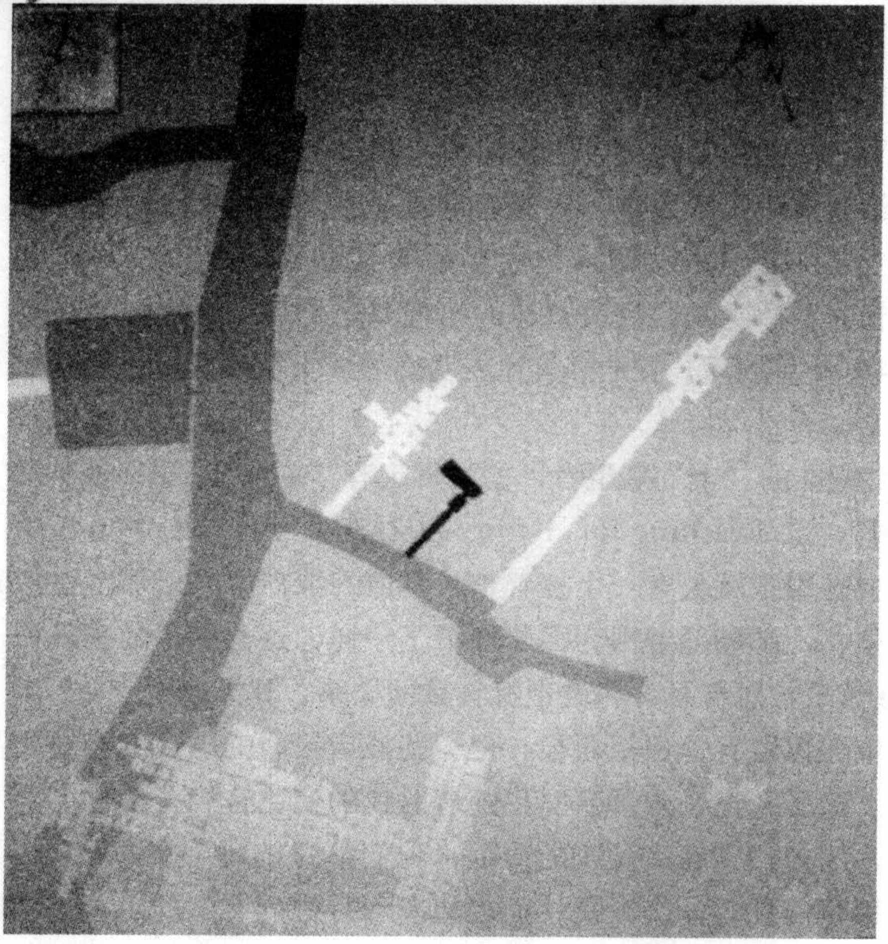
关于墓地的形制，全球似乎在早期都是按照人的体形做为长方形的居多，这比较一致，因为太一致了所以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困难——这有可能并非是相互习得，只有特殊的发现才有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们的注意力就应该放在墓道上面。

我没有专门细致的研究，粗略的感觉是，有关墓道的出现似乎是随着青铜器文明而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大约在4000年前后，在欧洲有比较明确的“十”字墓道，中国则是在后商时期“突然”出现。

我尚未获得古埃及的墓地有标准的“十”字型者，但是肯定有“墓道”，并且是非常长的墓道，这一点到著名的“国王谷”（Village of King）去看就明白了。以3000年前的拉美西斯二世前后为例，只要是国王就会有一个拉着长长墓道的独立的国王墓，这似乎符合中国人所说的“中”字型墓。那些隧道因为很长像笛子一样，这些国王的墓就被称呼为“笛穴”。并且很明显隧道的长短与身份和威望有直接的关系，比如嫌疑在18岁就被暗杀的国王图坦卡蒙隧道依然保留有，但短得很，但一些威望很高的国王隧道要长数倍，最长的会达到几百米长。除了墓道，内部墓室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一些变化。还有一个情况也符合中国的形制，王子们就埋在父王的附近，他们整齐排列，整体看上去与中国的殷商格局极其接近，即父王独占一个大墓，而旁边有一片排列有序的小墓。中国的殷墟墓地除了大墓一般认为是王，小墓还不清楚是什么人，而古埃及那里则已清楚，那些排列清晰的群墓就是王子们，由于拉美西斯二世一个人就有99个王子，所以他的孩子们的墓地占据了一大片——或许根据每个国王的实际孩子数目以及这些墓地之数目会获得一个差额，而这个差额很可能就是外派王子到殖民地做总督的数目，当然他们不一定是到中国去做总督了。

除了这些巧合之外，古埃及人是在大约16世纪从托特米斯一世（公元前1545——1515年）这里开始彻底抛弃金字塔建筑改为墓地的。而中国的墓道突然出现于后商，与埃及的这个国王带细长墓道的风俗之间有200年左右的间隔，很符合文化传播的规律。不过它可能还说明了其他一些可能，比如后商以墓道的使用表明了它的“独立”立场，有过之而不及，中国人甚至使用了四条墓道，埃及国王的那种墓道成为一般小王的形制，这是一种报复还是一种发展还不清楚——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人是由埃及人直接统治的，但是可以表明直接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是，这些“新王国”时期的墓地都建立在尼罗河的西岸，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古埃及人称呼人死为“到西方去”，中国人同样称呼人死为“上西天”，这个说法或许是通过印度等地传过来的，但不可忽视从古埃及发源的这个可能；那么实际上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中国人“上西天”的说法很可能是从

① “seba”的另外一个意思是“7”，而“十”符号的实际含义就是“7”，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个逻辑，seba也有太阳崇拜，所以两者得到了统一。这个问题很可能解答了在中国为什么“十”为数目“7”的问题，2根源来自萨巴文化！所以商周才开始出现的皇家“十”字墓道很可能想强调这一皇家象征，或者“十”就是“萨巴”的家族符号之一，这也许是对于“seba”的一个象征或追忆。因为中国尽管接受了古埃及的文明影响，但是在生死大事上却直接使用了与他们关系更为紧密的“seba”的象征意义。



▲ 这是一幅古埃及“国王谷”的一角，下方的群墓为王子墓，上方最长墓道的为拉美西斯六世墓。

公元前16世纪前后就传入中国。这一墓葬改革也可以联系东亚与东南亚的悬棺来考察，因为“国王谷”的墓葬改革实际上是为了避免盗墓贼的骚扰，他们一般都隐藏在悬崖群山之中，入口多在半山腰，所以也被称呼为崖墓。当然中国的悬棺出现得更早，但这个问题依然是有追索价值的。有关这个话题的最后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事实是，这个时期古埃及墓地与殡葬礼堂之间有很远的距离，最远的可能有1公里，中国后来的帝王墓制似乎也有类似的安排。

中国的所谓“墓道”之说是在后商开启。我认为它应该是借鉴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原由才做如此设计的。除了古埃及文明的影响以外，很可能有宗教的一些诉求，或者是犹太教的“十”字或者是太阳神的“十”字，甚至与“示巴女王”有关吗。

“示巴女王”的名字有另外一个含义是数字“7”。张光直先生曾经说过，史前中国地区最多发现的数字是“7”。大家知道在史前符号中就中国区域“十”就是“7”，而“墓道”以“十”为王者之尊实际上就是对“7”这一数字的尊崇，表示只有享受这个标识的人才是与“示巴女王”有同等荣耀的人。同时，中国人对于“七星”的特别崇拜可能也与“示巴女王”有关吗？①

① 中国的“十”字墓道的起源可能另有来历。既然我们打破传统思想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史前史，不妨再更为开放一些，不仅把源头引向中东，也引向欧洲。至少在地中海北部以及德国英国等地，是可以找到远古时期的“十”字墓的。而那时候基督教还未诞生。我的一个大胆猜测是，无论欧洲的“十”字墓还是中国商朝开始的“十”字墓是由同一个民族创造了，这个民族与“萨巴王国”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就是以商业为主业的海上民族腓尼基人。

② 李先登，《商周青铜文化》，35页：“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

③ 不过我的看法是夏甲可能根本没有来到中国，她的疆土要远远大于中国这一个地方，所以有一个更为广大的区域包括今天的阿富汗一直到阿拉伯的某些地方都被命名为“夏”，但是她的一个儿子被分封到了中国为王。

中国的鼎在三代时期有着严格的规定，以其大、重、量多为最尊贵的标志。但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青铜鼎“司母戊”竟是专门为一位王母制造的①，它说明了商代女性具有的尊贵地位，甚至可能是“最高”地位。那么她们的地位高到何种程度？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检视先秦列王的性别？

△ 两河流域的月神形象

△ 古埃及的智慧之神造型

妇好时代距离《圣经》中的示巴女王只有三百多年，假如是同根则她们之间的许多传统会很接近。我当初推测来自红海岸边麦加的夏甲是中国夏朝开国之母时，曾经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其中一个理由是：古代女人有那么高的地位吗？现在看来政治地位已经不成问题，古代的中东女人可以为王，她们来到中国照样可以为王②，即便不能为王做个将军看来已经不成问题。看来三代时期的许多文化特征与后来历史时期并不一致，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不一致？假如三代时期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割裂现象？具体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个变化？这些都是将来必须回答的问题，并且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 来自中国山东大汶口的符号

“萨巴王国”占星术占统治地位，所以这些女王顺理成章地必须是熟练的占星家和宗教领袖，必要时还要自称是“太阳神”，更多的时候恐怕是“月神”。

△ 来自中国西藏地区的符号

中国的商武丁就是位占卜能手。有人可能问为什么也门附近现在没有发现甲骨占卜的痕迹，我说他们可能被后来人彻底焚毁了，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

① 李先登，《商周青铜文化》，35页：“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

② 不过我的看法是夏甲可能根本没有来到中国，她的疆土要远远大于中国这一个地方，所以有一个更为广大的区域包括今天的阿富汗一直到阿拉伯的某些地方都被命名为“夏”，但是她的一个儿子被分封到了中国为王。

△ 这是蒙古发行的纪念成吉思汗的邮票，请注意主人公头顶的符号。

成吉思汗曾经服中东，出现这个符号根本不必惊奇

是激烈反对占卜的。而也门附近的犹太化是从示巴这里的3000年前才开始的，也就是从中国的周朝才开始。在中国发现的甲骨中有来自亚丁湾附近区域的龟骨，起码说明示巴之前的阿拉伯海区域的人们并不反对有人占卜。中国同期发掘出的海贝出产地最远的是南非。但是，中国地区的龟甲占卜最大可能是沿袭了部分中国当地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这一点不一定是从红海带过去的传统，从河南贾湖的考古看，中国的龟甲使用习惯远远早于商朝。商朝很可能融合了几种文明，起码有当地的与外来的。也门一带的星宿崇拜可以导致中国的星象命理学的发达，但这一流派与龟甲崇拜如何并列发展，目前还不清楚，不过从“摘星楼”看一定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中国的考古学创始者李济曾经说过①：殷商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的背景，我们认为是一种普遍传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在这种原始文化的底子上，殷商人建筑了一种伟大的青铜文化。而青铜文化本身却有它复杂的来源。在这些来源中，我认为是与两河流域——即中央亚细亚有密切的关系，若是我们把欧亚非大陆，在最近1200万年所经过的变迁，及动植物移动的历史弄清楚了，这一现象可以说是并不奇怪。史学家研究这一阶段文化，所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与史前的考古材料比较贯穿；同时要把苦于不能解释的部分，找出它们可能的来源，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都不是凭想像所能解决的。它们的解决，需要更广阔的田野考古工作，及更深度的研究工作。

从这位考古学家的逻辑判断，如此广泛的一种文明底色应该是海洋文明，而且它与两河流域有一定关联。临海而辖交通要道的萨巴王国也符合这一条件，不过在我的下一本书里，我要将这一问题扩展到整个腓尼基人那里。

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认为，示巴女王实际上是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女王Nikaulis。或许这是个误解，但却向我们指出了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在上古时期难解难分的关系。有人认为，“示巴”的意思可以是“埃及的土地”。我更倾向于示巴女王就是红海南段的一位女王，但她的王国曾经深受埃及文明的影响，大多数的传说，比如《圣经》、《古兰经》都更支持这一说法，并且也更符合我们的逻辑推理。

示巴女王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具有很大的文化影响，有关她的传说甚至扩散到波斯等地。中国的“西王母”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位神奇的女人。

①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1962年。亦见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174页。

其实，甲骨文在武丁时期的突然出现，还有“十”字王墓的突然出现，都可以视为在后商时期突然加入了某种新的政治势力，而这个势力与萨巴（西伯）可能有关。重新认识夏商周三代关系要从它们的亲缘上确认其政治变革中的特质，从而把握它们文化与宗教变化的渊源，是有可能的。比较重要而且相对清晰的一段历史是下面这段“晚商－周初”：

武丁（大约公元前1300年，甲骨文出现）

祖庚——祖甲

廪辛——康丁

文武乙

文武丁

帝乙

帝辛（纣）

周王：

武王（公元前1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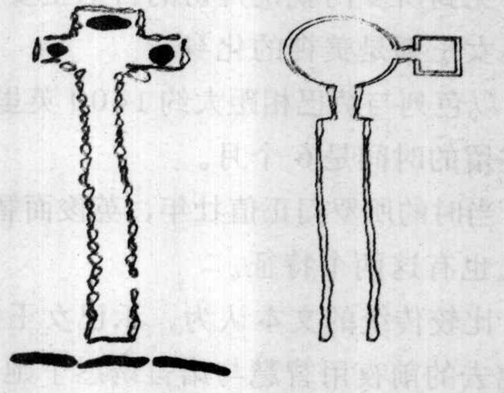
成王

康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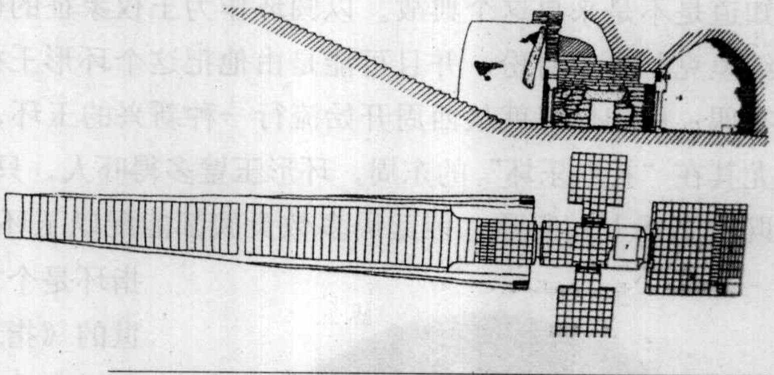
昭王

穆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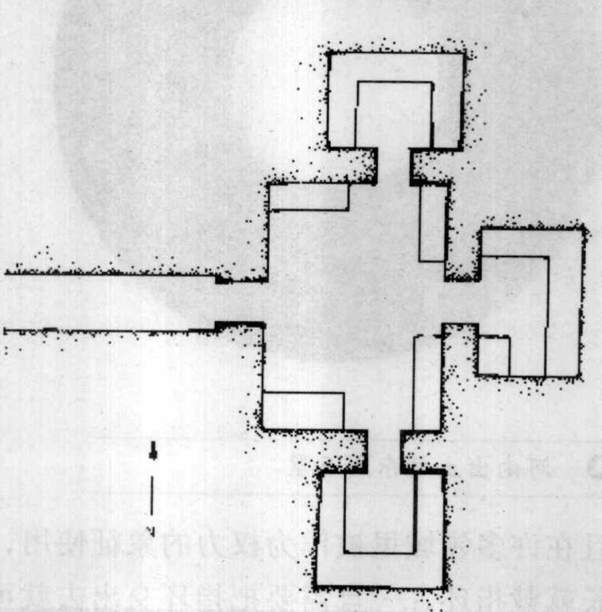
《史记·周本纪》里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周人的母系为“有邰氏”，是不是“犹太人”呢？父系尽管是践“巨人迹”，但实际如何或许大家都明白。他们的后代叫“西伯侯”，很奇妙地点名了这两个族群的联姻。在了解了犹太人所罗门与示巴女王的故事之后，中国周朝的王室族源就昭然若揭了。



欧洲爱尔兰古代十字型墓“新农场”



中国东北契丹人耶律羽之墓的剖面图、平面图（李力绘）



意大利北部2500年前的伊特鲁西亚人的一个墓室结构。

"孟那里克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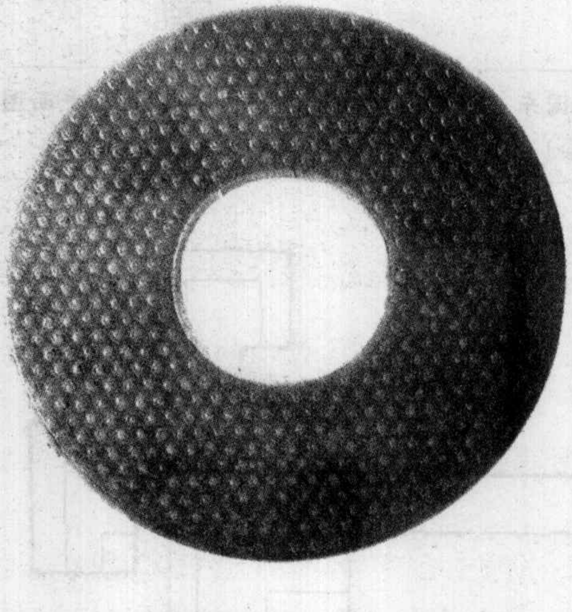
示巴女王的品性被描述为智慧、善解人意、勇敢而富于冒险。最出人意外的是，她喜欢哲学思辨，对世界充满好奇，这就是传说中她到以色列去的另外一个原因。以至于她一见到所罗门就说拜访的目的主要是去验证所罗门智慧的。所罗门以智慧著称于世，示巴女王则是美神的化身。

以色列与萨巴相距大约1400英里，据说示巴花去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其中她在以色列停留的时间是6个月。

当时的所罗门正值壮年，英俊而智慧，据说他的生理特征为黑发、深肤色（tan），中国人也有这两个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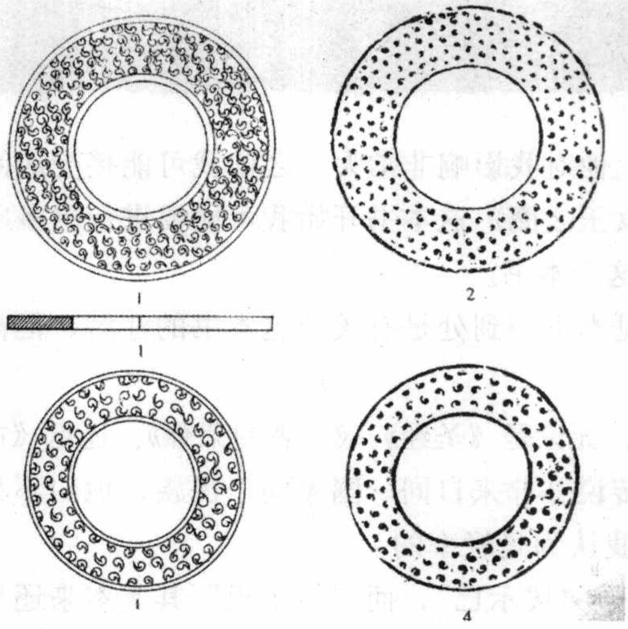
比较传统的文本认为，示巴女王由于处女为王的古训没有向所罗门示爱，所罗门在她离去的前夜用智慧与诺言诱惑了她。第二天临走他给女王一个圆环戒指作为信物，说一旦生了儿子就让他将来拿着这个戒指来以色列认亲。据说当儿子后来到以色列认亲时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儿子，没有进行指环鉴别，原因是那个孩子酷似爷爷大卫。

以上故事还引出另外一个小话题。后来波斯一带的王权象征不是别的而是圆环，不知道是不是来自这个典故。以圆环作为王权象征的确比较罕见，也无怪乎有人推测"蒙纳里克"另有身份，并且可能是由他把这个环形王权象征带入波斯应该没有问题。无独有偶，中国恰好就从西周开始流行一种新兴的玉环，通常专业术语将其命名为"玉璧"。尤其在"礼崩乐坏"的东周，环形玉璧多得吓人，只要是个"王"肯定就能佩带"玉璧"。既然不能人人问鼎，但起码多数贵族都能配以玉环。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吗？无论如何，指环是个古代重要的权力象征物，如今风行于世的《指环王》（又名《魔戒》）系列文学作品正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下的一个产物。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是东周流行的"玉璧"直接来自中东，因为中国很早就有环形玉的出现，如良渚文化就有，我这里想强调的是玉璧文化在全球的出现必定有交流的存在，而且尤其在东周的流行肯定也有其特定的道理，这是应该联合加以考虑的。



河南出土的东周玉璧

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受难时为了骗过宙斯，也是一个接受惩罚的约定，他让赫拉克勒斯永远戴着一个铁环，铁环上还带着一片高加索的岩石——也就是指环。指环作为一个有约束的诺言不仅在婚姻里被使用，而且在许多领域里被作为权力的象征使用，甚至这个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的西方，比如船长就戴指环，一旦需要把指环交出去就可以转交权力。伊朗古代的王权象征恰好也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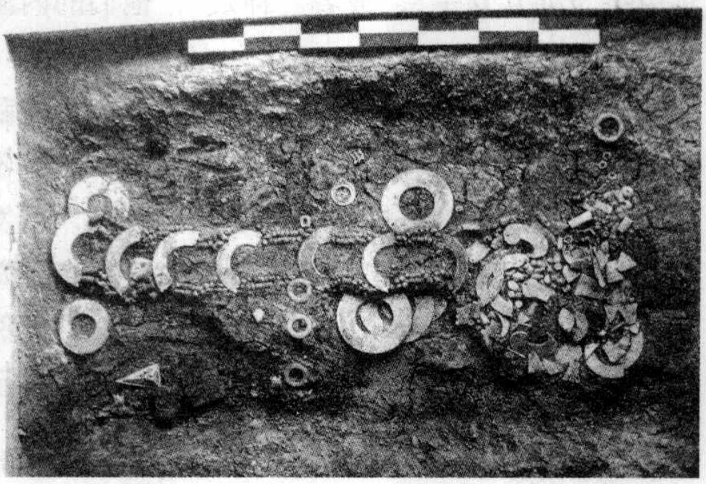


楚璧

个圆环。可以怀疑这个带有约定和权力含义的圆环与“普罗米修斯”这一传说也有关。即便不能肯定哪个为最初的版本，但是如此多的“戒指”与环形权威象征物品的出现，都可以视为一种文化同源交流的结果。示巴女王与希腊神话基本同期在3000年前，都很古老，那么假如中国的西周开始接受这个传统是完全可以的。

示巴最初为儿子取名为“Ibn al-Hakim”，意思是“智者之子”。有些人怀疑他就是那个建造空中花园的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只是年代相差太远。埃塞俄比亚人认为他是“大卫二世”，并且就是开创了“埃塞俄比亚王国”的“孟那里克一世”（意思是“how handsome he is”）。还有一种说法是，自他之后“萨巴王国”继承人皆为男性，“萨巴王国”也就是“埃塞俄比亚王国”。

22岁那年，在当时最著名的商人Tamrin的带领下，“智者之子”拜访了以色列的父亲。所罗门尽管妻妾成群后宫无数，却只有两个儿子（还有6个女儿），其中一个儿子留在以色列为王，另外一个就是示巴所出的“孟那里克一世”了。



河南西周时期的墓葬玉璧

看挽留儿子留在身边无望，所罗门答应赠送任何礼品，不料对方提出了约柜的请求，所罗门则更愿意让他的所有贵族大臣献出他们的头生子跟随“孟那里克一世”去辅佐王政。一种说法是，那些大臣贵族的儿子们闻听此讯与家人抱头痛哭，由于愤恨这个让他们远离故土的决定，他们偷取了真正的约柜，或许这算是对他们的一点安慰。以色列神圣的约柜真的永远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据说埃塞俄比亚人保留着这个神圣约柜。

示巴女王是萨巴王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们将不厌其烦地一次再一次围绕“示巴女王”展开我们的话题。我也相信我们将从她那里取得更多的收获。

读《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

我看过英国人拉尔夫所有的汉译版书籍，他对我影响非常大。之前我可能接受或倾向于他的观点比较多，但从《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这本书开始我可能要进行更多质疑了。这不表示我要彻底否定他，质疑仅限这一本书。

尽管这本书使我获益很多，正如大家所见本书中到处是有关他这本书的注解，但都是细碎的知识，他的主题却是我否定的。

拉尔夫彻底忽视了传统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无论是《圣经》、《王者的荣耀》、还是《古兰经》或其他神话传说。要知道那些书以及传说并非来自同一国家同一民族，他们不具有篡改历史的共同动机，所以他的这一颠覆我认为是轻率的。

他的结论是："示巴女王"就是大卫的妻子"拔示巴"，而"拔示巴"其实本来还是他的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圣经》中被儿子暗嫩强奸的那位，并且她先前已经许配给了儿子押沙龙为妻。由于暗嫩的强奸行为实际上是大卫所犯，所以等于大卫强奸了女儿，也等于大卫霸占了儿媳，所以这导致押沙龙不满而反叛，最后押沙龙被杀。这段家丑被《圣经》抄写者为掩盖事实而改写。接下来的推论更加离奇，这个"拔示巴"与父亲大卫生下所罗门，大卫死后，守寡的"拔示巴"又与儿子所罗门结婚，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孟那里克一世"，所罗门的另外一个儿子也是"拔示巴"所生。"拔示巴"有一个头衔是"处女女王"，或者"神妓"，他们的内涵可能是一致的。

这个故事没有说服力并非因为其中过分混乱的婚姻与性关系，这些在当时确实是可能发生的，不过一般母亲下嫁晚辈似乎应该非亲生的才可以，所罗门在拉氏的猜想里却迎娶了母亲。即便亲生母亲下嫁儿子我也可以接受，因为历史上确实有过类似的先例，但依然存在着其他疑虑。拉尔夫还仔细给出了拔示巴的年龄，这部分看起来也说得过去。

拉尔夫认为这位古埃及贵族就是所罗门

我主要不能接受这个推论的原因是，假如《圣经》书写人员改写了这些事实的话，那么周边那么多国家与地区一起为此改写似乎说不过去。"掩盖家丑说"没有根据。我认为《圣经》记录者没有必要更改这部分历史，因为大卫霸占"拔示巴"的过程在《圣经》中已经记述得很清楚，暗嫩强奸妹妹的乱伦也很清楚地记录在里面，假如为了掩盖何不掩盖得更彻底一些连这些内容都给销毁了呢？所以我认为那些记录者还是尽心地基本依照事实记录了历史。

提醒这一点或许很重要，拉尔夫与我都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拉尔夫或许由于生活在

基督教社会中有许多不满，所以他对于《圣经》似乎有许多怨言。而我来自一个对于基督教并无多少了解的国度，对于《圣经》则有一种新奇的认同感。但我们俩共同的一个认识前提是：《圣经》记录了部分真实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前研究价值，应该想办法用世俗的历史语言重新破解这部存在着许多秘密的文本。

我承认以色列在古代确实与埃及有着密切联系，但是没有到拉尔夫所称的地步：每个埃及法老都是以色列人。在这一点上没有他那么彻底。或许应该表述为我没有他那么大胆，尽管中国人已经视我为疯子。

假如拉尔夫的结论是正确的，中国夏朝前后就应该直接使用古埃及象形文字，而不应该偏于腓尼基体系的文字，这个文字体系还发展成为后来以色列人使用过的阿拉伯文字。假如按照拉尔夫所说，亚伯拉罕是古埃及的法老，要知道夏甲本身就是个埃及人，并且她的儿媳也是埃及人，那么中国地区的埃及文化特色会特别重，重到直接使用古埃及文字的程度。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地区没有发现直接的古埃及文字，我们只看到了影响的痕迹，这个“痕迹”直接反映了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地中海东岸或红海两岸——才是中国文明的直接来源，并且这两个地区当时都正流行腓尼基文字！所以我怀疑亚伯拉罕正如《圣经》里所写的是个重要的部落首领，活动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与埃及之间，而不是埃及本身。所以亚伯拉罕不太可能是埃及法老。

拉尔夫认为大卫以及所罗门都是埃及法老，而示巴女王为埃及女王或埃及公主。假如真相如此，中国地区内的同期文字依然应该是直接的埃及象形文字，但从我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却是“南阿”文字与中国甲骨文的对应。我的意思是，我的研究与拉尔夫的研究结果就示巴女王一节发生了严重冲突，不可能两个人都是正确的，没有选择的余地。我认为我的研究是正确的。不是敝帚自珍，而是拉尔夫证据不足，他多数是依据零碎的片言只语的推测。而我给出的文字符号则是硬性的指标，如“南阿”与甲骨文的对比，连我自己都必须服从这一前提才可以继续。

我认为《所罗门》这本书是他的主线问题大暴露。

上面有关“拔示巴”与“示巴”的关系只是他的其中一个推测，他在书中还推测过“示巴”的其他的可能身份。她还被叫做“南方女王”，当然他更知道她是也门与埃塞俄比亚地区的“处女女王”、“神之妻”、“神妓”。他还有一个推测是，示巴女王就是《圣经》中所罗门的正妻：“埃及公主”。“示巴”似乎可以出现于当时的红海两岸的任何地区，我在书中看到的最远的一个推测是，她来自南非。

有关“处女女王”或者“神之妻”拉尔夫有些研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说，“处女女王”或者“神之妻”都可能只是头衔，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能生育而真的永远是处女。他讲到，“圣母玛利亚”的“处女生子”其实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这说明玛利亚的地位也很高，并且很可能她本人就是一个“处女女王”。这个说法很有创意。考虑到耶稣属于以色列延续到最后最大的一个支系“犹太”，我认为这个可能与嫌疑不能排除。

第四部分 关注红海北段

夏与夏甲

夏不是我关心的核心，所以被放在最后面，原因是夏的证据太少，过分朦胧，所以从商周与萨巴的联系或许能更容易看出一些端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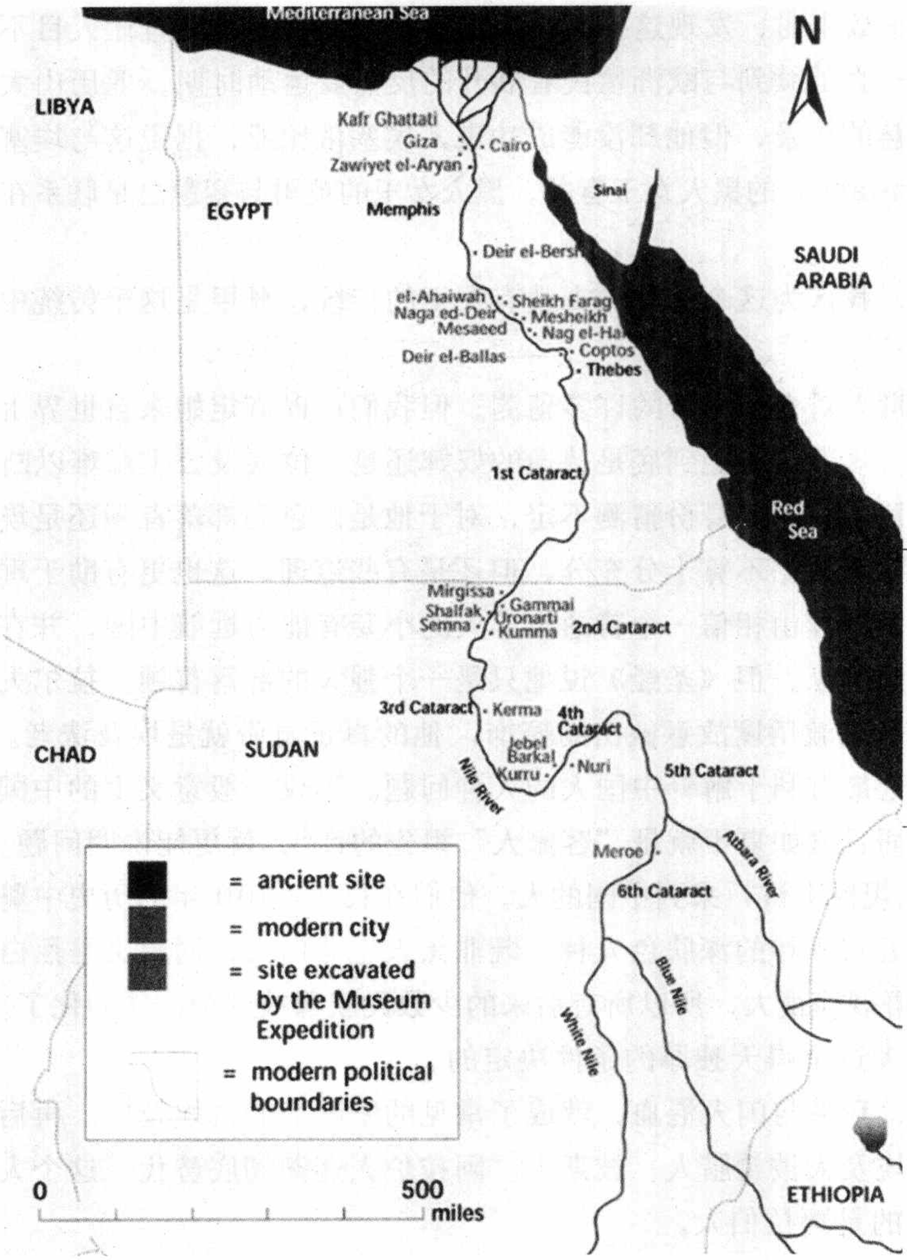
一般历史认为，《圣经》夏甲的后代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我之前没有人把她与中国的历史联系起来。我也曾对夏甲的埃及身份与希伯来人的妻子这两方面考虑过多。现在我要强调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阿拉伯人祖先。这个身份会更加圆满地解释我的体系。

传统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女性的地位之低下是公认的。但是母系氏族的说法起码说明了女性的地位并非一直低下，女人在那个时期的社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总体上女性的社会地位高低与历史不同时期有关。比如，男性参与生育过程这个秘密被揭示之前，女性的地位普遍高于男性，因为女性代表了神圣的生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女神像的比率高于男性就是个例证，这个现象可能一直延续到大约4000年前，比如女人可以为王，甚至只能女人为王，部分体现了这个意味。

大约4000年前夏甲是否为王，我们并无确切的证据，但是我们知道她被尊为阿拉伯人的祖先。中国正与她同期出现了一个与她同名的国家，而且从姓氏看这个王朝的最初建立者也是一位女性。我推测他们沿印度河一带从昆仑山进入中国境内而逐渐发展至中原。在印度河以西地区长期存在着一个叫“大夏”的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认为是其影响势力之一。之所以在中国内陆她的王朝能够确立，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中东那样的国家概念，所以作为一种新的观念与文明，他们很容易乘虚而入。由于这个关系，这个文明支系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在后来中国以及周边地区出现了无数个以“夏”命名的王国和政体。

在距离传说夏甲生活过的圣城麦加不远就是萨巴王国，这里也生活着一个自古只能女人为王的群体。这些可以作为旁证说明，夏甲在离开亚伯拉罕之后完全可能作为女首领存在，并且她的王国很可能就是麦因王国。

在红海附近，我们还可以找到比夏甲更早的女王首领，这就是古埃及女王，也是世界上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女王：“尼托克里丝”。她生活在“古王国”时期的“第六王朝”



（公元前2345～公元前2181年）。古埃及还有几位女王。第二位女王“索布克尼弗鲁”结束了“中王国”的“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公元前1786）①。非常不幸的是，这两位女王都导致了国家分裂。

◀ 古埃及地图 不难看出，埃及是地中海通往红海的必须通道，这一条件决定了古埃及曾经是腓尼基文化的一个长期联合，甚至埃及人还可能是腓尼基海上活动的有力赞助人。

古埃及最为中国人熟知的一个女王是哈特舍苏普女王（Hatshepsut 在位公元前1503～1482）。她以“战斗女王”而著称。不过我们要承认这个时期妇女地位已经处于下降趋势。她为了坐稳国王地位，故意使自己显得男性化，甚至为了迎合男性传统，她不得不在自己的雕像上装饰胡须，着男装，但依然引起许多非议。不过她很有政绩，这主要体现在商业与外交方面。

哈特舍苏普女王以商业冒险著称。她倡导的最著名的商业拓展活动名叫“朋特远征队”（the Punt expedition）。很明显这个活动与亚丁湾附近的“朋特”人有关，我们可以猜测古埃及人与“朋特”附近的人们组织了联合的大商队，他们还建立了一支商战两用的大型海军。此时正值商朝盘庚迁都前夜，盘庚迁都与这些海军或商业远征队的威胁有关吗？或许有人觉得我大惊小怪，怀疑一支远航的船队怎么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局势？那么100多年前西方的几支船队就把中国清人打得鸡飞狗跳的历史或许可以解释文明之间的差距所带来的巨大威胁。进一步借用这个模式，我们可以说明，很可能远古少部分文明人到达中国后以统治者的身份控制了中国广大的区域，这个假设可以解释中国古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人种不符现象——少部分的异族统治了大部分的蒙古人种。夏、商、周很可能就是如此。

① 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商务印书馆出版，44页。

当我深入去寻找非洲女王故事时，发现这些女王的数目是如此之多，简直让人目不暇接。这些女王的英勇行为一直延续到与欧洲殖民者展开的反黑奴运动时期。亚历山大当年挥师北非打败了声名显赫的埃及，但他却没能成功进入埃塞俄比亚，据说这与埃塞俄比亚一位名叫坎迪斯（Candace）的黑人女王有关。黑人女王的英勇与智慧总是联系在一起。

我开始信服她们的能力，我认为这个一带自古就有女王的传统，夏甲是这个传统中的一部分。

由于年代久远，导致了世人对夏甲身份的许多猜测。但我们可以肯定她来自世界上产生第一位女王的国家——古埃及。但她到底是普通的奴婢还是一位埃及公主却难以断定。因为人们对于她的丈夫亚伯拉罕的身份猜测不定，对于他是以色列部落首领还是埃及法老无法肯定。尽管这个猜测根据不算十分充分，但还是有些道理，这也更有助于理解夏甲与中国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普通牧羊人的小妾有能力远航中国，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但《圣经》说他只是一个强大的部落首领，拉尔夫认为这是出于平民化思想而从宗教角度故意做出的掩饰，他的真正身份就是埃及法老。

夏甲是埃及人的这个定论最有利于解释中国人的人种问题。不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与古代埃及人一模一样，而且假如夏甲就是“客家人”祖先的话①，就更能说明问题。假如夏甲是“第一批”（指从规模上讲）来到中国的人，他们在长达4000年的历史中奠定了整个中国人种的基础：五官平和的深肤色人种，既非黑人也非白人，同时又是黑白两种人的混血。由于这个人群规模最大，所以所有后来的少数民族都被这个群体同化了。这是由夏甲早到以及群体最大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的。

最初的古埃及人是黑人，后来与闪人混血，就成了常见的壁画上的古埃及人。再后来，长相如中国人一样的古埃及人被希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逐渐彻底替代。这个人群在埃及失踪了，取代他们的是阿拉伯人。

今天位于沙特阿拉伯的圣城“麦加”历史传说中是亚伯拉罕为夏甲母子建立。麦加与曼德海峡（Bab el Mandeb Strait）相距不远——麦加距离“麦因王国”的首府距离大约为700公里。没有人研究过首府在“麦加”的夏甲人在4000年前与也门的“麦因王国”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只知道“麦因王国”被“萨巴王国”取代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950年，后者为农业社会。

深入埃及

任何割裂红海沿岸几国之间的联系来分别看待他们与中国夏商周起源之间关系都是危险的，因为那会陷于可以预想的僵局。要知道今天的该地区国家和民族与几千年前有着很大的分别，以今天的国界去切昨天国界的做法是肯定错误的。仅就今天的埃及看，其领土比以往几千年的大多数时代就小了起码一倍。今天的埃及根本无法与当时的埃及帝

① 请参见本书《香港归来有感》之《“夏甲人”与“客家人”》。

国的影响力比较。在新王国时期，埃及帝国的疆界曾经北达叙利亚以北，南到埃塞俄比亚地区。

尽管有种种证据说明红海东岸与中国的“三代”有关，尤其萨巴与3300年后的商、周关联更为密切，但也不能忽视当时红海西岸的埃及帝国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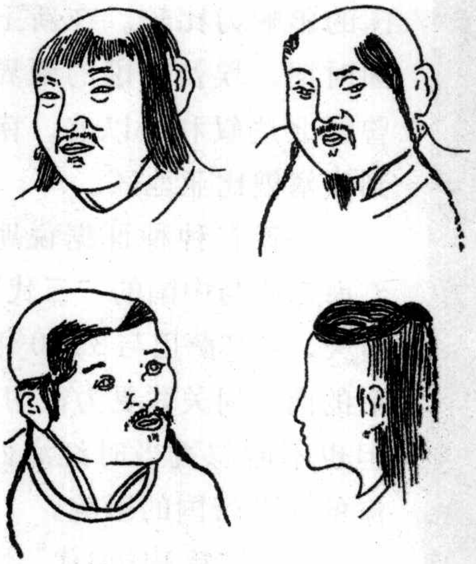
埃及“新王国时代”恰好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的商朝：公元前1567年～公元前1085年。当时埃塞俄比亚部分领土在埃及帝国的版图之下，因距离遥远，埃及派驻了“库仕总督”以控制努比亚地区，这里算是埃及的殖民地。而“库仕总督”一般由王子担任。

△◁ 埃及人的特殊发式碰巧与契丹人近似，我们是否可以怀疑契丹人与“夏人”、“埃及人”有关？

今天的苏丹国就是古代受埃及长期控制的“上埃及”地区，尼罗河的第三瀑布到第六瀑布都在苏丹境内。著名的“阿布辛拜勒神庙”（Abu Simbel Tempel）就在距离今天苏丹北部边境大约80公里的地方。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国与埃及之间隔着两个国家：苏丹与厄立特里亚，它们构成了一个大约1000公里的间隔地带。1000公里的距离很容易受到影响但又不至于被严格控制。再考虑到古埃及的首都在北方，那么距离埃塞俄比亚可能就更远一些了，尤其是古都之一的开罗到埃塞俄比亚地区几乎等于北京到广州的遥远了。

假如亚伯拉罕确实是埃及的法老，则我们可以推断，红海两岸在他们的后代中进行了多种政治联姻，也许他们共同组建了中国的商朝，但由于埃及的逐渐衰落，红海东岸的亲戚终于在公元前1330年控制了整个中国商王朝，他们不仅隆重迁都，而且彻底更换了文字体系以志彻底脱离的决心。

比较奇怪的是，夏末之后到商武丁之间的文字缺乏有机过渡的例证。假如能够找到



▶ 契丹人发型（摘自远方出版社《马可·波罗游记》）

一些这期间的文字痕迹，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商前期到底是埃及人插手还是南部阿拉伯半岛的“麦因王国”全部掌控了局面。从中国发现的文字证据出发，割裂地看夏商之间的关系，我们似乎得出了东部来商、西部来夏的结论。但是从山东大汶口出土的一些文字符号判断，它们与埃及文明有着更密切的联系。这里还存在一些不能完全解决或者不能逻辑推理的问题。

撇开夏甲与亚伯拉罕身份的疑点，直接从正史的论据出发，能否推断埃及“新王国”与商朝同生共死？顺此而推演的一个问题是，难道强大到占领埃塞俄比亚的古埃及不会影响曼德海峡对岸只是15英里外的也门？后一个问题的解答将能推论出萨巴王国受埃及文明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深。

我们一时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历史本身远比想像复杂，但是接近这些答案继续做些细致的工作还是有益的，比如仔细寻找这段时间的埃及强盛与衰败的时间表与中国的政治“谐振”，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商朝经过许多战争才在中国建立。商“简狄”就是以战神的身份出现的，“黄帝”在神话传说中也不失时机地同时出现，他们联合作战才打败了炎帝。我推测过“黄帝”来自埃及的雅各或约瑟——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以“喜克索斯人”闻名，并在18世纪的埃及建立过“牧羊人王朝”。而我也推测过所谓“炎帝”可能就是“亚伯拉罕”，“炎帝部落”实际上就是夏朝人。传说中的炎黄之战可以假设夏商之战。炎、黄本是同根，所以后来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逻辑上也合乎情理。这个假设可以在许多方面进行试错。

政治联姻与人质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显著政治文明手段。埃及帝国当时控制殖民地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这两项，这一手段当然他们也会用在中国。就这方面，中国从三代时期一直到唐都频繁使用，尤其是联姻和亲使用非常广泛，政治人质在周朝比较多见。

还有一个政治头衔恐怕也是从埃及借鉴而来。当时埃及人已经称呼最高统治者为“法老”，意思是“大房子”；中国至迟在秦就有“陛下”的称呼。也可单用“陛”，指与“皇帝”有关的意思，如“陛见”就是“见皇帝”。“陛”一般的意思指“台阶”。我认为“陛下”与“法老”（大房子）之间是有关联的。换句话说，“大房子”无非就是所谓华殿，这样的房子为显示其巍峨一般是有“台阶”的，从商朝的皇宫大殿来看都有高台。进这样的房子当然首先要见“陛”。所以最终以“陛”代指皇宫“大房子”是合乎逻辑的。无论如何，两地之间共用“大型建筑”代称“皇帝”是一致的。埃及“法老”的称呼一直持续到2000多年前。中国很可能也只是在秦这个时期才有“陛”这个称呼的，因为以前没人敢如此模仿“法老”，但秦始皇既然已经“始皇”，那么称“陛”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陛下”乃“大房子之下（的人）”，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住在“大房子”。

“新王国时期”古埃及是个军事帝国，实行专制统治，它把专制主义发挥到了顶点。

法老的权威来自神，法老的神性被极力夸大。[①]海军与战车在当时的埃及得到长足发展。这些都可与中国同期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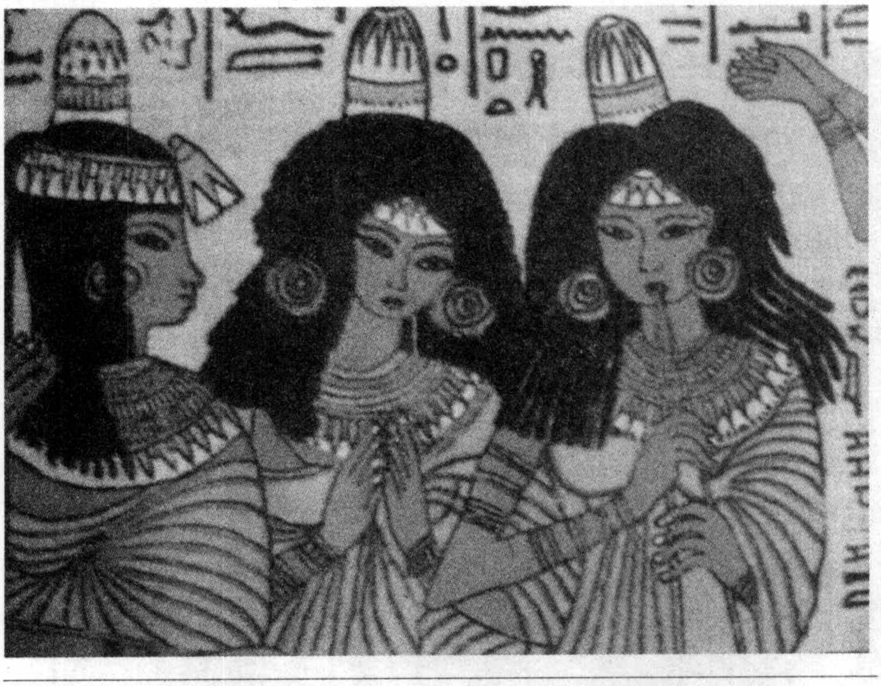
公元前14世纪埃及“政变”

公元前14世纪，埃及发生了一些大事，影响到整个帝国，使得国力大为消弱，许多殖民地失去控制，不知道此中是否包含了中国的商王朝，中国的甲骨文“突然”在此前后出现，“后商”开始。

公元前1362年，爱赫那顿驾崩，一直与他激烈斗争的旧贵族势力卷土重来。厄运也降临到继承他王位的女婿图坦卡蒙身上。图坦卡蒙是爱赫那顿的弟弟，说明这桩婚姻是叔叔与侄女之间的婚姻。

图坦卡蒙以他那庄严精美的金面具闻名天下。他被迫重新恢复多神崇拜，并且还从阿玛尔那（又名“爱赫那顿”）迁都到孟斐斯，最后迁都底比斯。即便如此可能依然不能平衡各方政治力量，他在17岁被谋杀了。

爱赫那顿与图坦卡蒙的母亲是位黑人。这位名叫Queen Tiye的埃及王后是努比亚公主。她在大约1391年嫁给阿蒙霍特普三世，共有三子（Amenhotep IV [Akhenaton]，Smenkhare，和 Tut-ankh-amen）。在风雨飘摇中据说一直是她在支撑着这个国家。这个王后尽管是个黑人，但据说漂亮而慷慨，有很高声望。



这幅古埃及墓室壁画中的女人看起来更像是中国女孩。

由于这一血统，从一些埃及彩色壁画上可以明显看出爱赫那顿的女儿是黑人，爱赫那顿本人明显没有白人特征。这一时期，古埃及人的肤色概念并不强，经常发生不同种族间的混血。闪含两族的混血结果使得埃及人看起来基本上同中国人一样。

14世纪是埃及帝国动荡不安同时也充满迷惑不解的一个时期。许多人怀疑爱赫那顿就是以色列领袖摩西，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他们基本同期，同时他们俩都以倡导“一神教”而闻名。爱赫那顿以世界上第一个“一神教”的倡导者而著称，他的一神是“太阳神”——阿顿（Aton）。之前埃及人信仰的是多神崇拜。有人说，他在政治与宗教改革失败后，以“摩西”的名义

① 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50页。

逃亡了。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明爱赫那顿是以色列人，起码父系上这样认定没有问题。可是我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因为《圣经》上很清楚地记载了摩西的母亲是位以色列人，当然我得承认以色列人也可以是黑人。

公元1320年拉美西斯（Ramses）王朝执政，埃及重新趋于强盛，他们开始与北方的赫梯人交战，“卡叠石大战”（Kadesh）取得的胜利在埃及人看来是平叛成功。估计叛乱的殖民地肯定不只这一个。此时应该提醒一个细节，在《向东》中我们曾经讨论过中国商祖“简狄”可能有赫梯血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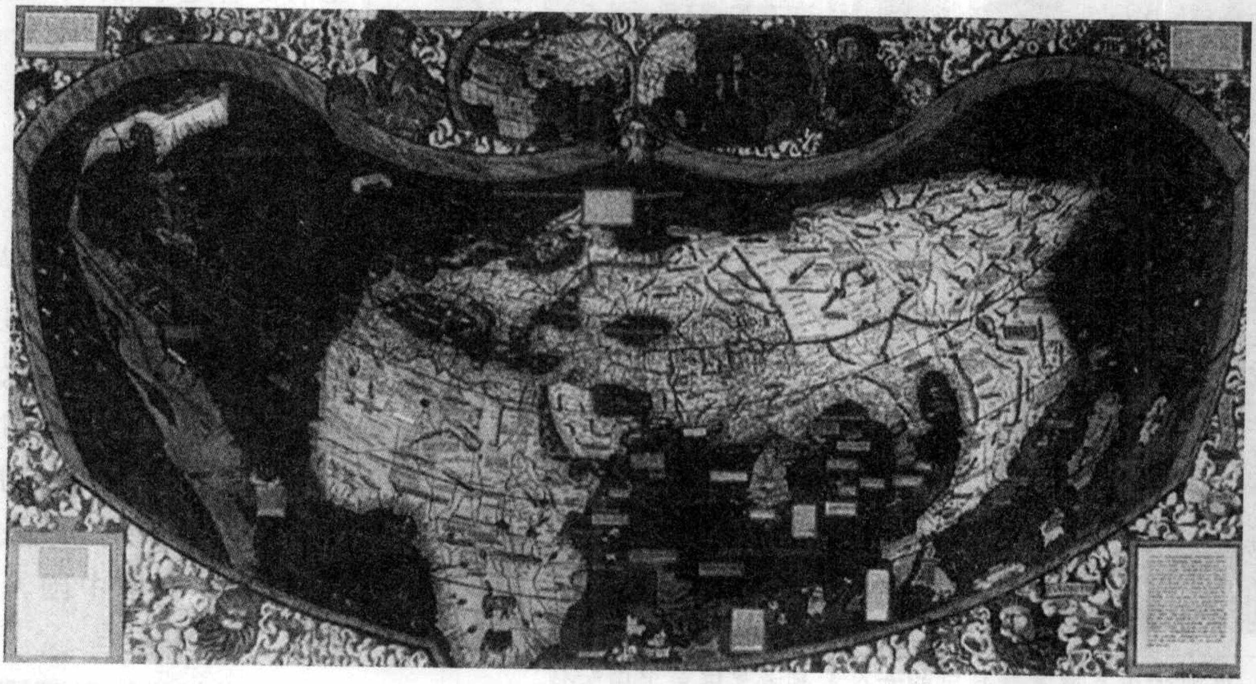
赫梯人先后将2个公主嫁给当时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经过近20年的征伐，最后和亲成功。

其他地区的许多战事也在等待拉美西斯二世去摆平，最主要的是西方邻国利比亚。不过看来最后都风平浪静了。

这就是在中国商武丁当政时期的国际背景，同时也是中国甲骨文产生的背景。这前后埃及已经把银子作为流通货币，并且中国人很熟悉的皮影戏也已经在埃及出现。

拉美西斯三世没有继续前任法老的光荣，帝国颓势不能挽回，阿蒙僧侣势力与王权斗争日趋尖锐。公元前1085年，埃及帝国灭亡，国土被一分为二。公元前1046年，中国周朝获得新生。

每一段中国历史似乎都与远在中东的帝国息息相关，生死相伴。当然同时生死相伴的还有沿途的其他王国，比如红海对岸的“麦因王国”在14世纪的衰落，萨巴王国在公



在这幅1507年的世界地图①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有很清晰的全球概念，而且亚洲处于一个显要的位置。从某种角度说，这幅地图实际上就是古代人怎样看待全球的问题。它是在公元1世纪的“脱勒密地图”的基础之上绘制的。在古代地图的研究中表明，人们从头就更关注南纬30度以北、北纬60度以南的这个区域。这其中深有道理。

① 参考http://academic.emporia.edu/aberjame/map/h_map/h_map.htm 引自“Whitfield (1994, p. 48-49)”。

元前10世纪的崛起，都令人怀疑它们之间存在的“多米诺”关系。

古代中东有一个强大的海上民族不断攻击埃及等强国，这件事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他们主要活跃在地中海，几百里外的红海也应该有这个海上民族的身影，因为地中海太小了，出红海东去将是一个巨大的世界：东亚、大洋洲、美洲，都在等待着勇敢的开垦者。但是关于这段历史现在还处于一种朦胧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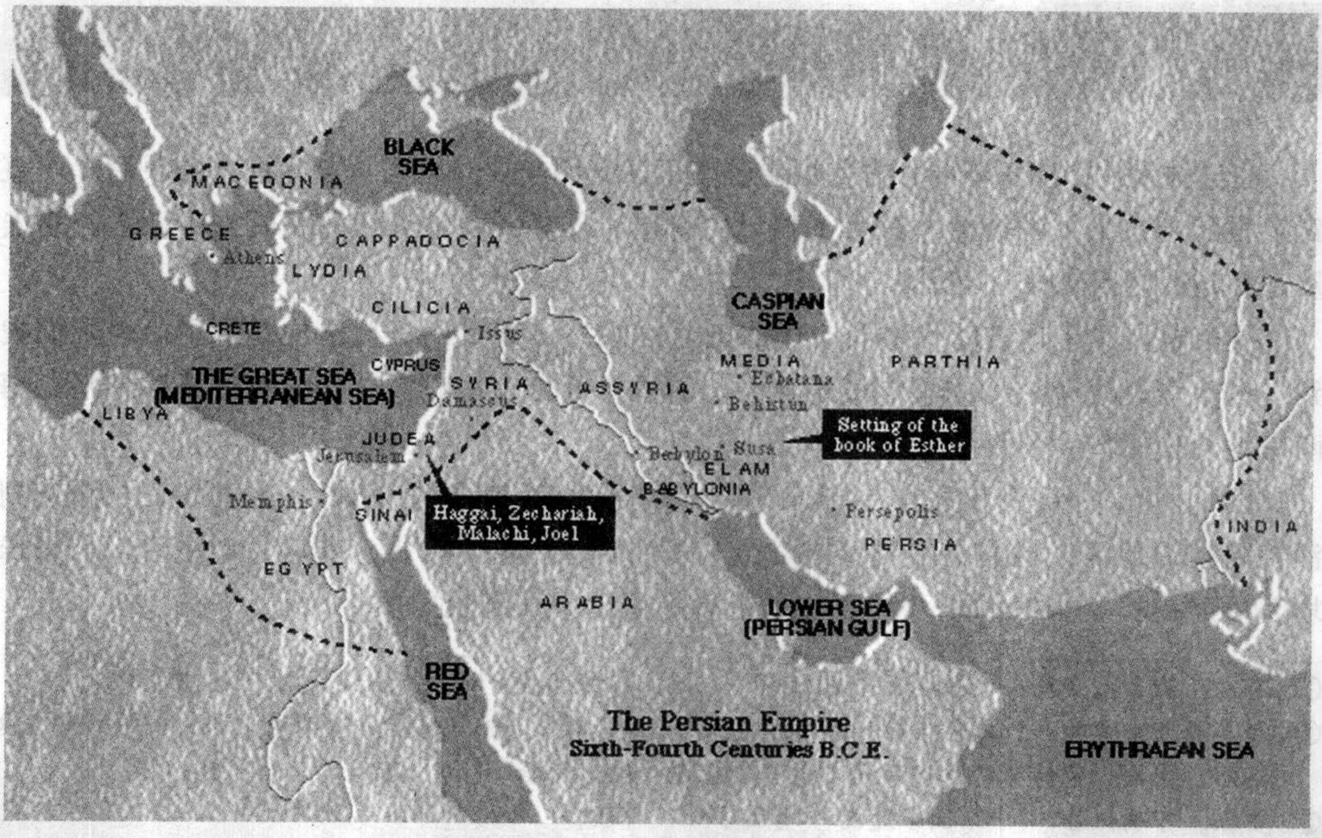
应该特别提出古埃及的一件史实：公元前716年，努比亚人彻底攻占埃及，建立了“努比亚王朝”，在埃及历史上被称为“第二十五王朝”。这是个黑人王朝。这个王朝后来败退南部地区。他们也被称作“埃塞俄比亚王朝”。

这几个词汇在古代经常指同一个国家或地区：Nubia，Kush，Axum 、Sheba。“埃塞俄比亚王朝”对埃及的统治持续到公元前656年。他们王冠上有双蛇，象征埃及与努比亚的统一。根据我们前面的推断，这些统治埃及的黑人很可能也是犹太人。从《圣经》中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前后，以色列人不断与埃及政权联姻，或者形成了其他密切的政治联系。另外，反映埃塞俄比亚古代历史的《王者的荣耀》也是从埃及的神庙里找到的，这本书里记载了许多示巴女王与所罗门以及他们儿子的故事。

公元前536年，埃及成为波斯的一个省。“救世主”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2年从马其顿远道而来，受到埃及人的热烈欢迎。托勒密王朝开始于公元前305年，延续14代最终被罗马帝国在公元前30年推翻。公元395年，拜占庭统治埃及。公元639年，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人进军埃及。所以，今天在埃及看到的人不是壁画上的那些种群，他们是后来的希腊人、中亚人以及阿拉伯人。

埃及早期一直是多神崇拜，后受基督教影响极大，公元7世纪又全面实行了伊斯兰教。

▼ 虚线内为波斯帝国曾经拥有过的版图



对于史前史的研究，许多人喜欢以规律寻找答案。但有时候照搬规律也会失败。因为创造历史的人们是活生生的人，那些富有个性的国王会使僵化的考古学家永远也找不到正确答案。比如古代宫殿多是有城墙的，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鉴定王城就是依托城墙来辨别，在安阳就碰到了类似的难题，一些宫殿看起来像是王宫但是缺乏城墙证据的支持，不知道现在是否最终找到了那些宝贵的痕迹。不过在商朝同期的公元前14世纪，埃及帝国的爱赫那顿法老就是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他在底比斯以北300公里处建造的王宫就没有城墙。

年代＼国家	古埃及	中国“三代”
公元前2040年	中王国开始	夏朝开始
公元前1567年	新王国开始①	商朝开始
公元前1320年	拉美西斯家族上台②	后商开始
公元前1085年	后王朝开始	周朝开始

注：此表取大致年代

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巧合实际上不仅仅发生于中国与埃及之中，假如有其他较大的中东古国相比较，都有或深或浅的可疑对应。偶尔我想，或许这更大范围的两地“谐振”才是更合理的？比如“二战”期间，为什么欧洲在卷入战争的同时远东地区的中国也与日本开战，甚至把远在美洲的美利坚合众国也给牵涉进去。这些全球效应并非偶然，并且亦非近代如此，自古可能就已经有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远古与今天的区别由于交通的不便可能只在时间上有些拖延，其余都应该是一样的。

埃及与周边的可能联系

在过去大约2500年内，古代世界各个不同文明与埃及发生着走马灯式的联系，一直到7世纪阿拉伯人的统治才获得了相对的安定。作为人类最辉煌的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埃及，在近代已经失去了光辉。

很难考证对于远古时代埃及与周边国家的联系，现代的一些历史或许可以为我们找到一些案例以说明古代的可能敏感连动。看看下面这个案例我相信会有助于我们对红海两岸的历史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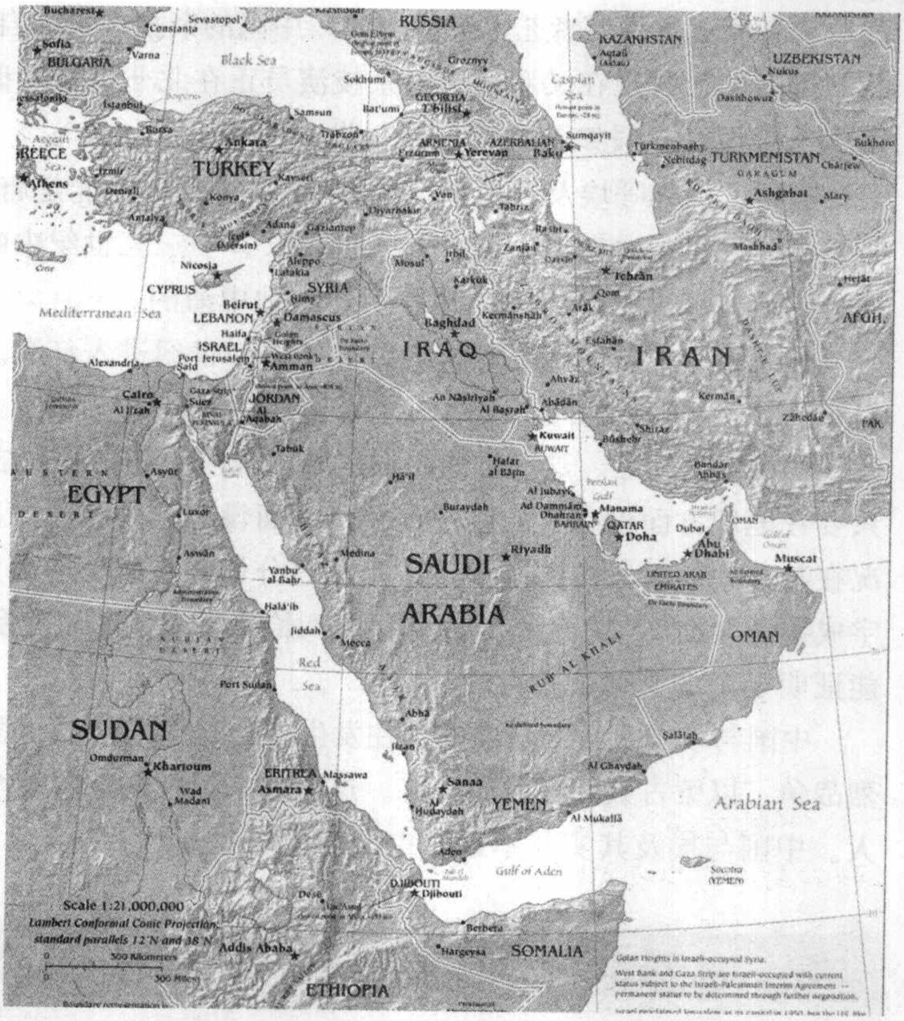
1962年，一群青年军官在首都萨那发动政变，夺取了也门政权。被推翻的君主逃到沙特阿拉伯地区，他们在那里筹措资金准备回到也门进行内战。同时，政变者却去请求埃及政府支援，当时的埃及纳赛尔总统真的派出军队到也门增援③。

① 有人认为喜克索斯人攻克埃及是在1600年。所以上面说的“商朝开始”更对应这个时间。

② 拉美西斯家族的上台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这是埃及历史上最后一个辉煌时期。而恰好就在这前后，中国一个特殊的时期开始，甲骨文出现，后商开始。

③ 雷钰、苏瑞林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313页。

也门内战在1963年残酷地展开，埃及军队直接参加了战斗。事态惊动了远在美洲的美利坚共和国与联合国，他们出面调停，希望沙特与埃及势力离开也门，呼吁双方停战。但是调停没有成功，几谈几战，埃及派兵最多时达到5万。



▶ 中东地图

这时在地中海东岸发生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它牵制了也门的局势。埃及与沙特无力东顾，趋向和解，以共同对付以色列人。埃及撤军引起也门国内大乱，示威游行导致了上百名埃及士兵被打死，最终沙特在1970年被迫承认也门共和国成立。

埃及在此期间军费达10亿英镑，据说多半花在也门战场。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有人分析败在同时介入两个战场”①。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可以说明中东地区，主要是埃及与阿拉伯半岛地区，“牵一发动千钧”的局面。古代的情形与此不会相差很远。比如公元前的14世纪。

埃及与中国

很意外地在《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389页）中看到：“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西周的丝绸就经中亚、西亚，辗转运抵埃及。”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以“黎轩”、“黎鞬（革建）”、“乌迟散”、“阿黎散”等出现于中国的文献。同时在南方，“埃及人利用西南季风从红海起锚，直航印度，运回珍贵稀有的中国货”。

该书认为中国与埃及之间的“直接”交往是从汉代开始的，根据《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曾经派人到“黎轩”。《后汉书》则记载“海西”（亚历山大城）的杂技演员到中国进行杂技表演②。我认为古代的国际交往或者外交，与今天的没有实质上的变化，都通过

① 雷钰、苏瑞林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316页。

②《史记·大宛列传》：“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

战争或者商业贸易或者艺术进行交流。中国的杂技本来来自“西方”，现在据说中国的杂技水平高超，我现在又看到中国杂技演员正在北非进行培训外援的报道。真是三千年河东三千年河西。假如不是有记载，谁相信啊。

中国古代称呼埃及为“勿斯离”，最早提到的可能是唐朝。“中埃直接经济交往可能开始于二三世纪之交（一说公元一世纪）”，……三世纪中叶的《魏略》介绍到欧洲去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经红海到尼罗河转进地中海的。

有人认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于二世纪进入红海。我认为这些时间都远远晚于真实的时间。真正的海上交通的开始至少得在5000年前。但是比较规范的来往则是从大约3500年前开始。这一推测是根据中国境内的某些考古结果来推测的，同时我也认为，只要在地理方面没有大的改变，技术方面没有大的突破，基本上就可以大胆推测交通状况在某些大的时段内的统一性，不必过分依赖文献——因为保存至今的文献所借助的文字成熟于大约2500年前，而这段时间恰好出现全球“变乱”，海路隔绝，文献的空白不能证明之前的交通就不存在。

中国与埃及直接面对面的交往发生在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与埃及发生三次大的激烈战争，以蒙古人的失败而告终。这时期来到中国定居的埃及阿拉伯人同样被称为“回”人。中国与埃及其实并不远。中国与中东也不远。

不能遗漏的沙特

按照“夏商周”的顺序，我该把拜访的第一站放在沙特。但我还是转了一个大弯，“最后”才不急不忙地来到沙特。由于我们对于沙特了解实在太少，所以刚一开篇其实就是结尾。

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沙特阿拉伯其实很年轻，然而它的历史却很悠久。沙特是中东最大的阿拉伯国家，是阿拉伯国家的核心。专门为夏甲所建的麦加城就在今天的沙特境内沿红海一侧。

属于闪族的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半岛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南部阿拉伯人，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主要居住在也门的盖哈坦人（Gahtan）；北部阿拉伯人叫阿德南人（Adnan），据说“阿德南”是亚伯拉罕之子易司马仪（亦即《圣经》）中的“以实玛利”）。“Adnan”这个名字让我再一次想起四川境内具有悬棺传统的僰人后代，据说在他们祖先的古墓中有名字为“阿旦沐”的物品，那些中国人自称姓“阿”。中国的悬棺最早登陆于中国的福建地区，时间是3840年前后。这些信息一次次让人想到亚伯拉罕的这位后代：时间、名字、以及悬棺方式。

南北阿拉伯人世代为仇，之间有许多差别。南方阿拉伯人善农业，北方主要为游牧业。南方为土著阿拉伯人，北方稍晚。我们一直关心的古典“南阿”文字就是南方阿拉伯人使用的文字；北方阿拉伯人最先使用过希伯来语，后来也接受了“南阿”，最后又演变出北方阿拉伯语。在伊斯兰教革命之后，北方阿拉伯语取代“南阿”语言。这个语言

发展关系对应到中国夏、商之际，可以有助于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北方阿拉伯人从西部进入中国腹地，南方阿拉伯人从南部进入中国腹地，所以夏商使用了不同语言体系。

首都在也门地区的“麦因王国”起始年代不详。其势力范围曾达红海北部的汉志地区，即今天沙特阿拉伯境内西部，包括麦加城。这个民族擅长经商，在死海附近的约旦等地都有商业驿站。麦因人在商业活动中使用腓尼基字母，可以确切表明他们与希腊和埃及都有商业来往。假如他们能到希腊，基本就和与进入中国西部的距离差不多了。麦因人使用腓尼基文字的事实很重要，中国夏朝以及晚期的半坡文化使用的恰好就是这种文字。

据说“麦因王朝”也是男性统治，有过27位国王。

与之比邻的萨巴王国早期是女性国王。古代萨巴王国也进入了今天的沙特阿拉伯领域。萨巴王国与麦因王国有不同的语言，萨巴人有“南海腓尼基人”之称，萨巴人同时以水利农业著称。

我们可以假设麦因人从北部进入了中国西北境内。萨巴人则可能参与了中国东部与南部沿海的活动，他们之所以比前者晚一些进入中国，原因是他们需要海航技术支持，部分人也可能通过印度进入中国西南地区，比如在孟加拉湾的最北端到中国的云南、四川一带直线距离很近，但那里山高路险，交错横断，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已知早期阿拉伯地区有几个周期性的大规模外迁活动，其动力为何没有结论，他们去向哪里也是个谜。

其实不能遗漏的国家与地区实在太多了，但是我们暂且先关注到这里。不过可以在这里提示一下，我一定会在以后合适的其他著作里重点介绍中东北部的一些国家，比如赫梯帝国。

第五部分 猜想“焚书坑儒”

秦始皇与孔子

在东周和秦朝，有人会出于一些特殊目的进行文化清洗，这些人可能首先是为了重建当时的新中华文明，彻底割断与“夷地”的联系，或者有其他的“文化革命”思想也未必。

从种种迹象看，汉朝有“西域”的记录，无论水陆交通全无禁忌，那么这个故意割断文化“脐带”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汉前，最有可能在秦代，并且进行得很彻底。

著名华裔考古专家张光直先生在《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318 页）中说：远为重要的是我们从后来的历史中得知，秦朝的建立者——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下令在全国焚烧政治类的书籍。根据由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在公元前 100 年左右所编写的中国通史《史记》的记载，在秦始皇 34 年，他的丞相李斯建议“烧掉除秦史之外的所有史书。除官方的学者外，任何人所保存的古代诗歌、史书或诸子百家的书都一律由地方官和军队将领加以没收和焚烧……不必焚毁的只是那些医书、占卜书和农书”。这位皇帝采纳了该建议，焚书在整个秦帝国的范围内进行。一些书幸免于秦人焚书的浩劫，但其数量寥寥无几，且常处于因被腐蚀而残缺的状态。

孔子

秦始皇这个人非常特殊。中国的统一历史开始于他，统一文字始于他，统一度量衡始于他，统一思想恐怕也始于他。或许这个人胸怀重建中华文明的大志，而改革文化只是他革命的一部分。在他统治期间，发生类似于斩断文化的可能非常大。他排斥儒教、坑杀儒生的行为，除了思想上的分歧之外，有可能是种族分歧，昭显了秦与“三代”尤其是周朝的种族上的分别，或者级别上的对抗。以秦始皇在其他方面的魄力看，他的毁灭行为是非常彻底的。我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对于秦始皇时期的探讨不够，有些问题从来就没有被提出来过。

“焚书坑儒”很可能是一场宗教斗争的结果。要从这方面研究“焚书坑儒”事件，首先就要清理“儒教”的真正根源。

前几天看到一篇厦门某大学老师写的“儒教起源于犹太教”的论文。没错，中国儒教内核很可能就是犹太教，最初的儒生很可能就如那位学者推测的是“拉比”。“儒教”乃“犹教”，从发音上，ru－you，也很接近，在北方这两字发音区别还比较大，在南方很多地区基本上没有差异。

我认为“儒”（ru）实际上可能来自与“Jew”有关，“dʒ u:”而“ju:”，然后再转换为“ru”就清楚了。“儒教”在初期可能属于或者根本就是“犹太教”（Judaism），或者就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逐渐分离出来并最终形成我们熟悉的“儒教”。

孔丘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有人视其为不信鬼神的原始唯物主义精神，这个推理是错误的，并且错了2000多年。

在中东，犹太教与“怪力乱神”的万物有灵的原始萨满教也一直势不两立，之间有过几次血腥斗争，动辄处死败者一万上千。这从《圣经》上看得很清晰。作为一个犹太教的传人孔丘自然也是愤恨“怪力乱神”的，而非唯物主义思维。信“一神”而“远鬼神”会被人误以为是“不信神”，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萨满教、一神教、唯物主义，三者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最大的差别是一神教依然为有神论者，只是反对万物有灵而已。这个对于“不语怪、力、乱、神”的误解竟然歪打正着导致了中国某种程度的“无神论”传统。明朝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公元1552～1610）初来中国时就在三教（其他两者为佛教与道教）中独尊儒教，大概就是因为“儒”天生与“犹太教”的同源关系，后来他发现实际上儒教是无神论者，所以他又下令禁止祭孔。但不管最初的孔子是否是一神论者，总之人们已经把他当作无神论者了。孔子已经被注解了2000多年，孔子还是最初的孔子吗？假如孔子有可能不是原本真实的孔子，那么儒教当也不是当初的儒教了。

作为儒教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了2000年，孔丘的“不语怪、力、乱、神”很可能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一种意外的色彩：任何宗教都无法长期深入地占据中国。尽管最初很可能是出于“一神教”而提出的这个思想，但由于后世人们理解的混乱反而成为遏止宗教的口号。这样的儒教土壤倒是极其适合唯物主义思想生长，所有儒教发达地区（在中国主要是汉族地区），有组织的一神教反而更不容易生根发芽，但原始的自然崇拜却依然盛行。这是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①]”但一碰到思想的高压线，孔圣人的原则还是有的，这点正如《圣经》中犹太人当初镇压金牛教崇拜者。对于孔子是否诛杀少正卯一事至今已聚讼千年，我试着在“全球文明同源”的背景体系下再来一解，看是否可以互相印证，从而也看看“不语怪力乱神”是否也在这个奇特的案件中得到了贯彻。

“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②]到底犯了什么王法竟然遭到屠杀而使圣人不手软？关键在“乱政”二字。

---

① 《论语·里人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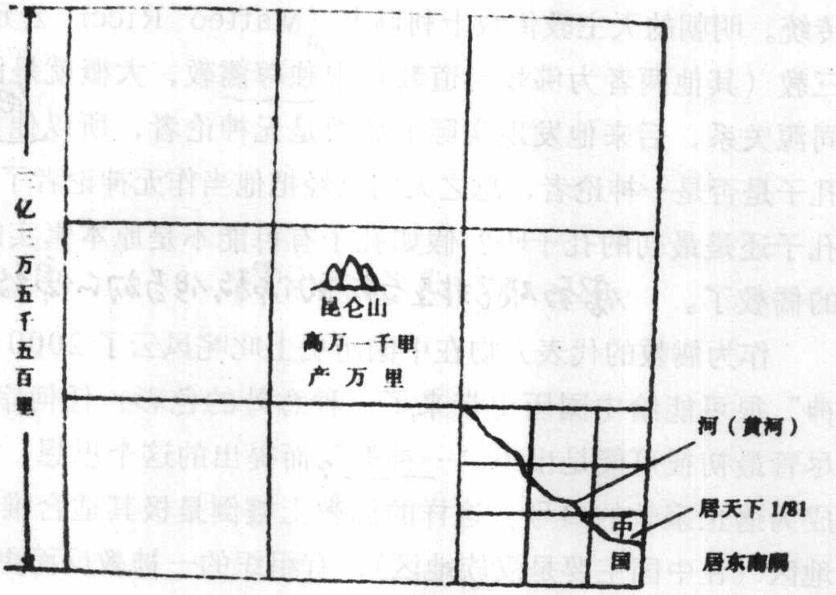
② 《史记·孔子世家》

诛杀少正卯发生在鲁国。山东这个地区是商朝故地，是中东到中国的海路停靠站、大本营，这里有十分特别的人文土壤，商周时代这里肯定是犹太教的天下。从中东本土犹太教与其他自然崇拜的激烈冲突看，中国山东肯定也有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鲁国当为旋涡中心。孔丘上台做宰相7天就诛少正卯，看来不仅"罪行"清楚，而且有人急不可待，是非杀不可，即便有违"仁政"也在所不惜。

《荀子·宥坐篇》总结少正卯几大罪行为：曰心逆而险、曰行僻而坚、曰言伪而辨(辩)、曰记丑而博、曰顺非而泽。总体看来没有实质罪行，排除了刑事可能，亦非经济民事犯，也没有具体的政治叛乱，看来属于"莫须有"的思想犯，就是常见的"乱政"政治犯。实际上很可能应该是"异教徒"犯，在孔子时代准确地应该说是"异端"①。

孔丘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犹太教徒，相去也一定不远，孔丘杀少正卯就应该是宗教政治斗争。而秦始皇"焚书坑儒"基本上也出于类似原因，但是却从相反处来。并且可能由于儒教的中东根源，为了切断这个根源，焚书坑儒，干脆把历史也给毁了，连带把国家民族历史生生割断，这影响的岂只是中国史前史，它直接影响了世界史的连贯，甚至影响了人类发展史的圆满推断。中国是个大国，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一环断环环断，一个文明链条因为中国的缺损而断裂。

这个历史事实到底如何，我还是报怀疑的态度，因为汉之前的历史我们掌握太少了，而有些资料则彻底消失不见。



△"邹衍大九州说"（自何新著《诸神的起源》）。此图暗示出中国中原的人们已经知道外面的世界。其核心"昆仑山"在"中国"西北，看来与今天的昆仑山所距不远，既有可能是今天的昆仑山，也有可能指今天的青藏高原。当时世界的最大帝国已经从中东的南面北移至伊朗高原，波斯帝国是世界的核心，也是拜火教的核心。而当时中国人乃至邹衍的地理学说都是以波斯和青藏高原为核心的，故而中国为东南偏隅了。

甚至今天家喻户晓的甲骨文在100年前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所以在文字并不健全的年代有什么深埋地下应该给出一个想像的空间。

我推测中国古代与外部世界曾经有广泛联系，截止春秋战国时期人们都很清楚这些历史，但从秦开始中国人才开始失忆。比如战国时期的齐国方士邹衍就曾经说过中国之外有八十国的理念，但邹衍的著作佚失，他的思想却通过晋张华的《博物志》所引汉代纬书《河图括地志》而得以流传："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部之立（原作位）起

① 《论语》有"攻乎异端，斯害也矣"之言。

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其山中应于地，最居中，八十国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好过也。”《史记》邹衍地理学说中有“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分居其一分耳”①。以上信息都在告诉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还是对全球有基本认识的，他们知道中国只是全球之一小部分。

西汉人把张骞出使西域当作凿空第一人，一直到上个世纪人们这样认同了2000年。但是现在已经证明西汉人的这个记述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的“失忆”已经被证实。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是，这些失忆，并且是如此近距离的失忆，这让人实在难以相信，但又是事实。它是如何形成的？我相信这是个很重大的课题。

两地宗教猜想与对比

要继续深入了解“三代”以及孔子的背景，需要重新审视中国“三代”时期的宗教背景。

中国早期的宗教是犹太教而不是基督教，这是首先要区分的。“三代”在“主前”，基督教产生于“主后”。他们两者尽管是同源，其实差别很大。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也进行过广泛激烈的冲突。在也门地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也是犹太教而不是基督教。公元6世纪也门地区犹太教对传播过去的基督教进行过屠杀灭绝运动。也门对岸的埃塞俄比亚大同小异。在外人看来，此两教一母同胎不应该相互排斥，但事实就那样发生了。中国古代曾经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真的可以用宗教的眼光重新打量考虑。犹太教是一种具有明显排他性的宗教，内部宽容外部不宽容。他们与中国人熟悉的佛教在组织上有着根本不同的属性。不过万事有利弊，犹太教，包括基督教，由于他们的严格组织形式或许同时培育了社会组织，这些宗教影响下的国家一般都比组织结构松散的佛教国家更早进入现代化社会。

在我开始研究“文明同源说”之前就有许多人就文字结构等方面怀疑过商、周期间有上帝崇拜痕迹，并且与犹太教之间有直接联系。这方面西方人研究的比较多，并且我知道他们也是如我一样的业余外行，中国人倒是从来没有关注过。我仔细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应该继续这个文字研究的课题，中国人来做肯定有新的发现。

尽管中国先秦就有“上帝”的称呼，但许多人认为那并不是中东犹太教《圣经》中的“上帝”，我的看法是，中国的“上帝”并不全是中东的“上帝”，但部分可能是同一个“上帝”，如《诗经》中讲述周取代夏商的《皇矣》（第一节）：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必四国，爰究爰度。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于宅。

以上诗句的大概意思为：伟大的上帝啊，对下界明察秋毫，夏、商两国得不到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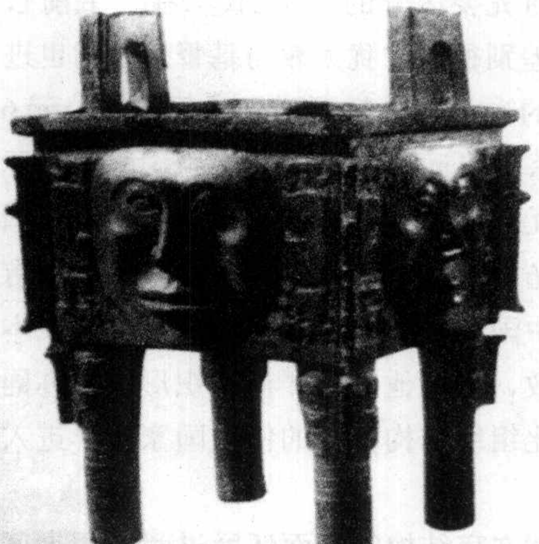
① 何新《诸神的起源》284～285页。

的支持，就向四周寻找新的执政者，结果周文王得到上帝的青睐，就扩增了他的疆土，选定了国都，照护它国家的四方。这样的思维方式与表达语气与《圣经》中的几乎一模一样，尤其是与周同期的大卫前后时期。

中国商、周尽管显示有族源联系，而且文明技术比如文字与青铜等也代代相传，但是很明显两代之间在信仰方面有较大差异。周朝，主要是西周，一改商朝的萨满教特色，青铜器上的活泼动物基本上都突然消失，周朝的图案主要是几何或其他非动物系列，显得庄严肃穆。

一神教的最大特点，或者说犹太教的特点就是反对偶像崇拜，动物是不允许出现在重要的祭祀场合的[①]。萨满教却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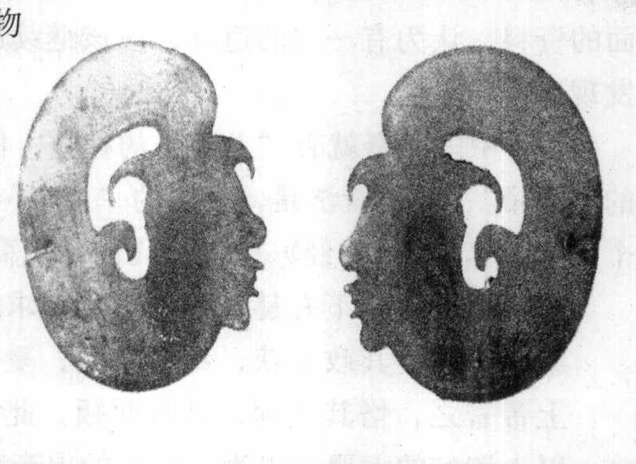
但羊却是犹太教或者基督教中的例外，并且它是该教经常出现的一个动物。无论是“替罪羊”的无辜形象，还是“牧羊人”的犹太人祖先形象都与羊难解难分，偶尔“羊”的形象会出现在一些基督教画像的中央，太阳也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或者干脆说，犹太教就是从太阳一神教进化而来。到了今天，基督教也分出许多不同的教派，对于这些图案以及要求也各不相同，但对于偶像新教就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而天主教就不反对给予圣母的画像留下应有的崇拜空间。



不过有关这些考察也不能绝对，因为即便是在以色列本土，《圣经》中记载的所罗门在敬奉天主的同时也敬拜其他神，肯定有动物崇拜的成分，只是犹太教占主流而已。所以对待中国的商周时期的宗教与装饰物的对应要辩证地看。

◀ 商朝青铜鼎

在东周的春秋时期，不仅动物回来了，连俗世的人像也大量存在，比如那些黑人头像就是春秋时期出现的。其后再也不多见黑人像在中国的出现，或许说明黑人在中国的量并不大，他们很快就被同化了。羊这种犹太教的象征物在周朝是有大量存在的，我认为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直发展到今天，羊都成为中国人“吉祥”的象征。这一传统有可能是从商周尤其是周传下来的。



▶ 河南出土的玉环人像，很可能表示了这些人为王族。他们明显有黑人五官特征。

① 《圣经.利未记》 26:1 你们不可作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錾成的石像，向它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中国周朝前后的宗教信仰可能随着统治者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很复杂，不过好在有迹可查，拿中国与中东同期的比较并不十分困难。

中国受犹太教影响的另外一个证据是，犹太教中妇女地位比较低（但与中国封建时代却又有本质的区别），这与阿拉伯半岛南部不同，那里妇女地位当时相当高，尽管那里萨满教具有很大的势力。中国历史时期妇女地位的低下与儒教的这一背景有直接关系。举一例，在《圣经》的《利未记》中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交代圣例，其中27：5曰："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男子你要估定二十舍客勒，女子估定十舍客勒"，还有更多同类内容，显示女人比男人贱一倍。

我们前面已经论证过，中国商朝的妇女地位是很高的，显见中国妇女地位的下降是随着周朝或者儒教的出现而形成的。孔子更是发出了"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的慨叹，无论他本意何在，但估计任何女权主义者都不会对此圣言喜闻乐见。孔子，以及孔子背后的潜在思想，以复杂曲折的方式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

商朝有大规模的人牲殉葬现象，一次就成千上百的很常见。用中国历史学家的话，往往会把人牲现象在周代的停止解释为"奴隶社会的没落"。我认为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原因，而是因为周朝实行了犹太教的"仁政"，停止了这个有悖于他们教义的行为，并不是突然到了周朝统治者就文明仁爱起来。这是宗教的力量。

人牲的使用在于陪伴死者，潜在暗示了死后的灵魂存在。假如周朝犹太教占主要地位，就会与主要信仰萨满教的商朝人在灵魂以及死后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差异，所以他们的人牲处理方式也会根本不同。 这个改变会是"仁政"的一部分。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商朝主要是萨满教，但他们还是有原始犹太教的意识，只是哪个占统治地位的问题，否则理解上就会有偏差。周朝也一样，不等于有了犹太教，萨满教就全部突然消失了。宗教是文化习惯的一部分，不是说改就能马上革除的，尤其表现在民众之中的信仰，会根深蒂固。

"礼"与以色列家族

"礼"为周的思想核心，也是儒教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与哲学的核心。

演化到今天"礼"的内涵与最初已经有很大差异。坦率地说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礼"的起源，但是运用我的体系，我认为它应该起源于周朝，或者说与儒教相始终，最早不应该早于商武丁之前。之所以做如此推论基于以下猜想，一旦以后发现前商也存在"礼"我的这个推测就是彻底错误的。

我认为"礼（制）"这个词汇与中东的"犹太教"有关。它的字源应该是以色列的12族之一的"利未人"(Levite)，"礼"就是"Levite"，就是"利未"的简写，取第一个字。这是一种代指。

摩西大约在3400年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属于以色列12支系之一的"利未"家族。在其后的几百年里，利未家族成为圣家族，这个家族因为摩西的缘故逐渐成为以色

列12个支系中真正的统治者，其他家族都需要向这个家族定期纳贡，而且只有他们才可以做祭祀与上帝沟通，具有生杀大权。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前10世纪的“士师时代”都明显没有改变。任何“利未人”天生高人一等，是祭司的后备，其他任何家族都不可能承担祭祀的亚政治角色。

在这个历史转变之前，以色列12个家族中的圣家族并非是“利未人”，真正具有王族统治权的是约瑟家族，这个关系主要是建立在他们母亲的不同身份上。但是经过几百年的变迁，通过宗教改革摩西家族终于得到了以色列人的统治权并将其保留了相当长时间。

最终“Livite”这个词汇会成为一个固定名词。在中国最常见的名词翻译就是取第一个音节来代替全词，所以“Levite（利未）”缩写为“礼”，并且代表了所有“利未人”执行的各种神圣而烦琐的礼仪。到了后期，可能剥除了纯粹的宗教色彩，这些人成为某种政治、法律的执行阶层，最后连周朝统治者的号令都无人遵从，制度监督者与执行者的“礼”就更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看，孔子对于“礼”的恢复与呼吁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于一种礼仪形式的热衷，他所期盼的是一种有秩序有信仰的宗教社会。此事有关当时意识形态，所以他杀别人，以及后来秦人来逐杀他的接班人，都在情理之中。

“Livite”在中国古代，尤其是西周或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曾经作为一个单独的族群出现。比如中国西北地区曾经有一个“楼凡”族可能与其有关。后来我在接近中原的某地也见过与其发音接近的古族名称出现，但当时觉得证据薄弱没有深究。

被儒家“礼”教化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重灾区是汉族。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汉族人最不善歌舞，这就是儒教的结果，其实也就是普及犹太教的结果。

在《圣经》里可以注意到那些歌舞的人们基本上与“野蛮”联系在一起。原由是，最初的歌舞是献给神灵的，在亚伦与族人们载歌载舞地敬拜金牛之后，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几千人的生命。犹太教是一神教，讲究肃穆，发展到后来，任何偶像都不允许存在，舞蹈也自然是不允许的。大卫打了胜仗载歌载舞，因而受到扫罗女儿的奚落。长期下来，汉人在儒教影响下，肃穆倒是肃穆了，并且也真的与周边相比似乎“文明”一些，不过从此失去活泼生机。

一些历史疑云

说到Levite，我想再对中国的中山国提一笔。有些情况或许可以类比。

中山国很特别，这个袖珍小国曾经以小胜大在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历史奇迹，但我认为其实可能与它的古老家族地位特殊有一定关系，不一定是别的小国家明里暗里让着它，而是它更集中了一批高等级文明有效支持了它的发展。甚至，以这样明显属于特例的国家很可能有特殊的宗教在支持也未必。

在以色列的12支系里除了Livite还有1~2个名义上的神圣家族，比如从埃及出来有埃及文明背景的约瑟之后。在摩西时代，尽管利未人掌握了实权，但他们通常还是要给

约瑟家族一些面子，因为按照世俗的解读，这个家族才是真正的王族。我在《向东》一书中曾经把摩西的宗教改革看作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必然，目的就是让利未族翻身，但同时他们却也没有彻底推翻约瑟后人。中山国我怀疑恰是有类似的根源，尽管不一定大家能记得远到埃及的事情，但许多周围国家愿意给他们留个面子或许是可能的。不过这个面子越到后来越难见到，所以中山国终于在战国晚期彻底被灭。实际上一种文明、一种格局都在这个事件里标志着他们在中国的彻底结束。随之，一个新时代来临了。如秦这样没有什么贵根的新人恐怕最是厌恶类似的旧人旧根基，所以从文化上消灭他们是他们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从宏观角度看，全球在大约3500年前到2200年前，也就是在中国先秦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十分独特的一个文明时期。许多标准与传统得到奠定，也有一些古老传统彻底破灭消亡。中国地区尤其明显。秦国在这个结束期统一了中国其实并非偶然，我相信中国的文明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也是全球连动的一个环节。

秦始皇作为新文明的代言人对旧文化进行清洗有充足的道理。并且他的清洗未必是专门对于先秦旧史的隔绝。

今天对于先秦的无知或失忆完全也可以由其他因素造成，比如文字的不完备，地理概念的演变和不统一，甚至是人们对于地理历史的懵懂无知，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混乱而停止了与中东的正常联系等，这些都有可能使今天难以找到夏商周与红海的联系。或许某些看似平常的文字需要重新破解，只要转换思维就会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出现。

我认为，古代人的迁徙活动，除极少数人有地理概念外，大多数人并没有今天的具体地理知识，所以即便有文字想记录也困难。但记录的不方便并不等于迁徙的不方便，这要分开看待。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这个事实本身令人足够惊讶和耐人寻味。或许这里隐藏着秦始皇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先秦之所以不称“皇帝”并非没有概念，而是皇帝在“西方”，中国的最高首领只能为“王”，但秦始皇打破了这一切，这是一种与过去决绝的态度，是一种与西方断绝联系的表态，同时他把联系的证据以及维护这个“礼制”最严格的儒生也给坑杀了。

对此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严重的怀疑，“秦”（qin）也有可能来自“锡安山”（tsion，锡安有许多不同的拼法，主要看哪个群体使用该种语言）。

围绕一个“锡安”与“大卫城”或者“耶路撒冷”，按照拉尔夫的解说有这几个拼写或称呼可能与其有关：Zion，Zoan，Zian，Tchian[①]。我将其对应在中国，则有更多的怀疑。“Zoan”更接近中国的“中”；“Tchian”更接近“China”，本来“T”在“Tchian”中就可以不发音，实际上就是“chian”；无论是“chian”本身还是其中的一个字母的可能错位（为china），都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想像空间。按拉尔夫的意思，这不仅是一座以色列的城市名称，而且还是古埃及的一座要塞的名称。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异地命名。既然在古代中东已经有两个“锡安”，那么在中国古代再发现一个也不是什么意外了。

① 《所罗门》，340页。

秦始皇的族系，假如要按照《史记·秦本纪》的说法为“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放进我的体系里，他就是约瑟的后人，与“犹太人”或者“但人”都不属一个派系，属于以色列人中的王族世系。

对于中国古代就已存在的“夷”也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最初它多与山东的“东夷”联系在一起。“夷”与“商”联系在一起。“夷”与“海”、与“海外”联系在一起。顺着山东的“夷”，我们来到南方的“夷”，比如古代福建泉州这里曾经聚集过大量来自阿拉伯等西来的外国人，就有“夷夏杂处”的说法，“夏”当然是指“中国人”，“夷”就是指从非洲或者阿拉伯半岛到福建这里的沿海国家民族的人，或者就是“外国人”。这里也揭示了一个问题，“商代”统治者曾经被“夏人”当做“外来者”、“外国人”，并且他们来自“海上”。

《夷岛志略》这本书更为“夷”进一步做了注解，这里的“夷”就是指上述的外国或特指与海路有关的外国人或外国地方的。北方陆路向来罕见这样的指称。最典型的是，从中东到中国东部的必然通道上的台湾自东汉以后就长期被命名为“夷洲”，这里肯定是个重要的中转站。隋朝开始夷洲又改为“流求”，这一称呼一直保持到明朝，改为“小琉球”。联系到考古学以及地理的一个事实是，在日本与台湾（以及中国大陆）之间存在着钓鱼岛和“琉球群岛”。在殷商出土的众多人头骨中，许多人类学家对于他们的人种归属提出了许多看法，威廉·W·豪威尔提出：“安阳人种与海南岛的现代中国人和北海道、琉球的日本人最接近，而不是欧洲人、美国印第安人或波利尼西亚人。[①]”这一发现很形象地给我们指出了海上通道的可能存在，以及这些人大致把文明扩散至哪些区域。

意义清楚了，那么发音呢？为什么是“yi（夷）”？万物必有来源。它是外来语吗？是“东方”(east，在语言同源的基础上)，还是埃及（Egypt)，或是也门（Yemen)，甚至是埃塞俄比亚（Ethiopia）或者以色列（Israel)，甚至还有一个意大利的伊特鲁西亚（Etrucia）古国？非常巧合的是以上几个名称全部第一个音节可以音译为中国的“夷”。这个语音的分析会非常复杂，我只是抛砖引玉，并不打算深究，这会牵涉到大量问题，比如何时起用这个名称，在他们的本土语中是否同英语一样或接近发音，中国当时又是如何发音的等，大概这个话题已经够人研究半辈子了。不过我知道“埃及”尽管第一个音节很匹配“夷”，但却是来自3000年前的希腊语，假如超过这个期间更古时出现“夷”，就可以肯定与其无关。假如最后的结果证实“夷”来自曼德海峡两岸我将十分高兴。同时也为商朝统治者来自红海一带找到了新的证据。

对于中国历史的神秘失忆，除了秦始皇的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可以考虑。就是中原地区夸张记述了他们的历史。张光直先生在评价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巨大差异时曾经说过[②]：“我们逐渐发现从我们几十代的老祖宗开始便受了周人的骗了；周人有文字流传下来，说中原是华夏，是文明，而中原的南北都是蛮夷，蛮夷没有留下文字给他们自己宣传，所以我们几十代的念书的人就上了周人的一个大当，将华夷之辨作为传统上古史的一条金科玉律，一直到今天才从考古学上面恍然大悟。”“我说受了周人的骗，上了周

① 张光直《商文明》323页。

②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76～77页。

人的当，并不是说周人有意欺骗我们，商周的人都写了许多书，说他们自己的事，自然不免给他们自已吹嘘一番，这些书后来又给儒教编辑修改，以适合他们的古史观，所以传统的上古史的基本资料就包含许多不可靠的成分……。"

后来迁居台湾的中国考古学开山之人李济先生则从另外一方面说："两千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醒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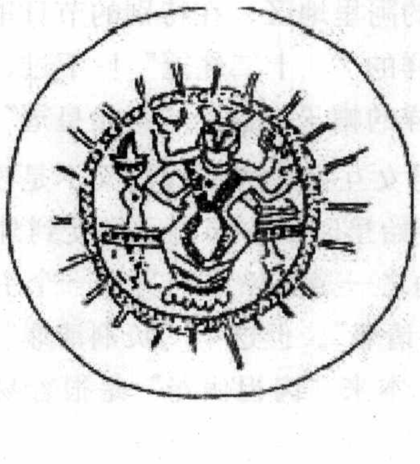
一个有形的长城截断了中华之源，秦的其他无形的思想是否造成了今天有关华夏更大的混乱？这是个值得深入的问题。

秦人信奉什么宗教

某些资料显示，秦时期并不禁止与海外的联系，甚至有中国的学者认为秦是中国最早有记录前往红海等地交往的朝代。那么我们缺乏的记录或者断绝的时期当在春秋时期，这是一个历史黑洞。而这个黑洞的制造者很可能就是秦始皇这个暴君。甚至他所建立的王权形式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照搬古埃及的形式。但是他信奉什么宗教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推测秦始皇尊崇萨满教。但是萨满教中也有分别，有不同的派别与团体。秦人崇尚狗，并且认狗为祖②，这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信号。

大约起源于2600年前的波斯祆教就崇尚狗。但中国的正史认为祆教进入中国是很晚以后的事情，我对此很不以为然。西来说之所以在中国站不住脚，或者说干脆研究都很困难，就是因为许多相关的历史都错了，一环错环环错。假如要确立"同源说"，需要推翻的定论太多了。起码从我这里，更正祆教进入中国的时期是非常肯定的。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也肯定不在传统所谓的汉代，要早得多，现在来具体给出佛教的时间或许还比较困难，并且不是本书探讨的要点，但是在未来一定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公式以计算出一种文明要素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得到传播——这个"公式"的研究要在全球同源的理论基础之上才能进行，许多相关问题在那时就会变得容易得多，而且会节省大量人力物力——这就是为什么要严肃而坚



① 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
② 依据吴天明，《中国神话研究》，3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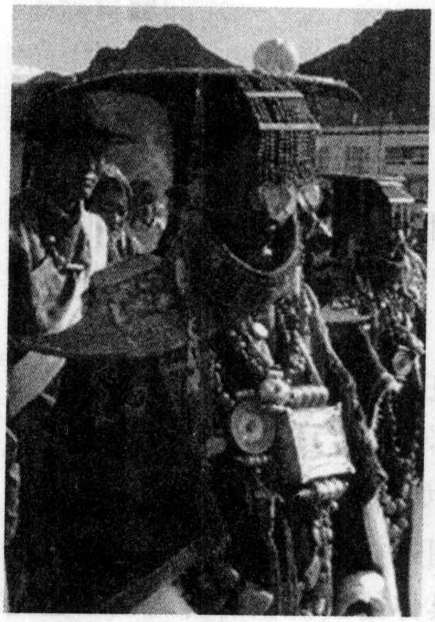
持讲出历史真相的原因所在。

有一本新出的所谓“汉族史诗”《黑暗传》①，很可能与袄教教义以及希腊神话有关，不过我还没有见到，推荐有志研究者有机会进行比对。在袄教教义里“黑暗”是最先生出来的，与“大地女神”结合后才生出来“光明”，所以从袄教看世界之始为“黑暗”而不是“光明”。基督教却是先有“光明”，后有“黑暗”。

秦始皇崇尚黑色广为人知。有人认为位于今天阿里地区的古象雄文化实际上可能属于波斯“大食文化”（非“大食国”）。“大食”分“白食”与“黑食”，而那里的“苯教”属于“黑食”。并且，从许多方面看，西藏苯教受到袄教影响。苯教与袄教同属萨满教之一种。“苯教”因教徒头裹黑巾，俗称“黑教”，后来的西藏人又被称为“番”(bo)人，颇可怀疑为“波斯”之“波(bo)”。“黑”及其萨满教特色都让人觉得在中国西北发家、崇尚黑色、喜欢巫术、尊狗的秦嬴很可能信奉了袄教或苯教。

秦始皇头戴典型的“十二旒冠”像。请注意“旒”通“牦”，这个称呼也从质地方面显示了它的青藏高原色彩。

他这个“嬴”更兼来自“青阳”之“少昊之姓”，愈加可疑。可疑归可疑，不足为据。“嬴”更像是崇拜“月神”的部族，中国（主要是藏区）形容古代“大食”地理位置为“西方月亮降落的地方”，这个以女性为祖或者仙女下凡而来的“嬴”人还真的很让人怀疑与波斯国里“大食”部落的关系。不过由于波斯本身就包含了犹太人、埃及人，所以不要只局限于怀疑与“伊朗人”有关。



西藏阿里（古象雄）普兰地区的传统妇女装束　张鹰拍摄

我总怀疑秦始皇那个奇特而著名的“十二旒冠”很可能与西方文明或这个途径的传播有直接关系。在今天依然封闭的阿里地区，在特别的节日里当地人竟然戴着如秦始皇一样的“ 十二旒冠”！不过，阿里地区是只有女人才戴那样的帽子，这个“秦始皇冠”到底是谁学习谁的？其根源在哪里？经过几千年的变迁，男女互换的风俗我们又不是没见过。

还有一个证据或可证明至少在秦始皇时期中国就已经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和氏璧的故事。和氏璧的主角之一是秦始皇，另外一个主角是赵人蔺相如。和氏璧还引出中国的一个著名成语“负荆请罪”。但这个“负荆请罪”看来并非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或传统，而是一个外来风俗。本来“肉袒伏斧”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以“负荆”作为谢罪的象征呢？

在《圣经 · 新约》中，耶稣临刑前戴了一顶带刺的荆冠，这表示他是罪人。在希腊

① 胡崇骏整理，选自中国湖北神农架地区传说。

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因为盗火种给人类而犯天条，他被宙斯捆在高加索山上受罚，他同样戴了一个荆冠："Vitex agnus-castus""洋牡荆做的冠"。我认为这里的两个不同地区(中东与希腊)不同文化体系中的神在"犯罪"时同样戴"荆"，不是偶然，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荆"的出现一定与"罪"联系在一起，"荆"可能潜在已为"服罪"的代名词，但只是没有人这样来总结，甚至没有被人们"发现"。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这段话很清晰地表明了这个故事发生于先秦战国末期。并且，他们与秦始皇是同代人。原文中，廉颇本来想挑衅蔺相如，后知他宽怀大度为国家忍辱负重，"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

"荆"与"罪"看来为一固定搭配，并且流行于远古时代的不同广大区域：东亚、西亚、地中海。假如"负荆请罪"与耶稣故事以及普罗米修斯神话为同源，那么"负荆请罪"的习俗在中国至少有2250年以上的历史，最起码也存在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死于公元前87年）生活之前。假如我们不那么严格的话，从"负荆请罪"的故事直接发生在秦始皇当朝，完全可以肯定秦始皇时代已经知道希腊神话的存在，也就是说，袄教在产生之后马上就进入了中国根本不在话下。从这里再次推测秦始皇因信奉萨满教而焚书坑"不语怪力乱神"之儒，似乎可能性越来越大。

既然他为了求仙能够让徐福带500个童男童女远赴东海，他自然能为求仙而派人去西域求拜。想必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因而遭到了许多人，尤其是不信神鬼的儒生的非议，为了杀一儆百，他干脆对他们进行了斩草除根的行为。

今天史学界对于袄教进入中国的时期断定在大约公元6世纪是有错误的，并且连带引起了更多的误解。有的误解还非常重大。

印度东北突现以色列失落部落

我看到一篇题为《以色列失落的部落惊现印度》的新闻，刊登在 2005年4月6日《北京科技报》[①]。随后我google到英国"The Times"在4月2日的报道："Lost tribe from India dreams to return to Israel after 2,700 years of exile"(见后面英文节选)。他们基本上在讲述同一件事情：印度东北地区大约7000人的一个部落在确认了他们为以色列后裔(约瑟之子"玛拿西支系")后期望迁回以色列，事实上一些人已经迁徙过去。根据一些国外的学术研究资料看，这个问题已经搁置有许多年时间了，现在以色列的大拉比终于正式承认他们拥有以色列公民的权利，并且已经派宗教团体前去沟通。据说他们中间许多人早已皈依犹太教或基督教。

一直以来我不仅认为中国"周"文化与犹太人有关联，而且我认为中国西北广大地区尤其是历史上的匈奴可能与以色列"失落的部落"有密切的关联（参考我的第三本书《历

① 本书总体成书在2005年元月之前，但这一节为2005年4月6日补充插入。

史也疯狂》)，而这批失落的玛拿西人就居住在印度东北与缅甸、中国西南国境交界处，所以引起我的高度注意。

仓促看了一些有关方面的国外研究资料与新闻，还有这些人的网络照片，我得知新闻里提到的这个部落属于一个名叫“钦龙”(Chinlung) 的群体。

“钦龙”主要生活在印度、中国与缅甸之间，周围其他国家也有他们的踪迹。在印度这批人还有一个名字叫“Kuki”，在缅甸他们更多时候叫“Chin”，有时他们又被合起来叫“Kuki-Chin”，“库钦人”。但是大家在选择哪个称呼更能代表他们的统一性时他们自己选择了一个古老名称“Zou”或者“Zoumi”。

这批人从外表看与中国人没有大的差异，大多数是标准的黄种人，偶见个别有白色人种倾向（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相貌与人种基因等可能并没有我们原先所认为的那样联系紧密）。这些人一个比较明显的装束是男人喜欢在头上围白头巾，这让人想起中国陕北的男人，中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男人似乎也有类似传统。“Zoumi”先前信仰万物有灵，现在已经准备或部分人已经皈依了犹太教或基督教。他们比较统一的神话传说是，他们祖先从“洞”里出生，或者从地球的“肠”、“胃”里出生，所以这些说法可能与中国西南的“侗族”估计有一定的联系，但实际上与中国的景颇族、白族、纳西族、羌族等也有联系。我认为他们的神话也可能是受后来的祆教甚至道教的影响。但最古老的从地球的洞里出生人类的神话应该来自苏美尔地区。或许这几个神话本来就是一个根源。有国外的研究者认为，这批人是公元前225年从秦暴政下逃离中国的“秦人”，途经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辗转来到目前的地区定居。部分人是唐宋时期从云南南昭国出走的，其成员很复杂。

我认为“Chinlung”实际上可能是“秦岭”。这些“Chin”人实际上就是“秦岭人”。而他们为什么都称呼自己为“Zou”人或“Zoumi”，显示了他们从根源上更认同自己为秦朝之前的“周人”，“Zoumi”很可能就是“周民”的发音。而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周朝”实际上就是“Jew 朝”犹太人，所以“Zoumi”是犹太人符合我的理论。从正统的角度确认，这批人正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藏缅人”，他们主要就生活在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地区。

我所迷惑的是，这批刚刚被以色列已经认领的7000人认为他们是“失落的部落”，但“失落的部落”发生在2700年前，中国的周朝却开始于3000年前。假如这批人真的是如某些国外资料所认为的他们是从“秦岭”出走的中国人，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失落的部落”首先曾经回归于周朝故地，然后才与“秦人”发生冲突并分散于各地。有人认为，他们经过伊拉克、阿富汗等地进入南中国，最后到达印度东北；但另外的学术研究表明，他们是从中国秦岭，也就是西安一带，与秦抗争才辗转迁徙到目前的居住地。这中间有些小问题令人疑惑。假如这批“失落的部落”知道西安附近就是周人故地，并且我曾经(在《向东》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周朝就是“Jew 朝”(犹太朝)，印度这批“失落的部落”要么曾经知道中国周朝的犹太性质才在古代过去投奔亲人，要么这批人根本不是“失落的部落”，而是周朝的犹太人！由于他们从某些文化痕迹上发现自己与犹太人比较接近，同时又听说过“失落的部落”的故事，所以最后附会到“失落的部落”是完全有可能的。

实际情况是，20世纪50年代他们中有两个基督教徒说他们在梦中有天使出现告诉他们是以色列的后代，不过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提到过他们的许多习俗与古代犹太人相近的事实。所有的这些认证一直没有提到生物鉴定，目前我的判断这更多是一种精神与传统的认证，类似的情况还出现于南非、中亚等地。由于这些事实与中国古代有关，所以值得中国历史学家关注。

以上这些尚未得到完全证实的信息，给秦始皇的政权以及秦始皇时代到底出于什么目的进行的“焚书坑儒”蒙上了更为复杂的历史色彩。

附：

Lost tribe from India dreams to return to Israel after 2,700 years of exile

By Ian MacKinnon

Indians descended from Joseph seek new homeland

A group of 7,000 Indians who believe that they belong to a fabled “lost tribe” expect to emigrate to Israel after being recognised as descendants of the ancient Israelites.

Sephardic Chief Rabbi Shlomo Amar has acknowledged the status of the Bnei Menashe people and will send a team of rabbinical judges to a remote corner of northeast India, next to Burma, to convert them to Judaism.

The conversions will ensure that the group who claim to be “children of the tribe of Manasseh, a son of Joseph” will be able to emigrate to Israel under the Jewish Law of Return. It will allow them to circumvent an Interior Ministry ban imposed on the Bnei Menashe Indians two years ago.

The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Christians and Jews, a group of evangelical Christians who work for Jewish causes, has already agreed to underwrite the cost of the Orthodox conversions of the Bnei Menashe to facilitate their migration to Israel.

……

Most of the two million Chinlung people living in Mizoram and Manipur say they are descendants of one of ten “lost tribes” of Israel exiled 2,700 years ago by the Assyrian conquerors.

They settled in the remote Indo-Burmese jungles after travelling through Iraq, Afghanistan and southern China.

After forsaking animism and converting to Christianity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most remained true to their new faith despite a fierce belief in their Jewish roo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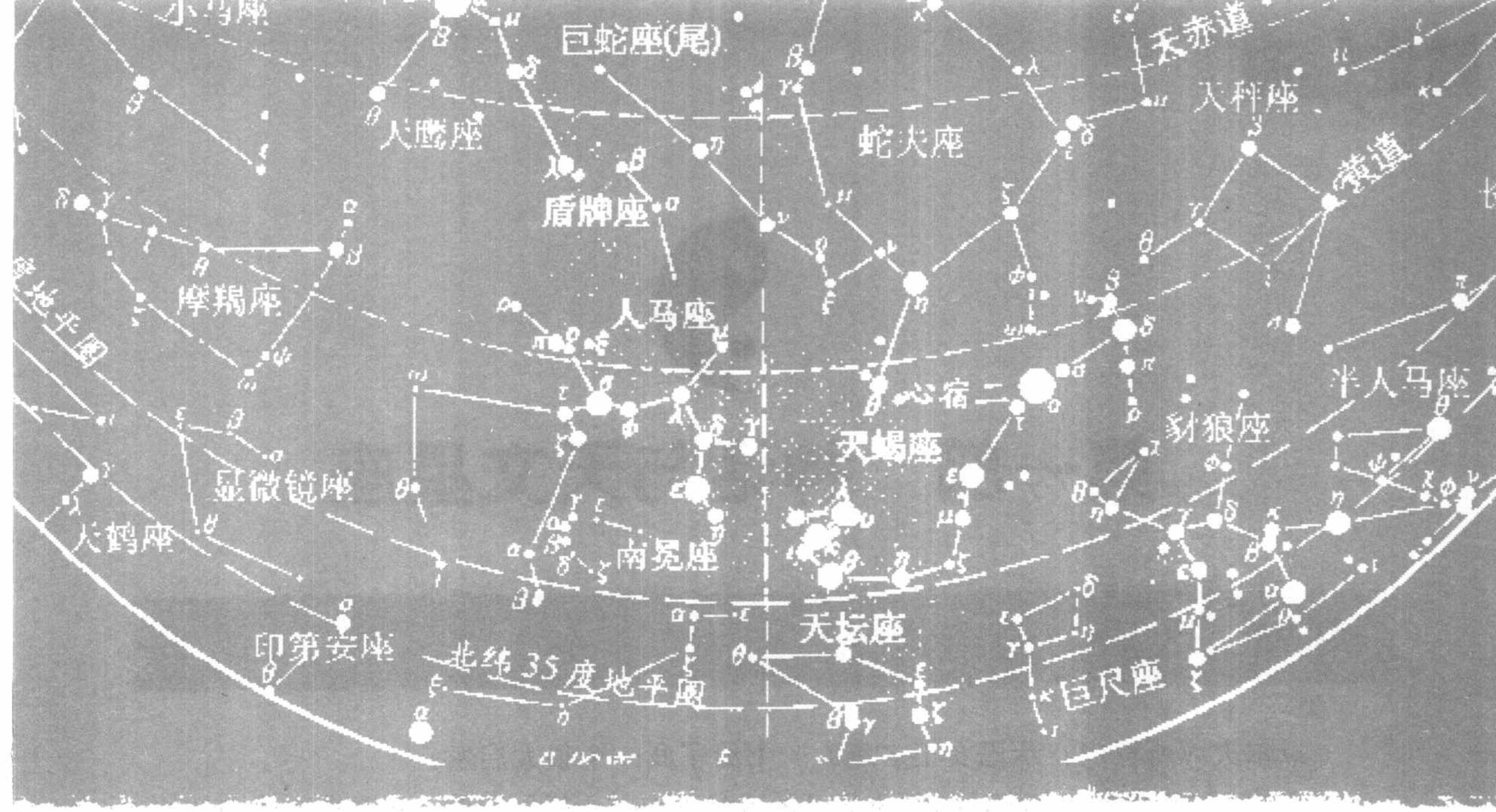
A handful went further and began adopting Judaism in the 1970s after seeing the traditions of their ancestors mirrored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 movement’s foundations date back to the 1950s, when two Pentecostal Christians experienced dreams in which angels declared they were the people of Isra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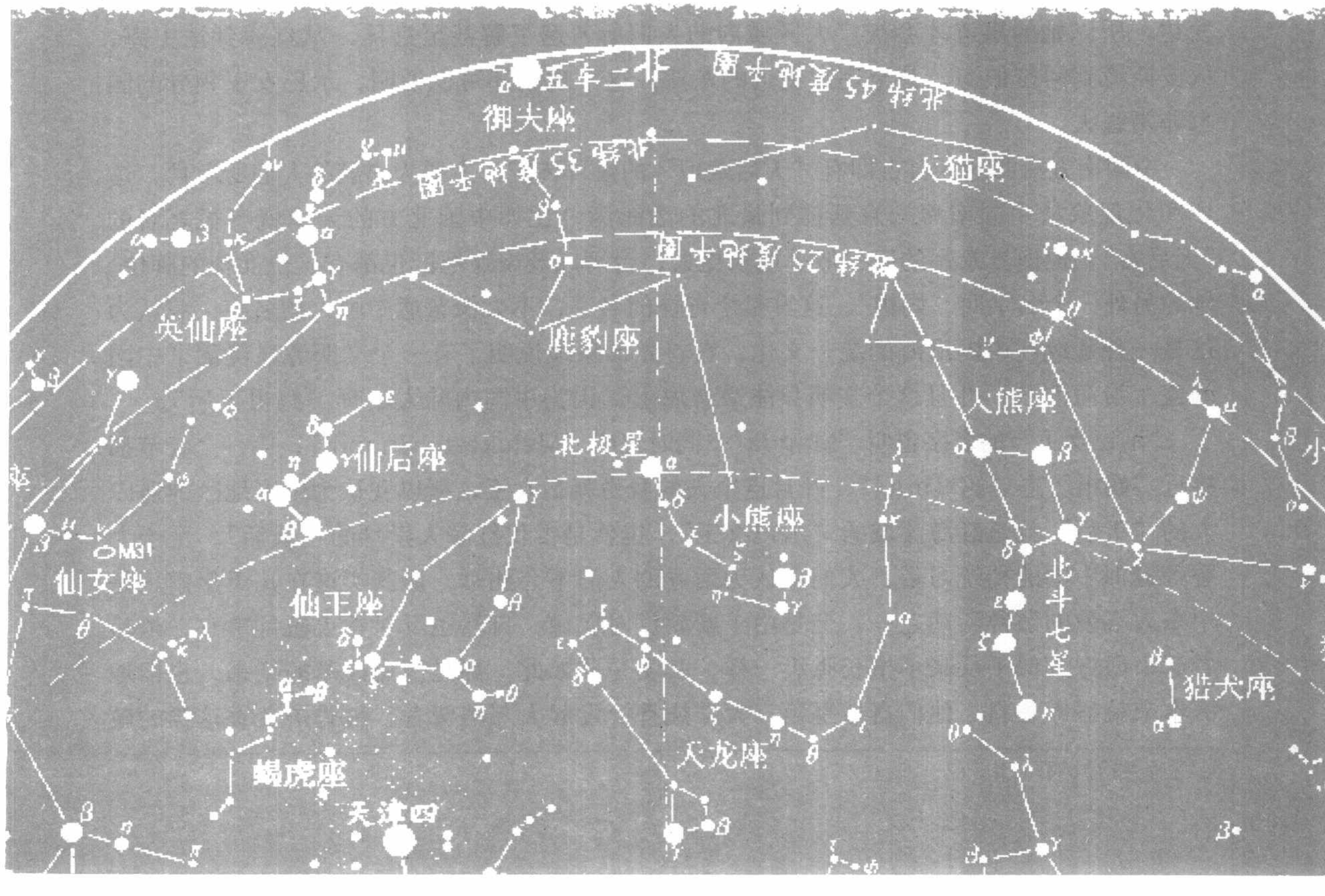
Others had already noticed similarities in their pre-Christian traditions with those of Jewish rites.

One was circumcision on the eight day after birth carried out, not with a knife, but with sharpened stones, just as Joshua did in the Bible. The tribe also celebrates a holiday on which unleavened bread was eaten, even though they do not normally eat bread.

……


巨蛇座(尾)
天赤道
天秤座
天鹰座
蛇夫座
黄道
盾牌座
摩羯座
人马座
心宿二
半人马座
天蝎座
豺狼座
显微镜座
天鹤座
南冕座
印第安座
天坛座
北纬35度地平圈
巨尺座

下部 遥问天上人间


五车二
北纬45度地平圈
御夫座
北纬35度地平圈
天猫座
北纬25度地平圈
英仙座
鹿豹座
大熊座
仙后座
北极星
小熊座
M31
仙女座
北斗七星
仙王座
猎犬座
天龙座
蝎虎座
天津四

第一部　神话与天文星座

麻姑、天后与西王母

拉尔夫《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一书给了我一个很大启发：

大约2500年前，红海流域的人们开始崇拜一位“天后”娘娘，这是背离犹太教的一种异教。拉尔夫认为中东人敬拜的“天后”就是被神话了的“示巴女王”，在希伯来语中“示巴女王”有一个对应的名字“Melekesh Shamh”[①]，换句话说“Melekesh Shamh”就是“天后娘娘”。这个时间对应是成立的，示巴女王在前，崇拜“天后”在后，地域上也合乎逻辑：红海。同时，这个后果说明“示巴女王”的传奇故事流传之广，并且经过几百年的酝酿最终蔚为壮观。

“示巴女王”的事迹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以有另外一种推测：她的王国对外贸易特别发达，所以她的事迹才会被广大区域内的人们所普遍了解甚至崇拜，从红海到地中海，从波斯湾到阿拉伯海，甚至还有更远的东亚。这个现象还可以说明，示巴女王领导的国家非常强大。

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自古即有“天后娘娘”的崇拜传统，主要为出航的人们所敬拜。这个文化现象从中国南海一直延伸到最北的渤海湾，比如中国北方的天津就有很著名的“天后宫”，但南方泉州的庙宇似乎规模更大，台湾以及南亚地区也都有这位女神的牌位。她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妈祖”，这真是个奇怪的名字，不太像普通中国人的名字。我认为这是一种延续在中国沿海的统一文化，它首先形象地说明了有一个文明源泉浇灌了中国的整个沿海地区，并且这个文明只能来自海上，因为中国内陆人不拜“妈祖天后”。

“示巴女王”的名字也叫“Magda”，同时也叫“Melekesh Shamh”，第一个音节都接近“妈祖”之“妈（ma）”，并且这个人的身份就是女王，所以我认为中国地区神通广大的“天后”就是红海流域的“示巴女王”，也就是古代红海人崇拜的“天后”。至于上香等看似中国的传统习俗，人们多认为西方的人们不会此举，但其实这在几千年前正是中东人喜爱的敬拜活动之一，但是由于新教反对偶像，自然也反对香火敬拜事宜，最后看起来西方人似乎从来不擅长香火一样，其实并非如此，都是历史改革的结果。也门地区本来就盛产香料，他们自然是第一大“烧香”发起人与消费者。用香炉焚香这样的敬

① 《所罗门》，331页。

神活动在《圣经》里也随处可见，甚至在比较旧式的基督教某些派别里也能看到香火敬拜的活动，这并非中国人的特权。就像“龙”的现象，只有眼界不够的人才会认为那是中国的特产，实际上“龙”早就出现在中东的文字记载中了，甚至比中国更早。

临海的中国澳门（Macau）名称的来历很可能与示巴女王也有关。“Macau”确实是葡萄牙人所取，但这是依据当地人的发音而来。葡萄牙人于16世纪登陆的地方是一座很大的庙宇，这座庙恰是一座天后妈祖庙，建于明成化年间，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葡萄牙人问此地名称，当地人就以这个庙宇的名称相告：“妈阁”。葡萄牙人就以“妈阁”为“Macau”。这个澳门的天后庙直接揭示了我们这个答案：示巴女王“Magda”或“Makeda”就是中国的天后娘娘“妈阁”。

我们可以沿着“妈祖”的敬拜路线寻找当初“萨巴王国”的“香料之路”，示巴女王的臣民把商船开到哪里就在哪里对她进行祭拜。

在《所罗门》一书中，拉尔夫一直想让我们相信“示巴女王”还具有这样一个头衔，或者说她们就是一个人：“玛迦（Maakare）· 他玛”，这是个埃及头衔。

中国有一个据说发源于湖南衡山的“麻姑”神女传说，她的地位仅次于“西王母”，似乎还与“西王母”有点关联。“麻姑”很可能就是“妈阁”或“玛迦”。也就是说，“麻姑”很可能就是“天后”（Makeda）的另外一个化身。

古代西王母画像

麻姑的传说

麻姑是传说中的仙女，为在农历三月初三给“西王母”祝寿，她每年都要在衡山采灵芝酿酒，然后飞天去给“王母”祝寿。

湖南衡山有“麻姑仙境”。衡山有桥，桥下有瀑落三叠，那就是著名的“绛珠瀑布”。

上行则见“绛珠池”，据说这里就是麻姑酿酒的地方。她捧桃提壶，身边靠着仙鹿，状若飞天。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中的“南山”即指“衡山”。麻姑由这里飞天去给王母拜寿。[1]

葛洪《神仙传》中说，“麻姑”是神仙“王远”请出来的，在东汉时期他们到浙江吴县一个叫蔡经的人家中，麻姑说出了三见沧海桑田的奇特经历。

麻姑的特征：年轻漂亮，长发飘飘，但手若鸟爪。

《列仙全传》中又说，“麻姑”是十六国时期残暴无度的“麻秋”的女儿，这麻姑为怜惜穷人常学鸡叫，这样民工就可得到休息信号了。后来流行的革命故事“半夜鸡叫”与此说有异曲同工之美。

麻姑与“水”有关，临“绛珠池”。“示巴女王”同样住在两面环水的海边，或者说红海穿越了她的王国。“绛”，大赤，大红色也。“示巴女王”居“红海”，麻姑居处为“红”池。实际上两处皆无“红”，所以这一共同之“绛”很是古怪，只能后者为特意符合“红海”才有“绛”色。

麻姑与鸟有关，“手若鸟爪”。“示巴女王”时代崇拜鹰，鹰为王权象征。“手若鸟爪”实际上是传说中常有的文学捏合手法，怕是人鸟合一的描写。每年向“西王母”拜寿的事迹则是相反的手法：分离法，将同一个人分为两个。麻姑与示巴为同一人。即便不是一人，无论如何麻姑也一定与西王母有关系，否则怎么会让她前去给西王母拜寿呢。

麻姑的“三见沧海”经历可能是真的，但只不过不是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个王国的整个经历，是许多人许多代的所见集合，这给我们留下了从外部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明显视点：长期从海外航海到中国看到的中国境内的变换。假如某些船队几年来一次，最起码是三年一个来回，由于三代时期中国东部平原地区在上古时代由于海平面不稳定，可能发生过海侵，上下幅度在150米左右；另外长江与黄河长期肆虐，湖南这样的典型地区肯定属于首淹之区，一些从中东航海而来的人们过几年再来就找不着原先存在的地方。往返几次，就给人们留下了“三见沧海桑田”的印象。

“麻姑”的故事与汉朝有关，其实中国大多数的神话传说都与汉代有关。这是个很特殊的现象。目前还不知道是由于文字由此时得以广泛使用才使一些故事广为人知，还是汉朝再次开放引起的这个结果，很是耐人寻味。但，从以上踪迹看，“麻姑”在中国的起源似乎不能超过汉朝，所以从逻辑上也与“天后”崇拜的现象发生不矛盾。

天后

泉州“天后宫”位于福建泉州市区南门天后路一号，始建于公元1196年，为“蕃舶客航聚集之地”。泉州莆田妈祖庙为“祖庭”。为什么“妈祖”的“祖庭”在泉州，这是个重要的线索。泉州，其实更是古代“夷人”进入中国的一大中转站，或者说，这里就是中国东南的大门。

---

① http://spot.cnair.com/hunan/hengshan/list_ma.htm

台湾的妈祖像

台湾“妈祖”崇拜也十分兴盛，仅“妈祖庙”就有510多座，但台湾人承认其源头在莆田，它们是从大陆“分灵”而来。

“妈祖”是海洋保护神，又称“天妃”、“天后”、“天妃娘娘”、“天上圣母”等等。道教《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封“妈祖”为“辅斗昭孝纯正灵应孚济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妈祖”的文字记载大约起于北宋。记载尽管晚但起源却未必晚。我对此的解释是，单独的“妈祖”崇拜作为一个宗教势力可能远没有儒教或道教佛教那样远大，只是沿海渔民的崇拜，所以就一直未被记录。

中国神话传说里“妈祖”是宋朝都巡检林愿（也有说叫林帷悫的）之女，母亲王氏。降生之时，王氏见到一道光从西北面射人房内，光辉耀眼夺目，香气四处飘散。婴儿取名默娘，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殁于公元987年，享年28岁。由于初生时无哭声，故名默娘。16岁观井得符，能布席渡海救人。升化后，有祷辄应。

“妈祖”主要神迹是救济海上遇难生民。“妈祖”有随从，生有千里眼、顺风耳，能解救人于千里之外。妈祖常穿朱衣，乘彩云游于岛屿之间。《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称：妈祖所救为“翻覆舟船，损人性命，横被伤杀，无由解脱”。后来职能扩大，称“若有行商坐贾，买卖积财，或农工技艺，种作经营，或行兵布阵，或产难”，“或疾病”，最后“妈祖”又为“送子娘娘”。

民间传说中“林默娘”终生不嫁，为处女身。默娘终生以行善济人为务，矢志不嫁，专心致志精研医理，为人消灾防病。她性情和顺，热心助人，排忧解难，还引导乡人避凶趋吉。传说莆田地区瘟疫大流行，林默娘想尽办法施药抢救乡民，果然立愈。

宋雍熙四年（公元987年），重阳佳节，妈祖父兄驾舟渡北上，西风正急，途中遇到

狂风恶浪，船在狂风怒涛中剧烈颠簸，妈祖敏感到父兄的遇难，亲临救驾，父亲救起，兄长与自己身亡。

此“天后”之“妈祖”或“默娘”，既有红海“示巴女王”的身影，也可能与中国内地某位贤淑女子的故事附和，合二为一，但主要是“示巴女王”，或许干脆“林默娘”的故事就是杜撰。首先，她影响广泛，一位普通女子不应该有如此大的影响。其次，为“处女”，出生时有“红光”、“香气”，皆与“示巴女王”事迹相关。默娘善医理，也门出产香料，香料本来就可入药。默娘享年“28岁”，这可能是“示巴女王”“28星宿”崇拜的一个隐语。“十六岁观井得符”，可能是处女女王登基执政的年龄。穿朱衣，云游于岛屿，这正是“萨巴王国”的文化象征与影响方式：红色、游弋于海。妈祖对于商业的大力支持，是“萨巴王国”与商朝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追忆。

无论“妈祖”还是“默娘”都没有脱离“示巴女王”的“Magda” （或“Maqda”以及“Makera”）发音。这不能不说是神话系统中部分忠于原创的原则在起作用。千变万变，某些原味还是会保留下来的。

道教里的西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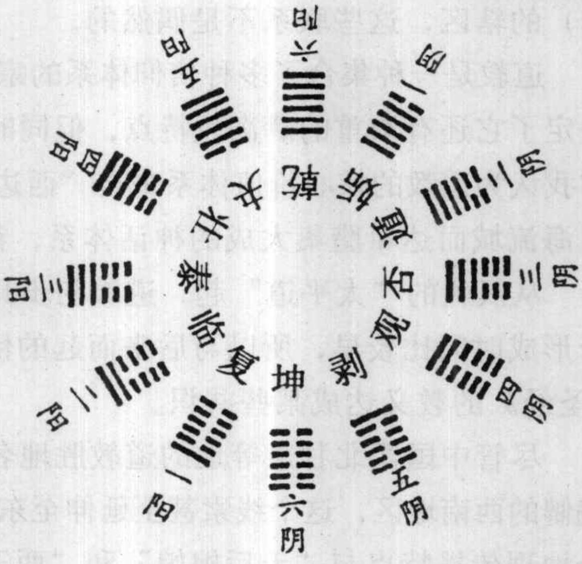
西王母，又名金母、瑶池金母、王母娘娘、西姥 、王母 、白玉龟台九灵太真金母元君 、白玉龟台九凤太真西王母、太灵九光龟台金母元君。她是中国神话系统中地位最高的具有明确政治意味的女神。她原是掌管灾疫和刑罚的怪神，后来逐渐女性化与温和化，甚至成为年老慈祥的女神。

相传王母住在昆仑山的瑶池，园里有蟠桃树，食之可长生不老。居处有城千里，玉楼十二，九层元室，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山。

《山海经》记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①，是司天之历及五残”。昆仑绝顶上有三只叫“青鸟”的巨型猛禽，每天替她叼进食物。西方白虎为其使者。《穆天子传》里，西王母又像是一位温文儒雅的统治者。穆王在瑶池与西王母相会，两人以诗词相互致意。

《汉武帝内传》称其美丽动人，为绝世佳人，赐予汉武帝三千年结一次果的蟠桃。“着黄金褡 ，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 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这个故事不太可能是镭实的，不过“示巴王国”当时还存在，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5年。

① 我怀疑这个“戴胜”是个误传，现在一般的解释为西王母头上戴着“胜”这种发饰。实际上“戴胜”是一种鸟的名称，并且是《希腊神话》之中的鸟，在《普洛克涅和菲罗墨拉》这一节中忒瑞俄斯和妻子姐妹俩的追杀中变成一只“戴胜鸟”，是很凶厉的形象。不过戴胜鸟由于头顶五彩羽毛，实际上既独特又漂亮，经常成为宗教或神话中的象征物。此鸟多生长于温暖干燥的南方，在中国主要在长江以南地区，非洲同样有此鸟。很可能最初西王母曾经以此鸟为象征，后来便传为她的一种发饰了，而且后世还真的流传一种“戴胜”的发饰。



十二消息图

道教在每年“三月三”定为王母娘娘的诞辰（也有称为7月18，或某月23日），俗称蟠桃盛会。

中国一些传统学者认为历史上西王母确有其人。主要结论为：她属于游牧部落，生活于距今3000至5000多年前，在中国西北。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张忠孝教授指出：“西王母既是一个古老部落国家的称号，又是古国女王的尊号，代代相传。”

与麻姑、妈祖不同的是，这个西王母传说的地域在中国北方，或者说在内陆，并且主要与穆王以及其他统治者有关，政治意味浓厚。蟠桃、瑶池、豹尾虎齿、衣裳华丽、庄严美丽，长寿，与鸟、虎等禽兽有牵连，有萨满教特色，与星辰有关联，与道教起源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让人浮想联翩。此人同样接近“示巴女王”。特别指出“腰佩分景之剑”这一特点，直到今天也门（男）人的主要装饰之一就是“佩带腰剑”，也门几乎人人佩剑，为必不可少的装饰品。

我认为以上三个女神实为一人。从中国南海到大西北该女神神迹遍布中华。“示巴女王”期间，国家兴盛，向外飞速开拓进展，从阿拉伯半岛南部呈扇型向中国传播扩散，必然后果当如目前。南边走海发展为“妈祖”，北边越高山经藏区而入青海、甘肃一带为“西王母”。

在内陆，“西王母”主要成就了道教；在海洋，“妈祖”成为水上保护神。假如想了解西王母，恐怕得继续顺藤摸瓜寻找道教的根源。它们两者似乎有密不可分的伴生关系。

道教的一些特点

有人认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它确实是中国独有的宗教，起码从名称上找不到与它相近的外国教派。但是道教的根系在西方，它的信仰价值体系甚至可以远达欧洲的希腊、非洲的埃及，但更多在西亚一带，并且道教不是单一起源。

假如我们把道教的鼻祖定为老子的话，那么创立时间起码不超过东周，但我认为把老子纳入道教体系是后人的附会。不过，老子生活的时代尽管并没有道教，日后把他尊为鼻祖还是符合逻辑的。

道教与八卦之间也有着神秘的联系，或许它的根系无论从时间还是从地理都扎得更远。我在《历史也疯狂》一书中已经撰文寻觅过《易经》的根源，关于阴阳、“八”神皆有可能起源于埃塞俄比亚的尼罗河源头地区。而埃塞俄比亚恰好又在“示巴女王”（西王

母）的辖区，这些联系不是偶然的。

道教是一种集合了多种信仰体系的宗教，首先有祖先崇拜，“驱鬼捉邪”的主要任务决定了它还有浓重的萨满教特点，但同时它还具有佛教、儒教、犹太教思想的融入。总体我认为道教的核心价值体系来自“西边”：西藏的苯教、西亚波斯的祆教，以及辗转从红海流域而达希腊集大成的神话体系，都可能是道教的主干。

从汉代的“太平道”起，道教初步具有中国特色，说来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由于形成时间比较早，所以与后来而起的伊斯兰教并无太多联系，假如有相通，则是通过《圣经》的教义达成某些共识。

尽管中国西北甘肃等地的道教胜地名满天下，但非常原始的道教痕迹却存在于中国偏僻的西南地区，这个线索甚至延伸至东南亚，展示了更加可疑的多种“西方”根源。这个地理传播特点与“天后娘娘”和“西王母”在中国的神话传说有某些相同之处，它还有其他的玄机。

道教是中国人东拼西凑的土特产。

和平、养生、医疗、天文、成仙是道教的主要内容，西王母以长寿蟠桃（秘诀）加入了道教盛殿。西王母还是道教中地位最高的女性神。在道教中她有许多名字，“白玉龟台九凤太真西王母”是其中之一。每年道教都有专门节日为“西王母”庆祝生日。这个情节十分特殊。西王母与道教有不解之缘。交互对它们进行研究可以部分为对方揭开起源的秘密。

在南方比较原始的瑶族道教传统中，“盘王”居于神仙首位。“盘王”身份一贯众说纷纭，我也曾经猜测他是否是商朝的“盘庚”，不过根据不足而放弃了这一推测。道教或者南方人崇拜的“盘王”名字叫“盘瓠”。“盘瓠”文化流传于整个长江流域以及南方沿海地区。他同时又叫“盘古”。

传说上古时，高辛皇后耳痛三年，她从耳中取出一虫，育于盘中，后变成龙犬，高辛帝赐名龙期，号称盘瓠。其时犬戎兴兵来犯，帝下诏求贤：能斩番王头者以三公主嫁他为妻。龙犬揭榜后即往敌国，乘番王酒醉，咬断其头。高辛帝因他是犬而想悔婚。盘瓠说：“把我放在金钟内，七昼夜可变成人。”盘瓠入钟6天，公主怕他饿死，打开金钟。见他身已成人形，但头未变。于是盘瓠与公主结婚。婚后，夫妻入居深山，以狩猎和山耕为生。生三子一女，长子姓盘，名能；次子姓蓝，名光辉；三子姓雷，名巨佑，女儿嫁人。

以上这篇简短的神话传说中隐藏着许多千年未解的重大秘密，其中的数目与形象都不是凭空编造。万物有源，一切的神话都会找到真正的源泉，只是其中牵涉到的范围之广达到我们不敢相信的程度。

一些古老的经书（如《解意书》）记述了盘瓠“漂洋过海”的传说。所以盘瓠到底是何方神圣？中国南方许多敬奉盘王的少数民族源自何处？只要我们深入研究，相信答案会越来越近。

“玉皇大帝”是道教中很突出的男神，他似乎与西王母是配偶关系，但在神话中他们

俩的这一关系也不十分明确。这个尴尬局面使我们产生了一些特别的猜测，它的原形会不会是大名鼎鼎的所罗门？“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的关系不正是有些同样的尴尬吗？说夫妻他们不是，说不是夫妻但他们却共同生育了后代。当然这只是一个仓促的猜测。

道观里的玉皇大帝造型

盘瓠、玉皇大帝、西王母是某些南方道教尊奉的三位主要神明。北方道教有些区别，我去过的一些道观里有敬王母娘娘的，也有敬老子李耳的，很不统一。最近听到的是来自海南的一个排序：东岳大帝、西王母、玉皇大帝，据说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西王母是前者的妹妹，后者的妻子，而前者指谓东岳“泰山”。一个小小的泰山拥有如此广远的影响，真的很不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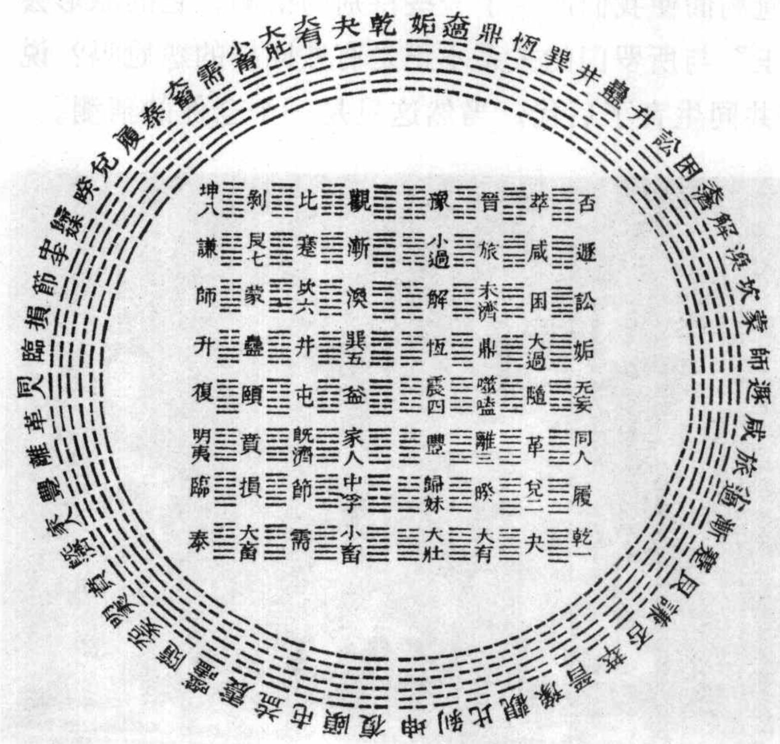
道教与“示巴女王”的主要联系嫌疑在于道教的星宿崇拜特点。比如，重要场合某些师公穿的法衣上面赫然为“28 星宿”。“7”崇拜也多见于道教。而萨巴王国的宗教特色本来就是星宿崇拜，后来他们接受了一神教。

南方瑶族的道教传统里有挂灯的习惯，“灯”象征天上的“星”，同时象征信奉者的级别。“挂灯”共分三个级别：3 灯（三台灯）、7 灯（七星灯）、12 灯（大罗十二盏灯）。注意这三个数字都是中东地区的神圣数字，我们在以后的分析中将可看到它们的神秘出处。

翻开任何一本有关道教的典籍，其中的“三崇拜”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甚至比“七崇拜”还要强烈。这个“三崇拜”到底来自哪里，现在找不到不要紧，要紧的是先要提出来。尽管我在上一本书《历史也疯狂》中已经对一般的“三崇拜”提出了看法，但是道教的“三崇拜”似乎还不在一个体系，因为道教明显具有天文含义，这个答案日后我们要去天上寻找。

另外，道教里面对“5”这个数字也很敏感。道教的发起人张道陵起“五斗米教”，道教发祥地青城山有“第五洞天”。《山海经》里还有“西王母，……是司天之历及五残”。这些频繁出现的数字本身应该有悠久神秘的历史。在神话传说或者宗教文本里，一般不会轻易放弃或改变数字、色彩以及一些罕见的特征，即便别扭也还会保留下来，“添加原则”强于“删削原则”。

除了追求长生不老，道教还特别重视所谓“房中术”，这是原始社会自然性意识的特别价值提炼。在一些隆重的盛典上，道士还会专门要求未婚的处女唱诗给神灵，说这样神灵才会喜欢接纳。这个程序不觉让人想起示巴女王的处女身份。



△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道教说穿了就是巫术大全。从“驱鬼捉邪”上面就很能看清楚这点。四川与湖北等长江中上游地段是中国地区内巫术最昌盛地区，真正的道教发源地就在这里。星象、巫祝与道教难分难解，它们都属于萨满教的范畴。但是道教从萨满教中分离出来自成一体。广东人称“喃呒佬”就是把道士当作巫者的结果。

“升天成仙”是道教的主题，它点明了道教与天庭（天空星辰）的天文联系。同时，以天星应人运、年命，这个理念在中国非常普遍，其根源就是来自于道教。

如基督教、佛教一样，道教里面也有“十诫”，这个是他们之间有一定因袭关系的直接证明。同时我们可以拿道教的与犹太教①、佛教的“十诫”②做个简单比较：

“一戒不得骂天骂地，二戒不得骂风骂雨，三戒不得骂父骂母，四戒不得骂师骂友，五戒不得隐经瞒教，六戒不得杀生害命，七戒不得贪花爱色，八戒不得凶怨凌人，九戒不得应贼害善，十戒不得举傅一己。”③

很奇特地在“道教”里面没有看到不得撒谎的诫条，而“不撒谎”这个条款是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信奉的。该条款的缺失对于中国文化可能有深远影响。假如真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那么关于中国人不忌讳撒谎可算找到了一处根源。

道教虽也有“十诫”之名，但较之佛教，道教距离犹太教的摩西“十诫”更远了一些。前面“四诫”其实合起来就是“一诫”：不能咒骂。我认为实际上这可能是对于犹太教“十诫”进行修改时的一种随便充填，因为“摩西十诫”中的前四诫都是在强调不能有其他崇拜，当然也包括了排斥萨满教，道教与犹太教完全冲突，所以道教的这前四诫除了宣扬自我主张外主要承担了“覆盖”的任务。

请特别注意道教对于“风神”的“不得骂”，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潜在的崇拜，也说明了一个特殊的文化联系。埃及有位“风神”，这个“风神”应该是位女神，并且她应该姓“马”(Maat)，同时她还是一位月神，另外她主裁判正义。这个判断让我们怀疑，西王母、妈祖、风神，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逐渐捏合为了一个人，有时候也被分离了，道

① 参见《向东》129—130页。
② 参见《向东》196—197页。
③ 徐祖祥，《论瑶族道教的教派及其特点》。

教继承了部分历史。

请注意伏羲也姓“风”或“凤”。

阿拉伯地区主要的神是月神而不是太阳神，这个可以从伊斯兰教方面得出这个结论，最突出的伊斯兰教标志就是月亮。

“自昆仑西王貘部族以九星订四季，开创原始农业生产，华夏先民已萌生宗教观念。五千年前早有五斗米巫，传说之西王母凤族，高居于龙（姬）虎（姜）部落之上。巫道仪轨亦显现于秦汉，周穆王、汉武帝崇尚仙道，与西山神女频繁往来，此为月母执天道之母系部族。昆仑独柱之原始巫道，与道家黄老稷下之学融合，乃有张陵道巫一气之天师道兴起。故东汉天师道之发生，实肇始于昆仑河源。[①]

以上这位研究道教的学者寥寥数语总结出了道教的许多历史渊源：道教与西王母的关系，其天文特色，凤族与龙、虎图腾，月神、巫术与昆仑。他道出了中国文化与“西方”的诸多文化与地理联系。

我曾经说过所谓凤凰就是红色的火烈鸟，这种鸟只产生于阿拉伯半岛南部与接近的非洲地区，都在红海沿岸。所以这里的“凤族”的“西王母”就被圈定在这个隐藏着的地理范围：萨巴王国。

东王父、西王母、羽人等是三个南方道教以及民间神话常见的神仙形象，考古中时有发现。这里的“羽人”可以理解为我们常说的“天使”，但与一般的“天使”又不同，它强调了“人”与“鸟”之间的转换，发展到道教的常用语“羽化”就是指人的“升天”。“羽化”与恒定的“天使”概念有所不同，“羽化”是道教里的一个理想，相当于升入天堂，这与希腊神话系统中的凡人被封神后成为天庭星座可能有一定关系，道教的“羽化”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宗教教义体现。我怀疑这一思想与佛教“飞天”也有关联。这些思想的统一和交流可能多是2000多年前通过波斯这一核心地理范围得到实现的，但也不排除有其他的来源。并且，作为远古文化的的一个理念，它也可能分化为其他的文化碎片。

◀ 青海地区唐代“羽人”瓦当。其实不难看出，中国所谓“羽人”基本上就是“天使”。

① 王家佑，《读<道教斋醮符咒仪式>有感》。

“牛郎织女”的传说

中国汉代是神怪故事大发展的时代，多数故事源在汉代。“牛郎织女”的传说也不例外。

表面上看“牛郎织女”与道教无关，但通过分析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神话与道教的某些理念相通，比如“羽化”，当然这个联系隐藏得很深，需要许多探究才能把两者联系起来。不过，“织女”作为道教人物“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的女儿，已经初步说明了一些问题。这个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应该与道教有神秘的渊源关系。

我记得童年时的神话故事都是从一个不识字的临家老奶奶那里听来的。她家有个葡萄架，我们常去她家听“瞎话”——这是豫西人对于“神话传说”的称谓，因为大家知道这些故事都不可能是真的，所以就以“瞎话”总括。但我们听的时候根本不会想这些真假问题，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听“瞎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业余的文化传播者存在，就是因为我这样喜欢听“瞎话”的人特别多，有需要就有“市场”。旧时代，没有电视，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脑与电话，甚至没有电灯，漆黑一片的夜晚人们有无污染的夜空，有皎洁的月光与星辰，漫漫长夜最使人高兴的就是周围有几个能说“瞎话”的老人了。在我们村里，不仅有老太太，而且有的老伯伯也很擅长说些老古事儿，挑水的井台是他们施展口才的最好演讲台。

一般神话传说因为口口相传，不稳定，一个故事会有不同的版本。“女郎织女”的传说由于流传很广，所以版本就更多了。

我听到的故事是这样的。七仙女经常下凡洗澡，不过有时辰要求，一旦时辰过了就不能升天，她们每次离开的时间很准时。一次，牛郎把七仙女的衣服给拿走了，似乎这衣服是特殊的七彩羽衣，没了它仙女就不能升天，耽搁了时辰七仙女不能回家就不得不和牛郎结婚了。王母娘娘与玉皇大帝听说后不允他俩的婚事，要把他们拆散，但这时小夫妻已经有了孩子。在牛郎追赶织女的路上，王母娘娘狠心地用簪子画了一条银河把夫妻俩永远隔开。喜鹊同情他们的遭遇，通知所有的同伴于每年七月初七搭鹊桥让夫妻俩会面。由于织女每次见到牛郎都会伤心哭泣，所以每年这天都要下雨，雨水就是七仙女的泪水。也真的很奇怪，几乎每个七夕都会下雨，看来古人已经找准了这个节气，真是结合得天衣无缝。这样的神话真美，而且蕴涵着古人的智慧。

我最初到网络上查找“七夕”的故事，没准备要有什么大发现。本来以为这个故事可能是中国自己的土产，它不一定是“西来”的，但最后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里有个细节或许可以说明“七夕”确实也有“本土化”部分。中国的神话多在汉朝开始生枝发芽，而汉武帝是汉朝最伟大的皇帝，他的生日据说就是阴历七月初七，另外他母亲也是王氏——不知道这与织女的母亲是“王母娘娘”是否有一定关联。口传神话，自然是什么都可以根据需要附会进去的，关键是原有的主要特征却不能过分削减。

牛郎董永就是后来附会进去的。孝子董永是汉朝人，他的出现不能决定这个牛郎织女的传说的初现时间，但可作为最晚出现时间考察。有关董永的故乡有江苏丹阳说、河

南南阳说，还有湖北孝感说。我注意到这几个地方都在南方，主要在长江流域。

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有《毛衣女》，与织女的传说有关，很可能是其雏形。《搜神记·毛衣女》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农夫在田野里看见七个女子，都穿着羽衣。他不知道她们是鸟变的。他悄悄爬过去，拿过其中一个女子脱下来的羽衣，藏了起来。这七个鸟人，在田野里玩够了，都先后飞走，只有丢失了羽衣的鸟人留了下来。这个农夫娶了鸟人做妻子。鸟人先后生下了3个女儿。几年后鸟人向大女儿询问羽衣的下落，被告知羽毛衣藏在稻谷堆下。于是，鸟人就找来羽衣，穿上它头也不回地飞走了。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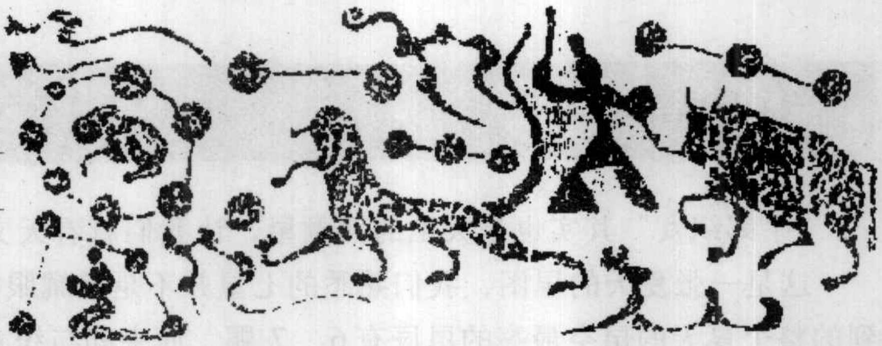
以下是我从网络摘取的另外几个“牛郎织女”的神话片段，雷同的多删除，主要为看差别：

天上的织女和诸仙女一起下凡游戏，在河里洗澡。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认识了织女，二人互生情意。后来织女便偷偷下凡，来到人间，做了牛郎的妻。织女还把从天上带来的天蚕分给大家，并教大家养蚕、抽丝②，织出又光又亮的绸缎。

牛郎和织女结婚后，男耕女织，情深意重，他们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家人生活幸福。这事很快便被天帝知道，王母娘娘亲自下凡强行把织女带回上天。

牛郎上天无路。老牛告诉牛郎，在它死后，可以用它的皮做成鞋，穿着就可以上天。牛郎按照老牛的话做了，拉着自己的儿女，一起腾云驾雾上天去追织女。就要追到时，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一挥，一道波涛汹涌的天河出现了，牛郎和织女被隔在两岸。

还有一个版本：织女是玉皇大帝的女儿，她刺绣出来的衣服就像彩虹一样美丽，深受玉皇大帝的喜爱；牛郎是个在天庭放牛的小伙子。织女和牛郎在天庭上谈恋爱，有情人终成眷属，玉皇大帝还举办了盛大的宴会以庆祝。然而这对男女结婚以后，变得懒散起来，织女不织衣，玉帝没衣穿，牛郎也不放牛了。玉帝气坏了，一怒之下就命令平时两人各在银河两边工作，每年农历七月七日夫妻才可以见面。③



汉砖画 牛郎织女

归结以上的主要元素为：帝王与王后、公主、天上人间、羽衣、鸟、爱情与别离的哀伤、生育、纺织、牛、牛郎、“7”与“3”的数字、河水、洗澡、追赶、盛典、狠毒的母亲、仙女、人仙转变、飞行。记住这些特点，后面我们会一再地与这些“符号”碰面。

① http://www.cnpoet.com/changshi/shenhua/039.htm

② 这个传说的线索很可能暗示了我们蚕丝的生产起源在红海，否则为什么叫“天蚕”。容待以后进一步分析，此处只是一个仓促猜想。并且，我认为桑蚕的养殖历史并不等于丝绸生产的历史，两者要分开对待。

③ http://www.forchildren.cn/chinese/info/2774.html

有关“毛衣女”的传说可能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神话。在汉族、纳西族、苗族、傣族中都有流传。日本、朝鲜也有相类似神话。

七夕期间中国民间有“乞巧”的习俗，故“七夕”又称“乞巧节”。小孩子会被告知在葡萄架下可以听到牛郎织女的悄悄话，我小时候真的就常期盼着那天在葡萄架下听到牛郎与织女的什么奇谈。

“七夕”的节日在战国时期可能就已经有了，据《物原》记载：楚怀王初置七夕。关于具体的情节，《荆楚岁时记》说，南北朝时的乞巧方法是“结彩缕穿七孔针”，妇女们来回用丝线穿针，穿得快的就“巧”了。明清以后流行“丢巧针”游戏。七月七日的上午，取一碗水在日光下曝晒，水面会产生一层薄膜，把缝衣针投入碗中，若针浮在水面上，便是“得巧”了。

还有一种活动是预言式的：找7位姑娘聚在一起成立一个“乞巧”小组，取苎麻①织成7尺布幅，各剪一尺以遮目观牛、女双星，然后据所见景象预知未来姻缘。

因为参与“乞巧”活动的多为闺阁少女，因此又叫“女儿节”。是日妇女多在庭院聚会，穿新衣、拜双星（即牛郎星和织女星）、摆香案、供果品，穿针引线，进行各项乞巧活动，十分热闹。

织女除了管理妇女纺织外，还是主宰瓜果生长的女神。《晋书》《天文志》里说：“织女，天女也，主司瓜果、丝帛、珍宝”。在七夕食品中有新鲜水果和“五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等干果。河南新乡一带则流行以葡萄、石榴、西瓜和桃等七样瓜果②，烙七张油烙饼或糖烙饼，包七碗小饺子，做七碗面条汤供奉织女，以祈求“织女送巧”的愿望得到实现。

如此多的“七”，“七崇拜”的痕迹展现无遗。这是否在说明这个故事有更加古老的根源呢？因为中国人在先秦或新石器时代才兴盛“七崇拜”。

星空传奇

“牛郎织女”其实也是天上的两颗星，让我们看看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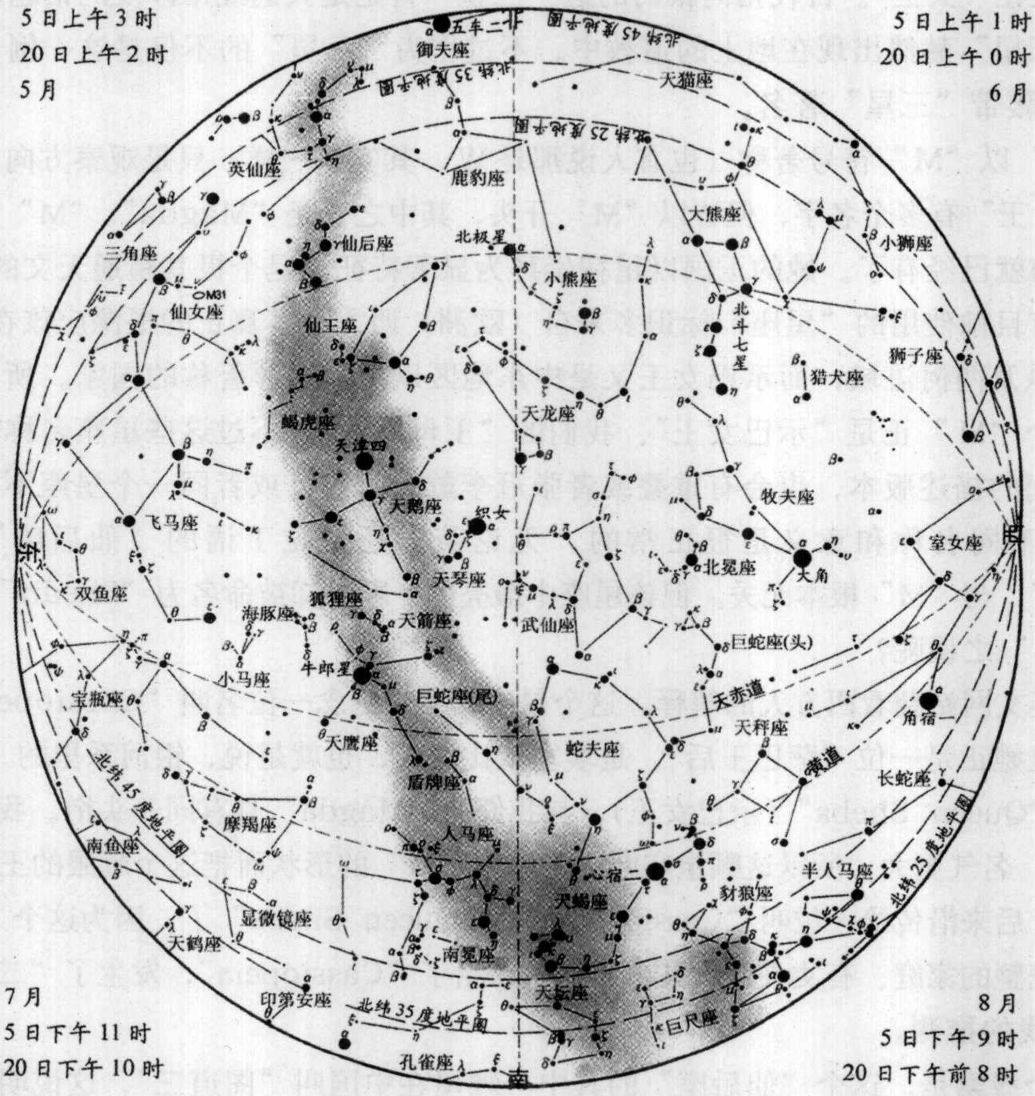
这是一张夏天的星图，我们熟悉的七星并不是最耀眼的，因为他们不够大。这里看到的整个夏天的星空最亮的星辰有6、7颗，而牛郎与织女星就在其中。

每当夏季来临，头顶上最能吸引我们的实际上是一个著名的天文现象：“夏季大三角”。这个“三角”是由跨越银河的三颗恒星组成的，它们是：牛郎（Altair）、织女（Vega）与“天津四（Deneb）”。这三颗星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星座，织女属于“天琴座”（Lyra），牛郎（中国称其为“河鼓二”）属于“天鹰座”（Aquila），而“天津四”则属于“天鹅座”

---

① 苎麻（Boehmerio nevia），荨麻科，多年生草本；色白，因借指白色。白叶种苎麻久经栽培，产量较大，茎部有光泽，耐霉，不皱缩，易染色，可供纺织、渔网编织以及造纸。可入药，主治热病。绿叶苎麻主要产地在热带，如云南、海南。

② 这些水果都是典型的“西方”食品。



△ 夏天的星空图

(Cygnus)。“织女星”是全天第5亮星，牛郎星是第12亮星，而“天津四”为全天第19亮星。但在夏季的天空它们三颗就显得非常突出，亮度名次在这个季节里肯定大大提前，因为全天星辰有几千颗。

在牛郎星和织女星之间的银河上，可以看见一个很大的“十”字形的星座，这是天鹅座。中国民间传说它是搭桥的喜鹊。天鹅座东北端的那颗白色亮星是天鹅座的α星(天津四)。[①]

视线不要离开银河，在银河北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仙后座”(或“天后座”)。在“仙后座”与“天鹅座”之间稍偏一点的地方就是“仙王座”。

我认为“牛郎织女”的故事实际上来自“天上”，并且这个故事可能是全球性的。由于“天鹅”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在故事经常能读到与“鸟”有关或者“羽化”的传奇。

这个著名的“夏季大三角”可以让我们对于特别注重星宿的道教“3崇拜”有了一个充分的警觉。这一联系是建立在道教与“西王母”的联系之上的。西王母在中国的神

① http://skyo.lamost.org/observe/summer.htm

话里一直就住在“天上”。古代指向银河的这“三星”肯定是人们经常涉及的话题，所以也会作为“三星”赫然出现在地上的道教中。不过作为“三星”的不仅是这一例，比如“猎户”也以腰带“三星”著名。

“仙后座”以“M”符号著称（也有人说那是W，其实都一样，只是观察方向不同而已)。“示巴女王”有多个名字，但皆以“M”开头，其中之一是“Magda”。“M”符号至少3500年前就已经有了。她的王国以星宿崇拜为显著特征，是个极其精通天文的国度。一般认为所有目前使用的“星座”标识多来自（欧洲）西方，其真正的根源应该在中东，在红海流域以及两河流域，而示巴女王又是中东地区以星宿崇拜著称的国家。所以非常大的可能这个“M”正是“示巴女王”、我们的“王母娘娘”。不过这些星座名称的来源往往会有不同的描述版本，也会有重叠或者张冠李戴的时候，或者同一个星座不同地区的人们赋予不同名称和意义是很正常的。无论英语还是拉丁语的“仙后座”都是“Cassiopeia”，与“M”根本无关。但该星座中最亮的一颗星却被命名为“Shedir”，会不会是“b”“d”之误呢？

到一个英文网站翻看西方人的解释，这个星座确实是纪念一位名叫“Cassiopeia”的王后的，并且她正是一位“萨巴王后”，是埃塞俄比亚人，也就是说，银河系里的“仙后”确实可以叫“Queen Sheba”（示巴女王），与我们的“Magda”具有同一头衔。我怀疑由于“Magda”名气更大，所以这颗星实际上是因为“M”的形状而把这个耀眼的王冠给了“示巴女王”，后来沿传给一位叫“Cassiopeia”的“Queen Sheba”了。因为这个“天上”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丈夫与女儿，所以就让给了“Cassiopeia”，发生了“二合一”。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

另外一个线索是，这个“仙后座”的其中一颗星在中国叫“阁道三”，这说明天上的繁星中还有“阁道一”与“阁道二”，而这个“阁道”实际上有可能是“示巴女王”(Magda)的部分音译，比如“g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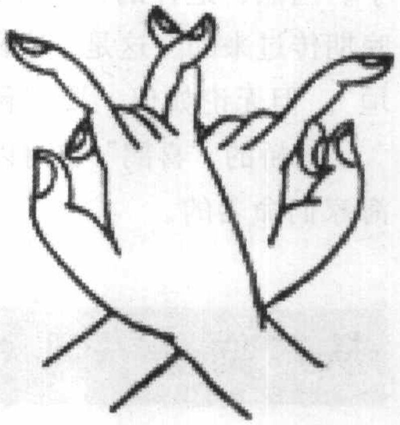
至于中国神话里王母娘娘“3千年一结果”的神奇“蟠桃”不是别的，它有可能代表了天上经久不变的恒星；“3千年”这个频繁出现而得以强调的数字恰好是天空上我们肉眼可见并且已经命名的星辰的数字：3000！还有，在庄子的《逍遥游》里有“水击3000里”，在祆教里有“3000年”的分区，这一系列的统一数字我认为不是偶然而得，“3000”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天上的星辰！也就是说，无论身处何方，在最近的几千年里，全球共同拥有了一个以3000颗星辰为主的一个知识体系，他们将这一神圣而不可知的体系数目运用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之内：文学的、宗教的，以及神话传说的。

“仙王座”在天上也没有“仙后座”那样耀眼，故事的主角本来就是“天后”嘛。“仙王座”的英语是“Cepheus”，拉丁语拼写同样。“Cepheus”是希腊神，但这个“克普斯”却同时是埃塞俄比亚国王！这个词源关系首先说明了红海南段与地中海沿岸希腊文明的紧密联系，说明了这些天文命名很可能与“萨巴”文化有关，并且主要与海上文明有关。据说这颗星是在大约2300年前由一位占星术士命名的。需要注意的是这时“萨巴王国”还存在，除了红海附近地区，全球占星术也很流行。西方神话里说，这颗明星是埃塞俄比亚国王Cepheus王杖上的一颗明珠，当然这是一种象征，而他的妻子就是虚荣的Cas-

siopeia 王后。由于这个埃塞俄比亚王国就是萨巴王国，所以Cassiopeia 也可以称为“示巴王后”。我们现在已经很肯定地说，这个天上的王室星座确实与“萨巴”有关。

上面这对萨巴国王和王后有一位名字叫“Andromeda” （安德洛墨达）的美丽女儿，它就是“仙后”旁边的“仙女座”，不用说她的护照也是“萨巴”国籍。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人原来在古代声名显赫，竟然占据了天上最荣耀的统治性皇室地位。原因可能很简单，因为“天上”本来就是他们萨巴人的地盘，这与他们的商业习惯分不开，他们常常需要远航，天文自然就发达。星空是他们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工具，这个“高科技”大概如今天美国的洲际导弹，看似与吃饭穿衣无关，其实天上飞的与地下走的密切相关。当时最频繁使用星宿知识的人们，一个是红海南段的萨巴王国，另外一个就是地中海一带的人们。一个时代有一个地区的兴衰。从这个角度我们真该说：地理决定了文明形态。在今天这个电子时代，怎么都想不到几千年前“两海”的文明发达。他们当然也想不到今天的发达文明集中在偏远的北美洲与曾经一片沼泽的西欧。

Cassiopeia 是位虚荣的女人，她吹牛说女儿是天下最美丽的女人。这个言论冒犯了另外一位美丽的海神涅柔斯的女儿们（即希腊神话中的海洋女仙），她要派一个海怪来吞噬毁灭埃塞俄比亚整个王国，惟一可以解救他们的方法是献出公主安德洛墨达给海怪吃掉。无奈之下王后就把女儿捆起来放在海边，然后让上苍决定公主的命运，这个可怜的公主看起来比“灰姑娘”的命还要苦。碰巧刚刚杀了美杜莎的宙斯之子珀尔修斯（Perseus）路过这里，这位王子一下就爱上了貌若天仙的公主。他救下了美丽的心上人，从此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的生活。只是从此Cassiopeia 成为虚荣和狠心的代名词。珀尔修斯与公主结婚之前还经过了另外一场战斗，因为公主先前已经许配给国王的弟弟菲纽斯，那场战斗以珀尔修斯举起美杜莎的头把所有的敌人变为石像为胜利的结局。



△ 佛教中的降三世（大印）。远至美洲印第安都有类似的“手势”符咒“印”。

“仙女座”的形象是一个仙女被锁链捆绑的形象，但是阿拉伯地区却把这组星座看做一方“印”，换句话说萨巴人把这个星座看作是一个“符咒”。这个从“印”到“符咒”的转换让我想起来明显让人迷惑的一些佛教手势，它们既被称呼为“印”但其实又是一种“符咒”。我认为一些不同区域的语言差异不自觉地进入到我们后来的生活中，没有人知道它们为什么如此。经过漫长的时空演变，太多的文明碎片堆积与重组扰乱了我们的视线。

“牛郎星”所在的星座一直被全球以“鹰”来命名，英文里就是最常见的“the Eagle”，这个女婿是“外人”，没有萨巴护照，并且是个老女婿。据说在3200年前的幼发拉底河的石刻上已经出现过这个星名。它周围有三个小亮星。它的命名比上面的萨巴王室提前了近一千年，那时连“Magda”女王也还没有出生呢。它周围的“三个小亮星”应该是中国“牛郎织女”故事里的“三个孩子”的起源。

织女星所在的“天琴座”一般认为与希腊神话有关，是阿波罗神或者墨丘利神赠送

给俄耳甫斯的一把具有魔力的竖琴。

我认为中国人“牛郎织女”神话把西方命名的星座给张冠李戴了——这是民间传说的“自由”特色，不过只有这样配合后银河才更有特别的意味。并且正是这个“张冠李戴”才把“大三角”以及“十”字架等重要的星辰给特别提了出来，只是把皇室里真正的“仙女”给冷落了。给我讲故事的老太太并无星座知识，她是个文盲，但是她会给我指出银河在哪里，这大概就是发生误差的必然吧，他们太自由，无意中编造了许多情节。但是作为相对专业的星象人员，比如道士，还是会注意那些天空中具有特别意义的星宿，并在他们的故事里保持一定的“专业性”。我想是这样，所以在不同的版本里我们会看到一些差别，有的对应了星辰的数目或特征，而另外的却已经南辕北辙。

“天津四”所在的星座“天鹅座”（Cygnus）有个希腊神话故事。据说“Cygnus”是一位王子，他因为朋友的死而哀伤欲绝，阿波罗受到感动而把他变为“天鹅”放入天庭，获得永生。神将凡人转变为鸟而放入不死的群体，这个程序我们中国道教有一个专业术语，这就是“羽化”。

南方道教里的“3”、“7”、“12”、“挂灯”对应会不会是“天庭”里的常用数字？“3”就是“大三角”，7是“七星”或“十”字星（因为“十”就是“7”），“12”则是“黄道12宫①”（或占卜运程的“12星座”？）。“28星宿”直接就印在道袍上自然就不用解释了。当然，这样的判断并不严密，而且有很大的漏洞，比如“黄道”一般认为是从希腊晚期传过来的。这是个有部分根据的猜想。而数字“3”也可能对应的是唐代出现的“三垣”。但无论如何，要解释这些现象必须要做出一些假设，最终来看哪个是最合理的。

搭桥的“喜鹊”也可以是“天燕座”（Apus）。正统的说法认为这个名字是16世纪航海家们命名的。

从“狗皇”到“盘古”、“伏羲”

“Canis Major”是“猎户（星）”的“大犬”，它是个单独的星座，“大犬星座”。这个星座中的“天狼星”是全天第一亮星。它的光芒是太阳的20倍，距离地球只有8.6光年。

在某些道观里供奉的第一大神叫“盘古”，然后才是“帝星”与“后星”。许多南方人的祖宗庙宇里也供奉“盘古”，与“盘瓠”或“盘王”是同一人，如畲族、壮族、苗族、瑶族等认为“盘王”是他们的祖先。“盘王”狗头人身，又谓“狗皇”。

---

①《回教、袄教以及其他天使介绍》（佚名）。

十二宫的天使分别为：

白羊宫（Aries）？马拉锡第尔（Malahidiel）。
金牛宫（Taurus）？阿斯莫杜（Asmodel）。
双子宫（Cemin）？昂比勒（Ambiel）。
巨蟹宫（Cancer）？马奴尔（Manuel）。
狮子宫（Leo）？擘丘（Verchiel）。
处女宫（Virgo）？哈玛流（Hamaliel）。
天秤宫（Libra）？乌列（Zuriel）。
天蝎宫（Scorpio）？巴比勒（Barachiel）。
人马宫（Sagittarius）？亚德南丘（Adnachiel）。
摩羯宫（Caprico）？亚纳尔（Haniel）。
水瓶宫（Aquarious）？加百列（Cambiel）。
双鱼宫（Pisces）？拜丘（Barchiel）。

这个传说至少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许多人研究盘王现象，至今没有揭开盘古起源的秘密。假如没有"文明同源说"这个秘密将永远无法揭示。结合宗教、神话与天文，确切地说"狗"尾巴已经被我牢牢抓住。我相信，解开"盘古"之谜也是揭开"道教"起源之谜，解开中华文明起源的一把钥匙。

△ 一盏伊斯兰风格的油灯

神话传说里"盘瓠"是个半犬半人的形象，这是公认的事实，南方少数民族有歌谣《狗皇歌》唱的就是"盘王"。我认为南方道观里的"盘王"对应的正是这个全天第一大星："大犬星座"里的"天狼星"。为什么道教对于这颗星情有独钟，原因它是除了日、月之外天上最亮的一颗星。换句话说，中国道教隐含着的天体崇拜对象不是日、月，而是日月之外的第一亮星。古代产生的宗教几乎每个流派都会把某个天体作为崇拜对象，比如犹太教是太阳，伊斯兰教是月亮，而道教却独树一帜是"金狼星"。

中国的"狗皇"盘古与"天狼星"所在的"大犬星座"有关。中国文化系统的"狗皇"与西方体系中的"大犬星座"有关，这本身将证明中西方文明的部分"同源"关系。他们在何时同源、以及如何走向同源，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天狼星"的名字叫"Sirius"，它属于"大犬"（Canis Major）星座之内。天空中还有一个星座叫"小犬"（Canis Minor ）。"日食"中国人通常将其描述为"天狗吃太阳"，很可能就与这些"犬"星座的古老传说有关，那么多凶狠的食肉动物为什么独独挑选了"狗"做象征，因为它在天上最突出。很可能又因为"狗"连"日""月"也能吃掉，所以"狗"是最有威力的，所以崇拜"狗"是个正确的选择。但这个前提是，中国人很早就知道"犬"星座的存在。这个时间可以推断为，在道教确立之前这些星座的潜在秘密就有人知道，也就是说，最起码两千年前中国人，准确地说是有一些中国人，已经了解了西方的星座体系与名称。但到底星座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多早，恐怕还是一笔糊涂账，但并非完全无迹可寻。上海交大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较为保守的结论"[①]为："古代中国天学起源甚早，它在较晚时期（例如战国时期）才从西方传入的可能性可以排除。"这就是说起码在春秋之前。

"天狼星"在英语中叫"Dog Star Soths"。它的拉丁语 "Srius"源自希腊语 "Seirios"。"seirios"的意思是"燃烧"，意义延伸到"火"。在这个嫌疑对象里我们要及时添加上一个元素："拜火教"，也就是祆教，它起源于希腊与中国之间的古波斯，时间在大约2600年前。

这颗"天狼星"对于红海西岸的埃及人也特别重要。一些庙宇里会专门敬奉"天狼星"，比如建立在Denderah的"伊西斯神庙"。据说每天"天狼星"的起落征兆都会预示尼罗河的涨落，而尼罗河是埃及人的命脉。中国的道教同样把"天狼星"（盘王）放在首

① 《自然辩证法通讯》14卷2期（1992），《中国天学之起源：西来还是自生？》。

位敬拜。假如我们说“王母娘娘”给我们指明了道教与“萨巴”的联系，那么这个“天狼星”所提示给我们的则不仅仅是古埃及文明在中国传播的痕迹，其中所涉之复杂远远超出我的想像。

中国有个俗语“三伏天”①，这也不是个纯粹的中国土生土长的概念，它与“天狗”有着类似的起源。中国的“三伏天”在国外叫“狗天”，英语表述为“dog days”。看来这是一个自古以来的全球概念。

中国的“伏”有“狗”的含义：一半人、一半犬。“伏”就是半人半狗的“狗皇”盘古。同时我认为“天狼”就是“狗”。“天狗”以某种还不清楚的天文逻辑导致了夏天的热，故而在西人的语言体系中同样有“三伏天”（dog days）。这个传说的体系开始得非常早，传播的根源既不在中国也不在英国，初步判断起源仍然在中东或者附近地区。

以上的这个分析，可能暗示了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个重要秘密：“盘古”这个“天狗”就是“伏羲”。“伏”就是“狗”。这个开天劈地的神仙，在南方叫“盘古”，在北方叫“伏羲”。这个差异的原因很复杂，但与道教在中国南北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地域差别极有关系。从后面的研究看，简单地说，民风淳朴的南方人使用了“盘古”的音译，改动不大，其原形是个大名鼎鼎的举世闻名的人物，否则他就不会影响如此大了。而“伏羲”则采取了意译，文字选取了“象形”的“伏”字来体现最初的含义②。请注意“伏羲”文化的发祥地在甘肃，它与四川道教发源地（青城山一带）基本等距于西藏昌都地区几百公里，那里的苯教文化很昌盛。这之间的关联不能小觑。

与“盘古”不同的是，“伏羲”在北方成为人首龙身，脱离了“狗”形。但两者依然保持着众多联系，并且通过道教传递了这一信息。伏羲文化所在的甘肃天水一带是中国北方道教的发祥地，那里附着的其他文化符号有“鹤”，比如有“来鹤亭”等。“伏羲”的“开天明道”不过是“盘古开天地”的另外一个版本。它们两者间有明显的差异也不必“友邦惊诧”，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中国南北方语言的差异相互听起来几乎像外语一般，所以经过几千年的分化严重到南辕北辙也是可以想像的。

由于北方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伏羲”这一符号在北方得到了更大幅度的“文明化”和本土化发展，最终使“伏羲”这一形象进入道教并出于道教，成为北方的祖

① 三伏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三伏天时段长短不完全一样，有30天，也有40天。三伏的具体日期是由节气的日期和干支纪日的日期相配合来定。中国传统的推算方法规定，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第四个庚日分别为初伏（头伏）和中伏（二伏）的开始日期，立秋以后的第一个庚日为末伏（三伏）的第一天。

② 我在进行有关盘古与伏羲为同一人的研究后，读吴天明著《中国神话研究》（62页），得知已经有一位学者常任霞得出过这个结论，不过他的推论过程与我的不同：“伏羲一名，古无定书，或作伏戏、庖牺……，同声俱可相假。伏羲与盘瓠为双声。伏羲、庖牺、盘古、盘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两者神话，盖同出于一源也。”另外，据说闻一多先生也曾经撰文指出，盘古就是伏羲。最近查资料得知，这已经是个定论，我由于是学界外人竟然对这一切都不知晓。不过，我误打误撞竟然寻找到了盘古之“犬”与伏羲的相通之处，也算是给这一结论一个更加充实的证据。同时，我的这一研究与已经成定论的猜想重合给我的研究更加坚定的信心，我认为我的方法应该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何况我正是想通过“盘古”与“伏羲”来推论其他更多的猜想。

先神。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盘古身上，“伏羲”太洋气了，“使用”起来还原的工作量太大，不方便。简单了解“伏羲”的一些特点就可以了。

“伏羲”的文化传说主要也在汉晋时期兴起，“伏羲”居“三皇”之首。这些看来都与盘古传说大同小异。

一般认为“伏羲”是这样出生的：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在雷泽中无意中看到一个特大的脚印，华胥氏用她的足迹丈量了巨人的足迹，感应受孕。怀胎12年后，伏羲降生。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这里再一次透露出与“风神”的可能关系。

东晋王嘉《拾遗记》：“春皇者，庖 牺 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牺 。”

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太暭 包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注意“蛇”身开始出现。

记住上面的“处女感应受孕”以及“巨人”、“十二”、“半人半兽”、“凤鸟”等文化符号，这些我们都会在后面寻找到他们的出处。也注意神话传说一代比一代有新发展，新材料添加使原本的简短故事看起来越来越“文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注重早期原始形象的原因，最初的形象距离它们的根源最接近，后来的故事化会让人眼花缭乱。

归结起来“伏羲”的功劳主要有这些：尝百药，制九针，创立医学；立占筮之法，创立占卜学；立九部，设六佐，分部管理部族事务。仔细看与盘古还是差别不大。注意其中的“6”、“9”以及占卜的萨满教特点。尤其不要忘记，最初“伏羲”叫“庖 ”，后来为“包牺”，最后为“伏羲”，暗示了这是一个外来语翻译的不确定性。在什么时候改为“伏羲”是比较关键的，为什么要改，其中包含着许多玄机。翻看“伏”这个字，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变化，一直就是“从人从犬”。假如还是不好接受从“盘”之“狗皇”到“伏”的变化，那么到从“伏羲”之“庖”（Pao）到“盘”（Pan）就比较好理解了，这说明它们的根源是一个发音为“P”的人或神仙。

假如有人拿出关于“伏羲”“最早”的文献记录，要细心鉴别原著的确切时间，考证一本记载“伏羲”的著作年代可能本身就成一门学问，比如《周易》。

对于中国“盘古”，我们在天上可以找到有关他的神话传说的所有人物：国王、王后、公主，还有他自己这只“天狗”，其他的物品也全部能在天上找到。包括中国人的“凤凰”天上星座都有——我说过其实“凤凰”与“龙”都不是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早在几千年前就出现于中东。但是中国人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实，。

现在我们去找找盘王故事里最主要的其他两个角色，一个是把“盘王”给罩起来的“钟”，另外一个是“伏羲”之“龙”。这可以验证中国的神话故事是否与西方的星座故事有关。

我们找到了：“龙星座”，“Draco the Dragon”；“钟星座”，“The Pendulum Clock”。甚至天上还有中国神话中常见的动物“狐狸”（Vulpecula the fox），当然也有与“牛郎”有关的“牛星”（Taurus the Bull）。只要道教神话里有的，天上基本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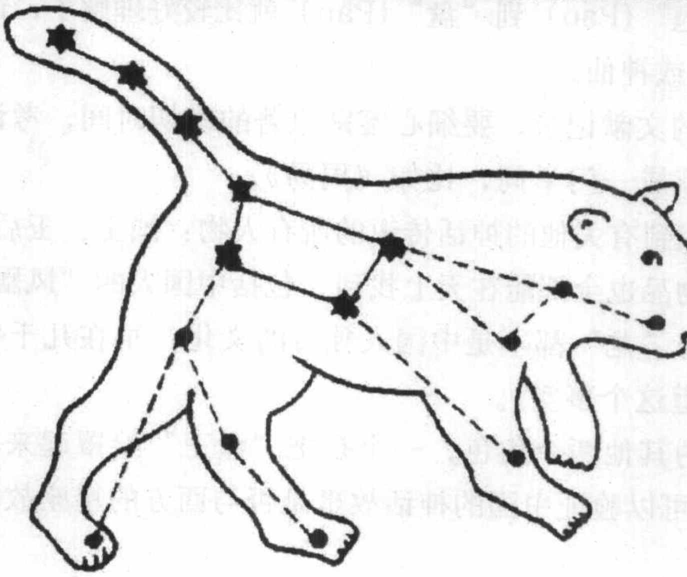
这里的“龙星”与“天狼星”和“盘古”之间的关系，或许还连带印证了“伏羲”与

"龙"之间的特殊关系，看谁选取哪一部分了。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政客多、文化人多，文明人大概认为"狗皇"不好听，所以就选取了"龙"图腾，这大概就是"伏羲"与"蛇"(小龙)与"龙"之间的一个渊源。最终"伏羲"从蛇身人首演变为"龙"身人首的，"狗"的老故事就彻底不讲了。还是南方人朴素老实，至今都在真诚颂扬原原本本的"狗皇"。北方人歧视猪、狗，仅一句骂人俗语"狗娘养的"也让"狗皇"进不了文明祠堂。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确实有着明显的差别，暂且不说强弱与文明愚顽，政治中心多在黄河流域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个特点会导致许多南北文化的差异。

不过，"狗"转化为"龙"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很可能在春秋时期中国人部分接受了波斯袄教尊崇"狗"的习俗①。比如在老子的时代"狗"就是受到崇拜的。袄教把狗当成"天狗"，在袄教影响的地区实行"天葬"就是让"天狗"吃掉死者，还有一种方法是让天鹰吃掉死者。后来袄教的式微又让中国人难堪于"狗"的存在，但经过几百年传播"狗皇"地位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甚至转为祖先神，总不好把祖先说扔就扔，所以只好将其巧妙地"伏"了下来。

"伏羲"与"盘古"的传说归一，说明了中华民族有共同的文明渊源，不管这个根源在哪里，它们都在东亚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新文化。尽管中国南北文化有差异，但它们确实应该看作一体的新文明。我认为中华文明有多长，"伏羲"与"盘古"的传说就有多长。一个仓促的看法是，这个传说的根源应该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他们可能超出了袄教的存在。但"伏羲"与"盘古"作为文化符号频繁出现却应该是在汉朝前后，这个传说的发展借了道教的东风。

图腾、"大熊星座"与"七星"



中国上古神话以及祖先传说里那么多的"熊"部落、"龙"部落、以及"凤"部落、还有"马"部落，有没有可能是对于天上某个星座的认同或崇拜？简单地说，这些图腾可能直接来自天上。假如真的如此，那么"熊"部落的人起码应该有"七星"崇拜。

"七星"崇拜是道教的主要标志，道教在中国的影响之大，说明中国的"熊"部落应该是个曾经很有势力的大部落。或者加上道教的影响，后世

① 可能看到这里有人又出来跟我讲常识，说正统历史讲袄教进入中国是很久以后的事，我不正在全面质疑历史嘛，只要是逻辑上行得通都可以试错推翻。比如这里，老子生存的时代袄教已经在波斯产生就合乎可以传播到中国的逻辑，假如袄教产生于老子之后就可以确切地推翻我的推测。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自己的先祖纳入“熊”部落也是一种可能。因为“熊”可能有神话色彩，后来转化为一种“仙”气，所以很神圣。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人以“熊”为美了，反而以“熊”为丑笨，而崇拜起“龙”、“凤”来。

除了道教之外，自古大有敬拜星宿的，全球同此。比如在北京的天坛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殿里供奉着“七星”、“日”、“月”等牌位。据说天坛是明朝时期学者们精心研究了先秦的礼仪而重新建立的，应该与道教没有关系。就“七星”、“日”、“月”等牌位问题，联系到古代的“图腾”崇拜，我认为所谓的“图腾”基本上相当于敬奉“牌位”。比如这里的“七星”、“日”、“月”就是图腾的一种。从语言方面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35年译本）一书里说：“在阿吉布洼部族中，往往发音为dodain的图腾一词，是表现氏族这象征或徽章的。[①]”“dodain”很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倒头”（或“刀头”，念daotou）为同源词汇。回忆童年时代在河南传统社会里“倒头”或“刀头”一词都与祭祀场所有关，并且是对祖先前辈的祭祀。最典型的是在死者牌位或照片前所放的牺牲（最常见的是大肉）被称呼为“倒头肉”。这个“倒头肉”的意思分开来讲可能有两个意思：“放在倒头前的肉”或“放在牌位前的供奉品”。有人直接解释“倒头”的意思就是“死者”，这并非不可，但是将其解释为“敬奉的祖先牌位”更无不可。从这里更能看出来，“敬奉的祖先牌位”（“刀头”或“倒头”）极有可能就是“dodain”（图腾）一词。

假如以上逻辑成立，那么某些“龙”、“凤”或者“熊”、“马”的图腾部落，实际上不过是敬奉过这些动物而已，甚至只是敬奉过这些动物所代表的星座而已，想必他们常常在祭祀场所把这些动物标为牌位敬奉，如北京的天坛所做的那样。比如“熊”部落很可能只是敬奉了含有七星的“大熊星座”。

“大熊星座”（Ursa Major）是天空中第三大星座。此星座中有国人十分熟悉的“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只是“大熊星座”之中的自然星群，不是一个单独的星座，它构成了“大熊”的尾巴与臀部。这个星座在北纬40度左右全年都可以看见，其他地区则没有这样幸运，所以“七星”文化只能流行于北半球。比如北美洲的印第安文化中有很多的熊神话，而南美却不多见，可能与这个天文现象直接有关。“熊”只在北方。

“七星”由于它的斗柄“指向”功能，一直深受古人青睐，尤其是那些到处奔走四处流动的商人。假如穿越大海或者翻越高山荒漠，它简直就是天上的“罗盘”，对于迷路的人们它是真正的“救星”。“七星”指向功能是通过分辨四季之后来达到的：“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也就是说只要你看到“七星”，通过斗柄方向就能判断季节，然后接着判断方向。它们的调校还可以通过每天从东方升起的太阳来得到确认。这样，即便鲁滨孙在荒岛也不会迷失方向，并且还可以知道四季与大致的年月。“七星”是挂在北方天空的挂历。

有关“北斗七星”的名字，一个英文网站的编辑是这样说的：“We know them as the Big Dipp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y are known as the Plough”。这说明除

① 参考自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118页。

了英国人称呼它为“耕犁”之外全球大多数人称呼是一致的，包括中国人。“Dipper”，表示“容器”，并且强调与水有关的“浸”的含义。中国人称呼它为“斗”或者“勺”，这里隐藏着一个不能轻易看到的秘密：中国古代人与西方人的称呼是一样的！“勺”就是舀水的容器。这就是说，“北斗星”的称呼很可能不是中国的自产，而是来自国外，或者说在古代全球是“同源”（除了英国）。中国对其命名“勺”的称呼取了意译；中国的“斗”取了音译。“斗”（Dou）很可能就来自“Dipper”的第一个音节“di”，当然这还要考虑到许多变迁是个大概。许多人指责我使用英语与中国语音的对应，说这样不严谨，按照他们的逻辑，不说不做大概是最“严谨”的了。我觉得这样的人多半根本不了解我们面对的完全是一门非常学科：史前史。

同时，“北斗”这个称呼暗示了古代的中国人已经有南北半球的概念，否则何来“北”呢？暗示了这群命名的人知道在南半球看不到“七星”。进而这个推测说明了这个群体的人是去过南半球的，有南半球的概念。我们有可能真的大大低估了古人的能力和活动范围，这个错误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对于“西来说”的错误反对，因为中国人认为那是不可能的，而这个“不可能”主要就指地理上的遥远。

文献学可以在我们的探索中发挥许多作用，其中之一就是需要查清“北斗”第一次出现在哪里。

“北斗”对北方人是指路明星，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功能，“斗”这个古字甚至主框架取了“十”字，以表示在春夏秋冬“斗柄”所对应的四方？同时这个“星斗”的词汇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北斗星”的极其崇拜，因为它替代了所有的“星辰”而成为一个集体的代名词，因而有了“星转斗移”等成语的出现。

同时我也提醒有关“宿”这个字，它非常特别，从甲骨文里“ ”或“ ”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它与“天梯”以及“天神”的关系。它与“星”合在一起的“星宿”实际上表达的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单纯“星辰”含义，它具有“星座”以及“星座里的神”的意味，这个特色会指向另外一个让我们惊讶的文化现象，它通往古代带有宗教意味的的星象学！

《说文解字》里只把“斗”字仅做“十升”的量词假如不能说是错误的，起码是狭隘的。当然即便是这个狭隘的解释也说明了“斗”与“七星”之间的神秘关系。“升”这个词汇不是平白无故就联系到“斗”的，因“升”而“斗”、有“升”才有“斗”的天文逻辑关系早就存在于中国的文化之中，但这个世俗的量词关系却是后来才有的。我确实不知道今天的简体字“斗”起于何年，为了严谨，我们放弃对于简体“斗”字的“指路”功能考究。查看甲骨文，“ ”，我们发现它正是一个天上“七星”最常见的符号：一个敞口的方勺带一个长柄。但是《说文解字》没有提供“七星”的意思。并且我们看到它的另外一个甲骨文形象更像是一个“犁铧”： ，《说文解字》同样对此保持了沉默。没有“西来说”的理论体系支持所有的中国文字对许多事物都保持了沉默，至今三分之二的甲骨文都未被破解，这或许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或象征：中国三分之二的先秦典籍都是一场误解，而今天的先秦史更是一盆糨糊。

两个截然不同的形状，“斗”与“犁铧”，可以解释“七星”最初所具有的两个意义

分别在两个（甚至多个）文化体系中的出现。而这两个“称呼”最初都曾经出现在中国的甲骨文里，说明了许多微妙的事实。其中之一是远古文明的大交流发生在至迟甲骨文出现的时间，否则中国的北斗怎么会与英语国家的“犁铧”那么接近。另外，当时在中国不同的部落或群体中同时具有这最初两种不同“北斗”的说法，所以它们都落实在甲骨文里，但是中国人最终选取了“斗”作为定型。这个文字的最终选定也为最初中国文明从多源到逐渐融合为单一局面提供了一个依据。这个现象也为甲骨文里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字却表达同一个意义提供了一个参考：不同的文化同时存在，并且这些不同的文化不全是中国内生的，而是来自与外部不停的来回交流。这个交流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得多，它之所以可能发生，不是因为交通条件发达，而是因为自由！但在周朝前后，这个交流却陷入了停顿，自主的中华文明也开始得到独立催生，一个关起门来打狗的封闭东亚文明开始了。

我们越来越发现天文学结合语言学或者文献学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比如“星斗”成语出现的最早时期，“北斗星”的出现时期，还有以上许多神话以及星座的准确出现时期，只有弄清它们才能解开真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核心时间。“严谨”细致的工作也是需要的，但是要看放在哪里才合适。

“大熊星座”的全球神话对比

围绕“熊”与“星座”的关系做个简单的全球神话对比[①]，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熊”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部落图腾，比如有人说黄帝就属于熊部落。无论如何，这些神话传说一定有其根源，现在我们就是要寻找他们可能的根源。我认为“熊”的根源来自天上，天文，星座。

熊“有毛”的这一特点给了我重要的启发。三千年前，动物还没有被进行生物学分科，所有动物想必都是一类，实际上直到100年前的清朝皇室还把乌鸦与喜鹊当作同一种鸟，所以远古就更是一笔糊涂帐。假如我是那时的“科学家”，第一步我愿意把动物分成水里的与陆地上的两大类。假如再细分，则还可以把地上的动物分为可以飞的与不可以飞的，还有一种分法是：有毛的与无毛的，吃肉的与吃草的。最大的可能是他们从来不想这个问题。比如“鸟”与“熊”就可以分归于一类，假如你没有受到今天科学观念“污染”的话。“熊”与“鸟”的共同特点是他们身上都长“毛”。假如在神话里让他们都能飞的话，飞着飞着飞得太远了他们就会变成一种东西的，鸟会变成熊，熊会变成鸟，再加上几千年的时间里，我们那些善于讲“瞎话”的奶奶的奶奶的奶奶的奶奶的奶奶的奶奶都是些文盲，只要其中的一两位弄错，我们就会全部错下去，这个错误的几率想想真是高得吓人。不过，好在能讲“瞎话”的人很多，在交流中张奶奶假如错了，听者会根据曾经从李奶奶与王奶奶那里听来的加以更正，所以大体上这个“瞎话”的传播规律既有一定弹性，同时也一直会得到自然维护。假如最早的祖先有人规定了“熊”本来就

① 参考：http://starryskies.com/The_sky/constellations/ursa_major.html

因“羽化”而存在于天上，那么在一些故事里他们就一直能“飞”，并且一直“飞”到今天。哪种动物能飞哪种动物不能飞，3000年前的古人是否有清晰的概念是个问题，否则宙斯怎么能把二熊提升到天上去呢，“熊”在天上不飞自飞。

看看来自希腊的“瞎话”是怎么让熊“飞”起来的。

卡利斯忒（Callisto）是猎人阿耳忒弥斯（Artemis）这个月神与猎狩女神的女仆，她被宙斯奸淫而怀孕，所以阿耳特弥斯就驱逐了她。看来这位月神有更喜欢处女的道德倾向，远古的西方人照样有贞操意识。那个生下的孩子名字叫阿卡（Arcas），意思是“槟榔”或“果实”。这段婚外恋激怒了宙斯的妻子赫拉（Hera），她决心报复。卡利斯忒被赫拉变成一个毛熊，被放逐进森林，她的儿子却成为一个猎人。一天，母熊在森林中听到儿子的声音就欢快地去迎接儿子，猎人却拉弓要射杀母熊。这时宙斯出现，他把这对母子安顿进了天庭。这就是著名的“大熊”与“小熊”（the Greater and Lesser Bears）两个星座的来历。“小熊星座”中有我们熟悉的“北极星”（Polaris）——“七星”斗柄所指的那颗星。

假如按照道教语言，可以说熊母子两人是被宙斯“羽化”为仙升天了。“羽”就是“毛”，使之有“毛”而不死并放置天上，这就是“羽化”。不过奇怪的是，中国道教接受了“羽化”理念，但抛弃了这个古老程序的细节，只取其抽象的“不死升天”。估计在道教之前中国存在过大量类似的希腊的羽化故事，他们直接与星座故事相连。

亚洲北部地区的蒙古神话中“大熊星座”的故事是这样的：

当地球还很年轻的时候，一位父亲让他的7个儿子去森林中学习听风的技术，这些孩子安静地在森林中倾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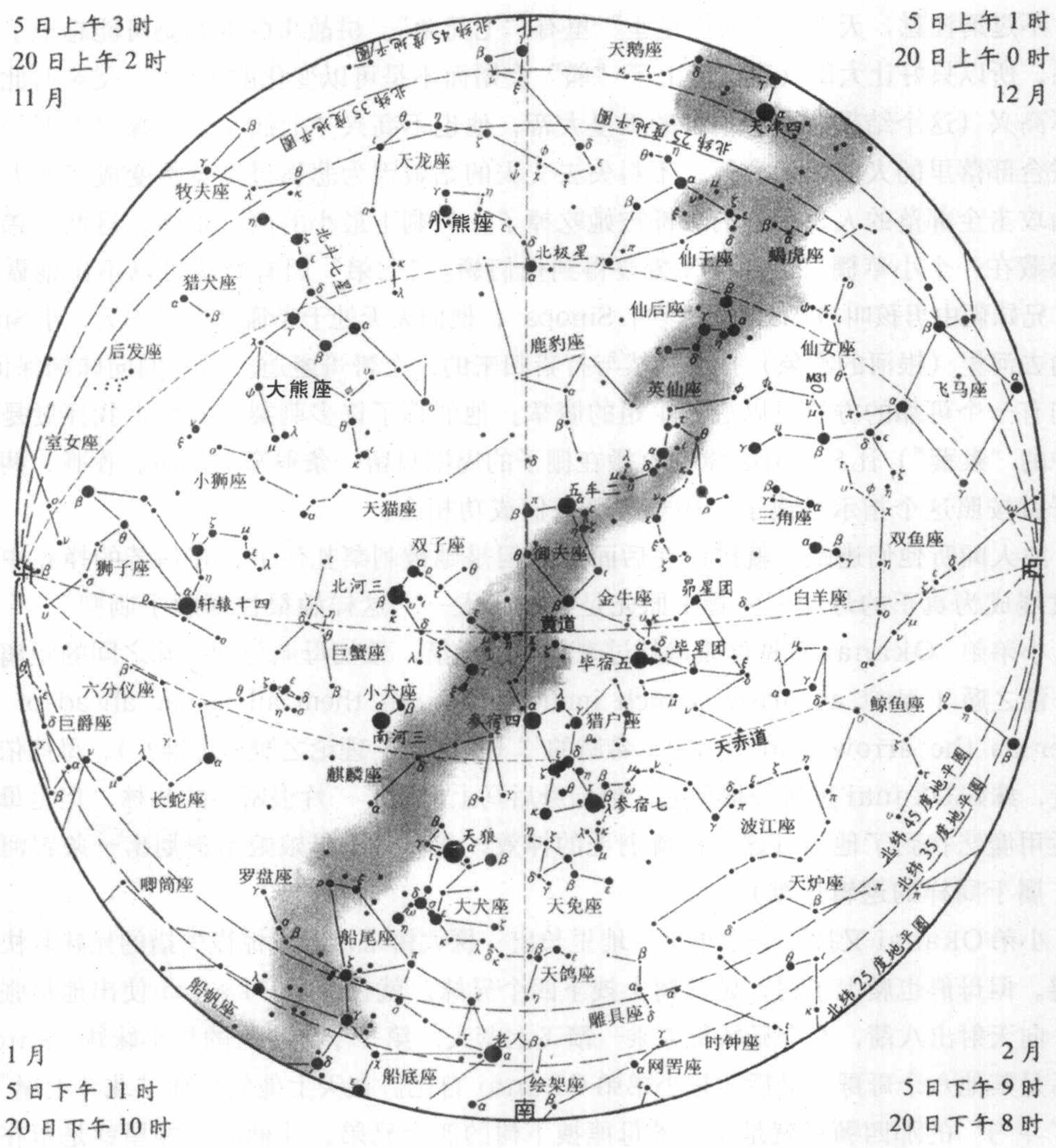
大哥在深夜被一个奇怪的声音惊醒，原来是风在歌唱。他不明白风在说什么，但是他从天空中看到“昴宿星团”（ the Pleiades）在闪烁。这个星光让他心动，并且他发现星光闪烁的节拍与风声是同节律的[①]。他赶紧把他的兄弟们叫醒，让他们听风声在说什么。兄弟们开始跳舞（这个舞蹈显示了萨满教显灵的企求痕迹）。风声越来越大，兄弟们的舞蹈越来越热烈。同时此处显示出风神崇拜。

突然这七兄弟向着昴宿星团（又称“七姐妹”）中“最年轻”的那个星球飘去。因为这个“七妹”爱上了最小的兄弟“Mizar”。而这被吸引上天的“七兄弟”也就成了众所周知的“北斗七星”（the Big Dipper），“Mizar”就是“七星”之一。假如仔细观察星座就会发现这位“七仙女” 已经脱离了她的姐妹们的队伍而距离“Mizar”最近。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天上的昴宿星团中人们只能看到“六姐妹”的原因，尽管大家知道那里原本应该是有“七姐妹”的。

这个蒙古传说与中国的《七仙女》传说已经有些接近了，而《七仙女》实际上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他们的原形还可以是《毛衣女》。

---

① 这个星团属于“金牛座”（Taurus the Bull）。“昴宿星团”在全球文化中以“7姐妹”著称。在这里我有个没有根据纯粹牵强附会的推定，这个“昴”可能是“木”，发音上接近，而“宿”则是“天上的神”（也就是“星”）的意思，事实上“木星”就在“昴宿”其中。“宿”字的甲骨文“”实际上就是“上了天梯的人”。



△ 冬季星座图

以上这个故事需要留意的另外一个细节是，“风”在其中的重要角色。我认为“风神”曾经在东亚占有重要的位置，并且很明确地表现在道教里面。这个“风神”依然可以去红海沿岸去寻找，到中东附近的神话里去寻找更方便，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风神”曾经占据重要的地位。实际上世界上一切神话传说，包括《圣经》与《希腊神话》都可以说大量借鉴了两河流域的神话传说。亚洲的这些神话也证明了东亚与西亚之间的神秘联系。同时，这个蒙古民族的神话与中国神话的渊源显示了蒙古族与汉族的紧密族源关系。

离开亚洲让我们跋涉到北美落矶山脉以东的印第安人“黑脚”（Blackfoot）部落。也许他们真是从亚洲过去的人，故事如此相像：

在一个部落里住着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还有七个兄弟，两个女儿。除了“最小”的一个儿子与女儿外，全都成人了。

一天，六兄弟出外打猎了。他们不在时，大姑娘爱上了一只大熊（这似乎不太合情理，不过请注意，天上的“大熊星座”里有“七兄弟”。讲故事的老奶奶可能忘记了这一联系，所以只好让大闺女直接爱上了“熊”女婿而不是可以变化的人熊）。父亲对此表示很不高兴（这个结果有点像中国的玉皇大帝，他也不高兴“七仙女”下嫁“牛郎”）。父亲联合部落里的人们杀了大熊。不料失去丈夫的姑娘因为悲伤过度竟然变成了熊人，她开始攻击全部落的人。所有的人都被她吃掉了，只剩下最小的两个弟妹。这两个弟妹一直躲藏在一个小草棚里。熊人发誓要得到他们俩。“七弟”因有魔法可以不让她靠近。

兄妹俩中男孩叫 Okinai，女孩叫 Sinopa ，他们天天处于恐慌之中。一天，小 Sinopa 偷偷去河里（银河的意象）打水竟然与打猎归来的六个哥哥邂逅。哥哥们向妹妹保证说，他们有一个可靠的方法可以逃离姐姐的魔掌。他们拣了许多刺梨（实际上我怀疑是中国话中的“蒺藜”）让 Sinopa 拿回家撒在棚子的周围只留一条很窄的出路。夜晚，两个小孩子就按照这个指示逃离了小棚子与哥哥们成功相会。

熊人闻听他们逃跑了就拼命在后面追，但是她被刺梨扎住了，在痛苦的挣扎中她竟然发展成为真正的母熊——看来原先是半熊半人——这样她很快摆脱了刺梨。

小弟弟 Okanai 看见母熊追赶过来就射了一箭，致使母熊与她弟妹之间的距离拉开了一箭之遥（ shot an arrow which immediately put them all as far ahead of their sister as the arrow had flown，希腊的“飞矢不动”理论之雏形思维？）。母熊依然在追赶，妹妹 Okanai 挥舞一根羽毛，他们身后马上出现了一片很密实的丛林，但是母熊还是运用魔法找到了他们（这个挥舞羽毛的神效，很有些王母娘娘用簪划出一条银河的神奇，属于同样的逻辑思维）。

小弟 Okanai 又挥了一下小手，地里长出一棵大树来，八个惊慌失措的兄妹赶快上树躲避。但母熊也爬上了树，她从树上拽下四个兄妹。就在这时 Okanai 使出他最强的魔法，向天射出八箭，八个兄妹每人乘一箭飞上蓝天。第一个飞上天的是小妹妹 Sinopa，然后是其他六个哥哥，最后才是小弟弟 Okanai 自已。在天上他们化作“北斗七星”。构成“斗勺”的那四颗星就是不幸被母熊拽下树的四个兄弟。斗柄的三颗星就是留在树上的三兄弟。离“Mizar”最近的那颗小星就是想与哥哥们呆在一起的小妹妹 Sinopa。

天上确实还有一个“天箭星座”(The Arrow)，总之神话里出现什么意味着天上一定有什么。

尽管蒙古与北美洲的神话有一些差异，但同源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又可以看出来，这些神话与希腊神话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差异。主要的联系在于“七星”转化为七兄妹与“熊”之间的关系，差异在于看不出希腊神话体系的特征。所以，有个仓促的判断是，蒙古与美洲的星座故事更为古老久远，他们所采用的文本与希腊神话为同源，但在很古老的时期就已经分别各自发展。这个分别的时期大约为3000年前，在希腊体系成熟之前。假如从地理上判断，我们可以把美洲的神话传说设定为最古老的，其中已经包含了“人”“熊”转化，而且用树枝挥舞出一片树林以阻挡追敌的情节与西王母画银河接近，可以考虑之间的同源。

从这些证据看，所谓欧洲人发现新大陆的说法完全是误传，人类根本就是从非洲这

里通过中东一步步走过去的。人类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文化隔绝，有的是因为地理变迁，有的则是因为社会动乱，两者都常常会引起商路中断、航道受阻。中国在汉前肯定经历过一次。从以上的星座对比中，我感觉到之前中国还经历过另外一次更加古老的隔绝，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里隐藏了一条有趣的线索，假如人们想了解星座的形成时间以及美洲人的迁徙时间，也可以从全球神话系统中得出一些结论，不过那需要非常细致的大量工作。

我参考的英文网站提供的“中国传说”有点出乎我的意外。下面就是他们的说法①：

中国对于构成“斗勺”的四颗星传说是“命运”、“马里克王后（或女王）”（Queen Marichi）与她的随从以及“文曲星”的家园②。

“马里克女王”会是中国的女王或者王后吗？我以前没有留意过，也从来没听过。我问一个生活在美国的文人，也无所获，看来他也没有听说过。不过我知道“马里克”是古代也门地区对于“国王”或“首领”的称呼！它怎么会被西方人塞进“中国”的神话呢？我们在下节专门追查这个问题，答案出人意料。

有关“大熊星座”的“中国故事”：有一个叫“魁”（Kuei）的小伙子以他渊博的知识和文学才华而著称，不幸的是他奇丑无比，丑到即便那些愿意帮他的人每次不小心看见他就会战栗不已。无论有多聪明智慧魁因为丑陋而没有一个朋友。

在首都举行的皇帝亲自颁发金玫瑰（a golden rose）的大考即将来临。魁竟然中了头名。他沾沾自喜地走进金銮殿，可是皇帝一看到他手中的金玫瑰就被吓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魁绝望地跳海自杀了。但是他感到有一个海妖把他托出了水面（“海的女儿”在丹麦也把王子送上了海岸）。这个海妖把魁从海底向上拉，越拉越高，从海面到空中，一直拉上了天。魁从此就在天上掌管科举、文章与学问等，功名官禄他全管，他成了“魁星”。

我记得中国的“文曲星”应该是“文昌帝”。查资料，传说“文昌帝”名叫张亚子，号梓潼，晋朝公元287年生人，期间晋武帝（司马炎）当政，号太康。

实际上在中国掌管“文运”的确实是“文曲星”（或曰“文昌星”、“文昌帝”）和“魁”。而“魁”来自“奎星”。

中国的“魁星”故事其实也反应了早期“羽化升天”的朴实特征，“魁”是被神灵给拉到天上的，不是因为修炼德行而上天的。

再看看另外一个美洲印第安部落阿尔冈琴（Algonquin）的神话传说。阿尔冈昆人居住在魁北克的渥太华河谷和安大略省。他们现在拿加拿大护照。

曾经有一只很大的成精的老熊，它的主要乐趣就是毁灭村庄。他毁灭了一个又一个，大家都很害怕。最后有两个村庄联合起来要想办法对付它。他们抽着烟讨论了很长时间，

① 出处：http://starryskies.com/The_sky/constellations/ursa_major.html

② 估计这个神话传说来自南方，请参考徐祖祥文《论瑶族道教的教派及其特点》：“据挂灯的经书所载，所挂的灯均代表不同的星神，如七星灯中的第一盏为贪狼星，第二盏为巨门星（怀疑为“厄门”之误），第三盏为禄存星，第四盏为文曲星，第五盏为廉贞星，第六盏为武曲星，第七盏为破军星。这些星神正是道教信仰的北斗七星。”

最后决定每个部落抽调最好的勇士来猎捕这只老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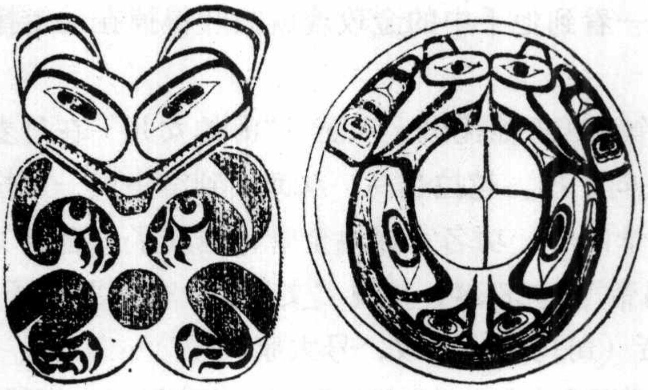
三勇士早已名动天下，老熊一听是他们要杀它就赶快逃窜，实际上它内心怯懦，外强中干。就这样它在前面跑三勇士们在后面追。追啊追最后大家都累了，老熊无路可逃就跑上了天。勇士们自然也追上了天。他们在天上围着“北极星”（“the north star”）继续追啊追。领头的猎手向老熊射了一箭把老熊射伤，但老熊的魔法使他逃过一劫没死掉。每年秋天当他们处于天空的地平线时老熊的伤口就会流血，血流到地上树叶的颜色就会变为红色。

看来两个北美洲的“熊”故事很接近，同源就更明显了，围绕“北极星”“七星”与“熊”元素展开。

在英国，“七星“中的“Mizar”与 “Alcor”这两颗星被称为“马”与“骑手”。

我在中国西北甘肃一带还能听到另外的“熊人”传说：一个熊人从村里抢来了一个姑娘成亲，他们还生育了孩子，后来姑娘借机逃跑，然后熊人就杀了所有的孩子。

“熊人”的传说全世界都有，并且多与交配和生育等拉上关系。这在《毛衣女》以及“美洲”的熊人故事里都能找到踪迹。不过也有人据此认为这是地球上真的有“野人”的根据。是否真的有“野人”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这些有关“熊人”的传说首先应该确认他们来自“天上”，而不是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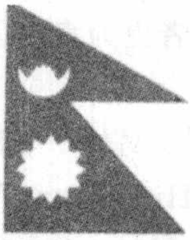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所描绘的熊，请注意其中一只熊的肚子上刻画了一个“十”字，是否象征了熊星座的指向功能。熊星座在古代的重要，足够使人们把熊星座神圣化而加以崇拜，因而会把“熊”作为天空的象征、神圣的象征，最后将熊“神仙”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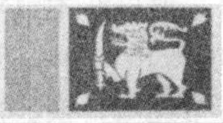
让我们总结一下以上我们涉及过的神话元素，计有：熊、兄妹、父母之于婚姻的反对态度、七兄弟、七姐妹、最小的孩子、最大的孩子、树、升天、箭、流血、蒺藜、爱情、死亡、勇士、追赶、人与动物之间的转化、河与海、海妖，极端的丑陋与美丽……。这些原始的元素装进历史的万花筒，又经过千年的不平衡“颠簸”，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转化为每个不同民族的独特文化。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个“万花筒”的核心原料来自哪里，换句话说，我正在寻找有关这些神话产生的可能根源。毫无疑问这个追寻与中国的文明起源有关。

解秘西王母“Queen Maric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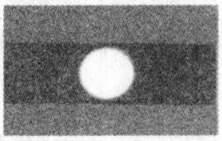
也门地区在3000～2000年前有许多大小不等先后并列的国家，它们是大约2800年前的盖太班（Qataban）王国，3000年前的哈达拉毛（Hadhramaut）王国，2700年前的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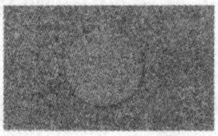
尼泊尔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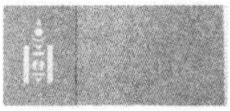
斯里兰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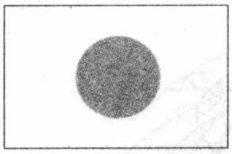
老挝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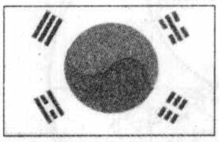
孟加拉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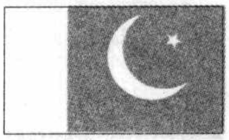
蒙古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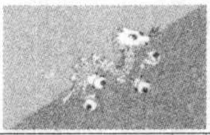
日本国旗



韩国国旗



巴基斯坦国旗



不丹国旗，其黄色与中国一样表示帝王颜色，龙同样表示帝王。

桑王国，以及3000年前的萨巴王国。这些国家称呼国王为“马里克”或者“穆卡拉布”。这个称呼在接近2000年前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因为统一了这一地区的希木叶尔王国的建国时间是公元前115年，这个国家没有称呼国王为“马里克”的习俗，他们称呼国王为“祖”。

我查遍了手边的资料，都找不到上节有关中国“七星”神话里“Queen Marich”与中国的关系，甚至根本找不到这个词汇的任何解释。我到网络上求救，并且推测“Queen Marich”可能是西方人称呼的中国“王母娘娘”，这将与红海的“马里克”再次联系起来。

网人“僧觉远”提供给我一个“喜马拉雅艺术”的网站地址①，然后他惊呼：Queen Marich确实是中国的王母娘娘！他从网络里摘出一段英语给我看：“Tantric Buddhists（佛教密宗）tell of Marichi’s determination in the manner of Tara. Taoists see her as Queen of Heaven, and the Japanese, as Amaterasu, the sun goddess.”

以上后面一句话说，中国道教将这个本来出现于佛教的人物Marichi视为“天后”（Queen of Heaven），而日本人则将她尊为“神道教”中的太阳女神。神道在日本的出现应该与佛教传入的时间不相上下，集自然崇拜与祖宗崇拜为一体，融合了中国传过去的佛教、儒教与道教思想。不知道是否受这个“女神”的影响，日本在早期还曾经有过女皇出现。其实从佛教迅速从印度传入东亚并广泛传播的例证来看，人们也不应该对于更古时期西方文化传入东方有过多的疑虑，现在不同的仅只是在佛教之前没有完备恒定的文字记载而已。环阿拉伯海地区自古有着广泛的交流，印度文化不仅接受有两河流域的文明，而且受红海两岸尤其是亚丁湾附近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接力棒的最后或者比较靠后的一节是东亚人。

这个中国道教里的“Queen of Heaven”，不仅是中国人熟悉的“王母娘娘”，而且是沿海一带人们尊奉的“天后娘娘”与“妈祖娘娘”。她成为日本的女神加以崇拜也是顺理成章的，东海西岸是中国，东岸即为日本，曾经有一群善水的人们就来回穿梭于这一带，并把同一个神带到两岸。不过，“王母娘娘”与“天后”确实也有所不同，很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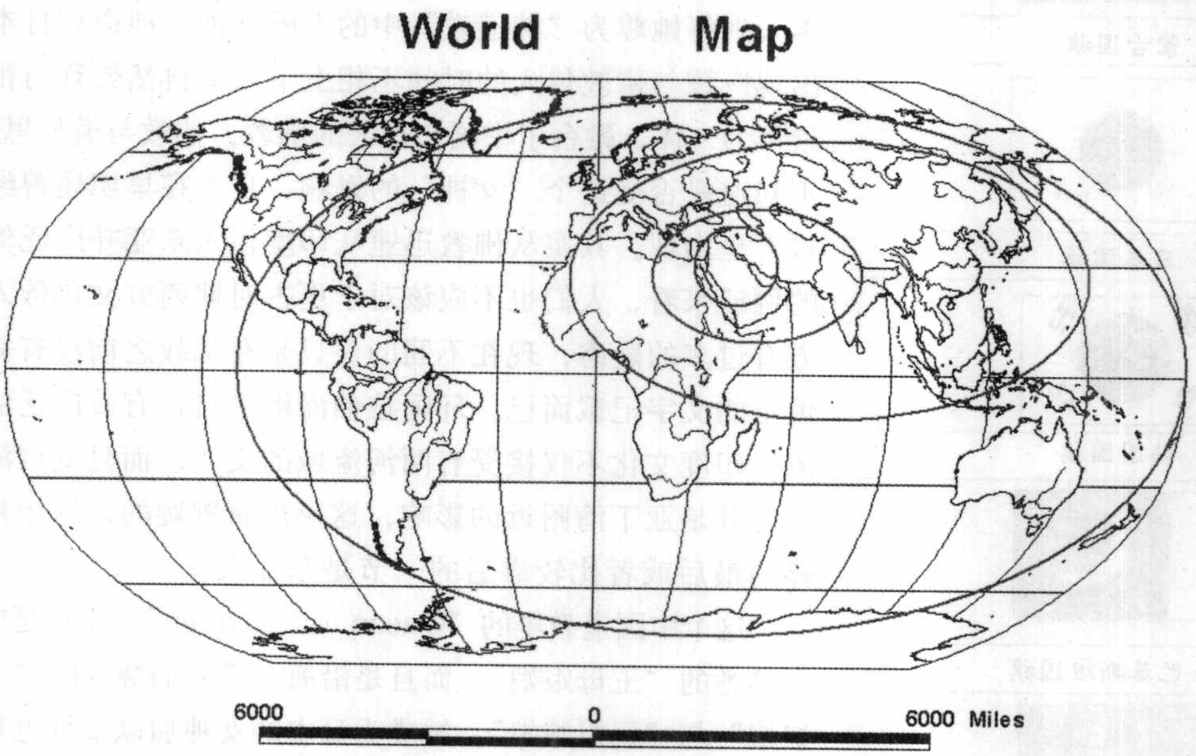
① http://www.himalayanart.org/image.cfm/90016.html

能一路来自印度与中国的陆地传播，而后者则直接来自于海上，或许后者更为直接。这个“天后”又名“妈祖”。

我到网站去看，发现该网站最突出的标识一个是“Himalayan art”，另外一个就是我急于想了解的“Marich”。看到这两个图标我惊喜不已，因为我误解“Himalayan”为也门地区古代的希木也尔王国（Himyarite）”。就在刚刚消除这个误解的同时，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可能：青藏高原与印度的分界线“喜马拉雅（Himalayas）”很可能来自也门的“希木叶尔王国（Himyarite）”。这两个词汇的相近显而易见：Hi–ma–la–yas，Hi–mya–ri–te,四个音节中的前三个几乎一模一样，r 与 l 在中国南方口音中经常转换。而位于希木叶尔王国曾经使用的“希木叶尔语”实际上就是我一直认为的甲骨文的同源文字“南阿文字”的延续。“南阿”早期与中国的甲骨文相同，大约2500年前才改革为字母文字。

南阿人远古即与印度有广泛联系是个事实，Himalayas 应该是来自 Himyarite 的人们曾经到达印度并试图穿过青藏高原这道屏障的一个证据。在这个边缘以及延伸的地理线上从东到西分布的现代国家是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克什米尔等。

中国地区与南阿之间最接近的地方不是别处，正是中国的西藏。西藏与南阿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为一千公里，文明的传播在这条线上通过印度与尼泊尔等地得到发展。实



△ 圆规地图示意。地理决定人类会一直挑选交通便利的地方去开拓更大的空间，它决定了早期人们会从中东向亚洲倾斜，并且已经有人了解到亚洲可以作为一个跳板进入美洲加大了东亚的重要性。从这个示意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的阻隔还是对人类文明的扩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文明程度高的地方都在土地相连的地区。

际上在我的体系之内，印度属于中东之外的二级文明，就与这个地理有关，对于中国它是个文明台阶。一级核心文明在中东，而中国属于向外扩散的三级文明地区。换句话说，印度是中国文明板块与中东文明板块之间的跳板和桥梁，与汉文明之间还隔着一个西藏。这个认识建基于印度文明来自中东文明的假设。这一点在《向东》一书中已有论述。印度宗教里有大量的事实说明他们与早期犹太教或者《圣经·旧约》所展示的历史有密切关联，当然不仅仅是与犹太人有关，印度与两河流域的联系更密切。

这里的印度文明也包括了喜马拉雅脚下的尼泊尔文明。也门古代的“示巴女王”时期流行的“处女女王”或“神妓”现象至今还在尼泊尔这个神奇的宗教国家保留着，这些“处女神”具有与活佛类似的神圣光环，初潮之前她们就是神。这个特殊的文化遗存现象可能暗示了在远古时期有一条文明路线从也门经过印度穿越喜马拉雅进入中国，然后通过西藏传播到临近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当然，这只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渠道之一，其他的渠道主要应该是西北经过西域和南方经过海路来到中国境内。

“Marich”是古代也门国王的称号，相当于中国人称呼的“陛下”，它不是个名字，所以任何国王都可以叫“Marich”，当然包括“示巴女王”也可以。我的推测是，久而久之，人们就以这个“Marich”来替代最出名的那个国王了，而这个国王就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示巴女王”。在后来的某个时期，人们一说“Marich”就知道是指“示巴女王”。这个现象可以拿中国人表达“周恩来总理”的道理来做比较，中国人写文章时假如不标明就直接称呼“总理”那多半是特指“周恩来总理”或当任总理。本来是一种职位后来成为某个在这个职位上最著名人物的专用。这里的Queen Marich就相当于有人称呼周恩来为“总理先生”，而在红海最著名的女王是“示巴女王”。

现在已知也门、印度、西藏与中国，这四个地方都有“Marich”出现，也门与中国的情况尤其明显地指出了“Marich”是一个“女王”。这很具体地指出了这样一条道路：也门的“Marich”通过1000公里的路程经印度、西藏来到中国内地，成为“Queen Marich”这个“王母娘娘”。“妈祖”则选取了完全不同的海路来到中国。

第二部分 宗教之间

道教起源与发展

研究中国的星宿故事以及有关的神话故事，我们会发现它们与汉代起源的道教有着神秘的联系。道教与王母娘娘有着紧密联系，所以道教是必须深入清理的一条线索。不过，我认为这个联系属于显形联系，而并不是最初真正的早期联系途径。

中国的道教很难说到底起源于哪个人或者哪个年代。这实在是由于一些特别的原因，比如道教本来就是巫术，巫术源远流长，可以说自古有之。除了巫术，道教还加入了星象学，一样无法寻找起源。道教还纳入老子的思想体系、易经的哲学体系，这样就更不好断定道教的具体起源时间。不同区域的道教还有一些差异，综述就更不容易。

“道家”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可能是西汉时期司马谈所著《论六家之要指》。

说道教起源于何年比较困难， 但假如说对于道教产生直接影响的人物还是有迹可寻的。按照时间先后早期最重要的应该是东汉时期的张道陵。他是张良第八世孙，又名张陵，江苏人，生于公元34年，“白日飞升”于公元156年。张道陵的“羽化登天”颇有些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耶路撒冷“登宵”的味道，之间是否有文化上的借鉴，或者干脆这样的“登天”本来就是阿拉伯半岛的一种古已有之的文化，颇可怀疑。张道陵因建立“正一盟威天师道”，俗称“五斗米教”，被尊为道教“祖天师”，是为“张天师”也。道教与星象、天文的关系已露端倪。

假如细致一些，还可以注意早期比较著名的道教人物，比如汉朝的于吉和宫崇师徒俩。“于吉”又名“干吉”，看来当初的文化真不发达，连个人名都分不清。

崇尚黄色的张角（？－公元184年）“太平道”是道教的另一源头。张角系河北平乡人，在东汉末年领导“黄巾起义”。后来中国的“明教”在宋、明皆尊张角为教主，很能看出“道教”与波斯“明教”之间的潜在暧昧关系。“明教”就是“拜火教”、“祆教”、“摩尼教”（也有人说“摩尼教”只是受祆教影响很大，并不真正属于此教。拜火教教内教派林立，甚至有人认为基督教也是拜火教的流派之一）。有人说，中国的“明朝”（公元1368～1644年）实际上就是崇拜“明教”的王朝，当然更是尊崇道教的王朝，不过明朝肯定也尊“儒术”。

东晋的著名道教人物葛洪（自号抱朴子）先以儒教修养著称，一个人集儒、道双学。

他的"欲求仙务以忠孝顺仁为本"的思想就是道、儒结合的典范，从此儒、道合流。

道教与儒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除了初期的激烈冲突外，很快就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二元，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二元精神，出则道、入则儒。还有一个"外来的"佛教对这个二元体系进行着补充，当然是补在道教，因为道教本来与佛教有一定的渊源联系，这个联系可能是通过西藏的苯教建立的。总体看儒释道这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最大，构成了中国宗教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基本底色。大家都承认佛教属于西来，其实道教与儒教从根源原料上也应该属于西来。今天看到一些中国人为所谓中华文明而情感用事喊些"文化复兴"以及"继承传统"、"捍卫汉语"等怪异的大口号，我颇感诧异。世界大同，本无你我之分，所以也不用捍卫"我的"、"他们的"，顺其自然最好。

金元宋时期，丘处机（1148～1227年，字通密，号长春子）明确提出了三教相通互融的新思想，三流归海，从此中国人认真在这张文化大网结下中华文明之果。从结果看，道教在民间占了上风，巫术是中国人喜欢的，也是中国人擅长的。一神教从西周开始就在中国胎死腹中，儒教在秦朝打了个趔趄最后落得个"不是宗教"，佛教尽管影响大，但毕竟是"人家的"，还是稍逊道教一筹。总体看来，我还是觉得道教对中国人影响最为深远，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已经将其中的道教神明转化为祖宗，在南方为"盘王"，在北方为"伏羲"。

宋、金、元时期的"全真七子"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他们是：丹阳子马钰、长真子谭处瑞、长生子刘处玄、长春子丘处机、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清静散人孙不二（马钰之妻）。"全真七子"随王重阳一起创立道教全真派。丘处机在王重阳去世后入磻溪穴居，成为全真龙门派创始人。注意这里"7"数字的一再出现。并且"真人"是一种"级别"，有别于普通人，介于人神之间，或可对照于西方宗教中传达上天旨意的、"天使"。后来的"天师"其实更能看出来就是"天使"或者"先知"的概念。

老子像

道教里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太平经》，其次是老子的《道德经》。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像是道教之本。《太平经》中有许多对于"火精"的颂扬，可能这是"明教"之所以尊奉《太平经》的主要推广人张角的原因之一。"火"为"明"。"火"是道教的精髓，也是"明教"的精髓。在古埃及文字里，"星"的描画方式其实与今天中国的"火"字基本上是一样的，"火"、"明"、"星"，三位一体[1]。《太平经》的出现与传播标志着道教正式成熟。这部经书并非一个人完成，是多人在不同时期完善起来的，正如《圣经》形成过程一样。

《道德经》实际上是被后人拉进道教去的，换句话说老

① 参考《向东》163页配图。

子被拉进"道教"是后人的好意，与他的主观意愿无关。不过，从老子的《道德经》所表达的宇宙观多少与"盘古开天地"有些牵连，道士们拉老子做"太上老君"并非没有道理。宇宙观、哲学观的接近或统一绝非偶然，它们之间可能有着神秘的内在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中国的道教在老子时代已经奠定了一些思想基础，并且也已经具有广泛的民间基础，汉代的人们将其宗教化是一种水到渠成。

宗教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除了最初的原始萨满教之外，一般都有许多共同特点。人类第一个被命名的体系化、组织化的宗教应该说是犹太教。第一总是伟大的，它确实是一种"文明"现象。宗教的教化作用、组织体制、乃至政治号召力，在人类的最近几千年文明进化史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没有宗教组织的影响，我们简直无法想像这个世界到今天仍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蒙昧状态。反过来偶尔宗教赶不上形势也会成为蒙昧。人类自从有了"科学"之后，宗教就遇到了新问题，或者说宗教面临着它的新局面与新任务。不过人们在近代科学教条思想影响下，只看到宗教负面的影响，对于宗教的正面作用估计不足，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至少宗教在欧洲的西方文化中是不能或缺的一个重要文化组成部分，没有基督教在西方的发展就不可能有西方的现代文明。抽取了宗教的西方文明将是苍白空洞的。

道教在中国同样走过了它的曲折发展道路。但由于道教的宗教特性，很不幸，甚至与其越来越接近的儒教，都没有能把中国直接引入发达的文明社会之中，反而在西方列强的对比下越来越走入文明的死胡同。今天已经到了中华文明彻底反思自我文化体系的关键时刻，清理中华文明、重建中华文明、反思中华文明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道教的基本派别与信仰体系

早期主要道教流派如下四个①：

方仙道：兴起于战国末期。从事方术、方技等道术的人，时称方士。包括天文、医学、神仙、占卜、相术、堪舆等技艺并宣传服食、祭祀可以长生成仙的人。据《史记·封禅书》载：最早的方士是周灵王时（公元前571－545）的苌弘。据称他会阴阳之学，明鬼神之事。至战国时最有影响的方士是齐人邹衍，他倡导"五行相胜"，"始终五德"的天意征兆，成为显赫一时的阴阳家。秦时最有名的方士是徐福，他以"求仙药"名义东渡。先秦方仙道代表还有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以及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两汉有李少君、李少翁、西门君惠、栾大、公孙卿、甘忠可、于吉、宫崇等。这些方士们均是为帝王求长生不死或为之找寻神仙、或为之采药、炼丹，这些活动一直延续到汉末仍很活跃。

黄老道　兴起于汉代。文帝、景帝为了巩固汉室江山，均采用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尤其窦太后好读黄帝、老子之书，这样影响皇宫贵族包括太子、诸窦均读黄帝、老子之书，使黄老学说蔚然成风。据《史记》载，最早研究黄老之学的人是河上丈人。黄老之

① 参考《道教协会网》。

学大兴于汉。汉武帝虽独尊儒术，但儒家亦崇拜黄帝、老子。加之黄老之学又与当时的神仙家、阴阳家、五行家、方技家、术数家等相融，特别是楚王英斋戒祭祀，学为浮屠，崇拜黄老。汉桓帝亲自去陈国苦县和濯龙亲祀老子，百姓更加崇拜。

太平道　是继方仙道和黄老道之后出现的道派。创立人是河北巨鹿人张角，主要活动时间为汉灵帝时（即公元172至184年）。他敬奉黄帝、老子为教祖，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以符水治病、叩头思过为传教方法。教徒数十万，遍布河北、河南、湖北、江苏、山东、北京等地。他自称大贤良师，其弟张梁、张宝则自称良医，行医传教，深得人心。公元184年（甲子年），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梁自称“地公将军”，张宝“人公将军”，统帅信徒数十万，共设36方，实行传教、军队合一的教团组织体制，打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发动了“黄巾起义”。起义失败，张角病死。

天师道　后人称正一道，创立人张陵，本太学诸生。自幼好道，天文地理、河洛图纬无所不知，尤好老庄，曾任巴郡江州令，后弃官入北邙山修长生之道。常读“黄帝九鼎丹经”，丹成于繁山，因朝政纷乱，隐退余杭十年。汉顺帝时（126～144）于四川鹤鸣山，传播“三官手书”和“正一盟威”道，为百姓治病、消灾。以《正一经》、《太平洞极之经》等固号“天师道”。因要求学道之人要奉献五斗米，后人称为“五斗米道”。后来张天师要求大家交鱼，现在许多地方的道教信众家里挂雕鱼，就是对这一道教传统的追忆。张天师道尊崇老子为教祖，尊为太上老君。以“老子想尔注”传世教民，信奉的主要经典还有《太平洞极经》、《太清经》、《太玄经》、《正一经》、《五斗经》等，立嘱家族世袭天师职位。其孙张鲁，人称系师，后归顺曹魏，被拜为镇南将军，得封万户侯，使天师道发展壮大，信徒遍布巴蜀、汉中，成为影响很大的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后人均认定“天师道”为道教正统。至元成宗大德八年（1340）第38代天师张宇材被授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录”后，“天师道”又名“正一道”，与金元时兴起的全真道并成为两大教派，延续至今。

道教从无组织无纪律的普通无名无形的巫术抽离出来，成为一个具有相对固定程式和固定教义，尤其是有信众组织，主要功劳还是应该从张道陵这里算起。所以研究道教的起源应该以张道陵为核心。

道教信仰的神仙体系庞大复杂，尽管一般我们见到的道观里其实不会如正统所要求的那样严格地列仙尽陈，但基本的神仙体系概念还是比较一致的。让我们还是认识一下常规的文字介绍①：

道教后期吸收了儒家“修齐治平”，融汇了佛教业报轮回和解脱济度的教理，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教体系。这个体系不是一次性形成的，而是逐渐发展的结果。其神灵体系分为尊神、俗神、神仙三大系统。

“尊神”是道教信奉的主要神灵，包括三清、四御、诸天帝、日月星辰、四方之神、三官大帝等。出现于六朝的“三清”是道教的最高神，是玉清、上清、太清的合称。玉清指元始天尊，上清指灵宝天尊，太清指道德天尊（以“太上老君”闻名，就是老子李

① 参考编辑自一篇“中国广播网青海分网”的无署名文章。

耳)。此三尊统御诸天神，为神王之宗，飞仙之主。四御指位次于三清的四位天帝，即总执天道的玉皇大帝，协助玉皇执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四时气候的中央紫微北极大帝，协助玉皇执掌南北极与天地人三才、统御诸星、主持人间兵革事的勾陈上宫天皇上帝，执掌阴阳、生育万物、安排大地山河的女神。诸天帝指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以及九天上帝、三十二天帝等。日月星辰指将三光神化，日为大明神，月为夜明神，金木水火土五星、北斗七星、二十八宿等均为星神。四方之神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三宫大帝指赐福天官、赦罪地官、解厄水官。

俗神是民间信仰中的神灵，被道教纳入信奉谱系中，包括雷公、电母、雨师、风伯等自然神，禹王、关帝等英雄神，文昌帝君等文化神，门神、灶神、城隍、土地等保护个人、家庭、城乡公众安全的守护神，药王、财神等功能神。

神仙是道教理想中的修真得道、神通广大的长生不死者。最初流传的神仙，多为上古传说人物，如赤松子、彭祖、黄帝、鬼谷子、黄石公、河上公、广成子、西王母、骊山老母、东王公、玄女、素女、采女、麻姑等。汉魏以后，增加了道家和道教人物，如庄子、列子、文子、张陵、尹喜、三茅、王玄甫等。唐宋以后又增加了吕洞宾等八仙。据陈葆光《三洞群仙录》载，至宋朝，道教仙人有1000余名。

道教与苯教的可能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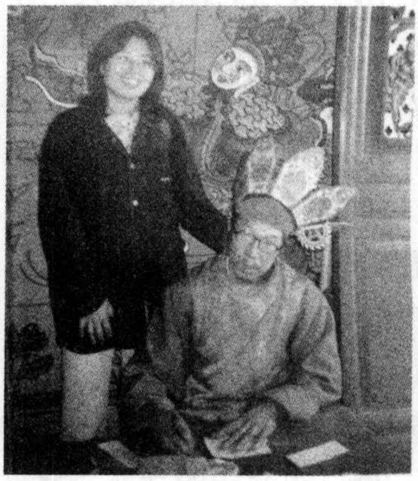
道教的原料养分或者说产生的土壤条件在东周就已具备，只等着一位“真人”出现把这些元素有机地串连起来。一个时代会产生一种人、并拥戴一种宗教；时代与文化、时代与宗教、时代与人，是相辅相成的。道教在2000年前终于迎来了它的天神张陵。

张陵不是村野民夫，也不是神汉，据说此人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作为张良后代的世家子弟，他可能看透了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微妙玄机，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四川作为发展道教的根据地，这是重要的战略考虑。从政治核心的黄河流域的洛阳都城“上山下乡”到远离家人的四川，这一行为大胆超群。

西王母像，请注意她的头饰与后面的“东巴”以及苯教中活佛的头饰都一样。

一般认为张道陵的修炼得道处是在四川中部的青城山，也有人说在附近的鹤鸣山，

相信两处都是张的根据地。这里是典型的藏汉混居地区，或者说恰处在藏汉分界线上。这一现象很微妙，给道教的出处指出了方向。这一带还是羌族人的聚集地，由于羌族与藏族族源密切，使得很多人认为羌族与藏族同源。但假如把羌族看作是甘肃每年冬季南下的一支，也可以解释甘肃道教昌盛的潜在原因。道教的产生与民族无关，但与地理方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者在云南与纳西族“东巴”在一起

西藏东西长南北短，其东西最远距离达一千多公里。藏区流传的古老“苯教”（Bonbo Sect）核心就在东部邻近四川的昌都地区。目前最大的苯教寺庙，也是尚存的最古老的苯教寺庙，就在昌都丁青县。这里是澜沧江的上游，苯教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随着江水流入云南等西南边陲。这里也是长江的上游地区，任何文明都会随着水流而扩散，这是早期文明的发展特点，所以苯教从长江上游流传到中下游很方便。云南地区历史上有“本主”信仰，与苯教应该有一定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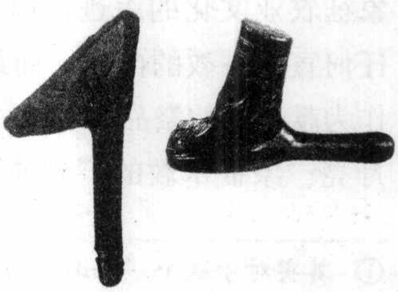
撒丁岛的“本本塔”

位于西藏东部的丁青县距离最西部的阿里地区恰好与阿里距离阿拉伯半岛地区之间等距。所以假如从阿里能把一种宗教传播到丁青、甚至四川地区，那么从阿拉伯半岛也能把一种宗教传播到阿里地区。东部昌都地区的苯教据说正是从西部的阿里地区传播而来的。

苯教第三十八代李西活佛

昌都北临青海，东接四川，距离青海最近，四十公里外就是青海省区，离开西藏150公里外就是青海省玉树县。从昌都市到甘肃和云南的距离相同：大约500公里。

“苯教”又叫“本教”，甚至“钵教”。意大利的撒丁岛有一种古老的“本本塔”，全部为男性生殖器形象，我怀疑两者有一定的联系。其证据并非仅只是该种宗教的发音，还有其他的内在联系，比如重视性的意味。



滇文化中的“祖”。

苯教一般归于萨满教，有一定男性生殖崇拜。两千多

年前与汉同期的云南“夜郎国”滇文化中也具有典型的男性生殖器崇拜色彩，它们在地理上非常接近。

有专家认为西藏苯教可能与“大食”文化有联系。不过这个“大食”还不是大家熟悉的“大食国”，前者指位于波斯境内的一个部落，“大食国”则是指几百年后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个以巴格达、开罗为核心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后来所说的中国“回回”与“大食”关系密切，不仅仅指阿拉伯人，更指波斯人，由于波斯的范围很大，干脆说“中东”可能涵盖力更强一些。

早期苯教教士穿红衣，后来曾经改穿黄袈裟。其宗教活动中浓厚的性崇拜意味，是一种可爱的原始特征。西藏最大的丁青苯教寺庙每隔12年在“铁马年”会有一次裸体舞大会，不过要得到政府批准才能跳这个舞蹈，据说已经停止过好几次了。

西藏地区的房屋建筑特点仔细观察与也门地区传统房屋很接近，甚至连色彩都相仿。西藏地区距离阿拉伯半岛的最近直线距离是1000公里，大约相当于西藏到湖北的距离。我相信西藏在古代与阿拉伯地区的文化联系会与汉族地区的一样紧密。

苯教一般把寺庙建立在悬崖绝壁之间。道教也差不多有同样的习俗，比如山西恒山①的悬空寺是绝佳的例证。悬空寺还是中国惟一的著名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寺庙，建立于1400年前的北魏时期。这个悬于绝壁不仅是道教信仰的一个境界，而且是苯教追求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即潜在模仿和追踪一位一直被悬于绝壁的真神的足迹。我们最终将会找到这个奇特的人或神。

原始苯教把世界分为三个部分，即天、地、地下。天上的神名字叫作“赞”，地上的神称为“年”，地下的神称为“鲁”，即常说的“龙”。我愿意把这三个字再次音译为：神、仙、龙。这个三分法与道教有相通之处，从张角三兄弟自命为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就看得很清楚。另外，道教“三官”正是“天”、“地”、“水”。从苯教“地下神”为“龙”可以认为“地下”就是“水世界”，它们之间完全对应。庄子作品里有“至人”、“神人”与“圣人”三境界，或许也有类似意味。

苯教认为人死后要经历“死后世界”而获得再生，这可能受到印度佛教影响，当然也与基督教教义有相似之处，就是对死亡这一终极问题认识的一致：人以某种形式复活。早期苯教是不信轮回的，但信“升天”，与道教同。

有今天的旅行者到古象雄人所在的西藏阿里日土县境内，看到一些与苯教有关的岩画，其原文描述如下：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岩画的族属是古代象雄人。岩画中几乎没有象征农业文化的踪迹，由此可知古代象雄居民以狩猎、畜牧为生。同时岩画中没有见到任何宣扬佛教的内容，而最为丰富的是任姆栋一组一号岩画展示的杀牲献祭的宏大场面。作为献祭用的祭品有125个羊头和10个估计是盛血的陶罐；作为祭祀对象的神则有太阳、月亮、象征苯教的“雍仲”符号、鱼、男性生殖器，还有象征“天梯”的“目”字形符

① 其实对于这个“恒山”的名字我有个牵强附会的联想，距离西藏最近的一条大河就叫“恒河”，当然它是在印度地区，heng这个音一再地出现于中国的内地，令人怀疑他们的真正出处在哪里。古代文化发展上的时空跨度是我们难以想像的。而在这个十分可疑的“恒”山里又出现这么一个“悬空”于绝壁的寺庙，我认为并非偶然。

号。在一条人称“齐吾普”（即小人山谷）的页岩峭壁上，有众多的野牛、羚羊、山羊、鹿、马等动物形象，还有一些分别持盾、格斗、骑马、跳舞的人物形象，有的像是热带岛国的土著，有的像是中原汉画里的“羽人”。①

将上面的形象描述与道教符号做对比，“鱼”是道教符号，张道陵传道最初入会交“五斗米”改为交鱼。另外，对于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可与道教热衷的“房中术”直接对应。“羽人”就更是道教升仙的典型标志。

象雄文化乃至苯教又来自哪里？这句话或许给了我们很好的提示：“有的像是热带岛国的土著”。

象雄与苯教

我在本书中一再地提到一个从阿拉伯半岛到中国的古代通道：从印度恒河进入中国昆仑山。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这条道路恐怕是自从有了文明就存在的一条古老的道路。旧石器、新石器一直到中国的三代时期，这条道路一直都存在。西藏阿里地区所谓的古象雄文化遗迹就在这条道路进入中国的第一个站点上。它后来又发展出古格王朝。从这个地区进来的不仅仅是阿拉伯文化与印度文化，还有波斯文化以及地中海沿岸文化，因为当时的印度河流域长期属于波斯帝国②。直接建立在印度河的源头这一事实说明了古格王朝与波斯文明可能具有的紧密联系。

象雄的北边是昆仑山。从地图上看，它就在昆仑山与喜马拉雅山脉的夹角处。这一地理特征本身就是一个神圣夹角。古往今来的许多昆仑神话其实很可能都与象雄有关。因为翻过昆仑山就是新疆塔里木盆地和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从这个地方出去就可以到达中国北方地区，但最方便的地区将是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与内蒙。

“象雄”又叫“羊同”。据汉文史料《通典》、《册府元龟》、《唐会要》等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至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八九万”。藏史《苯教源流》载：“象雄与上部（即西部）克什米尔相连，北接于阗雪山及松巴黄牛部之静雪地区（青海西南地区），南抵印度和尼泊尔。”汉藏两史所载象雄地域基本一致。“象雄为苯教之源。象雄人笃信苯教，重鬼神，喜卜巫，忌食野马肉。象雄盛世、即十八代鹏甬王之时，也是雍仲苯教盛行之际，雍仲苯教文化源远流长”。③

多数学者认为苯教起源和发展于象雄地区，即今天的西藏阿里。苯教起始时间没有

① 新华网西藏频道《拜访苯教故地》。这位没有署名的作者还在文章中表明了苯教与祆教可能有关。

② 请注意这一奇特地理背景，象雄（以及古格王朝）处于三条大的河流源头：印度河、恒河、雅鲁藏布江，三水源头之间的距离大约在50公里左右。这一奇特的地理现象本身就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河流是文明的源头，三大河流的共同源头汇聚肯定是一个独特的文明硕果，同时它将引向三大流域的文明交流。印度河穿过今天的克什米尔、印度、巴基斯坦流入阿拉伯海；恒河穿过印度、孟加拉注入孟加拉湾；雅鲁藏布江则从西到东贯穿整个西藏，在距离中国云南、四川省两百公里附近、以及缅甸一百公里的地方突然南下进入印度与孟加拉，然后入海。

③ 本段引文自《雍仲本教》网站嘉措顿珠文。

详细记载，只知道它与象雄文化现象共起始，在公元7世纪被吐蕃帝国灭亡。由于地理环境恶劣，中国国内对于这一地区的考古还处于初级阶段，更多的秘密等待着科学工作者去发掘。

苯教发祥地在今天的昌都丁青，那里有一个奇妙的孜珠寺（Zezhol Monastery），它也是今天最大的苯教寺庙。“孜珠”是一片山的名字，其中一座叫“无影白琉璃峰”，相传山下有琉璃空洞，里面的钟乳石呈透明状，形成所谓琼楼玉宇景观，主要山峰名“智慧剑峰”[①]。

苯教的创始人名叫敦巴辛饶，意思是“具有渊博知识的导师、引路人”，其实就是“先知”或“天使”甚至“天师”。他与释迦牟尼为同时代人。法国学者石泰安在其《西藏的文明》一书中说，敦巴辛饶来自象雄地区一个叫辛世系（部落）的人。有人认为他可能来自波斯，不是象雄本地人。

有研究表明，在藏文出现之前有象雄文字，看起来接近梵文，我则认为梵文看起来又很接近希伯来文。据说有一条道路从青海的玉树经过西藏阿里是通往西亚的，这条道路在国内又可以延伸到甘肃与陕西，只是很少有人提及[②]。甚至有人说唐僧就是从阿里进入印度的。这条道路考古在将来肯定会有重大发现，它将揭示许多文明的源流秘密。是汉族给西藏带去了文明，还是文明曾经西藏带给了汉人？其中大有疑问。西藏海拔之高确实阻挡了一部分人，但有一部分人天生对高海拔不敏感，所以不要把西藏这个世界屋脊当作一道阻挡所有人的屏障，它不能阻挡文明的传播，更不能阻挡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人们，更不能阻挡意志坚强的宗教活动家。

苯教从象雄向外传播的第一大站就是孜珠寺所在的丁青一带，然后再传向西藏南部林芝的苯日神山地区。丁青在历史上又叫琼布丁青，琼布是“大鹏鸟后代”的意思。我偷懒牵强附会一下，这个“琼”可能是“green”，而“布”就是“bird”。中国的“青”则直接继承了“琼”。在《说文解字》里“”字很有意思，我怀疑人们解错了，它应是只样子怪异的“大鸟”：脑袋上顶着三叉的神圣物件，下部省略了，只给了一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它就是“青鸟”本身也说不定，最终以“青鸟”代“青”。同时《说文解字》很怪异地说：“青”就是“丹”，也提到“青”属木，丹象征“火”，“青”生“丹”，“木”生“火”、“青”象征“东”云云，还是与道教有关的解释，五行那套理论。这个“青”为什么又成了“丹”是否与它的来源“红海”有关？这个实际上是红色的“青鸟”是不是中国的“凤凰鸟”的另外一个称呼呢？

“大鹏鸟”与苯教的产生和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另外，佛教里的“迦楼罗”也是一个“金翅大鹏鸟”，与500年重生一次的凤凰有些渊源。

---

① 孙光明，：《苯教圣地：丁青县孜珠寺》。似乎该作者也认同道教与苯教之间确有关联。
② 参考新华网《阿里未解之谜》。

本教中的“大鹏鸟”

一篇《拜访苯教故地》的文章介绍说：相传从象雄地区飞来一只大鹏鸟，在丁青附近上空见到一座雪山便落下休息，不曾想到雪山被踩塌了。这座雪山叫白乃日扎，是西藏的四大名山之一。大鹏鸟只好又飞到了一座小山上落下，小山却纹丝不动。大鹏鸟笑了，白乃日扎大雪山竟不如这座小石山。这一笑不要紧，从大鹏鸟眼中流出两滴眼泪，形成了两座高山湖泊。“大鹏鸟”在布托湖附近产下3只水晶蛋，3天后孵化出3个男孩，一个叫尕日苯（白色的），一个叫纳日苯（黑色的），一个叫扎日苯（黄色的），这3个孩子便成了琼布丁青人的祖先。现在，在丁青县经常可以见到大鹏鸟嘴叼毒蛇俯冲降落的图腾画。这种卵生神话被当地的苯教典籍和苯教信徒普遍看做是苯教的由来。”

请注意“丁青”这个地名与道教发源地“青城山”之间的联系。“青色”（green）并非没有意义，“青色”在两个宗教中有着因袭关系。不仅侍奉西王母的大鸟叫“青鸟”，还有其他地方也散落着这神秘的“青色”，我们会在后边逐步追寻它们的根源。还有，西王母的青鸟是“3”只。大鹏鸟的孩子也是“3”只。这不应该是偶然的。牛郎的孩子也是“3个”。道教对于数字“3”非常敏感，连西王母的生日也在三月三。不能简单看待这些神话传说的特征与数字，它们有着明显的象征与对应。另外，在苯教供奉的众多神圣中有一位叫“巴母”女神，并为此专门建有“巴母神殿”；“四季西王母”直接出现于苯教。所以道教向苯教学习借鉴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佛教中的金翅鸟（迦陵频伽） 请注意它的头上有两河流域典型的月神形象；并且它手上握蛇，这一点与埃及荷露斯等神的造型一致；而且他身边的两个侍从都是鱼身或蛇身，他头上还有一对象是牛角的装饰。这些都说明了它的古老渊源。

这是两河流域亚述遗址中考古所得，这个女人形象的脚下是两只山羊，其上有两只秃鹫。这种象牙雕一般是地中海东北角的叙利亚或腓尼基人的贡品。时间为公元前8、9世纪。同时挖掘出的雕像显示，豹皮是当时人们的时尚物品。而中国的西王母传说中常提到西王母身上的豹类装饰。

很有意思的是上面还提到这3个孩子的颜色是黑、白、黄，我相信这是早期人们对于人类学的初步总结，多数的人种就是漆黑的人、雪白的人，和混血的不黑也不白的黄种人。这最简单，涵盖了所有的人。今天不严格地话也可以继续使用这个三分法。

从“象雄”穿过印度恒河是到波斯湾的最近途径，波斯湾与象雄的距离和四川距离象雄基本相等。

阿里地区名字为“狮” 的地名很多，如“狮泉河”，“狮多”；所罗门的象征或图腾就是“狮子”，萨巴文化同样。“狮子”与“鹰”都是萨巴的主要图腾，与王权有关。假如说示巴女王是鸟，那么所罗门就是猛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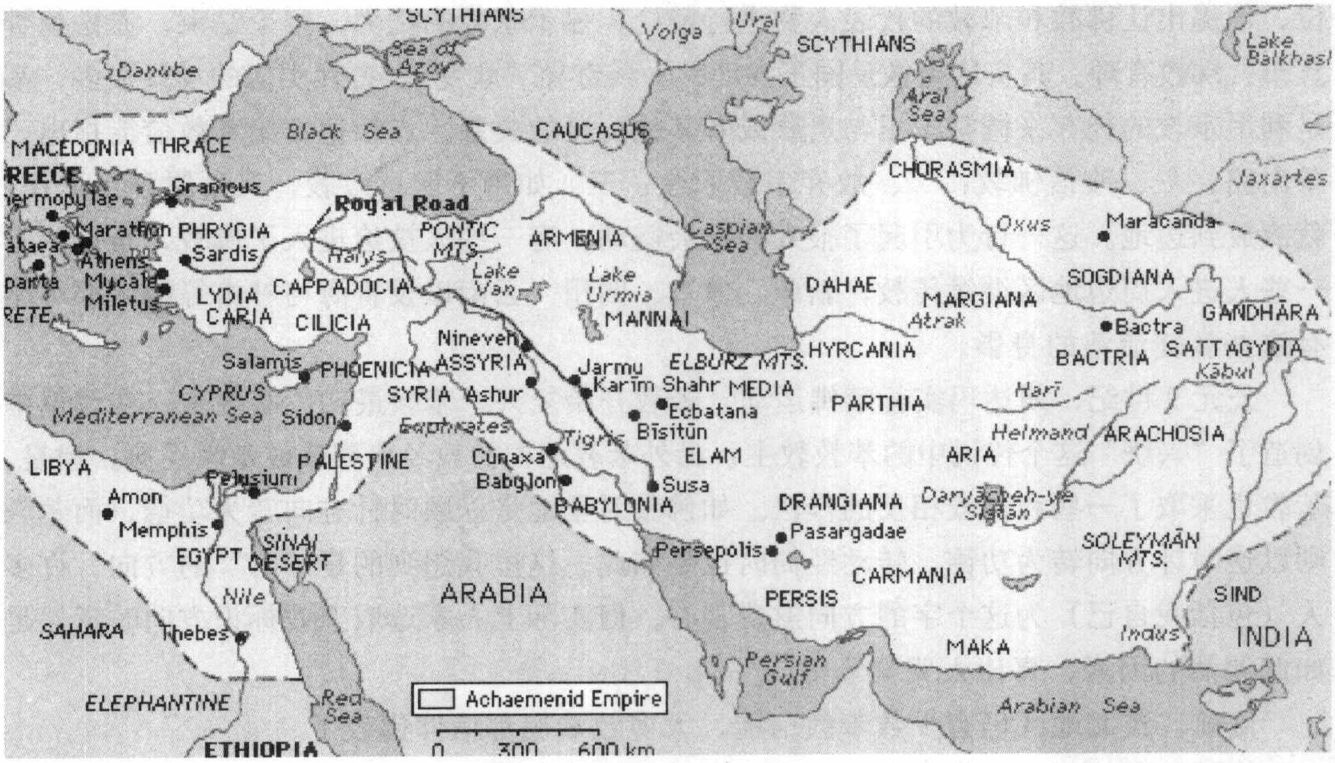
古代壁画中的西王母

阿里地区今天还有一条“象泉河”，在临近地区还有一条“马泉河”，这说明了“狮子”、“大象”以及“马”这些图腾对古代象雄人的重要性。

苯教在西藏兴起的最初阶段，大量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就生活在与阿里接壤的波斯这里，一位犹太女人甚至做了波斯皇帝的妻子，我甚至怀疑部分犹太人可能直接融入了象雄文化。当时的犹太人属于波斯帝国，埃及人一样属于波斯帝国的臣民。假如寻找当时西藏的文化脉络依然可以通过波斯的袄教（即拜火教）来研究。

祆教与犹太教的教义曾经进行过深层次的交流，部分《圣经》甚至因为祆教的教义而改写，比如今天“魔鬼”(devil)这个词汇以及含义都是从当时的“祆教”中提取的，之前犹太教的《圣经》里没有“撒旦”这个词汇与概念。假如苯教真的来自于祆教，就不能排除犹太教对于苯教的影响。当然，来自印度教和佛教的影响也会很大，并且更直接。

在象雄地区发现过14世纪葡萄牙文写的《圣经》片段，这个现象可以告诉我们：即使在条件极其原始的古代，世界屋脊也并非与世隔绝的禁地，这里一样有正常的文明传播。再提前1000年，基本交通条件没有大的差异，我仍然相信万里之外的葡萄牙人可以远达象雄。



▲ 波斯版图 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时期，埃及与耶路撒冷全部都属于波斯帝国。在波斯之内的各不同板块之间的文明交流与传播更为便捷，这使犹太教与祆教直接交流成为可能。

苯教与佛教之争

今天纯粹的苯教已经不存在，与佛教的关系也由水火不容到交流融合，苯教的教义已彻底融入西藏人民的风俗中，与佛教文化难以区分。这与内地儒教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有相似之处。

苯教信仰万物有灵，所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宿、雷电、冰雹、山川、土石、草木、禽兽等一切自然物。

苯教提出，地有九层，天有九重，加起来就是十八层。有关“九重天”的说法以后又发展为十三重。“十三”在苯教中是个吉祥数字。

“天神”在苯教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传说吐蕃王朝的第一位王聂赤赞普就是“天神之子”，“天子”也，与中国内地的文化、甚至东亚的王室文化（如日本天皇）基本都一样，可以看做同源关系。聂赤赞普顺着天梯降到人间。以后的6位赞普在完成人间的事业后，都顺着天梯回到天上[①]。第八位止贡赞普在和大臣罗昂比武时被杀，这个天梯被割断了，从此赞普就再也不能上天了。不过这里的“天子”宗教意味更浓一些，与中东许多“先知”基本类似，如基督、穆罕默德等。

随着苯教巫师权力的膨胀，赞普的权力逐步被削弱。左右国政的巫师都是贵族子弟，世袭担任。之前的犹太教里的祭祀职位基本类似。

吐蕃王室与苯教的矛盾日益尖锐。按照正统的说法公元5世纪初，佛教传入藏区，我认为时间应该更早。松赞干布时期始，佛教受到王室重视。公元755年，赤松德赞即位，他提出让佛教和苯教的代表人物进行辩论，显示宗教的优劣。辩论结束，赤松德赞宣布：佛教有理。其实这更像是国王发动的一场奇异“政变”。古代类似的场景很多，都是利用宗教的扬弃来调整国王与贵族或者其他阶级的关系。赤松德赞给苯教信徒指出三条出路：一、改信佛教；二、放弃宗教职业；三、如果不愿意改教，又不愿意当平民，就流放到边地。这一行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震动，有一些人被迫进入了佛教，不排除有一些人进入周边地区继续传教，新疆、蒙古、四川、云南以及青海与甘肃等地区都可能有这些教徒流浪的身影。

公元9世纪，朗达玛实行禁佛运动，苯教开始复兴。苯教最初没有教主，在改革中创造了“兴绕”这个传说中的苯教教主；另外苯教还把佛教经典翻改成苯教经典。但是，苯教也采取了一些和佛教相反的作法。如佛教对圣地是以顺时针方向转为功德，而苯教则以逆时针方向转为功德，转动经筒时也是如此。这里我想到的是“卍”的方向，许多人（包括我自已）为这个字的方向煞费苦心，但实际上人家选取宗教标识方向时竟然是如此偶然的因素，真让人哭笑不得。

目前，藏北地区仍有少数苯教信徒，大多数藏民都信仰佛教了。

值得提醒的是，苯教并非是一个仅限于西藏地区的一个宗教，在中国甘肃、青海、四川省，还有印度、尼泊尔都有苯教的存在，所以也不难看出苯教的来源与影响范围。

卡尔雍仲

建议《易经》研究者注意西藏地区作为一条传播通道的可能。我在《历史也疯狂》中提过《易经》的哲学与信仰体系可能起源于尼罗河源头地区的“8神”崇拜。这一早期神话体系可能导致了“8”的多种形式，包括建筑。不仅“麦加”的另外一个名字从辞源上很接近“八卦”发音，而且耶路撒冷圣殿山上著名的清真寺也是“八角”，而它们就在阿拉伯文化系统内（考虑到尼罗河的源头埃塞俄比亚也属于阿拉伯人的萨巴王国）。西

① 从古今本的《竹书记年》里看，西周时期的帝王死亡称“陟”，也是“升天”的意思，是个同样概念，亦为同源例证。

藏拉萨有著名的“八角街”，甘南与藏区相连的交通要冲还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八角城”——卡尔雍仲[1]。这么多的“八崇拜”或“八角”一定存在有内在的统一性。

到过卡尔雍仲的旅行者说，该城有八个城角，“城堡是一个中空的十字形，全长大约两公里。”今天城中住着几户汉人和藏人。“这座古城的样式与中原的城池大异其趣，倒是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多少有些相似。即便是历史学家们也很难揭开八角城的身世之谜，因为这里发现的文物上至两汉下至明清”[2]。假如把这一系列“八”崇拜与汉朝的开放以及宗教信仰联系起来，或许不仅可以解释“八角城”的秘密，而且可以解释“八卦”的来历。

古代西藏是不可忽视的文明区域，它在一些时期承担着独特的文明传播使命，无数人在这个世界屋脊上行走匆匆，把文明的火把传播到南北西东。

一般人会误认为西藏今天与周边地区的文明差距在古代也是一样的。其实这是忽视了人类不同文明阶段地理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我曾经在《历史也疯狂》中分析过中国东、西部地区在过去几千年的“三千年河西三千年河东”突然转至的差异（即西部在早期为文明发达地区，今天却是东部发达西部落后），说明不同文明时期对于地理的要求是非常明确苛刻的，一个全新文明时代的到来几乎会在瞬间改变文明的平衡。西藏在古代与周边地区不会有太大的文明差异，甚至会因为僻静带来的和平环境而比外界发展得更好。但随着以科技与信息为特征的“交通时代”的来临，西藏突然就“落后”起来。

◀ 古希腊与波斯帝国的犬牙交错势必造成文化的深度交流

“雍仲”文化与苯教、佛教有密切关系。“雍仲”是符咒祭，雍仲也是苯教的标志。苯教因为“雍仲”特色甚至又名“雍仲苯”。上面的“八角城”名字就叫“雍仲卡尔”，道明了这个甘南小城与藏文化之间的关系。

---

① 藏语常有的雍仲其实也是个苯教用语，它特指一种太阳崇拜，“万字”。

② 取自这个地址中一位名叫田野的文字 http://travel.tom.com/2277/2278/2004115-34353.html

中国蒙古地区萨满教中某些话相信与苯教“雍仲”有一定关联。蒙古民族与藏族的连接地点在甘肃、新疆一带。最典型的连接点就是既像蒙古族又像藏族的裕固族了，有人分析他们的语言认为与尼泊尔人接近，这太有可能了，并且能够印证文明从南向北的传播。苯教里的“十”字和雍仲图案是“火”和“太阳”崇拜的象征。其实也可以理解为“雍仲”就是苯教里的“卍”符号，据说最初是圆圈，表示太阳，最后简化为“卍”。不过这个符号在中国出现得非常早，所以也不能在西藏一看到这个符号就认为它一定属于苯教。

藏族对“雍仲“的转向格外敏感，因为转经时苯教徒按逆时针方向转，苯教寺画咒时也画作左转的雍仲“卍”。佛教是右向雍仲“卐”。

直觉上看，苯教有浓烈的基督教痕迹。羊、太阳都是犹太教——基督教的象征符号，但是它们却都同时出现在苯教文化之中。不过关键的区别在于苯教是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而犹太教——基督教却只信仰一神。这让我们越来越多地想到一种介于萨满教与一神教、甚至有人认为产生了基督教的特殊宗教：拜火教（即祆教）。并且产生拜火教的国度就是古象雄的邻邦：古波斯。

历史背景下的波斯祆教

犹太教发源于非洲的古埃及，是摩西出埃及时带出来的。人类的宗教根源以及主要理论体系的发展就在地中海东岸以及北部地区，包括波斯与希腊。

希腊在2500年前的天文大发展给宗教带来了新的活力。我认为轴心时代的希腊文明给原有的古老宗教体系以强烈的震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革命。我相信许多宗教由此而产生，而有的古老宗教则开始进行内部革命。比如犹太教开始分裂出一些教派，最终在两千年前出现了脱胎换骨的基督教。祆教更是与轴心时代同时产生。科学与宗教相伴相生。

古希腊的天文成就有目共睹。希腊人是个海上民族，日月星辰是他们重要的航海指向灯。他们很早就开始测量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地球的圆周长也是他们关注的。天文的影响还推动了数学（主要是几何与“三角学”）与哲学的发展。

希腊文明是西方科学文明的真正源头。不过一般认为希腊文明来自古埃及的影响为多（别忘记埃及就在红海西岸）。最初我认为基督教可能使西方文明获得了更多精神上的超脱，使欧洲人成功摆脱了实用主义的庸俗，但是研究希腊天文学我才发现，奠定西方哲学思想的基础假如是从天文学开始的，那么这个仰望璀璨星空的“童年”应该会给这一文化带来深远的影响，其空灵的气质在大约2500年前就可能因为天文学的发达而成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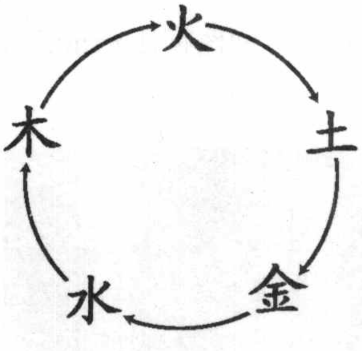
假如从公元前6 世纪开始考察，东亚文明确实稍逊西方一筹。古希腊的泰勒斯(Thales，约 624～547 BC.）曾预测过日蚀，计算出一年有365天。他还有多项重大发现，他的智慧让人惊奇。埃及法老让他测量金字塔的高度，他就在自己身影与实际等距时去测量金字塔的太阳阴影。

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 ，610～546 BC.）则提出了月亮光是对太阳光的反射的正确结论。他还说，太阳是一团纯粹的火，这也很接近事实。这一理论很可能有助于拜火教的教义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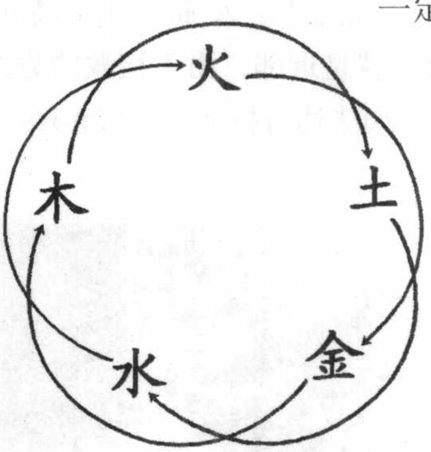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宇宙是一个包括各种天体的大圆球，中心有一个火球，圆形的太阳和大地绕中心火球运动。这种关于天体整体运行的推测为太阳中心说奠定了基础。太阳与火的神圣关系从这个理论中升起，与犹太教——基督教的太阳崇拜殊途同归。我怀疑希腊天文学家接受了大量古埃及的天文知识，并与他们的“太阳神”理论有某些相通之处，从而可能形成了“拜火教”的理论根据。并且从这里更能体会到，火、太阳、光明、星球的统一性。

古希腊人还认识到月蚀的真正原因。

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地球与反地球以及中心的火，这些元素构筑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神秘“十”。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几个奇怪的现象或理论让人怀疑与中国是否有一定关系。比如中国的《易经》就是以数来演算世界万物的一种“哲学”，数学就是世界，这个理念恰好是毕达哥拉斯的核心思想：数就是一切。另外，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推断，“十”这个符号尽管在数目上是“7”，但是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里它却被尊为“4”，“4”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最为神秘、神圣的数目，它与单纯的数字“4”不是一个概念，超越了数字“4”。该学派最著名的誓言就是“以神圣 4 的名义”(by the Sacred Four)。对此，我所联想到的是，古代中国的“十”意义是“7”，但同时“十”在今天却读“shi”（10），与“4”（si）非常接近。在中国南方 10 与 4 是同一个读音 si。这个奇妙的对应似乎在提示着我们什么，值得继续关注。



五行相生图



五行相克图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发起人是公元前 5 世纪的费劳罗，该学派并不是非常科学的学派，但影响巨大，而且其神秘性带有宗教性质。它不仅让我们联想到“拜火教”的成因，而且很可能中国的五行起源来自于这里的“五星”（金木水火土），转而为“五行”相生相克的中国道家理论。介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东西中国很多，或许我们统称其为迷信比较合适，假如我们还不能归结为愚昧的话。由于天文的独特性，人类早期的宗教信仰与天文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希腊天文学肯定也带动了许多宗教流派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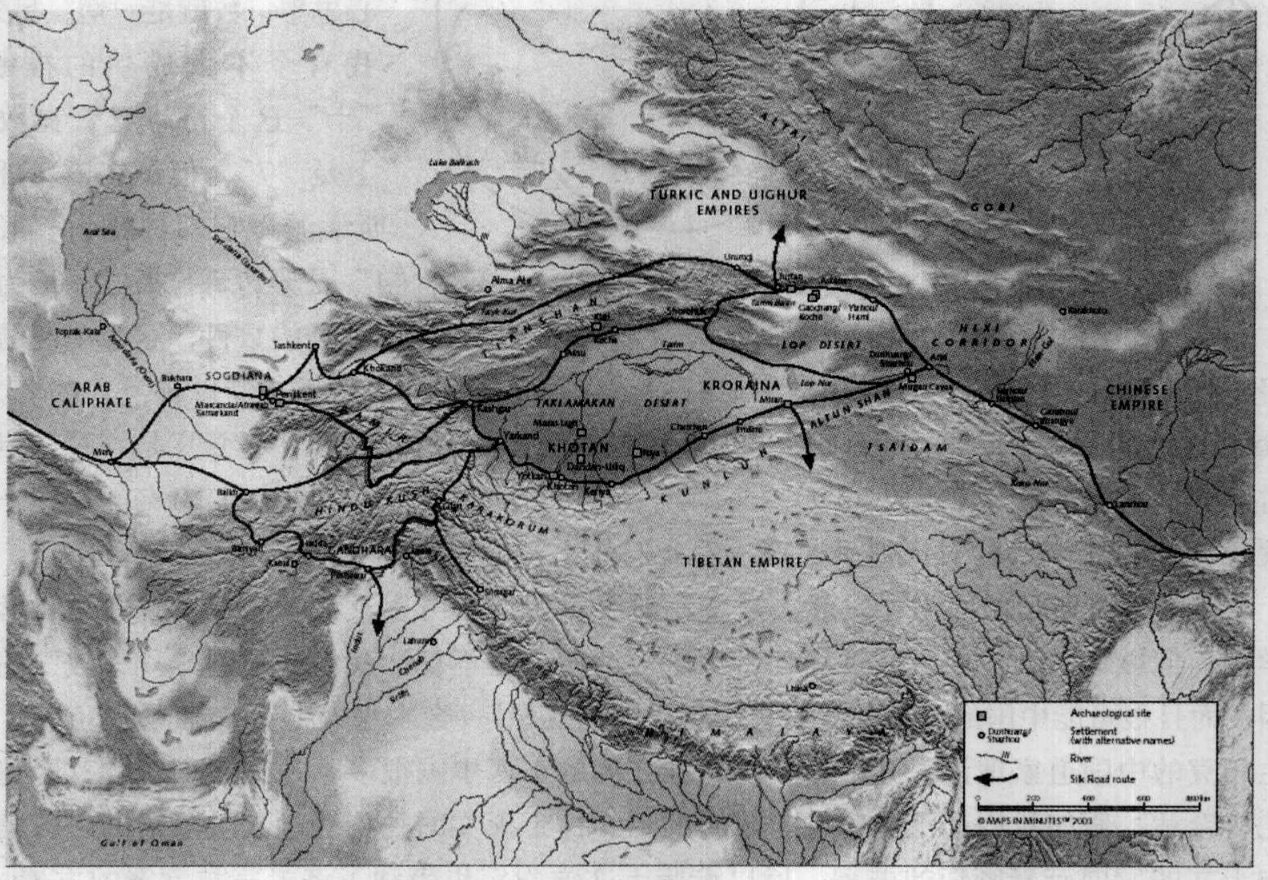
毕达哥拉斯学派尽管有天生缺陷，但摆脱了“地球中心论”实际上是人类认识上的飞跃，意味着人们在当时已经认识到地球只是天空中的一颗行星而已。不过这一理论体系很快就被柏拉图时代之后的人们抛弃。

被誉为“希腊化时代的哥白尼”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310～230 BC.）

第一个尝试测量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并正确提出地球面积小于太阳。他甚至天才地提出“太阳中心说”，认识到地球和行星围绕太阳旋转并进行自转。天空在希腊人那里不再是平面的图画，天空在科学的认识中被立体化。

“祆教”就是“拜火教”或“明教”①。有比较激进的观点说基督教也属于祆教，这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基督教主要是信仰《圣经》之《新约》部分的，而《新约》成书时间比较晚，多在祆教之后，而且当时犹太人就生活在祆教国家（波斯）。《新约》中耶稣明确被基督教义作为“光明之子”出现。即便是最正统的《圣经》研究者也承认后期《圣经》确实借鉴了一些祆教概念，不仅是“魔鬼”这样的重要词汇，而且“善”“恶”二元冲突在《新约》骤然激烈起来。而祆教正是一个以“善”“恶”二元冲突为标志的一个宗教。

“明教”之“明”取意译，“明”就是“火”；“火”也可以是“星”，就是“日月天体”。我认为“明教”除了“拜火”还具有明显的天文背景。这与其地理环境分不开，波斯距离希腊非常近，希腊是世界天文之都。小亚西亚半岛在当时也属于波斯帝国（公元前550–330年），波斯人与希腊人就是近邻，由于祆教的势力非常大，所以许多著名希腊科学家与天文学家也加入了祆教，如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赫拉克利图斯(Heraclitus)等。



波斯帝国期间的丝绸之路示意图。印度河当时属于波斯，后来属于印度，今天属于巴基斯坦。一个红色的箭头明确地指向印度河，说明这里是有一条通道的。

① 本书因为特殊之故，并不统一对这个宗教的称呼，但多称呼其“祆教”与“拜火教”。

2500年前，埃及与以色列皆归波斯帝国，世界上最发达的科学文明也必将进入波斯寻找最大的“消费市场”。世界范围内的天文学在波斯帝国初期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时的宗教不可避免地具有天文这一“科学”特色，假如没有天文学的神秘加入，那样的宗教肯定是“落后的”宗教、遭人唾弃的腐朽宗教。波斯袄教的产生正是在这样背景下的文明产物。以星辰崇拜为显著特征的“祆教”，就这样横空出世。

应该说明的是，在这个时代之前，与希腊天文学紧密相连的希腊神话系统可能已经在3000年前完成，星座系统在这个时期已接近尾声。有人说，祆教的早期也应该从3000年前开始算起。这两个隐约出现的文化大事似乎都在暗示着一种可能：轴心时代的天文科学发展更有力地推动了祆教等宗教发展。

罗马人在公元前3世纪杀死了阿基米德，这桩人类科学史上的悲剧标志着希腊文明的结束。当然波斯帝国也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而灭亡了。失去了帝国的祆教从此进入了它的传播期。

大批希腊人信仰祆教，也为日后罗马帝国接纳基督教奠定了“文化”基础。几百年后的基督教也正是从罗马帝国这里获得了新生并传播到整个欧洲，这并非偶然。无论基督教还是祆教都崇拜“光明之子”，皆鼓励信众做“光明的儿女”。但无论两者怎么接近，祆教与基督教还是有本质的差异，所以在《新约》里我们也会看到许多的文字是让人识别“真假”传教士的，不用说祆教受到基督教的排斥，基督教也受到异教徒的排斥。祆教与基督教这两种宗教都有极强的排他性，所以它们彻底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这两种宗教的特征接近是由一连串的文化交融历史背景决定的。

围绕祆教源头

介绍祆教的文章很多，我随便摘取了两篇这样的文章做基底，加上一些史实补充和我个人的一些推理，读者简单可以看出祆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某些联系。

祆教(Zoroastrianism)是古波斯的宗教，对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回教都有深远影响，其实对于中国同样如此，只是后来中国人一直不知道。有人认为祆教大约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其创始人为“琐罗亚斯德”（Zaroaster，亦作Zarathustra，约公元前628～551人)，为祆教“先知”，故祆教又名“琐罗亚斯德教”。但这只是一种说法，祆教的起源争论颇多。

比较著名的一种说法是，祆教产生早于公元前1100年前后的阿黑门尼德时期，并在当时被尊为国教。有关起源的争论只是早期萌芽与晚期成型发展的问题。伴随波斯帝国产生，琐罗亚斯德使祆教走上了新的历史舞台。尽管祆教有如此深远的根源，但人们却一直认为祆教只是一种区域性宗教，没有获得过世界性的信徒。但我认为，祆教以另外一种方式获得了传播，并且一直活跃在世界各地，只是隐蔽地被各种不同的教派“吸收”了而已，它的名字不在，但精神长存。

波斯帝国时期也有波斯国王信奉祆教。祆教在波斯经历过政教合一阶段，即便在后

来还保留了祆教人士废立君王的特权，可见祆教的政治地位之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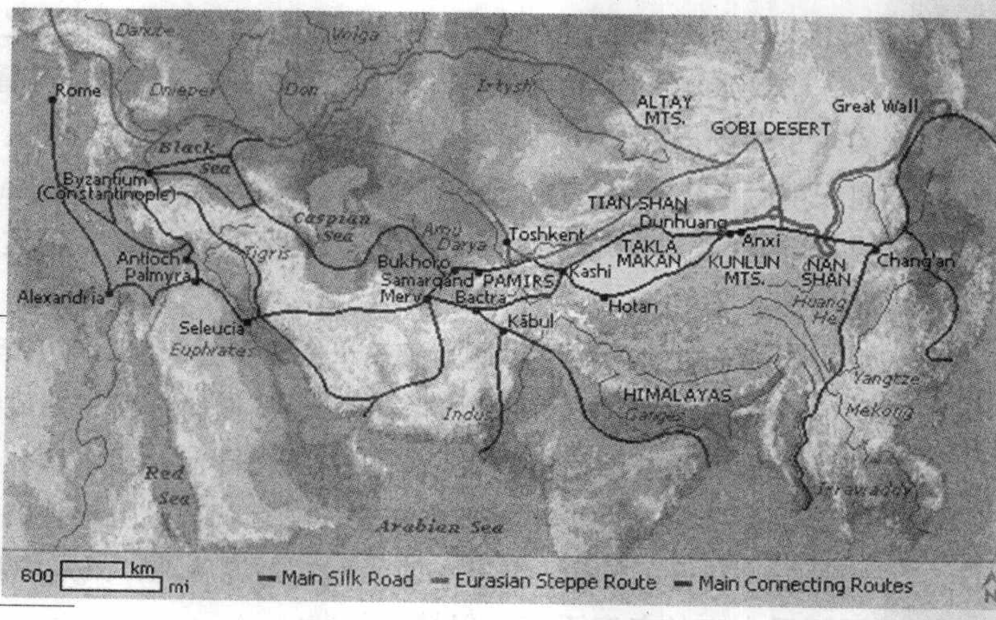
波斯后来被塞流斯将军统治，其中的“塞流斯”与“天狼星”（Sirius）接近，或可注意对于“天狼星”崇拜的宗教根源。

祆教对希腊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具有深刻的影响，波斯的宗教与希腊的科学结合在一起是文明的大融合。有人认为祆教使希腊人开始相信灵魂可以升上天堂，这个影响给希腊的星座系统带来了浓厚的宗教与神话意味，天人合一首先在希腊的星座体系里实现。假如事实如此，那么中国道教的“羽化升天”概念则亦可能源自祆教。

祆教对基督教最著名的影响结果可能就是导致了“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的产生。现代学者均以“诺斯底主义”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而基督教中的新教却视“诺斯底主义”为异端。祆教与基督教的难解难分由此可见一斑。今天世界上最大的节日“圣诞节”一般人认为是基督教节日，但实际上那天是祆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的生日①。还有，第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一般人认为是伊朗北部的阿美尼亚（Armenia）。为什么独独会是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这一历史现象亦非偶然。

“诺斯底主义”是产生于大约两千年前的一个宗教团体。“诺斯底”的希腊语含义是“知识”。诺斯底主义同时也是一个哲学系统，建基在希腊哲学之上。它是彻底的二元论，强调物质是恶的，灵魂是善的，灵界与物界处在永恒的对抗之中。因此，最伟大的神是不可能创造这个世界的。至高的神则是完全的灵体，《旧约》里上帝创世，表明上帝是次等的神。这些看法还影响了他们对耶稣的观点。人既然是物质，就是恶的，身为善灵，就不可能以肉身在世上生活，因此耶稣不曾为人，一直是灵，只是以肉身显现一下。这种说法被称为“幻影说”。另一种说法是，上十字架的耶稣并不是神，而是人，基督曾以鸽子的形式降临在耶稣这个人身上，但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就已离他而去（后来的回教认同这个解说）。由这些观点又影响到他们对“拯救”的不同看法。

基于“知识”包含对自我真性情的认知，因此有些“诺斯底主义者”会鼓励信徒放任犯罪以获得真知，这些放任中当然涵盖了性的淫荡。但这种观点会跟“诺斯底主义”中“肉身是罪”的观点互相冲突。更多“诺斯底主义者”对性与婚姻采取苦修



这是一张古代交通道路图。红色者为丝绸之路。但其他的通道肯定在远古自由迁徙时期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因为是否通行首先是地理上的指标，然后才是政治因素。

① 信息提供者：伊朗留学归来的荣松先生，其专业为历史学。

态度，他们主张尽量不要生儿育女，以免制造更多被黑暗势力囚禁的灵魂，女人被造是罪恶的渊薮，因此他们企盼有朝一日女人全被改变成为男人。尽管存有这种观点，但从文献中考证，在他们很多派别中女信徒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①

“诺斯底主义”由于强调个人超越世界的诉求，所以特别能获得知识分子的青睐。不过“诺斯底”的“知识”并不是智性的“知识”，而是一种“心灵知识”。②

诺斯底主义很快遭到了正统基督教的排斥并被扫地出门，但是有关的哲学与神学辩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个教派是如此奇特而引人注目，甚至因为它的心灵部分的哲学探讨，有人认为是由这个争论而发展出了现代心理学。

直面祆教

祆教最初教义为口传心授，没有书面记载。后来渐成文字，名为《圣特－阿维斯陀》(Zent-Avesta)，又名《阿吠陀经》(Avester)的文本是研究这一波斯宗教的惟一典据。里面只有诗歌部分是出自其教主瑣罗阿斯德，其他部分作者多不详，如《智慧之灵》(menoki-i Khrat)，和《阿替拉华夫传》(Book of Artay Viraf)。

从辞源上看，汉字的“祆教”之“祆”(xian)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祆”的意思在原宗教的意思是“天神”，别忘记西藏最初的国王也都是“天神”。实际上我看“祆”(xian)就是中国的“神仙”之“仙”(xian)，意思与发音都完全一样，这只是个拼写上的“误解”——中国早在明确有“祆教”之前就听说了他们的“神仙”概念，并且有了它的文字“ ”，后来才有“祆教”这一完整的宗教概念，故而两者产生了差异。让我说“祆教”直接翻译为“仙教”才好。不过，看来“祆”确实是个很年轻的字，我在《说文解字》里没有找到这个字。用正统的说法，祆教是公元6世纪传入中国的，这根本是天大的错误，祆教应该在创始之初就进入到中国的西北。不过“祆”字据说造于隋唐时期。

“天神”、“先知”构成了“祆教”核心人物，而“神仙”与“天师”是中国的“道教”人物，这中间其实并无很大区别，只是经历了一个时间与地理跨度之后进行了中国本土化而已。当然，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中国人并没有简单地接纳祆教，其中有着太多曲折的发展。

祆教既不是一神教，也不是多神崇拜，它是善恶二元论宗教。教主瑣罗亚斯德出生于伊朗北部，这时犹太人恰好被俘至伊朗北部，无论是祆教本身的教义还是这位教主的出身都颇让人怀疑其犹太背景。

在祆教的教义里善总是战胜恶而获得胜利。“万事得”这个善神虽是至高无上的，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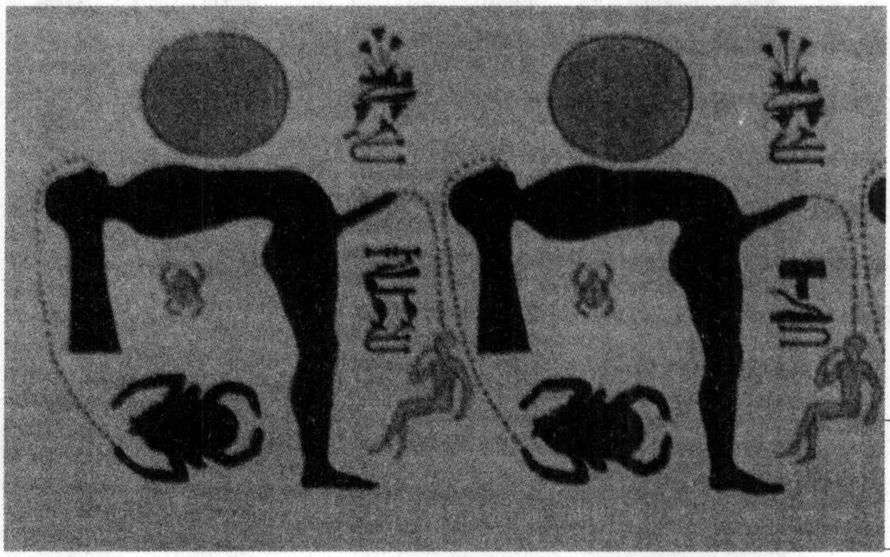
① 有关诺斯底介绍性文字文字参考陈韵林先生在网络上的文章。

② 由这些怪异的理论，我首先想到过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形象，比如竹林七贤等。西方到中国的漫漫长路，还是可以过滤许多思想的，任何一种理论到达中国的时候必定已如强弩之末。不过，“强弩之末”是在百家争鸣的文明时期的一种可能局面，假如在沿路一片真空的蒙昧时期呢？任何一种文明形式在中国的落地是不是会是相反的“强弩之首”呢？

在他之下，一切均落在真与假(Asha——Druj)二神的对立和抗争。祆教认为人有自由意志，但死亡与败坏的势力是如此巨大，无处不在，人事实上只能活在鬼魔的淫威下，难言自由选择。祆教有极强的宿命论。

善神阿胡拉·米兹达（即“万事得”)，现代波斯语为Ormuzd，译为“欧尔米兹德”；恶神安哥拉·曼纽特，现代波斯语为Ahriman，译为“阿里曼”。善恶之间的斗争长达12000年。

祆教的创世说是这样的：在第一个3000年中，阿胡拉的光明世界与安哥拉的黑暗世界并存，当中有虚空隔开。黑暗向光明世界进攻，于是创世过程开始。在第二个3000年开始时，阿胡拉预知未来，约定双方持续斗争9000年；安哥拉只能知过去，同意这一约定。阿胡拉预言斗争的结局是黑暗世界消亡，安哥拉惊慌失措，堕入暗界而瘫痪。阿胡拉于是创造天空、星辰、月、日等，最后是原牛和原人迦约玛特（Gayomart)。安哥拉再次进攻，创造出毒蛇和各种害虫，杀死原牛。原牛的骨髓在地上生出植物，原牛的种子生出各种有益的动物。安哥拉杀死原人，原人的种子藏在地下，40年后生出大黄，从大黄中生出人类的祖先：他们是一对伴侣，玛什耶（Mashya）和玛什耶那（Mashyana)，之后他们与黑暗混战。在这善与恶的斗争中，人有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或是以善念、善行、善言参加善的王国，或者相反加入恶的王国，死后各有报应。善者死后走过裁判桥（Chinvat）进入光明天堂。恶者过桥时桥面变得如同利刃，使他们堕入地狱受苦。那些善行与恶行相抵的人留在“中间地带”(Hamestaghan)，无痛苦亦无快乐。在这人的世界开始后的3000年，琐罗亚斯德出现，以善的宗教教导人类。余下3000年，每一个1000年末均有一个救世主，即索什扬（Soshyan)，他是从琐罗亚斯德藏在湖中的精液里生出来的。三个“索什扬”最后一个出现并进行战斗时，历史传说里的英雄和妖魔都将复生参战。最后所有死者都会复活。彗星戈契希尔（Gotchihr）降落在大地上，燃起大火，一切金属熔化为浆液，形成滚滚灼热洪流。所有的人，生者与死者都要度过洪流，善者如同浴于温暖的乳中经过考验和净化进入天堂。诸神和妖魔进行最后的战斗，结果失败和消亡，恶魔永久堕黑暗深渊。最后大地成为净化了的世界，安逸宁静，是为弗拉什卡德（frashkard)，伟大的更新。因此，祆教以“火”为“光明之神”阿胡拉的化身，故其俗以“拜火”为崇尚神之表现。①



◀ 古埃及的神话中表明了“太阳”通过“神”以“精液”生产万物的关系。

① 以上资料来自《小隐在线历史论坛》一位名为Taning的网络文章《拜火教简说》。本节主要参考了此文。

这个善恶之争，光明与黑暗的搏斗，很可能导致了中国春秋时期就已开始的“阴阳”之说①。上面的情节中请注意“3”个救世主“索什扬”，这个数目对应了苯教“大鹏鸟”的3个孩子，同时也对应了西王母的“3”只青鸟。“3000年”的阶段则对应了西王母的蟠桃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不过我不认为道教中的“盘瓠”或“伏羲”就是“阿胡拉”，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做中国的“先知”。每个宗教的不同首先就是这个“先知”的不同，假如一样中国的道教就干脆直接叫祆教好了。每个门派的创始人总是既吸收以往成功的宗教但又有独创，基本上让人看不出其创作根源在哪里同时又有自己的体系，这就算是“得道”了。新宗教的产生是一门微妙的拼凑技术，张道陵肯定对这门“技术”十分精通。

阿胡拉预见到安哥拉将破坏他创造的宇宙，事先创造了6位天神，充当他创造并保护宇宙的助手。这6位天神分别是：1、巴赫曼，在天国代表阿胡拉的智慧和善良，后被奉为动物神。2、阿尔迪贝赫什特，在天国代表阿胡拉的至诚和圣洁，被奉为火神，是宇宙和人类秩序的保护神。3、沙赫里瓦尔，在天国代表阿胡拉的威严和仁政，乃天空之主，守卫大地，负责救助穷苦百姓。4、斯潘达尔马兹，在天国代表阿胡拉的谦恭和慈爱，被奉为土地女神。5、莫尔达德，在天国代表阿胡拉的永恒和不朽，被奉为植物女神。6、水神。这6位天神为阿胡拉所创造，但又参与了宇宙的创造和保护。尽管名称和职司各异，但各神性质相同。也就是说，尽管他们各自有独立性，但共主于阿胡拉·马兹达，因而称为“七位一体”神。6位天神分别代表阿胡拉的各种优良品质，共同组成了体现所有美德的善界至上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善界神，如牛精古尔苏万、遵命天使斯鲁什和幸福女神阿希等。

祆教有“七大天神”，道教有“七大真人”，基督教也有“7个天使”。我相信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模仿，他们是相互学习借鉴的结果。

“7”崇拜大量出现于祆教。他们还有“七大节日”，起源于伊朗雅利安人的原始信仰，由琐罗亚斯德将其发展同“阿胡拉·马兹达”与六大天神联系起来：最重要的节日是“元旦节”；“仲春节”献给大地之神；“仲夏节”献给水神；“收谷节”献给大地之神；“返家节”献给植物之神；“仲冬节”献给动物之神；“万灵节”献给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

祆教非常注重个人道德，强调“善行”，这点与佛教很接近。“善行”的目的是“厚生”，即使生活富足。而要生活富足，就必须努力农耕和畜牧，这是高尚的职业，宗教上的功德。它反对斋戒禁食，理由是“吃不饱就不能完成宗教的艰巨任务，吃不饱就不能拼命劳动……宇宙以食而生，以不食而死。”中国的“民以食为天”在这个背景之下恐怕应该有新解。祆教的积极态度与基督教很接近。

祆教还创制出“三善”救赎说：“善思”、“善言”、“善行”。“善思”是指要笃信和崇敬阿胡拉马兹达，不允许妄自尊大，不可亵渎神明，不得心怀邪念。“善言”是指，要歌颂和赞美神主“阿胡拉马兹达”及其六大从神，严守口戒，不得撒谎、行骗、争吵、谩骂，不可妄行污蔑和诽谤。“善行”是指要虔敬诸神，严守教规，不犯戒律，勤事耕作和养蓄，力行乐善好施、扶弱济贫。信徒儿童15岁视为成年，要举行成年礼。届时，成年

① 梁启超认为阴阳五行源自战国前后，何新认为源于晚周秦汉之际袁据何新《诸神的起源》46页。

少年腰间系上长带，共绕三匝，前后各扎一个四重结。此圣带为祆教徒标志。绕腰三匝意为善思、善言、善行等“三善”之礼。

老子提出“三绝”，庄子提出了“三境界”。不知道是否他们之间有文化上的继承关系。

祆教之主要祭拜行为有[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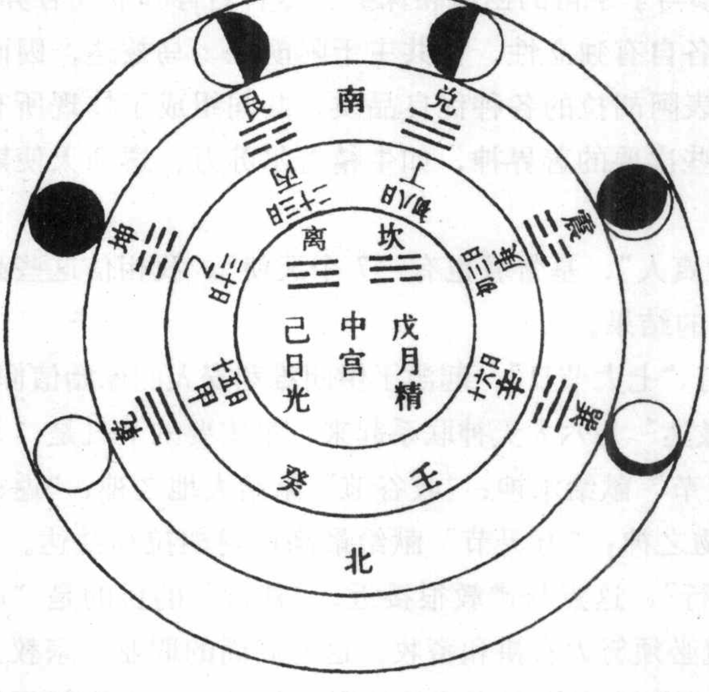
1、祭火：火为光明神阿胡拉马兹达之化身，故为祆教信徒最重要之祭祀。祆教建有专门之火祆祠，遍布各地。而祆教徒每日必祭火三次，于自家炉膛献祭，祭品由清洁的木柴、香料和一小块脂肪组成。

2、祭水：伊朗因为沙漠化，水源异常珍贵。人们认为水是诸神的创造，所以定期向水献祭。祭品由牛乳和两种代表水的滋养的动植物组成。

3、诸神祭：伊朗人也向诸神献祭，以求得今生来世的各种幸福。祭品有植物和动物。动物以牛、马为主，植物最主要的是豪麻[2]（一称“胡姆”）。

遍布中国的“火神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景观，每个在传统社会中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火神庙”文化。“火把节”是中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重大节日。他们与拜火教有关吗？

世间有如此多的自然现象，为什么中国人独独选取了“火”来崇拜，并且其影响之大，不得不令人怀疑这是“拜火教”与“道教”在中国的共同传播功劳。火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是事实，但以类宗教的形式传播开来还是让人起疑它是否有宗教的背景。



▲ 卦图

正统的看法是，“明教”于公元6世纪才进入中国，并且据说是以佛教的外道进行入中国的。我认为祆教思想早在先秦就已进入中国，但当时是否以一种完整的宗教面目出现还是个问题。秦朝的影响也可考虑是透过苯教发生作用的，两条途径都需要再检验。祆教的极强“排他性”是秦朝为什么一定要清理“儒教”的原因所在吗？祆教的接纳有可能直接导致了“焚书坑儒”的事件发生。如此极端的历史大事除非来自宗教、政治，否则不可能发生。要检验祆教是否进入中国，看阴阳、五行进入中国的时间就可以了。我认为阴阳、五行是随着这一时期的波斯与希腊的宗教与天文思想进入中国的，后来它们又与八卦《易经》思想汇入道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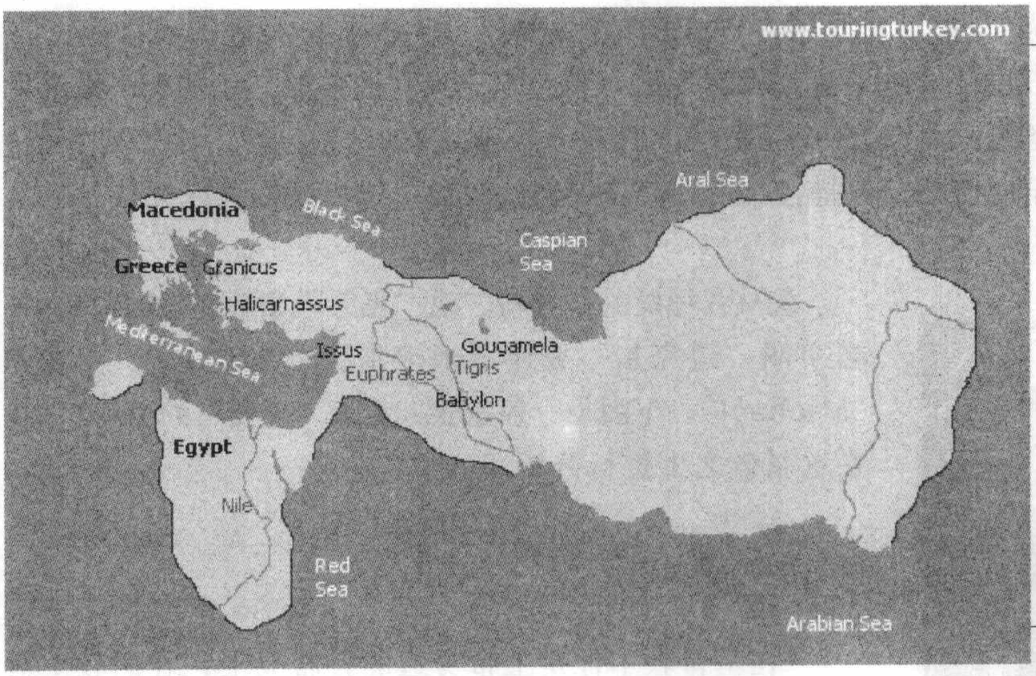
① 本节多处资料参考于一篇无署名文章《拜火教简说》。

② 这一点请先留意，我们在后面将注意到“豪麻”是个特殊的含有宗教意味的祭品。

“祆教将一天分为五个时辰，分由五位神祇保护。每一时辰都须祈祷，一日共五次，称之为“班达吉”（意为“服侍”）。这里的“5”对应于中国道教里的“5”崇拜。并且从这些祈祷程式上也能看出祆教对于后来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有“五功”正是每天“五次祈祷”。

“祆教徒强调肉体洁净，每日每次祈祷前必先清洗脸、手、脚。如遇重大仪式，必大净洗，并全身换上新衣。祆教徒将食物分为可食与不可食两大类，入口食物，要保持清洁。食器不可混用，食品分而处置。”这些都更透出对日后伊斯兰教的影响。在今天的日本神道教中，进入寺庙行礼之前也要进行清洗以表明圣洁，或许都是从这个久而远的源头传播过去的传统。

“尸体为不洁净物，故人死后，会被送至天葬台，任由飞禽走兽啄食。余下骨殖被收入石壶，另外埋葬。……祆教徒洁净之礼异常繁复严格，多者尽有‘九天之濯’的洁净礼。”以上祆教教规可以看出祆教对于犹太教、伊斯兰教以及西藏苯教的特殊影响，尤其是让鹰鹫吞食人的尸体这样的“天葬”苯教习俗，假如不是宗教要求断难流行至今。祆教中的“天葬”中还有一种方式是让“天狗”吃死者的尸体。狗在祆教中是神圣的①。



◀ 很明显亚历山大帝国就建立在他们所推翻的波斯帝国之上，只是希腊被全部归入亚历山大帝国。因为这个帝国依托的文明是希腊文明，故而这个帝国也偶尔被称为希腊帝国（Greek Empire）。无论是波斯帝国还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都基本上与后来的中国接壤了。

我希望读者记住这一细节：琐罗亚斯德在42岁时得到大夏国王维斯塔巴的信任，国王成为祆教教徒，很多王族大臣也纷纷加入，这是祆教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祆教创始人的一个转折点。大夏国宰相娶琐罗亚斯德“最小的女儿”为妻。由于琐罗亚斯德就是“先知”或“天神”，无疑他的小女儿就是“小公主”了，祆教创始人早期传教不利屡

① 有关“狗”与“鹰”的崇拜其实非常古老，也是一种祆教的挖掘与继承。比如在古埃及以及其他地区“鹰”的崇拜遍及全球，并且肯定早于祆教发源。让秃鹫啄食死尸的习惯在4千多年前的苏美尔地区就有，并且是对英雄的一种崇拜仪式。而对“狗”的崇拜在古埃及也早就有，他们认为是某种神圣的化身，所以崇敬“狗”，这就是辛那波里斯（Cynopolis）人。比较有趣的是与之相邻的俄克喜林库斯（Oxyrynchus）人却崇拜“鱼”。崇拜的动物他们是拒吃的，但是邻居吃对方崇拜的动物，他们在要求邻居停止吃他们的崇拜者未果之后双方开始刻意吃对方崇拜物。中国某些少数民族是从来不吃鱼的，这应该查一查他们的习俗来历；但另外一些民族却又是特别喜欢吃狗肉的，或许他们都有些来历？

遭失败，但是自从小女儿嫁入豪门之后，祆教才迎来它真正的春天，骤然兴旺。

从种族上，有人认为祆教是伊朗与印度的雅利安人创造的宗教，是从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时代的“过渡型宗教”，它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今天的祆教确实不是大教，估计与道教所面临的惨淡局面差不多。

在伊朗本土现存有大约20万祆教徒。有一支波斯祆教教派曾经流亡到波斯湾的荷莫兹岛，然后辗转落脚于今天的印度孟买，成为“Parsiism”（波斯系拜火教徒）部族，现在大约10万人，他们与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时一样以宗教获得民族凝聚力。

“天使”与“盘王”

“青鸟”是世界性的灵鸟形象。它的身影遍布几个主要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祆教、苯教、道教，甚至希腊神话。我认为“青鸟”的的原型可能是《圣经》里的一个天使，或者是祆教与苯教教义里“天葬”使人升天的“鹰鹫”，以及它们的综合。甚至以内“青”实际为“丹”，所以还有“凤凰”的意味。

《圣经》里的“天使”都是有翅膀可以飞的，符合“飞天”的条件，并且有“报信”、“告知”的职能。《圣经》的“天使”概念年代更悠久一些，《旧约》已有，比如其中有3个天使告知亚伯拉罕的情节。但是在《新约》获得新的发展。或许我们可以说祆教也参考了《圣经·旧约》。

最被我怀疑的“青鸟”或“飞天”原形在《圣经》中，名字叫“迈克尔”或译“米卡尔”、“米迦勒”，英文为“Michael”。下面是一篇宗教人士谈“天使”的资料[①]，我在这基础之上进行分析。

◀ 天使“迈克尔”

“在基督教中他是上帝身边的首席战士；在回教中对他有‘炽天使、力天使及大天使’三种说法。米迦勒与埃及神话中的‘天狼星’之神‘塞流斯’是为同一神。他是世界陷入乱世时必会出现引导世人的大天使。在伊斯兰教中，对米迦勒的描绘是：‘翡翠之翼、番红色之发、俱百万张脸与口、舌，会百万种方言，为人寻求阿拉的赦免’。《古兰经》记载米迦勒为信徒之罪而流泪，而生出智天使。”

这些记载显露了这个原形与中国道教供奉的第一大神“盘王”的关系，“盘王”在我的推测体系里正是天空第一明亮之星：“天狼星”。在道观里“盘王”坐第一把交椅，把盘古做为祖先的多是中国南方人，这个特殊的地理特点可能增加了苯教对道教的影响。

① 本节中凡引文来自一篇署名为STORMDAI的文章《回教、祆教以及其他天使》，来自：http://bbs.chinagamedev.net/archive/index.php/t-358.html

苯教就流布在长江上游以及澜沧江上游附近。苯教的“大鹏鸟”正是“青鸟”，“米迦勒为信徒之罪而流泪，而生出智天使”的情节与苯教“大鹏鸟”流泪成湖及生三鸟有雷同之处：眼泪有神效。

这里当然存在问题，中国的道教与苯教都产生于公元前，而伊斯兰教却产生于公元7世纪。但不要忘记《古兰经》的蓝本是《圣经》，并且《古兰经》同样受到袄教的影响，这是定论。所以不能认为一旦属于《古兰经》的东西就是发生在公元7世纪，开创伊斯兰教的人实际上最初多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们会接受许多旧有的基督教传说，“天使”就是这样。

中国神话故事里有“盘古开天地”的说法，这个故事来自哪里？部分来自《圣经》。上帝用7天时间“开天地”创世，他曾经找“7个天使”做帮手，这个“米迦勒”正是“开天地”的天使之一，并且是“天使长”，为天使之总长，可以理解为仅次于上帝的人。盘古与女娲一起在中国创世“开天地”，时间恰好也是“7天”，与《圣经》一样。

《创世纪》中神在第一日就创造了天使作为其创造天地的帮手，这些被称为“创造天使”的天使有七位，最常说为：犹菲勒、亚纳尔、然德基尔、萨麦尔、拉斐尔、加百列和米迦勒。

这七位天使又分别掌管了七大惑星；在萨麦尔堕落后，六位又皆住于神之下的第六天。

犹菲勒 土星

然德基尔 木星

萨麦尔 火星

米迦勒 太阳

亚纳尔 金星

拉斐尔 水星

加百列 月亮[①]

“袄教最高神亚夫拉（即‘阿胡拉’）手下的七大圣灵，字意有‘最高的善’之意，直隶于最高神之下，他们不是神也不是生物，其性质和地位和基督教的‘大天使’有异典同工之妙，为世界的正义和真理而战。”

七大圣灵为：

斯拉欧加——Sraosha 服从（代表动物是公鸡）

沃夫·马南——Vohu Manah 智能

艾霞·凡许达——Asha vahishta 天则

爱尔麦蒂——Armaiti 虔敬

古钖拉·赖扬——Khshathra vairya 权威

汉鲁凡戴——Haurvatat 完美

阿米雷戴——Ameretat 不灭

中国某些道教流派中排列的“七星”可也以对比另外一方面的情况[②]：“七星灯中的

① http://bbs.chinagamedev.net/archive/index.php/t-358.html

② 参考徐祖祥文《论瑶族道教的教派及其特点》。

第一盏为贪狼星（疑为“天狼星”），第二盏为巨门星（怀疑为“厄门”之误），第三盏为禄存星，第四盏为文曲星，第五盏为廉贞星，第六盏为武曲星，第七盏为破军星。

上帝的“七个天使”帮手，祆教里他们是“七位一体”，在中国的道教里成为“7个真人”，以及“七星”。

右手剑、左手秤是米迦勒的标准形象。明朝周游《开辟衍绎》：“盘古氏，左手执凿，右手执斧，犹如剖瓜相似，辟为两半。上半渐高为天，含青黄赤白黑，为五色祥云；下半渐低为地，亦含青黄赤白黑，为五色石泥。”我们有理由认为“盘古”确实选取了《圣经》中“米迦勒”的部分形象，并且其任务同样是“开天地”。

“青鸟”、“天狼星”、“塞流斯”，中国的“盘王”与这个“Michael”（天使“米迦勒”）有许多相象的地方，不过中国人只选取了其中部分特征，所以总体看起来他们既像又不像。前面我们说过，一个好的教派开创者肯定是拼凑高手，而不是全盘照抄，所以“盘王”是个综合了多种宗教和神话传说的人物，他不可能是个一呼即出的人物，否则何来其神秘性。现在我们还不算彻底解开盘古的秘密，最终从语言角度揭开这一谜底的地方还在“天上”，后面我们将要说明为什么会有“盘古”、“庖牺”这些名字的出现。我们需要找到所有的当初盘古被拼凑的碎片才算结束。

我认为在中国应该很早就有盘古的传说，它几乎与祆教同期就随着波斯商人来到了中国。甚至老子所在的（西周晚期或者东周早期）时代可能就有萌芽思想传播到中国来。比如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刍狗”实际上是当时百姓敬奉的一位与狗有关的神仙。“以万物为刍狗”实际上暗示了当时的“刍狗”这个信仰体系有“万物有灵”的思想。

老子还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对于“礼”的坚决排斥似乎说明他是与儒教相对抗的另外一个教派（雏形），这也是为什么老子的著作会在后来被直接拉进“道教”的原因，因为他实在与道教是一个根脉，尽管那时还没有道教的说法，甚至可能还没有祆教的说法，但是一种祆教的萌芽思想体系肯定早就有了，我相信祆教萌芽期有3000年的历史。

“火之子”与“火神”

盘古很可能还吸取了另外一位“天使”的一些特征：“来自犹太传承中的阿撒兹勒(Azazel)，又作Ibris，Eblis，Halis，字意即为‘绝望’之意。神话中传说他原为魔灵撒旦，被天使们抓住后，经过自身的奋斗做上了‘大天使’的职位。伊布利斯依‘不向神以外的偶像崇敬’为由，说‘火之子焉可拜土之子’因而被罚，变回原来的魔灵在人间游荡专吃人们死后的灵魂。”从以上还可以推断出Eblis这位“天使”同时是位“火神”：火之子。

对于“火神”，中国还有一个专门的神话传说。主人公并非“盘古”或“伏羲”，很像是这里的“Ibris”或“ Eblis”。传说在帝喾为商之首领时，他看到商地没有火，就让

儿子阏伯到中原任“火政”。阏伯为保存火种非常尽力。他死后，人们就在他保存火种的土台上修了火神庙（或称“阏伯祠”，又称“火神台”）。阏伯在另一则传说中又成了盗火英雄：他原是天上的“火神”，因偷向人间投放火种而违犯天规，天帝把他贬到凡间为民。阏伯从天上下来时，偷偷将火种藏在身上，带到了人间。时隔不久，阏伯盗火的事让天帝知道了，于是，天帝发了一场洪水，要淹没人间的火种，惩罚阏伯。地上的洪水像猛兽一样，吓得人们四处逃散。阏伯为了保存火种，筑起了高台，　搭起了遮雨水的棚子，独自一人留在高台上看守火种。洪水退后，当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的时候，高台上的火种还燃烧着，阏伯却饿死在火种旁。这篇神话中的阏伯明显具有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这个盗火英雄的身影，并且希腊神话中的大洪水恰好发生在“普罗米修斯”造人之后。不过　“阏伯”　这个名字却透露出，这个传说只是与希腊神话同一个根脉体系，但却不是直接取自希腊神话。“阏”在汉语中有两个读音：e，或者yan，我推测它也有可能读yu，难道没有人想到中国的“火神”“阏伯”（Ebe）就是犹太人的“火之子”“Eblis”吗?

《利未记》十六章9、10：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拈阄归与阿撒泻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与阿撒泻勒。

中国人一般将“Azazel”翻译为“堕落天使”，在《旧约》中，赎罪日那天会给他送去一只替罪羊。在英国诗人弥尔顿写的文学名著《失乐园》中“Azazel”就是与撒旦魔鬼一起反抗上帝的那个天使。

但是在伊斯兰教里他却是个“神灵”[①]：“one of the jinn”。

看来“Azazel”的身份很复杂，一会儿是恶魔的化身，一会又是“大天使”，“山羊”就是他的形象。

基督教里接纳的羊是“绵羊”而非“山羊”，“山羊”是恶的象征，“绵羊”相反。我想提示读者注意的是，无论在苯教里还是在道教里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公羊”对于他们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一直对此特征敏感。以前我错认为金牛教曾经在《圣经》里与摩西对抗，所以一看到牛崇拜的痕迹我就能指认出来他们是与基督教抗衡的萨满教，但一般看到羊我就会认为“羊”可能代表了基督教。我得说，这个判断过分简单粗暴了，不全面，比如“山羊”就是“撒旦”的化身。在苯教与道教（比如“青羊宫”就不是偶然的，宗教中任何特殊的色彩都有出处）里居然也发现了“羊”的痕迹，但它们却属于萨满教的范畴。在宗教的严格处，“山羊”与“绵羊”确有云泥之别。有“羊”符号出现的宗教不一定就不是萨满教，要分是什么品种的“羊”。

① 美国传统辞典（双解）。

另外，中国广大的地区里存在着用羊献祭的传统，几乎与犹太教的程式一样，直到我父母这辈都见证了这个传统。最初我认为是直接从犹太人那里传来的，现在看来也有可能是通过其他宗教文明传播过来的，比如袄教。到底如何，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但是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堕落天使”或者“火神”的概念早就在中国流传，它不仅成为中国的火神“阏伯”，而且中国人还保留了献“替罪羊”的程序。根据我母亲的叙述，她在20世纪上半叶所见证了每年一次的火神庙会，届时都会有一只神羊被献祭。据说这个羊被挑选养育的过程本身就很神圣，被献祭的当天还要在羊背上点燃酒火以验证是否灵验有神。

有人在另外一篇讲述“Azazel”的文章里说：“Azazel”有“炽天使”或“智天使”的位格，是看守天使群的指挥者、天使长。他是“挪亚时代和炽天使桑杨沙等等人类女子生下200个天使的天使之一。在Nephilim（看守天使与人类所生的巨人）遍布全地制造灾难后，身为指挥官的他自然应该负全责。据说他被其他大天使埋在耶路撒冷附近深坑中处以永远的幽闭处分，在最后的审判日里他将被投到“火湖”里去。

他拒绝为人类服务而说出的“火之子焉可拜土之子”因而受到惩罚，则是另外一个版本。同一个神在不同的文本里会有不同的说法，这位就是如此。

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应该引起注意，《圣经》里的神已经有“火”、“土”之分。“Azazel”之所以不向人服务就是因为“人类是土做”的，这也合乎中国的神话传说“人是土做的”；另外，他把自己看做是“火之子”等于承认自己是“火精”，有“火”的属性，渐渐与中国《太平经》里的“火精”靠近。羊、巨人、火精，都是中国道教的元素。具体到盘古，则需要多加一个“用土造人”。

在犹太教里他有7个蛇形头、12个翅膀，并且骑在蛇上。“7”、“12”、蛇，从盘古的“狗”到“伏羲”的“蛇”、“龙”之身，似乎这可以解释“伏羲”不一定是中国人自己篡改的形象？

总之，关于这个“天使”有许多的传说，他在《圣经》为核心的系统中很活跃，并且变来变去。

“回教信仰中，伊比利斯有五个儿子，分别代表了五种罪行：

安沃（A'war）–“独眼”教唆人荒淫的恶灵

查兰布尔（Zalambur）–使人争吵不睦的恶灵

大悻（Dasim）–使夫妇彼此憎恶的恶灵

索特（Sut）–使人使谎的恶灵

提尔（Tir）–‘大鸟’，产生灾害，病疫的恶灵”

《山海经》中的西王母“五残”正是指“瘟疫与刑罚”，应该与此同源。道教中也有明显的“5”痕迹。不过我怀疑他们更多可能来自“五行”。我相信“五行”来自袄教与希腊天文概念。

“回教中的亚兹拉尔（Azrael）的形象特征为‘四颜四翼的天使，身体上披满了毛皮，毛皮下是无数的眼睛，这些眼睛每一个都注视着世间的每一个人，当眼睛闭上的时候，

也就是人要死亡的时刻’。”

这当然是关于他的另外一个传说版本。这位天使的毛皮使他看起来肯定更像一头“熊”。不过他又有四只翅膀，所以他还可以是“鸟”。总之，他想“飞”那很容易，传来传去会传出个“毛衣登天”我也不会奇怪。注意他是人形，却全身长毛，脸上也是毛，我看到这样一个“人”时宁愿相信他是头熊，也不愿意认为是鸟。因为鸟的肢体与人明显有区别，必须有鸟爪，而且只有两条细腿。假如一个人胳膊与腿都在，并且全毛，那只能更接近我们想像的类熊动物：“野人”。

至于这个亚兹拉尔的“无数的眼睛”，让我们来看看希腊神话里面是怎么说的。多眼怪物的创意到底属于哪个民族哪个宗教，我没有研究，但我愿意认为它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的出处。

“由于宙斯诱骗了美女伊蛾，引起天后赫拉的嫉妒。宙斯在隐藏的情急之下把伊蛾变为一头漂亮的小牛。赫拉找到阿利斯多的儿子阿耳戈斯来看守这个情敌。这个怪物好像有一百只眼睛，在睡眠时只闭上一双眼睛，其余的都睁着，如同星星一样发着光，明亮有神。

《圣经》、《古兰经》中的“七星”、天使、“米迦勒”，还有“火之子”Azazel，把犹太教、基督教、袄教、苯教、道教，以及我们熟悉的全球神话联系了起来。这些元素被放在一个千年万花筒里被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摇啊摇，摇啊摇，经过一些老奶奶以及一些宗教人士的重新编织，最后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眼花缭乱的文学与宗教文本。它们被拼合、分裂、再造，终于把我们给转晕了。

第三部分 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

希腊神话背景简介

希腊文明是一个整体，除了天文、数学和哲学思想之外，希腊的文学——神话系统——也是世界上古史中的奇观。希腊神话与天文系统通过星座的命名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许多历史与宗教的秘密就隐藏在这个看起来明显为虚构的文学作品之中，我相信某些重要的中国文明源头之谜也暗藏其中。

全球的星座体系大部分都由希腊人命名，所以那些星座故事里的人物多半是希腊神。由于星座命名的实用性，以及希腊神话体系的博大精深，又加上天文科学观察研究的成果融入，他们不仅对于周边的文学与宗教做出了贡献，而且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最为璀璨的一部分。不重视三千年前古希腊的文化背景与文明成果就无法了解整个欧洲文明的源头，同样可能也无法真正了解中国文明的源头。

表面上看不到多少“希腊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但是通过对道教文化的溯根求源还是发现希腊文明在中国的渗透是如此深远。但是它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不通过一系列的复杂探寻就可能会完全忽视它们。

我有一个重要的猜想是，我们对于地中海沿岸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很深的误解。一直以来人类探索中国与西方的联系时，多有猜测与中亚的，然后是西亚的，还有埃及的，但是绝少提到地中海，这些都是由一些误解造成的。实际上两地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每当我们想到地中海的文化，我们总是会首先想到古希腊艺术与生活，他们确实与中国的联系不大，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错位，它误导了我们。我们熟悉的希腊文明实际上只是后期的希腊文明，也就是大约2600年那个时代的文明，很可能在更早的“自由”时代中国与希腊之间进行过神秘而频繁的交往[①]，并且某些文明信息在两地是相通的，两地的联系恰好是在2600年前掐断的。假如我们寻找彼此在大约3000年前的交往，可能会有新的收获。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带来的扰乱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希腊文明同样来自中东核心地区，在希腊神话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圣经》的痕迹，而犹太人的《圣经》或者希腊神话都深深植根于早期的两河文明与古埃及文明——随着时间的推进，早期神话受两河

① 这方面的具体细节我会放在以后的另外一本书中作为海洋文明专题去探讨。

文明的影响更大，晚期的受红海两岸的影响为多。这些文明的多重交叉也阻挡了我们的视线。不过现在我还不具备对《希腊神话》作出仔细分层的能力，所以只能是笼统地观察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的可能联系。我相信我们即将开始的研究能够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希腊神话》的原始形态在中国早期同样存在，但是世界“封闭时期”也是荷马生活的时期，所以中国并没有得到《希腊神话》后期的完整创作。也就是说，《希腊神话》在原始状态时期两地的联系就渐趋中断。

分析希腊神话故事的一些元素，几乎其中囊括了全球神话故事的主要原素，从欧洲的安徒生、格林童话到中国汉魏前后的神怪故事，也包括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与星座有关的神话故事，如“七星”与“熊”等，全部都有同源的痕迹。

这些相互借鉴是如此丰富，以至于偶尔打开一本希腊神话我们会怀疑是不是错拿了《圣经》，有时候看着希腊神话又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安徒生童话、甚至中国神话的情节。比如“大洪水”的故事，除了人物名字不同之外，都是因为人类的不义，“造物主”发怒要用洪水毁灭世界，在希腊神话是宙斯发怒，在《圣经》是上帝发怒，然后都是有一对“义人”获得先知的通报然后躲过灾难——希腊神话中“义人”丢卡利翁算是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普罗米修斯作为“先知”通报了宙斯要毁灭人类的消息，他们躲过一难，然后人类才继续繁衍；挪亚的故事基本相同。两个故事不同的是结尾处，《圣经》里的挪亚夫妻已经有了 3 个孩子，所以他们很顺利地继续建设家园，但是希腊神话里却显示这对夫妻没有孩子，他们使用了很特殊的方法来再造人类：把母亲的骨头丢在身后就长出人来。希腊神话的逻辑有些像中国的创世神话版本，即大洪水之后需要再造世界再造人类。“女娲”与“盘古”的“开天地”我相信结合了《圣经》与希腊神话两个版本，所以结果是，看起来哪个都像中国的版本，但是哪个都有差异。有可能是中国的故事传出去而成为他们的两个版本吗？可能性也有，但是几率不是很大，原因我前面已经就这方面讲过很多了，主要是整体的发展中东明显优于东亚的水平。

我初步的看法，《希腊神话》的创作时间会非常早，基本上与《圣经》同期。由于它没有成为宗教文本，所以更为自由地显示了其文学的构架与特色。假如从社会学、历史学角度做对比，还是能简单地发现一些时代痕迹的，比如其中大量的乱伦生活，母亲与兄弟的婚姻，父亲与女儿的婚姻，母亲与儿子的婚姻在其中普遍而坦然，给人留下了洪荒时代的道德观。由于 3400 年前左右摩西时代就已经明确了婚姻的基本形态，所以这样的文学作品雏形起码也在摩西前后时期。希腊距离以色列并不特别遥远。有人推测以吟唱希腊神话著称的荷马的最早年代或可在 3200 年前（但大多数人认为他生活在 2800 年前），这个希腊神话的创作时间我个人认为起码不会短于 3000 年。这就意味着这些神话向全球传播的时间也应该大致发生在 3000 年前左右。但是不同时期传播的丰富层次肯定有很大差异。

古代世界最让我惊奇到目瞪口呆的两大艺术作品奇观，第一是中国汉代匪夷所思的曼妙绘画，以长沙楚墓为例，第二就是结构复杂、逻辑清晰的希腊神话了，有多少言语都无法表达我对这些早期人类智慧的敬佩之情。从这些无与伦比的艺术作品上面我们才了解到有些时代是用何种科学技术都无法复制的，那是一种巧合的时代精神，是人类文

明的结晶，他们的存在已经超出了艺术的价值。这些伟大作品的产生肯定遇到了一个特别的时代与特别的人群，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汉代是中国一个开放与融合的大时代，那么大约三千年前的古希腊肯定同样经历了一个值得探究的特殊时代。并且希腊人只是无数水上民族的一个代表而已。我对古希腊为代表的文化发展判断是，由于商业的突起，原先默默无闻的“海上民族”突然变得举足轻重，无数的财富在积累，文明被突然催生，《希腊神话》与天文就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了。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商业航海，人类突然发现了更广大的新世界，开阔了眼界，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世界观乃至生命观、哲学观；由于航海的需要天文变得越来越重要，围绕天文的星座以及星座故事基础上的希腊神话诞生了。激荡在希腊神话中的精神不是平凡的庸人精神，那种波澜壮阔的英雄主义是其他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无法模仿的，这部作品很可能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精神象征。我相信这个时期希腊人以及其他水上民族通过埃及经由红海、波斯湾，或者通过印度到象雄，以及经过波斯或小亚西亚与中国发生过广泛的文明交流。当然，这些水上民族也可以长途航海来到东亚。

《希腊神话》的根源来自中东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这当然也给中国神话是直接从中东继承而来带来可能，所以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可能只是从同一个源头发展起来的两个支派而已。其中的两河流域是最早根据天文预示人间祸福的星象学大本营，南部阿拉伯半岛通过波斯湾承接了这一传统。红海西岸的古埃及是神话与萨满教的天堂，夹在两大文明之间的“萨巴王国”（埃塞俄比亚与也门地区）由于大规模国际商贸的关系可能将这些神话在大约三千年前就传遍了全世界，欧洲、亚洲、美洲都是这一文化影响的地区。后来，在波斯、印度以及西藏，部分情节又汇入了多种宗教。这个纷乱的传播期我推测大约从3500年前开始，到大约2000年前基本停止，中间有一个大的变化期，这就是公元前8世纪前后的全球变乱切断削弱了传播秩序。

当初的希腊神话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希腊神话》都是经过现代文学手法整理的，最著名的整理人是一个叫古斯塔夫·斯瓦夫的德国人（Gstuv Schwab 1792–1850）。不过这个神话在北欧获得整理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些神话融入欧洲远方民间神话故事被加以再创造的可能性是多么大。这也就是我们在安徒生从民间收集来的传说中为什么会频繁看到《希腊神话》踪迹的原因所在。实际上欧洲与希腊之间的神话同源是无须考察的，基本上已经是个定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证明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或者欧洲神话的联系，无论证明中国神话与他们两者的哪个有联系，就等于证明了亚洲与欧洲的（一部分）文明同源关系。

《希腊神话》的产生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人类的思维能力、语言能力都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在这个神话产生的同期，是全世界文明大发展的特殊时期，它比我们了解的“轴心时代”早了大约500–1000年。假如说“轴心时代”是哲学思想风涌而起的时代，那么大约3500年前的语言文字也带动了一次“文明大爆炸”，好几种文字在这前后突然产生，包括中国的甲骨文与希腊文、阿拉伯文等，一神教开始出现。它为后来的文明发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然，正如我们看到的，星象学也在这个期间开始系统和完备。这些3500年前的文明现象的发现与总结，其意义在于提示我们：全球在这一时期的

确发生了一些我们尚未知道的根本改变才导致了这一"文明大爆炸"。回答这个问题是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我对此给出的仓促的答案是：商业意识的苏醒使人类第一次在文明上获得了一次飞跃。同时带动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文明交流的新浪潮，交通航海技术得到快速促进，驯养野生动物技术的积累也使人们开发出了骆驼与其他运输性动物，马匹的"广泛"使用也在这个期间。天文学逐渐从原始星象学的基础之上开始发展并分离出来。以上这些带动了各地更加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中国实际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基本上是从这个期间开始的。以后的历史学家将会发现人类在20世纪下半叶突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是计算机的发明与使用。而3000多年前的这次变革很可能是航海工具。而带动这次远古革命的人就是一群善水民族，他们肯定从种种角度参与了《希腊神话》的创作。所以《希腊神话》值得我们"再次"阅读，就像《圣经》值得我们"再次"阅读一样。

希腊神话主要人物以及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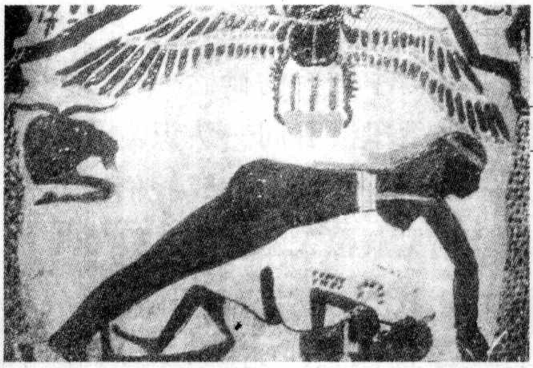
希腊神话中的神仙谱系历来有一些不同的分法，下面是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

第一方阵：地神该亚(Gaea)、天神乌拉诺斯(Uranus)。

第二方阵：泰坦巨神(Titans)、天神克洛诺斯(Cronus)、泰坦女神瑞亚(Rhea)、泰坦巨神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泰坦巨神厄庇米修斯(Epimetheus)。

第三方阵（后面打*号者为"12主神"）：天神宙斯(Zeus)*、天后赫拉(Hera)*、海神波塞冬(Poseidon)*、冥王哈得斯(Hades)、农神得墨忒耳(Demeter)*、灶神赫斯提亚(Hestia)*、太阳神阿波罗(Apollo)*、月亮女神阿耳忒弥斯(Artemis)*、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智能女神雅典娜(Athene)*、冥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战神阿瑞斯(Ares)*、火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青春女神赫拍(Hebe)、神使赫耳墨斯(Hermes)*、酒神狄俄倪索斯(Dionysus)、小爱神厄洛斯(Eros)、牧神潘(Pan)、胜利女神尼姬(Nike)、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

地神该亚(Gaea) 地神该亚又称"大地之母"，是希腊神话中最早出现的神，在开天辟地时，由混沌(Chaos)所生。所以也有的把"Chaos"看做一位"原始天神"的。该亚生了天空，天神乌拉诺斯，并与儿子结合生了六男六女，即十二个泰坦巨神及三个独巨神和三个百臂巨神。是为世界的开始。



◀ 古埃及神话中天神与地神的交配

上面的这个"创世"过程总让人不自觉地想到中国老子的名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

(dao)相当于“混沌”(Chaos)，它无性繁殖产生了大地女神“该亚”(所谓“道生一”)，“该亚”又生出“天空”与“天神”(所谓“道生二”)，然后与他们交配产生了无数后代(“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上篇·二十五章》似乎更具体接近希腊创世：“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大”者，“巨”也。

对于希腊神话的等级也有不同分法，有人讲“泰坦巨神”是指由地神该亚和天神乌拉诺斯所生的六男六女，包括俄刻阿诺(Oceanus)、科厄斯(Coeus)、克里俄斯(Crius)、许珀里翁(Hyperion)、伊阿珀托斯(Iapetus)、忒伊亚(Theia)、瑞亚(Rhea)、塞米司(Themis)、谟涅摩西涅(Mnemosyne)、福柏(Phoebe)、忒提斯(Tethys)和克洛诺斯(Cronus)。这些巨神彼此互相结合，又生出如赫利俄斯(Helios)、塞勒涅(Selene)、厄俄斯(Eos)等神。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等都不在其列，他们属于晚辈。

天神乌拉诺斯(Uranus)：地神该亚所生，后来又与该亚结合生下十二泰坦巨神。他是第一个统治宇宙的天神，因贪恋权力，把该亚生的每个孩子都扔回母腹，该亚唆使最小的儿子克洛诺斯阉割了父亲，并推翻了他的权力。克洛诺斯溅飞的精液使该亚重新受孕生下四位女神。

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古埃及神话系统里最古老的一部分：伊西斯女神受孕生下何露斯，然后何露斯与塞特的大战。中间的主题就是有关权力的争夺、精液大战以及受孕生育。古人似乎很早就知道精液的威力，古埃及神话里拿精液大战，希腊神话里飞溅的精液也使大地女神重新受孕，祆教创世部分里的每一千年出现一位的“先知”也是从琐罗亚斯德藏在湖中的精液里生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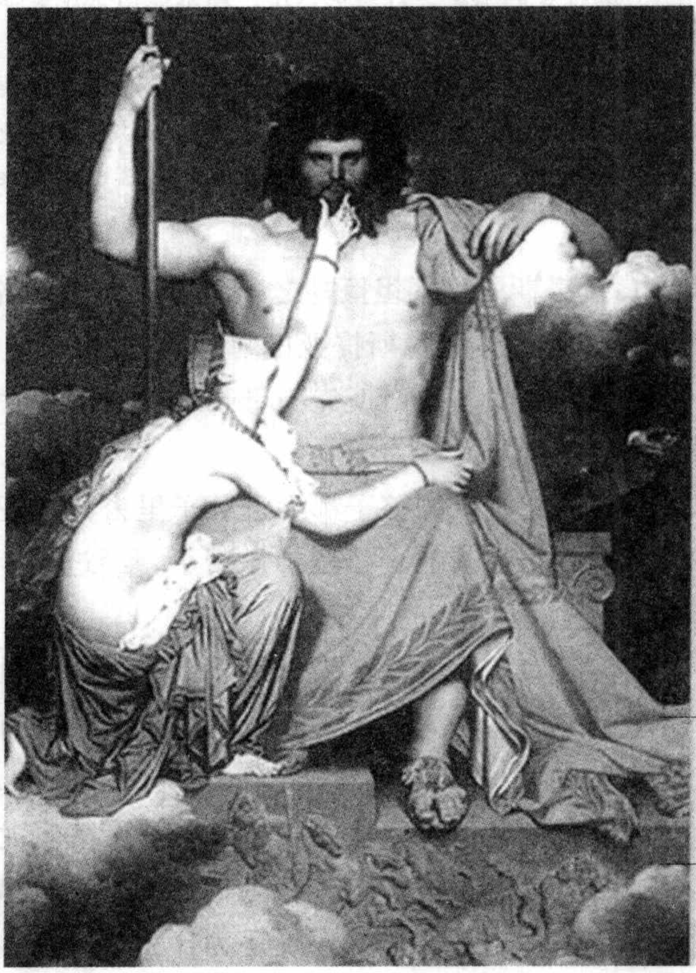
《圣经》里以及中国上古都重视“12”这个特殊的数字，我曾经研究过都与以色列的“12子”似乎联系不上，另外它有民族局限性。似乎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答案。“12个儿子”也是许多神话或童话以及道教中的敏感数目，“小儿子”也是常见符号，现在有了一个结果，尽管证据还比较薄弱。他们的根源在希腊神话，准确地说，在古代的中东传说里，因为希腊神话并不真的是希腊人自己的作品，只是对于整个中东古代神话的系统整理。

泰坦巨神(Titans)主要是指地神该亚和天神乌拉诺斯所生的六男六女，共十二个巨神。这些巨神彼此互相结合，又生出最早的赫利俄斯(Helios，日)、塞勒涅(Selene，月)、厄俄斯(Eos，黎明)、阿斯特赖俄斯(Astraea，星辰)等许多神。瞧，这12个人是多么地重要，没有他们，我们将失去整个星空。

这些人物具有浓烈的天文意味，希腊神圣都住在天上。与中国人的概念一样，西王母与玉皇大帝也都是天上的神仙。为什么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里会有同一认识？我们只是对这一现象熟视无睹才会认为本来就该如此。实际上不能是这样的，起码我们可以怀疑，实在应该怀疑，在远古时代，突然的一个全新理念，把星辰拟人化，把人物安排进星空，这样的巧合几率很小。今天觉得这样的巧合很容易，实际上在远古是思想的一个整体飞跃，当时它并不那么简单了。千百年来那么多人看着苹果掉落为什么只有牛顿一

人开始研究地球引力，其实并非是牛顿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人类的整体知识积累了一个阶段，只是需要一个人来总结而已。

在文明更加古老的埃及那里，他们的神话中人物一般并不突出在天上，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区别。但是希腊与中国的古代神话却在天上，这暗示了一个文明出现的“时代”问题，因为晚所以才更“高明”。今天的任何一个哲学系大二的学生都比2600年前的苏格拉底或老子更有哲学修养，更高明者的“晚生”也同时就浮现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认为中国的神话太“高明”了，因而我们的文明有可能是“晚生”，起码晚生于埃及。



天神克洛诺斯(Cronus)是泰坦巨神，为该亚所生的“最小的儿子”，他推翻了他父亲乌拉诺斯，成为第二个统治全宇宙的天神。他与泰坦巨神瑞亚结合，生下三男三女，其中最小的是宙斯。

忑提斯的请求 安格尔油画 1811年 阿喀琉斯的母亲忒提斯请求宙斯假手让特洛伊人获胜。

“最小的儿子”不仅推翻了父亲的统治，而且生下宙斯这个“天帝”，而且“宙斯”也是“最小的孩子”！ 无论在东亚还是在欧洲，神话故事里“最小的孩子”都是核心人物，比如“七仙女”就是“最小的孩子”，美洲的“七星”故事中“最小的兄弟”也最有威力。

“3 个孩子”也出现于《希腊神话》：三男三女。在希腊神话里还有“三仙女”，她们住在克里特岛上，宙斯出生后就是交给这3 位女仙抚养的。而“3 个孩子”的故事也一再地出现于一些宗教和其他地方的神话里。如中国的牛郎有“3 个孩子”，中国《毛衣女》里升天的仙女也有“三个女儿”。另外，中国的《封神榜》里也有著名的“三霄娘娘”，她们是来自三个岛上的“仙姑”，这同时与希腊的“三仙女”接近。其实《希腊神话》里的三个一组的女神还有很多，比如“命运三女神”等。阿拉伯世界同样有显著的“三女神”崇拜，在早期阿拉伯的多种崇拜中，有“3 位女神”与一位叫 Allah 的男神共为最重要的主神，较别的神更伟大，回教出现以后就只尊 “Allah”为先知。印度教中最大的神也是“三位”。

天神克洛诺斯(Cronus)在天上是土星。已故同好苏雪林女士的一段研究说：

西洋神话学家每言土星神克洛诺士 (Cronus) 乘飞龙车，右手携大镰刀，左手携麦草一束，为“时间之神”(God of Time)。后来变为文学里的“时间老人”。飞龙车是不给他乘坐了，携镰刀及草如故。……现在我们知道西亚每一行星神即七曜或九曜之神，必配恒星一座至数座，行星的土星所配者为狮子星座 (The Constellation of Leo) 中国名之为轩辕座，为黄帝星座，黄帝在五方帝中属土。每年一到夏季，狮子座在我们顶上出现，居天体正中，故曰“中央土”。若行星的土星，行动虽迟缓，却不能固定于天体之一处，故知“中央土”系指恒星而非行星。

狮子星座立于长蛇座 (Hydra)，长蛇系水蛇。西亚有一石刻，一狮立于带翅之长龙上。中国黄帝乘龙上天，……龙即腾龙，也即是飞龙。黄帝有“应龙”，即有翼之龙。而《九歌·湘君》有“驾飞龙北征”、“飞龙兮翩翩”之语，知其为土星之神，也是九曜中之土。如比，则外国神话土星神乘飞龙 (The Vinged Dragon) 有了着落了。

泰坦女神瑞亚(Rhea)是地神该亚与天神乌拉诺斯所生泰坦巨神之一。后与天神克洛诺斯结合，是宙斯、波塞冬、哈得斯、赫拉、得墨忒耳和赫斯提亚的母亲。

以上的多次婚配显示出人类早期乱伦的痕迹，比如乌拉诺斯先与母亲结合生下了女儿，然后他又与女儿结合，几乎全部是近亲乱伦关系。

推翻了父亲的乌拉诺斯比父亲还贪恋权位。他把所有的孩子都吞进肚子里去，瑞亚设计骗过父亲兼丈夫生下了最小的儿子宙斯。宙斯找到其他 5 个巨神做帮手，经过十年激战推翻父亲，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众神队伍开始建立。

宙斯找巨神帮忙的故事在《圣经》里可能转变为“上帝找 6 个天使做助手”的创世故事，当然这与袄教也相似。宙斯的阵营实际上也是 7 个人，因为除了他们 6 个人还有一位母亲。

由这些希腊神话里的战争，我想到中国古代的许多传说，比如黄帝联合炎帝战蚩尤等，我甚至怀疑类似的希腊神话早已进入中国的史前先祖故事里。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有多少是真实的、多少是神话传说，现在还不清楚，这个严重的怀疑是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很少依靠中国史前神话传说来进行推论的主要缘故，所以我就一贯对中国先祖神话体系保持了敬而远之的态度，或者说对它们的“破”超过了“立”。中国文明需要破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想像的程度。

赫拉与其他主神

天后赫拉(Hera)是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罗马名字朱诺(Juno)。她是宙斯的姐姐，在宙斯取统治权后成为宙斯妻子，与宙斯结合生下战神阿瑞斯(Ares)、火与工匠之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和青春女神赫拍(Hebe)，这又是“3 个孩子”。

赫拉是掌管婚姻的女神，是生育及婚姻的保护者，她代表女性的美德和尊严。赫拉生性善妒，对于宙斯的外遇很不满。她曾经将宙斯的情妇卡利斯忒及其儿子变成熊，在赫拉克勒斯出生时阻碍他，之后又令他发疯、杀死妻儿。

赫拉与宙斯的姐弟婚再次说明了希腊神话形成时代的原始性和古老性。不过赫拉的

强烈嫉妒似乎又在告诉我们这时已经处于婚姻文明的萌芽期：3500年前左右。希腊神话体系中还没有非常明确的道德观和文明观。

赫拉的动物象征是凤凰，这与历史上中国皇后一贯对应"凤"竟然是完全一致的。这与我的一贯主张的"凤是外来"又一次不谋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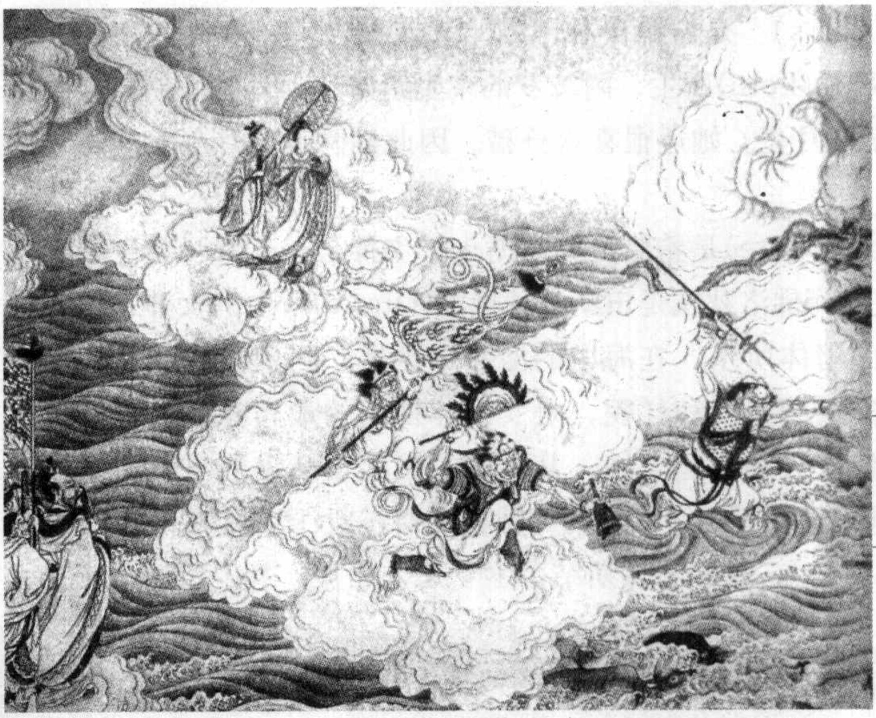
综合以上赫拉的特点，我们完全可以说"西王母"身上也有她的某些品性，但主要还是"示巴女王"。

海神波塞冬(Poseidon)是希腊奥林珀斯十二主神之一，他是宙斯的哥哥，地位仅次于宙斯。他的罗马名字是涅普顿(Neptune)，他是九大行星中的海王星。他与宙斯一同战胜了父亲克洛斯之后，一同分割世界，他负责掌管海洋，以三戟主宰水域，在水上拥有无上的权威。他能呼唤或平息暴风雨，轻易地令任何船只粉碎。波塞冬曾经与雅典娜争夺雅典，可惜最后还是败给雅典娜。在争夺雅典时，他变出第一匹马，所以他也是马匹的保护神。

马的出现加重了这个作品的时间性：3000~4000年前左右，不会再前。

▶ 希腊的海神波塞冬，其典型特征是使用一个武器三叉戟。

海神波塞冬的地位如此之高，所以我们几乎在欧洲与中国的所有神话故事里几乎无一例外都会碰到"水"这个道具，非常引人注目，到了无水不成故事的地步。当然，这个现象还有一个解释，这些神话故事的主创者是"海洋民族"。



◀ 在这幅名为《古代中国海神图》的传统画中，其中的一个海神使用的正是"三叉戟"。

冥王哈得斯(Hades)是宙斯的哥哥，战胜父亲克洛斯

后，他负责掌管下界冥土。他的罗马名字是普路同(Pluto)，是九大行星中最小最外的冥王星。他的妻子是在巡视大地时抢回来的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哈得斯同时是掌管财富的神祇，掌管地下埋藏的黄金宝石。

农神得墨忒耳(Demeter)是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罗马名字刻瑞斯(Ceres)。她是宙斯的姐姐，掌管农业的女神，给予大地生机，教授人类耕种。她也是正义女神。她与宙斯生下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珀耳塞福涅后来被得墨忒耳的哥哥哈得斯抢去做了冥后。因为失去女儿，她无心过问耕耘，令大地失去生机，直至宙斯出面，令她们母女重逢，大地才得以重生。每年的冬天就是她与女儿团聚的日子，她放下工作陪伴女儿，令这段时间不宜耕作。

灶神赫斯提亚(Hestia)是希腊奥林珀斯十二主神之一，罗马名字维斯塔(Vesta)。她是宙斯的姐姐，掌万民的家事。她还是位贞洁处女女神。

太阳神阿波罗(Apollo)是希腊奥林珀斯十二主神之一，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Leto)的儿子，阿耳忒弥斯的孪生兄弟。阿波罗又名福波斯(Phoebus)，意思是“光明”或“光辉灿烂”。阿波罗是光明之神，在阿波罗身上找不到黑暗，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所以他也称真理之神。阿波罗擅长七弦琴、精通箭术；阿波罗是医药之神，把医术传给人们；他也是寓言之神。阿波罗掌管音乐、医药、艺术、寓言，是希腊神话中最多才多艺，也是最美最英俊的神祇，阿波罗同时是男性美的典型。

从上面又不难看出希腊神话与拜火教之间的关系。因为“黑暗”产生了“光明”的逻辑顺序，与拜火教的教义重合。尤其“巧合”的是，与“黑暗”一起生产“光明”的是天帝宙斯，而且，他们的孩子叫“光明之子”。不仅拜火教接纳了“光明之子”的概念，而且基督教同样接受了“光明之子”的概念给耶稣。“光明之子”为“真理”的化身，首先在希腊神话中出现。

即便按照正统的说法，希腊神话也早于拜火教，基督教则在拜火教之后大约500年出现。

月亮女神阿耳忒弥斯(Artemis) 是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罗马名字狄安娜(Diana)。她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Leto)所生，阿波罗的孪生姐妹。阿耳忒弥斯与阿波罗一样，司掌光明，她所掌管的就是月亮。她还很喜欢狩猎。因此她除了是月亮女神外，还是狩猎女神。

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是希腊奥林珀斯十二主神之一，罗马名字维纳斯(Venus)，是九大行星中的金星。阿佛洛狄忒是宙斯与狄俄涅(Dione)所生的女神，但有另一说法说她是由天神乌拉诺斯的遗体所生，在海中的泡沫中诞生。阿佛洛狄忒象征爱情与女性的美丽，她有古希腊最完美的身段和样貌，是女性体格美的最高象征。阿佛洛狄忒的美丽，使众女神羡慕，也使众天神都追求她，甚至她的父亲宙斯也追求她。但宙斯的求爱遭到拒绝之后，宙斯把她嫁给既丑陋又瘸腿的火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但是阿佛洛狄忒却爱上战神阿瑞斯(Ares)，并和阿瑞斯结合生下几个儿女，其中包括小爱神厄洛斯(Eros)。

泡沫既然能够生成美丽的维纳斯，自然也能由美丽的仙女化为泡沫。《海的女儿》出

生的逻辑实际上在这里可以找到古老的痕迹，主要就在希腊神话里，比如在海里诱惑奥德修斯的塞壬可能就是“海的女儿”的原形。

智慧女神雅典娜(A t h e n e)是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罗马名字弥涅耳瓦(Minerva)。传说是宙斯与聪慧女神墨提斯(Metis)所生，因有预言说墨提斯所生的儿女会推翻宙斯，宙斯遂将她吞入腹中，后因头痛不已召来赫淮斯托斯劈开头颅，从宙斯的脑里跳出来的是一位全身甲胄、挺举金矛的女神，她就是雅典娜。雅典娜是处女神，具有威力与聪慧，是宙斯最宠爱的女儿。雅典娜是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最崇拜的女神。雅典城的名字就是用女神的名字命名的，而且亦是她专有的城市。她传授希腊人纺纱、织布、造船、治金和炼铁等各种技能，还发明犁耙，驯服牛羊，因此她也是农业与园艺的保护神。她还是法律和秩序的保护神。

战神阿瑞斯(Ares)是希腊奥林珀斯十二主神之一，罗马名字玛尔斯(Mars)，九大行星中的火星。他是宙斯与赫拉的儿子。他司职战争，形象英俊，性格强暴好斗，十分喜欢打仗。他同时是嗜杀、血腥，人类祸灾的化身。

对于“战神”中国早年研究西来说的苏雪林女士说：“今日发掘出商代帝王陵墓，每有大批无头人，其头别葬，前者称‘无头葬’后者称‘人头葬’考古学家皆莫知其所以然。笔者则谓无头葬者因战神无头，故将侍卫武士头亦斩去作成战神部下，则用以保护王陵，威力可增数倍之故。又古代武将棺之被发现者，棺中人往往无头。中国人顶讲究‘全尸’，纵其头被敌人砍去亦必以木雕一人首续之，今之无头当亦是模仿战神形状，孟子所谓‘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可见古代战士时时以失首为荣。失首何荣？也不过是模仿战神罢了。”

有关这个“战神”我有更多的论述放在下本书中专题讨论，部分证据将会证明，中国之受地中海的影响不晚于后商。换句话说，中国之接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或者两地的对等交流，至少是在商朝，或者重在商朝。

火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是希腊十二主神之一，罗马名字伏尔坎(Vulcan)，他是宙斯与赫拉的儿子。他是最丑陋的天神，而且瘸腿，但却娶了最美丽的女神阿佛洛狄忒。他是火神，亦是诸神的铁匠，具有高度的技巧，制造了许多种的武器、工具和艺术品。这位神一大特性是热爱和平。

我想说，很可能中国人所敬的“火神”有部分是他的身影，道教不仅敬“火神”，而且尤其珍视“和平”，这从《太平经》里看得最清楚了。并且这里还有一个“巧合”，无论是希腊的火神“Hephaestus”还是罗马火神“Vulcan”，他们的第一个音节“he”“vul”与中国的“火”（huo）发音都很接近。

神使赫耳墨斯(Hermes)是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罗马名字墨丘利(Mercury)，九大行星中的水星。他是宙斯与女神迈亚(Maia)所生的儿子，在奥林匹斯山担任宙斯和诸神的使者和传译，又是司畜牧、商业、交通旅游和体育运动的神，还是小偷们所崇拜的神。

酒神狄俄倪索斯(Dionysus)，罗马名字巴克科斯(Bacchus)。他是宙斯与凡人公主塞墨勒(Semele)所生的儿子，宙斯从烧死的塞墨勒身体中将他救出，他是酒神，也是欢乐之神。

◀ 这个大约公元前350年的希腊酒神明显具有女性特征

小爱神厄洛斯(Eros)：厄洛斯是战神阿瑞斯和爱神阿佛洛狄忒所生的儿子，罗马名字丘比特 (Cupid)。他不会长大，总是像个小孩子，背上长有翅膀，和他母亲爱神一起主管神、人的爱情和婚姻。厄洛斯有一张金弓、一枝金箭和一枝银箭，被他的金箭射中，便会产生爱情，即使是冤家也会成佳偶，而且爱情一定甜蜜、快乐；相反，被他的银箭射中，便会拒绝爱情。小爱神的箭无论神和人都抵挡不住。

实际上中国古代也有以弓箭为媒的，不知道是否之间有关联。《吕氏春秋》以及《礼记·月令》都有基本相同的记述："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以太牢祀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失于高媒之前。"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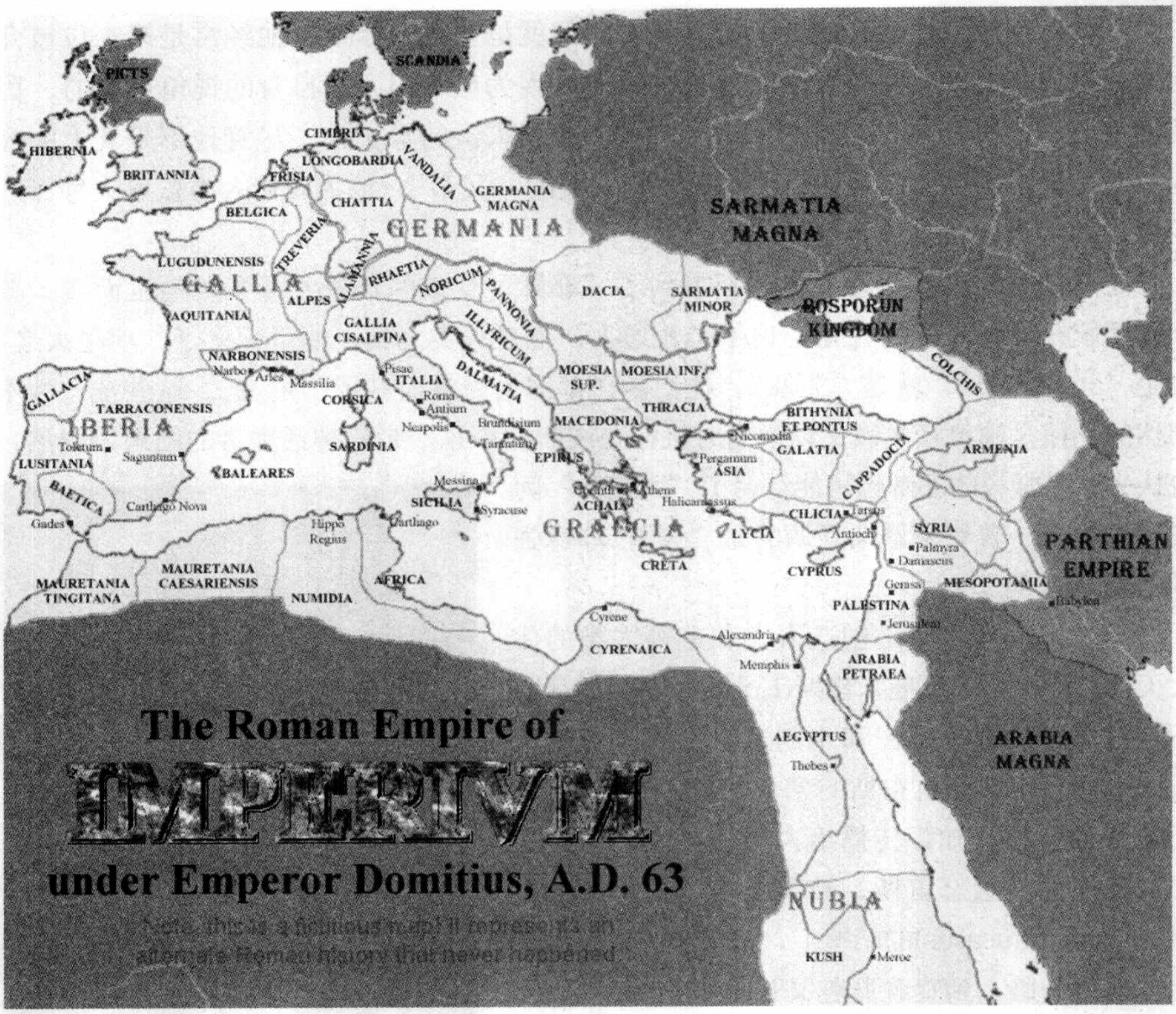
牧神潘(Pan)是半人半兽神，头上长着一对山羊角，下半身长着一条羊尾巴与二条羊腿。他是神使赫耳墨斯的儿子，是爱喧闹和喜乐的神。一切荒野、丛林、森林、群山都是他的故乡，他是牧神也是山林之神。潘也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用芦笛吹奏出美妙的曲子，经常吸引山林中的仙女倾听。他由于羊腿的外型常常被当作淫荡的象征。

我的河南家乡对于雄性"山羊"有个别致的称呼："骚狐"。但我们那里同样对于那些淫荡的男人用这个戏称。不知道是否是一种希腊神话在这一话题上的遗存痕迹。

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是宙斯跟安菲特律翁国(Amphitryon)的王后阿尔克墨涅(Alcmene)所生的，他是珀耳修斯(Perseus)的后裔。赫拉克勒斯是宙斯为了生一个强大无比的儿子以保护神、人免于毁灭而生的。但赫拉嫉妒赫拉克勒斯，令他不能成为地上至高无上的王，更令他发疯杀死妻儿，要他为兄长欧律斯透(Eurystheus)完成十二件苦差。赫拉克勒斯一生有很多丰功伟绩，是他放了普罗米修斯。赫拉克勒斯最后被半人马涅索斯(Nessus)的毒血毒死，他死后升天，与众天神一起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并娶青春女神赫拍为妻。

希腊神话与罗马神话的众神体系主要分为大神与小神，再加上一个半神，就是三大类。或者说，希腊神话、罗马神话中的人物主要分这样三个层次：1．不死的神，2．死后可升天的英雄，3．地上的凡人。他们对应了中国的：神、仙、贤。

① 引自何新《诸神的起源》181页。



罗马大帝国可以看作是亚历山大帝国的一个“继续”，只是中心撤出了亚洲，走向地中海与欧洲。这个大撤离是人类文明一个新的阶梯，它的文明基础是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耶稣的“诞生”将人类引向一个新的文明。很明显罗马文明属于海洋文明，地中海与红海皆为罗马版图的一部分。同时这一点也从这张地图上看得很清楚，所谓罗马帝国基本上覆盖的是古老的腓尼基文化版图，并且也是阿拉伯人的版图，同时也是基督教文明的版图，这几个概念实际上在不同的时期为同一概念，也说明了这几个文化之间的神秘联系。地中海沿岸至今分布有18个国家。

“盘古”、“伏羲”与希腊神话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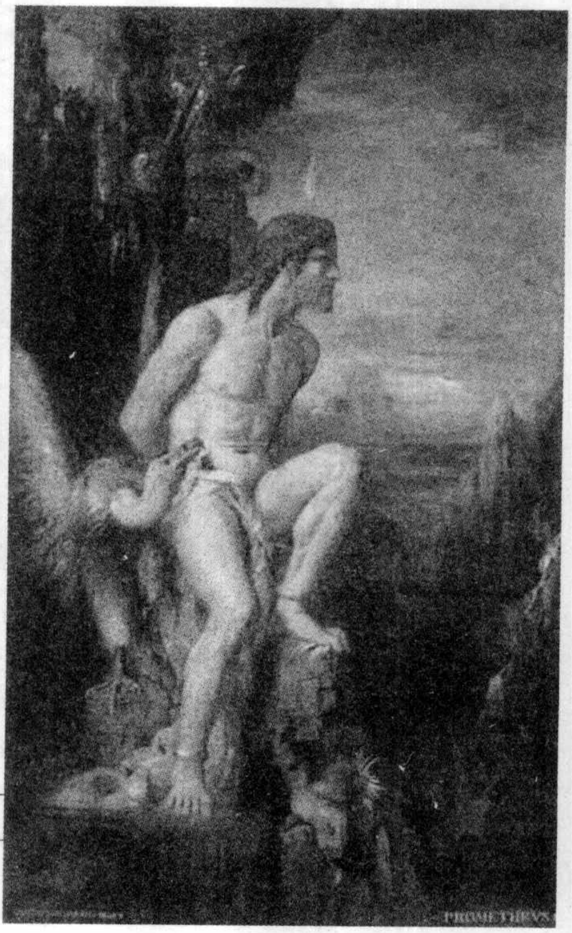
有一种说法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并不属于“提坦”巨神，而是大地女神的孙子，他的父亲才是12提坦神，名叫伊阿佩托斯。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普罗米修斯就是泰坦巨神。

无论如何，普罗米修斯在希腊神话中都是一位极其重要的天神。他的地位甚至比宙斯还要高，或者按照中国俗话说，他的辈分要比宙斯高。但由于宙斯后来推翻父亲掌握了统治权，所以普罗米修斯也受宙斯这位天帝的管辖，不过他还是经常与宙斯做对。宙斯除了荒淫无度对美女感兴趣外，对于人类毫无情感，而普罗米修斯却是人类的父亲。

一般在《希腊神话》的开篇处首先看到的就是普罗米修斯，他经常是第一位被介绍的神。他为什么如此重要？我猜想他的重要是因为从我们人类自身的视角造成的，因为是他创造了人类，并且给人类带来了火种。他是人类的保护神。尽管他不是天上的最高统治者，也不是第一位天神，但他是我们人类的“父亲”。他为我们人类盗取火种而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他是富有爱心的“火精”。

是不是有人已经由普罗米修斯想到了“耶稣”受难的形象？从某种角度而言，普罗米修斯就是耶稣一样的先知：他不是普通人，他是人类之父，他是天之子，他是火之子，他是“光明之子”，就是“先知”。他们俩还都因为受难而戴了“荆冠”。这些统一性不是偶然的，而是围绕祆教教义以及当时流行在波斯、中东一带的神话融合的结果。当然，我也认为，基督教的耶稣也可能结合了“太阳神”阿波罗的形象。普罗米修斯强调的是“火”，耶稣强调的是“光明”。

传说普罗米修斯是创造人类和造福人类的伟大天神。他在弟弟厄庇米修斯(Epimetheus)的帮助下，按照神的形象用泥和水创造出人类，并赋予人以生命。他又违抗宙斯的禁令，使人间有了火。还把各种技艺、知识传播给人类，使人类得到文明。他因此而触怒宙斯，被牢牢地钉在高加索山顶(Mount Caucasus)的峭壁上，每天有一只大鹰来啄食他的肝脏，到夜晚肝脏又长出来，恢复原形。普罗米修斯要受这样的折磨达三万年之久，他忍受一切痛苦，始终没有屈服，后来被赫拉克勒斯(Hercules)所救。



普罗米修斯 莫罗作品

肯定有人已经想到了，普罗米修斯就是中国“盘古”与“伏羲”的主要原形。以上普罗米修斯的所有行为与特征基本上都是中国神话传说里“盘王”与“伏羲”的作为。当然，还结合了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的其他神圣的特点。我认为“盘古”与“伏羲”实际上是从道教进入中国的祖先系列的。把这些神话或宗教人物化为祖先神是一种道教传播者的捆绑逻辑：爱祖先就会爱教，爱教就是爱祖先。

“Prometheus”中的“Prom”在一起的连读，恰合“盘”(pan)音。这段话里普罗米修斯的作为其实最能形容中国“盘王”所善：“普罗米修斯帮助他的创造物，教会他们观察日月星辰的升起和降落；给他们发明了数字和文字，让他们懂得计算和用文字交换思想；他还教他们驾驭牲口，来分担他们的劳动，使他们懂得给马套上缰绳拉车或作为坐骑。他发明了船和帆，让他们在海上航行。普罗米修斯教会他们调制药剂来防治各种疾

病。另外，他教会他们占卜、圆梦、解释鸟的飞翔和祭祀显示的各种征兆。”并且这是个萨满教的普罗米修斯。

尽管希腊神话里确实有一位具体名字就叫“潘”(Pan)的牧神，其代表符号应该是“羊”，但从种种方面考虑我依然认为“盘王”应该是“Prom”。另外，从“盘”这个字型上看，无论简化字还是古字里都是含“舟”的，说明了“普罗米修斯”或者“盘王”与海洋的关系，既合乎他们来自海洋，也合乎“普罗米修斯”教人类造船的传说。

再说说“庖牺”，就是“伏羲”与普罗米修斯的关系。“庖”pao这个字中的“ao”在古代曾经为“u”是可能的，我可以给一个旁证以说明“ao”“u”之间的转换是可能的。比如“抱”(bao)这个字，在我的豫西家乡话里就非常明确读为“bu”，说明“ao”与“u”之间发生了转变。至于“ao”、“u”两者之间是从什么时候转换的，以及转换的规律是什么，我都不清楚，但是这个在汉语体系内部发生转换的例证说明了其他的类似转换也是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庖牺”实际上就可以是“普牺”，它距离“普罗米修斯”就更近了一步。

不过，古代的许多神仙实际上是多种身份与多种文化的混合体，我认为除了以上的根源之外还会有其他的神秘起源，我会在其他地方进一步论述。

也有人论证说盘古就是印度神话中的“Purusa”，这并非没有可能，但这不过是个中转环节而已。从“Prometheus”到“Purusa”，再到中国的“盘瓠”(Panhu)，这个转换可能是存在的。我要证明的正是多点的同源关系。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不仅创造了人类，传递文明，而且还是“火”的传递者。请注意“拜火教”(即祆教)与他之间的潜在联系。在印度至今遗存的一个“拜火教”群体名字就叫“Parsiism”，与“Prometheus”相比，其中有两个关键音节接近，其演变后的对应：Par–Pro，siis–theus。中间省略了一个“me”，但是我们发现丢失的那个“m”出现在另外一个单词的结尾。我非常怀疑祆教之中的“光明之神”与希腊“火神”普罗米修斯的关系。

这个“火神”或“火精”普罗米修斯与“太阳神”阿波罗并不是一个人。“阿波罗”是宙斯的儿子，在天上专司太阳车，他的“辈分”要比普罗米修斯低。普罗米修斯是盗取火种给人类的神，所以他是“火精”，不是“太阳神”，有区别。

伏羲在中国京剧中的脸谱。所谓京剧中的脸谱其实不过是古代人舞蹈时的面具或脸部纹饰的一部分。

希腊神话里确实并没有把普罗米修斯看作过“火神”，但是我们从他盗火的英雄事迹确实可以这样尊称他了，实际上希腊神话里真的有一位“火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不过这个“火神”却没有多少事迹，他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盘古”。

中国南方神话传说里还说“盘王”还有个弟弟，名字叫“盘生”。普罗米修斯也有个

弟弟，符合了这个要求，他就是娶了著名的“潘多拉”做妻的那位。这对兄弟中哥哥叫“先知”，弟弟以“后知”闻名。

普罗米修斯被捆受难在山顶的动人故事情节也为中国道教甚至中国文化里的高人在山里的这一情结找到了出处：这是对于人类祖先的一种纪念。中国的道观多建在山上，象悬空寺那样怪异的悬崖建筑就是对于普罗米修斯最贴切的纪念方式。我还要强调一下，道教是通过西藏的苯教，或者说，道教是通过西藏文化而产生的宗教。换句话说，普罗米修斯很可能是通过西藏来到中国腹地的。

我怀疑“Titans”这个“巨人”称呼还与中国西南的西藏（Tibet）、西藏人（tibetan）称呼有一定的联系。西藏的苯教与波斯的袄教假如信仰同一个“Titans”神的话，就可能会有这个结果。神话传说中西藏人的祖先来自天上，是“天神”的后代，“Titans”确实都是“天上的神”，并且是级别很高的“巨神”。而且具体到“普罗米修斯”被绑在峭壁上被鹰鹫叼舐的场面，就更为西藏特殊的启用鹰鹫“天葬”习俗找到了根据。信众可能为蹈袭“祖先”榜样，一再地把寺庙建在高山与峭壁之上，并且自己在升天之前也要被鹰叼去。

其实袄教与与苯教共同具有奇特的“天葬”方式，已经说明了中国西藏与波斯文明的联系。而波斯文明与希腊文明的紧密联系，又为希腊与中国之间的文明联系埋下重重伏笔。

火神与盘古更多记载

拿晋人范晔的《后汉书·南蛮列传》与希腊神话对比，更容易得出中国“盘古神话”部分源自希腊神话的捏合：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以少女，又无封爵之道，以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皇帝下令不可违信。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因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女央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这段话表明盘古“生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恰是希腊神话中该亚生“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提坦巨神”的情节。“好入山壑，不乐平旷”，似乎是对普罗米修斯被捆山崖的纪念。

赫拉克勒斯用另外一个半人半马的喀戎（Chiron）替代了普罗米修斯继续在高加索的

悬崖上受难骗过宙斯的情节，可能还引出了另外一条线索。

中国传说中的“火政”或“火神”叫阏伯，对应于天上星座就是“商星”。天蝎座（Scorpius the Scorpion）中有一颗红色亮星，犹如天蝎的心脏，它就是著名的“心宿二”（Antares），也叫“大火星”，还被称为“商星”。奇怪的是，这个“大火星”的旁边就是半人半马的“人马星座”（Sagittarius the Archer）。这等于说，中国的“火神”（大火星）旁边就是一个替代“火神”受罪的“喀戎”，这不应该是巧合，要知道天空上有88个星座呢，独这一个被安排在旁边而恰合了希腊神话。这只能是希腊传说曾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嫁接的结果。假如古代中国人不知道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曾经被半人半马的喀戎所替代，就不可能有这个“阏伯”对应于恰好是人马座旁边的“大火星”的结果。当然了，除非有人研究后得出结论，说这个安排是近几百年的事情，那么我这条论证就是失败的。简单地讲，中国什么时候把“阏伯”和“商星”对应起来，或者中国人什么时候称“商星”为“大火星”，那么就能确定中国人接触过希腊神话体系的时间。

“大火”与“商丘”的事情或者起因发生在殷商之前。《左传》：“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沉，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不过，至迟商星在中国的出现也是《左传》出现的春秋战国之交。所以这里等于点明希腊神话进入中国至迟在春秋，也就是大约老子生活的时期。

这里还有一个典故，“商星”所在的“天蝎座”在希腊神话里是一只藏于埃塞俄比亚的蝎子。这是不是很奇特？很可能这里隐藏着一些我们目前还不了解的秘密。埃塞俄比亚属于“萨巴”，商朝同样与“萨巴”有紧密联系。

从中国典籍出现“盘古”以及他们谈及“盘古”的时间看比较成型的时间在汉晋。以下为“盘古”主要的早期文字汇编[①]。

宋代《太平御览》卷二引《三五例纪》：“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居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

清代《绎史》卷(引《五运历年纪》)：“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清代《述异记》卷上：“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

① 参考自《盘古文化网》。

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盘古氏，天地万物之祖也，而生物始于盘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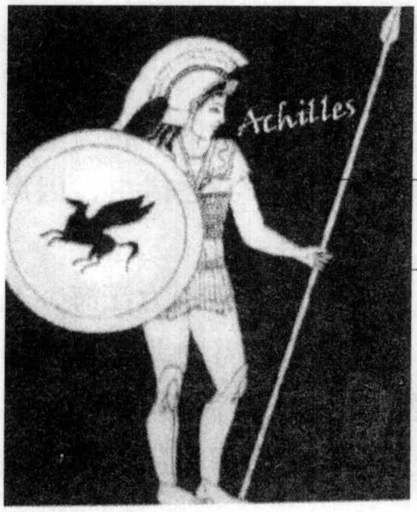
明朝周游《开辟衍绎》附录《乩仙天地判说》：“天地合闭……就象个大西瓜，合得团团圆圆的，包罗万物在内，计一万零八百年，凡一切诸物，皆溶化其中矣。……合闭已久，若不得开，却得一个盘古氏，左手执凿，右手执斧，犹如剖瓜相似，辟为两半。”

《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卷八十三引《补衍开辟》：“天人诞降大圣。曰浑敦氏，即盘古氏，初天皇氏也。龙首人身[1]，神灵，一日九变，一万八千岁为一甲子，荆湖南以十月十六日为生辰。有初地皇氏，初人皇氏。”

以上记载，极言“盘古”之“巨”，与希腊“提坦”巨神获得对应，也为庄子哲学中的“巨”元素找到了出处；“崖石出血成水”似为“普罗米修斯”被缚于山顶鹰啄痕迹；天分“二仪”为天地，实际上是袄教的光明之神的行为。以上多从宗教和哲学方面论述宇宙生成关系，非民间传说，所以没有族源成分在其中。这里与“狗”无关，体现出是在日后附会了“天狼星”的传说，才有“狗皇”的传说，或许是道教之后经过广泛传播才有认祖行为，但这条线索暗示了道教与袄教的密切关系，“狗”是袄教崇敬的。这一传播的强化与改编当在汉晋，是道教的“功劳”。中国的鬼怪故事也多产于汉晋，就与道教兴盛有密切联系。相信经过仔细研究是可以推论出盘古神话在中国引进时间，但这不是我的目标，所以这方面的话题也就基本上到此为止了。

中国藏族的僧侣，他们的帽子很特殊，这个风俗是从哪里来的呢。

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了非常原始的神话符号，或许深入挖掘会有更多的发现，比如下面这段的某些人物名称非常完整，完全可以与西方原始神话做出对比。并且我很惊喜地在这首歌里听到了“共源”这个概念：



古希腊的英雄或贵族常戴这样的帽子。此图为希腊神话人物阿咯琉斯

苗族《古老话》记录了苗族生成哲学《事物生成共源根》：

先出现天，后出现地。从那时起，盘古就分开了天和地。……最后才育原始人。……千万事物同一理，事物

① 注意这里盘古也与伏羲一样具有了“龙首人身”。

生成共源根。头号重要搜媚诺， 第二是各薄港搜， 第三是玛汝务翠， 三样缺一不得生。生成相资双有利，……。

“头号重要搜媚诺，第二是各薄港搜，第三是玛汝务翠”，其中的名字明显为外语翻译，假以时日想必能找到它们在世界神话体系中的对应。

描写古希腊战斗场面的图片，注意他们的帽子。同时也顺便观察这个古代陶片上的“回”型纹饰，他们常常出现在中国古代的装饰之中。这些图案既不是地中海独有的，也不是中国独有的，他们遍布古代的全世界，古埃及、古以色列以及远达美洲都能找到类似的例证。

“宙斯”与“玉皇大帝”

许多宗教都是几种教义拼合的结果，研究比较近的宗教最容易得出这一结论，比如明朝的“白莲教”就是糅杂了儒、释、道，并且其尊奉的“无生老母”更是我们所早已熟悉的几个创世人物的拼凑，伏羲、女娲、西王母、观音全在里头，并且发展到这个时期，伏羲已经有姓为“李”，而女娲则姓“张”了。其实这些与神话、传说有关的发展演变轨迹直接参考顾颉刚先生考证的孟姜女故事的变化怕是最合适的，捏合、变形、丰富，都是常用的手法。

道教当然也是一样，只是年代久远，不好调查了而已，很明显道教也是把几种不同途径、不同文化版块的信息综合在一起才构筑了道教的骨架，真假难辨，其中某些是“真实”的历史，比如具有传奇色彩的“西王母”，某些则属于纯粹的神话虚构，比如“盘古”和“玉皇大帝”。

道教里的“盘古”（伏羲）与“王母娘娘”我们已经讨论得够多了，现在来看看道教里最常见的“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的角色比较古怪，他很威严，不亲切，但似乎天庭没有他还不行。假如说“普罗米修斯”是人类之父，那么“宙斯”则是希腊神话里典型的“天父”、“神父”——这正是“玉皇大帝”在中国的角色。“盘古”在中国并不是“帝”，但却坐第一把交椅，因为（在希腊神话里）他是人类之父，所以中国人也认他为祖先。玉皇大帝贵为皇帝，道观里的“帝星”就属于他，但他却坐第三把交椅。这之间有着微妙的排序，体现了中国人既服从秩序又重视祖先根源的伦理。

尽管在中国神话里经常出现“玉皇大帝”这个角色，但是他真的没有多少具体“事迹”，所谓“乏善可陈”正是指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他的地位很高，却很少事例？这就只能用希腊神话来解析，因为他是宙斯，尽管威严但却也荒淫，并且他喜欢与人类做对，尤其是他残酷地把普罗米修斯锁在悬崖上的举动使人类只屈服于他的淫威，最先把他引进中国的人恐怕知道他这个老底，所以他就被某种程度地淡化了。

有人说“玉皇”之名，首见于梁陶弘景《真灵位业图》①。看来这个人物出现的时间不会太早。“玉皇大帝”又名“玉皇道君”，曰“位居右位第十一”；名为“高上玉帝”时，则“位居右位第十九”。这里与希腊神话有特别的对应，因为以希腊神话里的辈分来算，宙斯大概在希腊众神中差不多也是这么个位置，因为他辈分实际上很低，前面有许多的前辈。

天神宙斯(Zeus)是希腊奥林匹斯(Olympus)十二主神之一。宙斯为天神克洛诺斯（土星，Saturn）与瑞亚所生的最小的儿子，他与哥哥姐姐一起，同他们的父皇开战。经过十年战争，在祖母大地女神该亚的帮助下战胜了父亲，将其送押到大地的最底层。从此宙斯成为统治宇宙的统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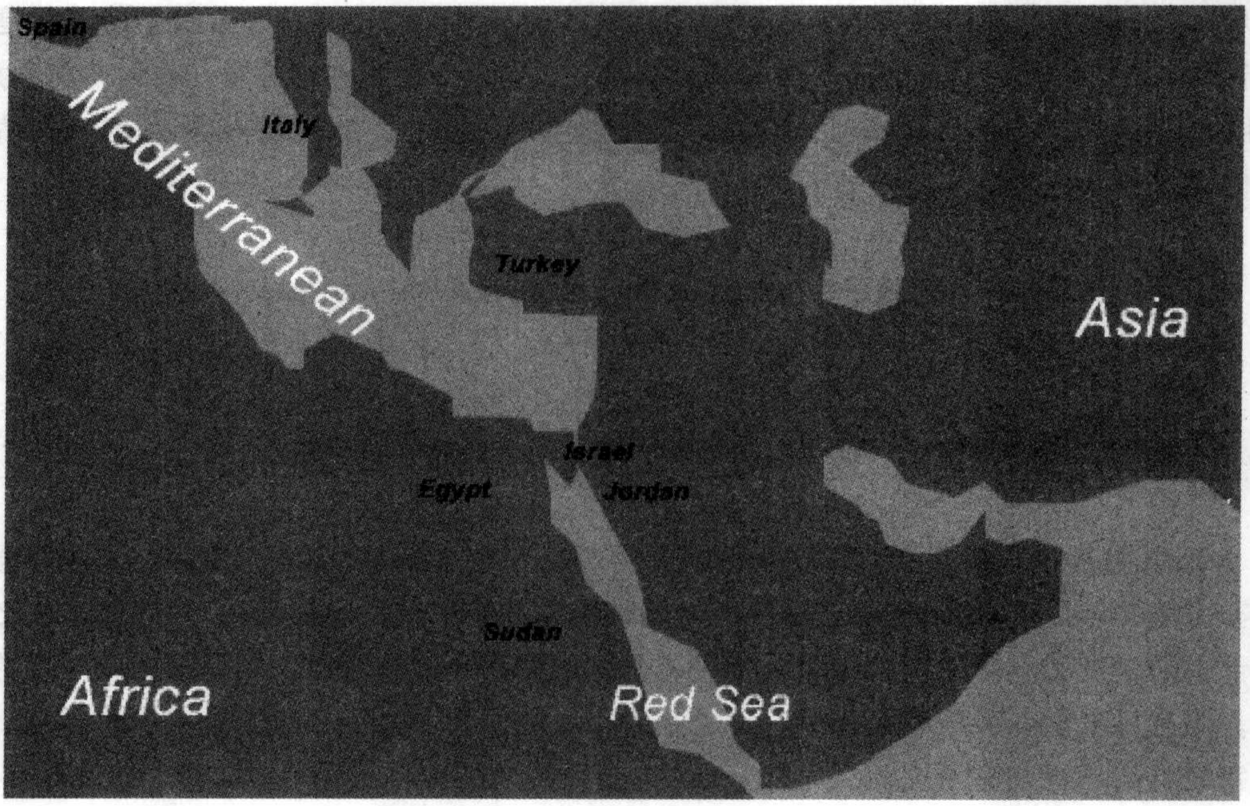
宙斯的罗马名字是朱庇特(Jupiter)，九大行星中最大的木星就是“Jupiter”。宙斯与众神都住在奥林匹斯山上，他具有最大权威，能够使用可怕的雷电惩罚神与人，他知道神和人的一切事情，还能预知未来。宙斯风流倜傥，到处留情，有很多的艳闻，在希腊神话中和他有关的故事多数都是描写他的情史，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政绩可谈。

“希腊神话”系统后来传至罗马帝国又生发出“罗马神话”，多数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换了新名，情节略有改动，这是政治与宗教的产物，更是文明传播必然的结果。希腊神话反过来也有小部分借鉴了罗马神话。研究这个嫁接或罗马本土化过程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这个本土化的案例非常完整，是整系统的搬迁，并且事实清楚，是非常典型的一种文明传播，也可以作为文化地理学上的一个典范来分析。

希腊在地中海东北方的巴尔干半岛最南端，距离曾经归属波斯帝国的小亚西亚半岛（土耳其）很近，其间隔着岛屿密集的爱琴海。今天希腊的部分领土就位于小亚西亚半岛。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上两边相互打来打去，著名的特洛伊（Troy）战争就是发生在它们之间。罗马在亚平宁半岛，与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半岛隔着亚得里亚海，这是一个相对规则的宽度在2百公里的海湾，各自有鲜明的文化体系，“罗马神话”之于“希腊神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

---

① 陶弘景（公元456—536），南朝齐、梁时期著名高道、炼丹家、医药家、文学家、学者，自称“华阳隐居”。今江苏南京附近人。出身于南朝士族，从小表现出浓厚的隐逸志向。二十岁时齐高帝引为诸王侍读，后拜左卫殿中将军。公元492辞官隐居到今天的江苏茅山，自号华阳隐居，是上清派的实际创始人。公元501雍州萧衍（梁武帝）自江陵起兵，陶弘景表示拥戴；并于次年萧衍将代齐称帝时，又以“梁”字为应运之符，令弟子献之，遂被萧衍定为国号。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即位后，屡请其出山而不得，但梁武帝对其“恩礼愈笃、书问不绝”，时人谓之“山中宰相”。陶弘景道儒释三教兼收，上识天文地理，下晓物产人事，琴棋书画，经书文学，无所不通，佛道兼修。大同二年（公元536）于茅山飞升。（参考“冥纸灰”文）



从这幅地图更容易看出地中海与红海之间的一体化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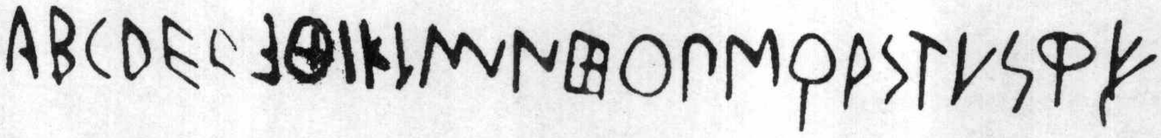
以上地理与时间变迁中的文化符号的更改，意味着时间与地理对文明影响的多寡与深浅。在这个参照体系的映衬下可以较好地理解具有地理阻隔与时间跨度的中国文明所受中东影响的可能以及程度，最重要的是这些文明符号进入到中国受到本土化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不过中国与地中海北岸的文化传播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

希腊的“宙斯”在罗马改叫“朱庇特”。前面我们分析过“普罗米修斯”在中国改叫了“盘瓠”、“庖牺”，那么在中国“宙斯”改叫什么呢？我想都超不出“音译”与“意译”，或者它们中间隔了波斯或者印度的什么神话才传递到中国来也是可能的。

撇开希腊语，把宙斯作为罗马神话中的名字就是“朱庇特”“Jupiter”，或拉丁文的“Ipiter”，都可以牵强附会到“玉”（yu）字（“皇”“大帝”都不是名字，是尊称，所以不能拿来比较语音）。“I”可以直接为“玉”；在翻译中，“y”“j”经常混淆不分，或者把“j”作“y”，比如“犹太”的“犹”（you）实际上就是“Jude”，又比如希腊神话英雄“伊阿宋”就是“Jason”。又因为中国一般只取第一个音节，所以就取了“Jupiter”之“Ju”转为“玉”（yu）是极可能的。

假如是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的玉皇大帝原来是“罗马神话”而不是“希腊神话”。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意味着我需要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会舍近求远？这不合规律啊，是不是我的推论出了什么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困难，但是现在看有以下两个可能：1. 一些偶然因素，比如中国的神话既有希腊神话也有罗马神话，但是取名时却偶然地使用了罗马化体系；2. 还有一个可能比较复杂，我会在下本书的海洋文明专题里详细论述，现在简要地说，在大约3000年前的地中海北岸地区，意大利半岛与希腊半岛曾经属于不同的两个文明区域，分别受

到来自中东板块的文明势力的影响，而中国地区恰好对应的地区并非希腊半岛，而是意大利半岛的伊特鲁里亚古国，那是古罗马的前身。但由于希腊神话与罗马神话差别不大，所以我们还是一直以“希腊神话”代称“罗马神话”，实际上“希腊神话”按照一般情况说也在“罗马神话”之前。



意大利半岛上的伊特鲁里亚文字，时间大约为2700年前（只剪出图中字母）。

幸运的是“盘王”原形“普罗米修斯”在两个系统中名称一致。 看来与中国相通的真有可能并非是“希腊神话”，而是《希腊神话》的衍生《罗马神话》。对这一体系之出现于中国，当然不排除在远古即有交流，但可以考虑其他的途径，比如拜火教时期的带入，还有日本学者饭岛忠夫曾经提出过亚历山大东征给中国带来的过天文学的影响，那么宗教与文学也当有所交流。

宙斯，或曰Jupiter，所代表的是木星。木星在星空中属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有一个英文天文专业网站给了这样一个评语：The lord of solar system，太阳系之王。它是太阳系中最大的一颗行星，体积是地球的318倍。这样一颗星很符合“玉皇大帝”在道教里“总执天道”的大帝身份。

木星在中国又叫“岁星”，“岁”表示周期，与大约12年（实际上不足12年）走完黄道带的12宫有关。是古代非常重要的一颗星，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这颗星的记载。

有关岁星，日本人饭岛忠夫说[①]：“巴比伦与印度皆有与中国相似的木星(岁星)纪年法，而印度此法又系西方输入。”在同一本出于1925年的《支那古代史论》(12)中，他“全面阐述其说。他认为中国天学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建立体系，该体系是从西方输入的”，原因则是归结于亚历山大东征。除了上面这个“岁星”的论据之外，他还列出中国天文学西来的十大理由：

1. 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论与古希腊人的相似。

2. 中国四分历取回归年长度为日，古希腊Eudoxus也取同样数值。

3. 由四分历回归年长度和19年7闰法则，可得76年周期(即从历元时刻起经76年之后，合朔与冬至时刻又回到同一天同一时刻)，而古希腊Clippus也在330B．C．左右创立同样的周期法。又中国与希腊都曾以428B．C．这年的冬至日午前零时为历元。

4. 古希腊制定76年周期法所依据的观测完成于400B．C．左右，而巴比伦之测定春分点与古代中国之测定冬至点也恰在同一时代。

5. 楔形文泥版书中所见巴比伦星占学，其中有些内容与《史记·天官书》相似；而

① 本段引述自江晓原教授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4卷2期（1992）文《中国天学之起源：西来还是自生？》

巴比伦星占学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传入希腊。

6. 中国二十八宿体系与巴比伦和印度的同类体系同出一源[①]。

7. 巴比伦与印度皆有与中国相似的木星(岁星)纪年法，而印度此法又系西方输入。

8.《春秋》所记36次日食中，有两次为中国全境所不能见，但用巴比伦推算日食之沙罗周期(Saros)推算之则正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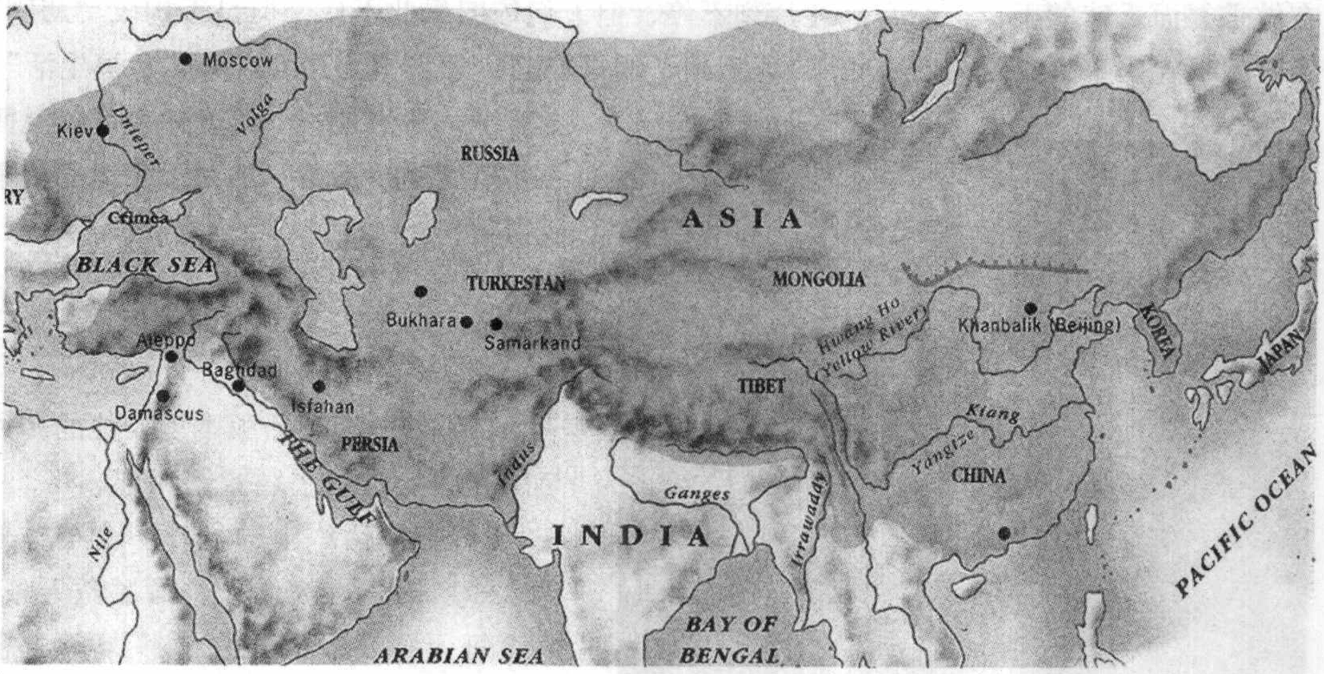
9. 中国古代天学仪器如圭表、漏壶、浑仪等，与古代西方颇相似。

10. 古代中国乐(律)历相关，此与古希腊Pythagoras学说相似。

木星有非常多的卫星。在没有现代天文工具之前，人们用肉眼只发现了3颗卫星，这就是为什么神话里总有“3个孩子”的原由之一？但是后来人们又发现了它其实有“4个孩子”，就是4个卫星。

不过在星座故事里，这些卫星都是宙斯（木星）的情人，比如“腓尼基的公主Europa”就是其中之一；受到诱惑的Europa甚至给宙斯也生了“3个孩子”（这就是欧洲名字的由来，现实历史中查里曼大帝将他征服的这块大陆命名为Europe)。Europa是“木卫二”，属于“金牛座”，当初宙斯诱惑她的时候是以小白牛的身份出现的。

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卡利斯忒（Callisto）是“木卫四”，她与宙斯生下的儿子一起构成了大、小熊星座，“北斗星”与“北极星”都在其中。



▲ 蒙古大帝国版图　从埃及帝国到波斯帝国以及亚历山大帝国，再到罗马帝国一直到蒙古帝国，很明显这个期间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向北移，也在向中东之外的两个西北与东北方向移动。这个移动很可能有两个因素有潜在的关联。其一，地理环境的突然改变，中东与北非大范围的沙漠化构成了环境背景；其二，在公元前7–5世纪具有文明意识的以色列人被亚述和波斯人大规模北迁，随之的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匈奴文明以及蒙古文明次第发育成长。宗教本身并不一定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但一神教的出现相对于萨满教是一种高级文明，它将避免人类在较低级的层次上去思考宇宙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在客观上会对科学技术以更大的催生空间，这是原始萨满教所不能达到的。

① 江晓原对此条提出质疑，认为“尚待证明”。

艾奥（Io）则是“木卫一”。在希腊神话（也是星座故事）中她因受到诱惑而被赫拉变为小母牛到处流浪，最后流浪到埃及，宙斯又把她变为人形。这位姑娘以皮肤雪白著称，所以她才是真正的“白雪公主”。

传说一个特洛伊美少年（Ganymede）也曾吸引过朱庇特的注意，他被叫去做酒司。他是“木卫三”。

吴刚折桂与西西弗斯

希腊神话中的主要元素有：金羊毛、金苹果、仙女、国王、王后、王子、英雄、巫婆、预言、森林、海洋、长征、冒险、妖精、爱情、婚姻、熊、鹰、大洪水、惩罚等，他们一再在全球日后的神话及童话故事里重复、再生、变化。人兽或者人鸟之间的转变是其一大特征。神话里主要提倡的是人的自然情感以及英雄主义精神。

希腊神话里的“重复性惩罚”也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情节设计。西西弗斯（Sisyphus）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西西弗斯因触犯天规而受罚，他要永久向山上推滚巨石，每次推到山顶这块巨石又必定落下，需要他重新再来，这个程式轮回往复无穷，直到永远。这个荒谬的命运构成了他的悲剧，其实这更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悲剧：无数的人一生都在做重复而乏味的工作，一直到死片刻不停，但人们依旧乐此不疲。但是否构成“悲剧”实际上只在当事人是否“有意识”，意识到了便是悲剧，意识不到还会成为“幸福生活”。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也可以说西西弗斯“坚持不懈”地对于命运的抗争值得效仿。

西西弗斯

在另外一个神话版本里，他的传说与阴间和死亡的主题紧密相连。

《希腊神话》中的另外一个英雄普罗米修斯因盗天火给人类而触犯天条，被鹰每天啄食肝脏，白天恢复晚上被啄，重复往返，无有穷尽。坦塔罗斯由于得罪众神而被打入地狱，他永远站立在一块即将掉落的大石下面，在忍受无尽饥渴的同时，那些可以解救他的河水与浆果就簇拥在他的身边，但却永远保持在他够不到的地方，这三重折磨永无止境。这些都与西西弗斯所受“重复性惩罚”是同一文学手法。他们的相似让人想到中国早期的某些章回小说，比如《水浒传》，前面的

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独特，到了后面，不知道是作者烦了还是江郎才尽，人物开始出现雷同或者程式化。希腊神话这一弊端并不那么严重，但《希腊神话》众神的共同违反天规以及领受“重复性”惩罚的命运就属于这个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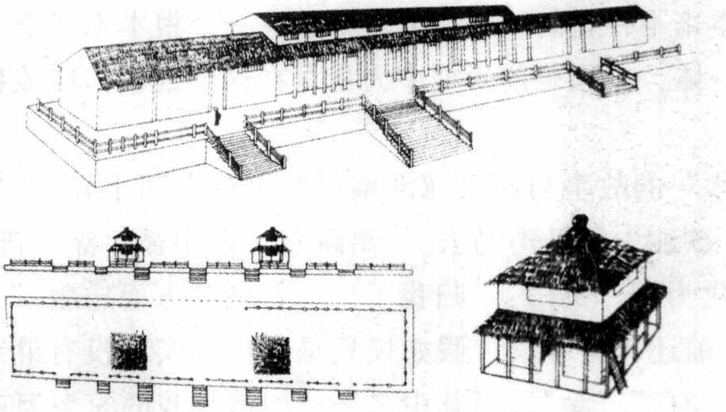
中国神话里也有一个人物，同样因闯祸而受到上天惩罚做“重复性无效劳动”，命运堪怜，俨然一个中国版“西西弗斯”。他就是我们熟悉的吴刚同志。我认为这个吴刚不是对西西弗斯的模仿，他们俩可能就是一个人，只是传播到中国进行了本土化嫁接，表面上看有很大的差异。

相传吴刚是汉朝西河人（又是汉朝！），曾跟随仙人修道，升入天界。吴刚在天庭犯了错误，仙人就把他贬谪到月宫。月亮上有座广寒宫，宫前有棵桂树，高五百多丈，生长茂盛。吴刚的任务与西西弗斯一样，被判罚做“重复性无效劳动”，日日砍树（所谓“折桂”是也），但桂树永远不倒。每次砍下去会有斧痕，但只要斧头离树砍痕就消失，吴刚就永远这样砍啊砍。这是他的命运。

吴刚应该是取自希腊神话的人物，我承认不是照搬，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假如不能说是直接取自西西弗斯，那么可以说此人具有明显的希腊痕迹。最重大的嫌疑当然在于“重复性无效劳动”情节的设计。我不认为这是个很容易的文学创意，所以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个有力证据。其次，“桂树”是希腊神话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树种，从希腊文明而起的“桂冠”正是由桂树枝做成，这两个巧合在一起的几率就更小了。最后，西西弗斯的命运在神话里与“死亡”和“阴间”有关，而月亮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正是主“阴”。并且我怀疑中国的“阴阳”最初就是指“月亮”与“太阳”，所谓“阳精为日，阴精为月”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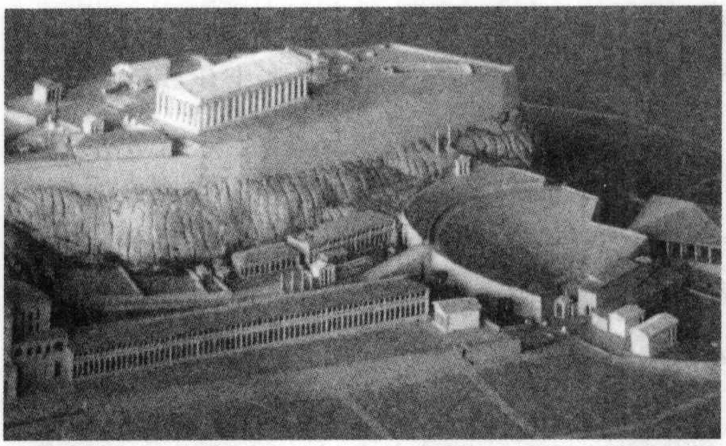
当然了，把他们放在一起对比今天人们只看到差异，假如两个不同的版本是从3000年前就分道扬镳了呢？那么，他们就会在不同的基础之上生根发芽，等到了他们的“成年”由于各自成长环境的不同面目全非不能相认是很正常的。我们一直在强调远古的交流，但同时必须注意到国家与民族概念出现之后产生的隔绝对两地产生的影响，把握了这两方面才算“全面”，才能接近事实真相。

相似的让人疑惑的两地例证还很多。到底是希腊神话片段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还是上面所说的交流与隔绝的效果，甚至谁是谁的源头现在也说不清，惟一肯定的是：两地明显在很久之前有过联系。



中国商朝殷墟大殿考古复原图（据石璋如殷代地上建筑复原）。假如给这些大殿换上雕花廊柱，顶上加瓦，就与希腊圣殿没什么区别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商朝的廊柱一定是直而无饰的，并且在同时的希腊恐怕也无瓦呢。

比如"后羿射日"就有"太阳神"阿波罗把太阳车借给儿子法厄同的悲剧影子：由于太阳失去运行规则，造成了遍地焦渴，连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人都给晒黑了。后羿在中国是"日神"，而阿波罗更是"太阳神"，他们是一致的。这里还引出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传统中认为"猫有九条命"，而后羿曾经射掉"九日"；在古埃及神话中"猫"正是"太阳"的化身之一，所以也可以说，后羿射死了"九条猫"，但它依然以仅存的那条"猫"活着。



古希腊大殿考古复原（自明信片），此时晚于商朝大约500～1000年。

希腊神话实际上是当时中东以及周边神话的综合。我甚至怀疑希腊神话的形成与传说中的雅利安人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人群曾经在大约4000年前左右在希腊到印度一带呈横向拉锯战，我相信一些神话传说在这一带具有广泛的共性。因而，某些中国神话的框架既有希腊神话的痕迹，也有印度神话的踪影。

"禹"与"鲧"的传说

大禹和道教的渊源关系也很深。河南嵩山的道观假如不是国内最大的道观恐怕也是名列前矛屈指可数的名观。嵩山一带还是大禹和妻子涂山氏故事主要发生地之一。

大禹传说的文本基本上是从汉朝开始大量出现，《蜀王本纪》、《淮南子》等都有记载，而这个时期又是汉朝与外部世界高度交流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道教的萌芽期。但大禹的故事是从汉朝开始出现，还是因为道教的关系而致使早已存在的传说开始发扬光大，还有待研究。

"大禹治水"故事太离奇，多半只能归于神话类别，比如人变熊，人变石，以及石生人。这些都不可能是事实。但是中国人还是常将大禹当作一个历史时代。我觉得这可能是特有的一种历史寄蟹现象，把本来不存在的一些人或事寄放在一个根本不相干的壳里了，而后来人们也就认了他们为一体。中国史前研究中大量存在这个现象，应该特别注意这样区分与剥离。

一般我们现在听到的"大禹治水"的故事与西汉《淮南子》记载大同小异："禹治洪水，凿轩辕开，谓与涂与氏曰：'欲饷，闻鼓声乃去。'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化为熊，惭而去。至嵩山脚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有趣的是，"涂山"所在似乎目前还有些争议，假如仅只是神话其实就没有继续争论的必要了。一般传统认为"涂山"有"三涂"，而其中之一竟然就是我的家乡河南嵩县。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嵩县与嵩山根本不是一个地方，之间隔有大约二、三百公里。

嵩县在秦岭最东的伏牛山，嵩山位于河南登封县。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集部·文选》第四十一卷："汉中地形，实有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左氏传，司马侯曰：四岳、三涂，九州之险也。杜预曰：东岳岱，南岳衡，西岳华，北岳恒；三涂，在河南陆浑县南。" 古之"陆浑县"即今日之"嵩县"。既然是"陆浑县南"就是今日之"车村乡"，从我记事起这里就是一个具有特殊风土人情的一个怪地方，那里与我居住的县城所不同的是更闭塞，具有更多高山。由于嵩县具有跨黄河、长江与淮河三大流域的奇特地理景观，而车村这里并不属于黄河流域，在距离车村乡政府20公里外的地方有一个海拔2153米的"石人山"，尚不知是否就是大禹传说中的石人仙山；而传说老子归隐的"老君山"就在距离车村50公里处的滦川县内。

以上《淮南子》里还没有说明大禹为什么"化为熊"，后来的道教故事里解释说：大禹是被"玉皇大帝""化为熊"的。"玉皇大帝"在我的体系里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天帝"宙斯"，而"宙斯"确实在希腊神话中有点化人为熊的权力与能力，比如前面我们讲过的大、小熊星座的母子俩就全被宙斯点化为熊。所以，"玉皇大帝"在道教故事里把大禹点化为熊的故事，双重证明了以下可能：

1.道教中的玉皇大帝就是宙斯；

2.大禹传说与希腊神话同源。

涂山氏听到鼓声看见大熊后奔逃，在大禹的追赶过程中化成了一座巨石。这个紧急逃离中转变为其他物质的情节在希腊神话中屡见不鲜，并且一般还都是男人追女人，女人发生变化，与大禹故事完全相同。希腊神话里追逐中女人发生人变物最著名的是仙女达芙妮（Daphne）为躲避"太阳神"阿波罗的追求而变成月桂树。希腊神话中静态中的"人变物"就更多了。在希腊神话里直接就有"人变石"的案例：底比斯国王安菲翁的妻子尼俄柏因得罪命运女神而失去7个儿子与7个女儿，最后她在悲伤中化为一尊石头。所以大禹的妻子变石头这一文学手法其模仿体系很值得怀疑。

石破而生子的情节，可以理解为"物生人"。希腊神话中也有类似情节。比如阿佛洛狄特的情人Adonis就是从"没药树"中诞生的。所以启生于石母并不算什么创举。

不仅大禹自己化为"熊"，而且他的父亲鲧也有同样的经历。《左传·昭七年》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话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三郊，三代祀之[①]。"《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掩洪水，不得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山。[②]"

以上神话实际上也能看出这个"鲧"也有《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的原形痕迹。普氏曾经在"不得帝命"的情况下，因"洪水"事件而得罪天帝。他预先把宙斯将用洪水惩罚人类的消息透露给人类，他在洪水过后又违背天条把火种盗给人类，最后宙斯为了惩罚他而将其捆绑在高加索"山"以受鹰鹫啄肝的万年磨难。两者故事轮廓基本相同：都是为人类谋利而开罪天帝。

从以上的两个中国文献看，对于"鲧"的最后命运有一个差异。《左传》为"殛鲧于羽山"，"殛"(ji）字有两个含义：其一为"杀戮"，其二为"惩罚，特指流放[③]"，假如是

① 引自何新《诸神的起源》263页。

② 引自何新《诸神的起源》262页。

③ 引自《辞海》1616页，1999年"缩印本"。

后者解释就更接近《希腊神话》版本。但目前的中国人一般认为是杀了鲧，这会不会是后来《山海经》的演绎呢？因为这个版本明确使用了“杀”，所以我们现代人就随了它。神话经常在不同时期会有很大“发展”，“杀”的事实究竟是不是后来演绎，还要考察两部作品哪个在先，但现在对此没有结论，其作者有猜测为汉者，也有推测为战国时期。

这个神话即便是杀了“鲧”，如此多的对应点重合，也可以怀疑鲧神话与希腊神话有同源关系。有人会说，中国“盘古”已经模仿了普氏。这并不构成矛盾。不过，两者看起来为什么会有比较大的差异，甚至从来没有人提出过“鲧”与“盘古”为一人的疑问①。对此，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中国曾经两次（甚至数次）与外部世界产生过较深入的交流，“鲧”与“盘古”是这两次分别不同的交流结果。“鲧”在前，“盘古”在后。假如给我一个仓促判断的机会，我愿意说，“鲧”神话产生于3000年之前，而“盘古”神话产生于大约2000年前。之间可能隔绝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恰逢希腊神话在希腊丰富与成熟，所以当后来再次以“盘古”进入中国时，“鲧”与“盘古”擦肩不认。而且，整个与大禹有关的神话明显与“盘古”序列有一定的差别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以上时间推断的基础之上，“鲧”始终没有走进宗教，只在民间流传；而盘古却被道教接纳，或者根本就是道教直接从《希腊神话》中请进来的（时间可以假设为亚历山大东征前后），因而在两个体系中各自发展出不同的谱系，比较明显的不同是，“鲧”甚至还有具体的儿子“大禹”。接下来比较巧合的是，战胜洪水的禹之子“启”是从石头里产生的，而基本相同的故事又在《希腊神话》里出现：普罗米修斯（相当于“鲧”）的儿子丢卡利翁（相当于“禹”）遭遇并战胜了那场著名的大洪水，之后他也用石头开始造人！这条线索又全部对应起来，差别只在细节。禹在中国同样是个战胜大洪水的英雄。

《山海经》与《左传》的作者皆为不详或不能确定，但基本圈定为秦汉前后之人，进一步《山海经》多认为作者是战国人②，《左传》有人疑为汉人托作。为什么这前后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传播在春秋至汉这一阶段，很可能与文字的成熟也有一定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假设这些传说早有口头存在。此中原因可以继续探讨。

“殛鲧于羽山”中的“羽山”很可能是“神山”或“仙山”，既然“羽化”就是“仙”化，如此解释是顺理成章的。后来将其儿子大禹“羽化”为“熊”而成“仙”更支持了这一论点。这个故事不仅说明了“鲧”与“禹”家族成仙的神话性质，而且给出了“变熊”就是最初的“羽化”过程，中国神话里一般省略“黄熊”的升天的过程。后世可能

---

① 在本书出版前的2005年3月18日，我读到一篇署名清华大学／胡万川的文章《捞泥造陆——鲧、禹神话新探》，在文中得知神话专家袁珂先生倒是说过“鲧”的原形是“普罗米修斯”的看法，不过胡不同意袁的观点，认为“鲧”来自“捞泥造陆”的神话，而“捞泥造陆”是个全球共有的古老神话。胡的主要反对意见为：“鲧”既然是个对人类有巨大贡献的人为什么会是个反面形象，成为“狗熊”，所以这个提法是错误的。本书的许多分析已经可以圆满地回答胡先生提出的这个疑问：“熊”在古代就是“仙”，是“羽人”之一种，根本不是反面角色。

② 屈原在《天问》中已经提到这个故事：“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所以可以认定该传说体系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存在于中国，因为屈原生活的时期为战国时期的楚国，屈原生卒：约公元前340～278年。

由于黄熊的笨重，看起来升天困难，而渐渐隐去黄熊，让一些圣人直接“羽化”成仙，最终根本不用作任何变形，从人就直接升天了，但是保留了“羽化”的说法，以“羽化”代替“升天”。从今天看，一些比较古老的民间传说中才能看到一些具体的羽化人物，比如中国的七仙女、比如这里的鲧、禹，也如欧洲的天鹅姑娘等。但到了汉之后道教人物就基本上由人直接“羽化“升天了，根本不提实际的外在变化了，因为越到后来人们越相信“科学”了，神话与宗教也跟着前进。进而今天我们已经把“黄熊”当作有辱形象的反面人物了。

月老红线

太多的例证说明，在希腊神话里也可以看到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生下一个儿子日后相认的故事格局，这已经不好猜测到底是谁借鉴了谁。

在所有与天鹅或鸟有关系的仙女故事里，一般都有一个盛大的宫廷宴会。在示巴女王拜访所罗门的故事中一个不能或缺的重要情节恰好就是一个盛大的宴会：据说在示巴

克劳德·德·洛兰(Lorran)油画 示巴女王登岸。不过根据传说中示巴女王实际上采取的是陆路。

女王离开以色列的前夜，所罗门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宴，就在晚宴之后所罗门运用智慧诱惑了处女女王——因为晚宴后焦渴的女王不得不到所罗门的帐篷中去取水。这是非常

重要的特定场景，这是惟一一次女王与所罗门的床笫之欢。

示巴女王生下儿子后，他拿着父亲留下的信物“戒指”去以色列国认亲。戒指的传说也出现于希腊神话中。因为普罗米修斯从高加索山逃亡后为了迷惑宙斯就也戴了一只铁环，并且这个铁环更像今天的戒指，上面还镶嵌了石头（后来现实中变为玉石类）。

类似他们父子日后相认的故事在《希腊神话》里不只一个。其中一个是忒修斯（Theseuss）的身世：

他的外曾祖父母都是有强大背景的王室，其母为公主埃特拉。没有继承人的雅典国王到忒修斯的外祖父这里拜访，结果已有家室的国王与忒修斯的母亲悄悄成婚，几天后这位国王离开。临走前他给新婚的妻子说：我在一块大石头底下放上一双鞋子和宝剑，等他长大了搬开石头拿上信物就去见我。忒修斯长大后见到了父亲，并当上了雅典国王。

除了人名与地名，以上细节上与示巴女王的儿子“孟那里克一世”的身世极为相似：王室出身的母亲不明不白地与一个身世显赫的国王结合，还不知道是否怀孕父母就分离，丈夫留下日后见面鉴别的信物，这个儿子最后成为王子做了国王。

接着上面的故事，可能牵出了中国的“月老”红线：

忒修斯来到父亲的国度成为王子，但国内形势复杂，内忧外患，一时忒修斯难于立足。邻国克里特国王米诺斯又来索取贡物：七对童男童女（“童男童女”现象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很常见，又一个全球同源）。这些童男童女被送到米诺斯之后命运极其悲惨，他们将在著名的米诺斯迷宫被一个半人半牛的怪物杀死。人们怨声载道，说是忒修斯这个私生子带来的祸殃。为了平息众怒，特修斯决心自已充当童男童女进入迷宫，杀死半牛半人怪物。父王再三恳求他不要前往，忒修斯说他一定能够杀死对手安全归来。以往载走童男童女的船都挂黑帆，因为他们有去无还。但这次启程前国王交给儿子一面白帆，说假如他获得了胜利请一定换上白帆归来，让大家放心（此处给日本传统中“幸福的黄手帕”一个可能的出处解释）。

神谕告诉忒修斯向“爱神”阿佛洛狄忒（中国此神应该名为“月老”）献祭就会有好运，他不明白有什么意思，但是依旧按照指示去做了。一到克里特岛，这位美男子就倾倒了公主阿里阿德涅，她偷偷交给忒修斯一个线团，指示他把线团一端拴在迷宫入口，跟着线团向前走就到了半人半牛怪的跟前；同时她还交给心上人一把利剑，这可以杀死半人半牛怪。他果然杀死了怪兽并成功走出迷宫，最后带着童男童女与深爱他的公主离开了克里特岛。令人悲伤的是，由于他忘记换上白帆，他的父王在岸边看到归来挂着黑帆的船只，因悲伤而卒死。

这个故事中实际上是“爱神”帮助忒修斯获得了胜利，但主要工具却是一个“线团”与利剑。中国人在我们能够回忆的古代没有爱情（禁止谈爱情），只有婚姻中的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可以期盼美满姻缘，未婚的女孩在一些特殊的中国传统庙会里都会买到一些红线头，这个传统很可能就与这个希腊故事有关——这样的习俗多在黄河、中原一带，比如河南。中国也有“抛红绣球”的传统，这是选择夫婿的一个途径，这就更明显：公主阿里阿德涅把“线团”——也就是一个“绣球”——交给了忒修斯使她赢得这个美男子爱情。希腊神话里没有说“线团”的颜色，但中国人因以红色为吉利，所

以好事都是“红色”，“红线”以及“红绣球”随即成为媒妁姻缘的象征。我不认为中国的这一传统又是巧合，因为“红线”与“绣球”以及“（爱情）婚姻”两者有机地对应，几率极低。一个线团被分解为“线”与“团”，在中国南“团”北“线”，都是希腊神话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延续和发展。

中国在周代已经有“媒官”月老一职①，我甚至怀疑这个“媒”（mei）是否来自“米诺斯”之“米”。

半人半兽形象是古代希腊神话与中东神话里多见的造型，还有一些角色在人兽之间变来变去，比如宙斯。这个原创程式在中国人已经本土化后并不多见，比如有“汉文明”出现之后。但是在“盘古”“伏羲”之类的人物身上却出现了半兽半人状态。我怀疑中国的儒教“远鬼神”思想多少遏制了活泼的希腊神话在中国的发扬光大吧。

中国文明一直被认为缺乏浪漫神话，这个说法有几分道理。中国神话总体呈现出一副贫血状态，虽然拣拾起来似乎也不算少，但是明显不成系统，支离破碎，处于一种原始状态。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说明系统思维能力的缺乏。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是地理传播上的问题，距离西方太远，西方人随便一捏合都比中国人方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有“理性”的儒教，损伤了一切活泼的文化本质，神话从源头上就被压抑了。

其实从童话产生自西方，发达于西方，已经说明了许许多多的相关问题：文明程度、传播途径、文学能力、思辨方式等。一切关注中国文化的人必须对此做出足够的反思。

嫦娥传说来自印度神话

尽管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之间有着种种神秘联系，但印度神话恐怕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我相信许多中国神话直接来自印度，来自佛教。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中就很清晰地分析了这两个家喻户晓的中国故事其实是来自印度，因为三国故事广泛流传，所以最后竟然“三人成虎”了。不过也有其他不同意见，1980年第9期《麻醉》，刊登了日本弘前大学医学部松木明知的题为《麻醉科学史最近的知见：汉之名医华佗实为波斯人》的文章。不过，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神话故事的众多根源。

这里我想只举嫦娥的故事一例说明一下中国神话的多源。当然这个故事中除了印度成分还有其他地区的文化成分，因为吴刚与嫦娥的特殊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嫦娥传说与希腊神话也有联系。

尽管大家都知道嫦娥奔月的传说，但是让我把故事讲出来似乎也有点难办，因为嫦娥奔月的故事版本太多，仔细一看差别很大，假如“严谨”的话就不知道选取哪个才妥帖了。这正是传说故事的一个特点，每个地区与每个人说出来的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创造”之随意性也就可见一斑。

① 吴天明，《中国神话研究》，27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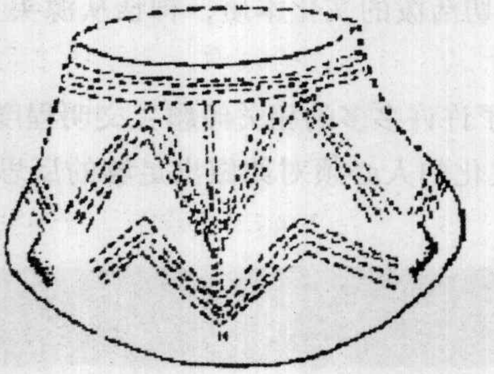
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古今传唱，无人更改，倒是可以当作千年前《嫦娥奔月》的朦胧版本看待，神话的基本元素全部包含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似长像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现今流传的“嫦娥奔月”神话母题主要有：1．嫦娥吃“不死药”奔月，2．嫦娥与后羿有夫妻关系，3．偶见嫦娥与蟾蜍的关系，她因受惩处而被变为蟾蜍。

一般认为嫦娥的传说最早见于汉初的《淮南子·览冥训》。更早的还见于《归藏》，但《归藏》并未将嫦娥与后后羿的故事放在一起，只说嫦娥为月精，非常简单，几乎无情节可叙。故事在《淮南子·览冥训》中得到了发展，嫦娥与后羿已经被放在了同一个故事里，不过却未见夫妻关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何则？不知不死药所由生也。”

在《淮南子》的古本中尚有嫦娥到月宫化为蟾蜍的记载，后来这个情节被略，但是蟾蜍与月亮的关系却被保存了下来。不过“蟾蜍在月”的神话主题是个全球现象，说明这个元素本来就可能不属于中国人而是外来，并且舶来的时间非常之早，因为据考夏人就已经有崇拜蟾蜍“蛙神”的习惯了[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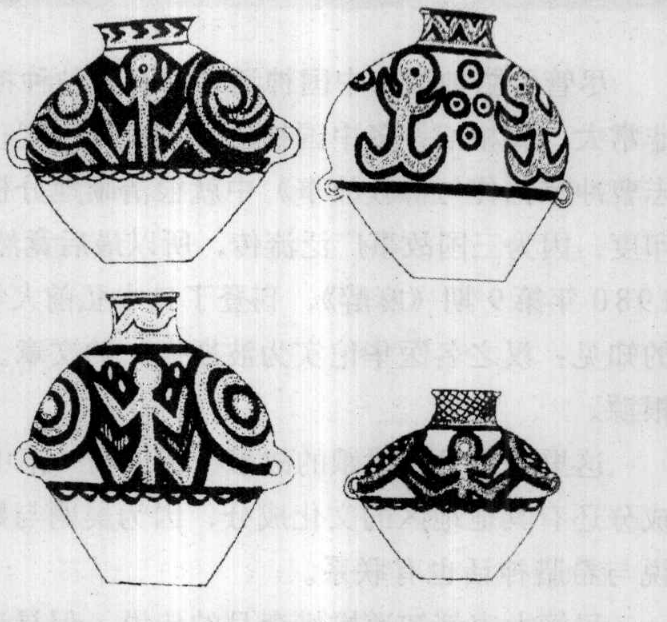


德国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蛙形线纹罐

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中的“常羲”就是嫦娥，证据不很充分。

与月亮有关的中秋节“月饼”确实是中国人自己的特色，不过形成节日的时间很晚，是唐代皇帝碰巧在一个中秋节赏赐了科举才子们一些圆饼后流传下来的习惯。

这个神话传说与其他中国神话传说一样，经历了明显的“发展”，并且都在汉晋时期获得了质的飞跃。



新石器时期的中国青海地区的蛙纹（马厂类型）罐

汉代是道教成型的一个时期，并且是中国神怪故事的丰收年代，同时汉代是中国文献记载里的第一开放国家，想必嫦娥就是在汉人所做的《淮南子》之后开始注入复杂曲

① 吴天明，《中国神话研究》，31页。

折情节的。大多数中国神话都与汉代有关。这里需要特别关注的另外一个现象是佛教在汉代大举进入中国的事实[1]，这对于理解嫦娥故事的迅速丰满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一个细节才会对汉代的“开放”做适度评价。以《淮南子》为例，那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作品，也就是说，这个汉朝“开放”实际上在张骞之前就存在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嫦娥故事之间的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点：1．嫦娥的身份，有的故事里她是个普通村姑，有的说她贵为帝喾之女；2．有的使用“后羿射日”版本作为背景，有的使用淫贼河伯的版本，还有的完全舍弃“后羿射日”主题；3．“不死药”多是说从西王母那里讨来的，偶尔有说是从某无名大仙处得来；4．奔月动机：有的故事里嫦娥是在和一个偷吃不死药的坏蛋“蓬蒙”抢夺中误吃了不死药而奔月，有的说嫦娥为了摆脱河伯的骚扰让后羿一心一意于射日事业就牺牲自己吃了升天的不死药而奔月，还有一种说法最常见，认为嫦娥自己独吞不死药而奔月，是个负心人。

这些众多差异正是民间神话传说由不同人不同地区长期口头传诵所形成的结局。

有人考证嫦娥的名字，说原本嫦娥叫亘（或“姮”）娥，因避讳汉文帝刘恒（前177–前157年在位）讳，改称嫦娥。我对于这个说法保留怀疑态度，或者它是因为恰好与汉代印度月神故事的传入发生了融合，从而顺便更名也未可知。佛教在东汉初就在中国建立寺庙意味着印度文化在汉朝大举进入中国，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宗教，包括印度教。

本书一直没有涉及印度教，这里简单讲几句：佛教与印度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或许可以拿犹太教与基督教类比。印度教的起源很早，应该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从神话以及教义看与拜火教以及犹太教都有或多或少的牵连，我想主要影响的来源还是最初两河流域附近的文明，主要看“创世”部分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我认为嫦娥的故事主要借鉴了印度神话，但是否直接从东汉嫁接过来还是个疑问。一是神话元素的接近，一与语音有关。下面我们来看有关的神话：

印度的主神有三位：大梵天（Brahma），大自在天（Shiva），以及妙毗天（Vishnu）。大梵天为创造之神，宇宙之主。大自在天及湿婆，是三只眼的破坏之神（即鬼眼王）。妙毗天是宇宙与生命的守护者。三大神皆能自由变化，犹在众神之王因陀罗（Indra）之上。

一次因陀罗得罪了大自在天的分身陶尔梵撒斯（Durvasas），遭到诅咒，因陀罗诸神以下三界都因此失去活力，日渐枯槁。诸非天，通称为阿修罗（Asura）趁机攻打衰退的诸天。诸天兵败只好向大梵天求助，梵天推给妙毗天（毗湿奴），毗湿奴对诸天说：“你们照我的话作，保证你们又会变成一尾活龙。” 他命他们将某种药草投入大乳海，以制不死甘露（The Dew Of Life）。但是诸天必须与阿修罗合作，并且最终一起分享这些不死天露。

就这样他们开始一起搅海，搅着搅着，从海里搅出一只香洁牝牛，其后搅出了天女梵琉尼（Varuni），是为谷酒女神（实际上我认为此女与希腊神话中的“维纳斯”有关）；然后出现了乐园大香树（吴刚的桂树？）；然后是月轮，大自在天取来作为额头的装饰；然后是一碗可以毁灭三界的毒露；然后是七头长耳天马；最终天医川焰（Phanwantari）手托不死甘露出现；最后出现的是幸运与美的女神吉祥天（Laksmi），她日后成为妙毗天

① 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为洛阳的白马寺，建立时间为公元68年。

之妻。

诸天欢欣鼓舞，被冷落在一旁的诸非天（阿修罗）则十分不快，其中一个从天医手中抢走了不死甘露，妙毗天化为一个美女混入阿修罗，加以迷惑，趁机将不死药夺回。诸天喝下了甘露果然又变成一尾活龙，大发神威把阿修罗赶回地狱，因陀罗重回宝座，从此三界平安。

在诸天饮甘露时，有个阿修罗名叫 “罗猴”（Rahu）变成诸天进去偷喝，结果被日天子苏利耶（Surya）与月天子旃陀罗（Chandra）看到，他们告诉了妙毗天，妙毗天立刻射出法轮血滴子。罗猴把不死药只吞到喉咙，头就被割了下来；虽然他身体死了，但因已吃到甘露而得永生，大叫一声，飞到空中。罗猴从此恨日月，只追日月，一追到就把日月吞食，这也是“日蚀”、“月蚀”的神话解释。罗猴星为一黑暗星，死掉的身体化为计都星（彗星），为不祥之星。

在中国西藏苯教里就有“罗猴星”与“扫把星”。我前面也推测过西藏在中国古代曾经起到过的独特的交通作用。由这里可以看到苯教也受到印度教影响的痕迹，进而假如中国道教确实受到西藏苯教的影响，那么一些道教故事来自哪个方向就比较清楚了。“扫把星”在今天是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概念，指“晦气”的物品或人物。实际上，假如我们把彗星有可能造成陨石伤害看，确实应该归于“晦气”之列。不过这个概念起于道教、苯教与印度教的起源却在这里得到了澄清。

中国的月亮女神“嫦娥”是一个“粘贴”结果。最初她很可能叫过“罗猴”(Rahu)，“亘（姮）娥”是也。后来或许是为了避讳或者是出于其他原因，结果让她从偷吃“不死药”的阿修罗变为“月神旃陀罗”(Chandra)，这样粘贴之后已经接近中国的“嫦娥”(change)。这一变化比较大，身份与名称都发生了变化。或许这个改变是记性不好的历代老奶奶们“狼腿拉在狗腿上”，把月神举报的名叫“罗猴”的阿修罗偷吃不死药的事情拉在了月神的身上，这是神话演变中常见的事情。不过这一改编很成功，简直天衣无缝。

蟾蜍为月神被及时糅进这个故事。先是印度月神“chan-dra”与中国月亮神兽蟾蜍“chan-chu”糅在一起，他们发音接近。所以蟾蜍先为月神 。无论是印度月神旃陀罗“Chan-dra”还是中国月神蟾蜍（chan-chu）第一个音“chan”都接近“chang”(嫦)；“娥”为女性尊称，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嫦娥”的名称。 同时解答了为什么嫦娥会变为蟾蜍。

“不死药”这个概念据说在战国时期才出现在中国，与“仙”的概念同时在中国落脚。之前中国有类似“迷幻药”的概念，但与不死药还不是一个概念。很明显，前者为实际存在物品，后者为一理想虚构物。有人说，“不死药”与“仙”的概念的引入意味着一种新的宗教的引进，它已经有别于原始萨满教，原始萨满教只有“迷幻药”的概念。我们由这些零碎的信息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大概的轮廓：在春秋战国前后，中国确实有新的文明进入到中国，它们包括印度教、佛教、拜火教，甚至希腊神话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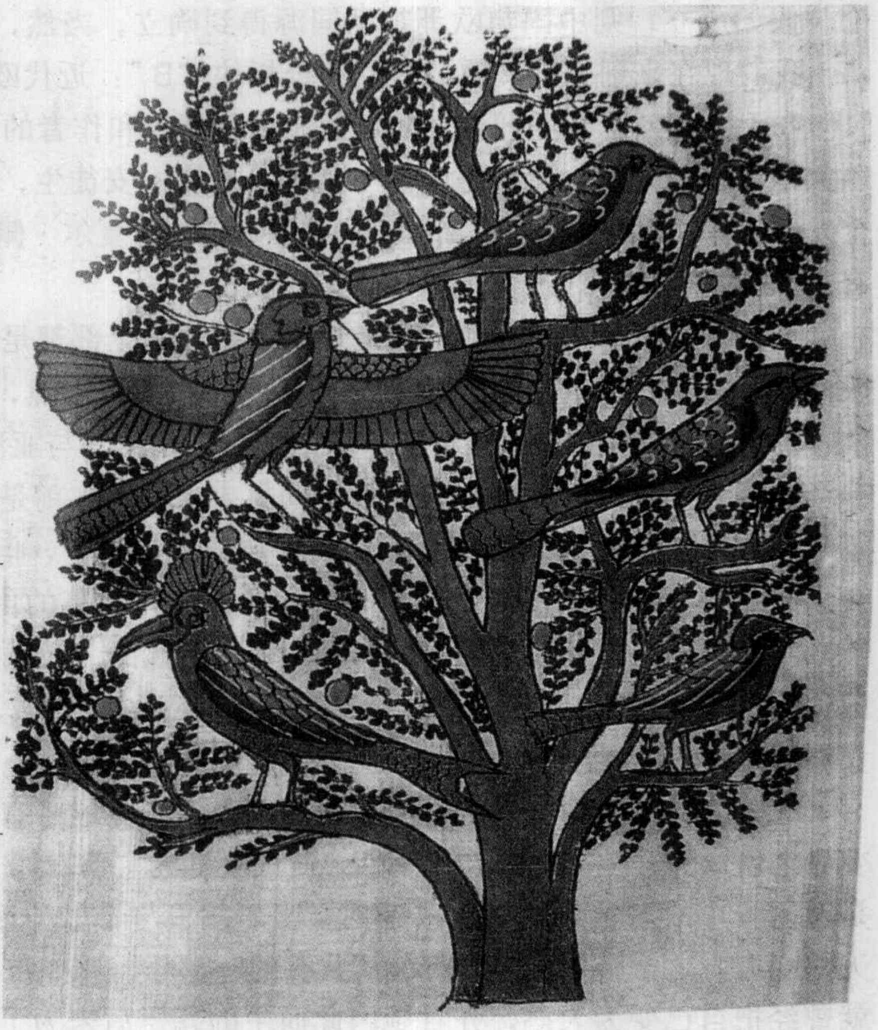
在拜火教里也有“不死药”的说法。拜火教“不死药”是用一种叫做“豪麻”的植物制造的。拜火教对于“火神”的敬拜活动中使用这种“豪麻”。后面我们在分析全球童

话时会发现出现在童话中最为突出的一种植物竟然是“麻”！我认为多少与这件事情有关联。

◀ 汉砖画后羿射日

这个“毫麻”我认为可能接近“大麻”。大麻与其他麻类植物一样可以用它的纤维进行纺织，不过同时也可以采取它的分泌物作为致幻毒品。大麻种类很多，但据说只有印度大麻才可以生产出致幻品来。这些信息似乎向我们暗示波斯与印度之间的文明特殊联系。拜火教产生于波斯，而拜火教中的使用的豪麻却多产于其临国印度。

嫦娥与“后羿”逐渐拉上关系，似乎也与这个印度神话有关。“妙毗天”是印度最高的三大神之一，中国的后羿作为日神地位也其高无比；在上面的搅海中产生的一位美女“吉祥天”与“妙毗天”日后成为夫妻。嫦娥原本是一独身，但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还是被好心的故事能手们配于后羿。另外，举报偷吃“不死药”的人本来就是一个日神和一个月神，所以把嫦娥这个月神与日神后羿联系在一起，并非没有道理。这个肢解与重装实在彻底，在还原中连我都几乎找不到完全的大碎片，全是小零碎。



▶ 古埃及瑞鸟图。由于鸟就是太阳的象征，这一点与中国同，所以后羿射日实际上就成了射鸟。而中国神话里所谓的“扶桑”恐怕就是这样落满瑞鸟的埃及神树。

第五部分　几则全球童话与神话

来自德国的格林童话

有一个公式如下：

条件：　A 就是希腊神话，B 就是欧洲神话与童话，C 是中国神话。已知 A ≈ B（已为定论），现在我要求证 C ≈ A。其实假如证明了 B ≈ C，也就间接证明了 A ≈ C 的结论。假如成立，则中国与欧洲神话同源得到确立。当然，这只是一个概括性的做法。

我们现在来到人类文明的另外一个板块“B”：近代欧洲童话。

今天大家熟悉的欧洲童话故事假如以整理者和作者的知名度而言，首先他们代表的国家是丹麦与德国，然后是法国与英国。丹麦有安徒生，德国不仅有格林兄弟而且有为全人类整理了希腊神话的古斯塔夫，法国童话则有夏尔·佩罗（CharlesPerrault），英国有王尔德作代表。

严格讲童话并不是神话，但是早期童话几乎全部都是经过专业作家加工的神话。一般而言，童话作家同时也被看做是神话的收集人。当然，现代科幻童话除外。

我认为希腊神话以及与星座故事的结合，是欧洲与亚洲民间神话的重要原料与养分。一半的童话是从民间故事来的，而民间故事在整理之前是由那些业余“荷马”奶奶传承下来的。《荷马史诗》被说丢了，或者干脆就全散架了，但是许多听过这些故事的老奶奶会编造一些新的故事出来。这就是西方所谓民间故事的由来。

“天鹅”是个十分欧洲化的符号。对应于中国的，我想应该是“喜鹊”与“燕子”。中国传统星座里面并无“天鹅座”的概念，在银河这一区域，“天鹅座”恐怕就是《牛郎织女》故事中好心的“喜鹊”。

从中国到日本、甚至全球的神话传说中，许多地区有类似《毛衣女》的神话，稍微变异之后成为了欧洲版的“天鹅姑娘”或亚洲的“羽衣仙子”、日本的“仙鹤女”等，这是对同一个故事转述版本，或者把星座的故事与希腊神话元素混合的结果。人变天鹅，天鹅变人，是希腊神话与星座神话共有的一部分，比如宙斯为了诱骗美女丽达（Ledo）就曾经把自己变为天鹅，并且她因此而生的儿子后来为了寻找父亲也变鸟而升天——这大概就是中国道教里最典型的“羽化升天”原形；“太阳神”的儿子驾车掉进海里死后，他的朋友锡格纳斯因悲伤也化为天鹅永远在波江[①]上悲鸣。人鹅之变在所有的近现代神话

① 此“波江”应为意大利半岛北部的“波河”，只是翻译习惯不同而已。

或童话里有多样的版本。

全球的“鹅”或“鹤”故事集中起来都有这样几个主题元素：爱情、天仙或美丽公主、鸟、水，这几个是“一级元素”。然后还有“二级元素”：如青色、魔法、受难、眼泪、王子、森林、国王、苹果等。从中国的《牛郎织女》（或《毛衣女》）到我们熟悉的俄罗斯芭蕾舞《天鹅湖》，都可能来自同一个古老的版本。它们可能并非来自具体的同一个故事，但却是来自同一个大的体系。

几则童话与神话对比

我在做“全球文明同源”研究之前，曾经刻意对全球的神话体系进行一次搜集阅读。“神话”之于我的特征是：无具体作者，民间流传、古老、与民族根源有关。其中包括犹太人的《圣经》以及中国的女娲传说等。当时只发现“洪水故事”是全球共有的，当时我也还没有碰“童话”这一板块。

当我集中检视全球童话时才发现那么多的故事是如此相像。首先是欧洲之内的相象，为一级亲缘关系；然后是欧洲与中国或者亚洲、包括中东的相像，还有美洲的故事；最后是非洲的。它们之间的联系之紧密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我先是迷惑，最后被震惊了：这绝不是偶然，它们是同源的！只不过距离的远近影响了它们之间的相似程度而已。这是很正常的文化地缘现象。

我一直很清楚地记得一件令我羞愧的小事，但是这件事却让我产生了一些重大怀疑。一次我随爱人到他导师家里，他们谈话时我闲着没事就找导师的小孙女说话。我给她讲《白雪公主》的故事，结果快讲完的时候，她提醒我说那是《睡美人》。用一句我家乡人喜欢用的俗语，我这叫“狗腿拉到狼腿上”了。说实在话，这两个故事太相像了，不全是我的错，除了幼儿园的老师这样的专业人员谁分得清这些童话的细节呢。尽管要点一个在“雪白”的漂亮，一个在“昏睡”上面，但是它们的其他要素太多相像。现在我们把几个比较著名的又比较接近的童话（神话）放在一起比较看看，进行一下故事元素比较：

国家／地区	法国／南欧	德国／北欧	丹麦／北欧	中国／东亚
神话名称	《睡美人》	《白雪公主》	《野天鹅》	《七仙女》[①]
相似主角	漂亮的公主	漂亮的公主	漂亮的公主	漂亮公主
相似亲属	国王和皇后	国王和皇后（后又娶妻）	国王和后妻	王母和玉帝
相似情节	生育公主	生育公主	12 孩子	3 孩子
相似情景	洗澡／水	下雪／流血	浴池／湖水	洗澡／银河

① 以同名电影为主要参考。

相似道具	青蛙预言	魔镜	癞蛤蟆／镜凳	老牛魔力
性别或数	12 个仙女	7 个小矮人	仙女莫尔甘娜	7 个仙女
目的交叉			12 个孩子	
相似反面女性角色	坏巫婆	老巫婆／后妈	好巫婆	恶毒西王母
相似情节	纺锤	针线活	纺织披甲	织布
相似场景	森林	森林	森林	老榆树
相似情节	公主昏睡	公主昏死	公主睡着	牛郎睡着
相似命运	最终王子出现	最终王子出现	最终王子出现	与牛郎见面
相似主题	爱情	爱情	亲情／爱情	爱情
共有水果	苹果	苹果 需瓜果	苹果	“七夕”食品
共有动物	鸟	鸟	鸟	鸟
相似主角年龄	15 岁	15 岁	15 岁	少女（16）
相似结局	幸福结局	幸福结局	幸福结局 但常别离	可以相会

如此多的相似元素不由得人不弄混。《白雪公主》与《睡美人》的故事更容易混，因为它们的主人公都是一个美丽的公主，《野天鹅》由于有 11 个王子的一直参与所以还有相对的区别。

从以上对比不难看出，欧洲板块的童话（民间神话）与中国的《牛郎织女》也非常接近；但是也可以看出来，法国与德国最接近，丹麦已经有变；变化最大的还是中国的神话。显示了地缘因素确实存在。相似性随距离呈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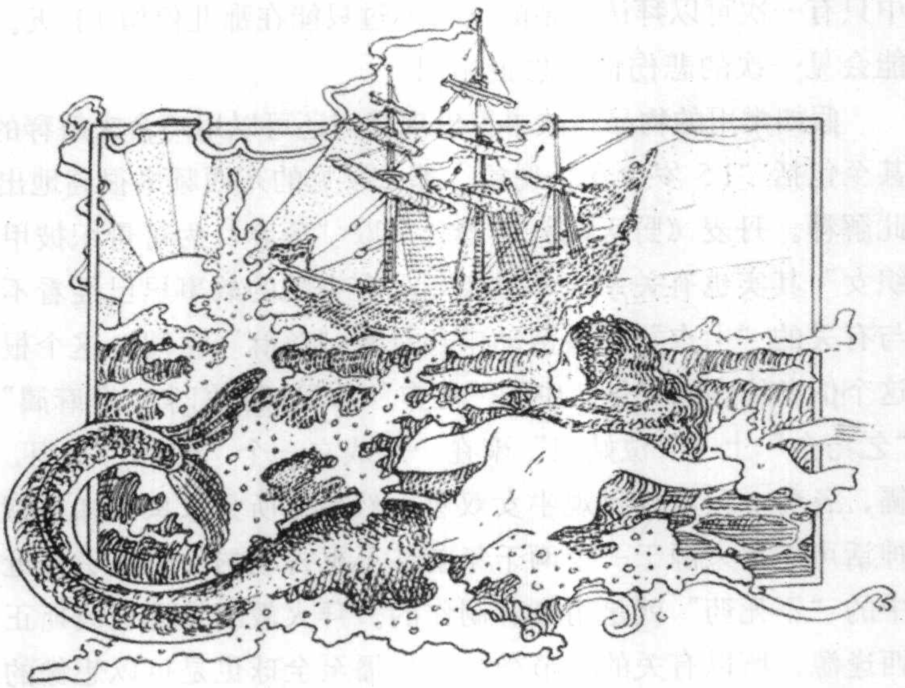
安徒生很明确地告诉人们，《野天鹅》的故事（见下篇）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从逻辑上可以判定其他两则故事也受到民间故事的影响。它们之间的区别正是在口头流传过程中的变形结果。安徒生与格林兄弟不仅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相互认识，还见过面。德国与丹麦是近邻。安徒生曾经在整个欧洲游历广泛，有 10 年的时间都在国外旅行，他或许会听到许多的欧洲民间传说，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应该是他的祖国的吧。《希腊神话》对于欧洲神话的影响自然是不用怀疑的。《希腊神话》是欧洲人的“论语”，千百年来欧洲人一直以熟悉《希腊神话》的程度来判断一个人的文化素养。

1838 年安徒生创作的《野天鹅》感觉最为质朴、原始，但这并不表示创作时间最早，因为法国的夏尔 · 佩罗写的童话《睡美人》是在 1697 年。主要看哪里更闭塞偏远哪里的作品就会更“原始”一些。

顺便请注意上面的三个童话里有关数字“3”、“7”、“12”的出现，它们神秘地对应

了中国道教中的三个最重要的数字。说明这些神话与全球的宗教体系也有神秘的同源关系。

坚韧美丽的公主，长发飘飘的处女，在婚姻面前为了坚守诺言的无奈失语，牺牲自我，大海的背景，特殊的眼泪，由这些特定的人物以及情节还可以扩展怀疑到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格林兄弟的《少女玛林》。关于前者的“鱼身”，《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哥哥就是这样一个人首鱼身形象，说明“海的女儿”这个造型不是原创，只是变了性别。



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

“15 岁的少女”也是个欧洲童话中女主角的共同年龄，构成了有趣的“15 岁少女现象”。为什么大家都选取这个年龄，肯定当初有所依据，并且应该来自远古，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认为18 岁以上的女人才合适谈恋爱，但在古代时间要提前。中国考古认为，“古代女子的始婚年龄一般在15 岁左右。如陕西临潼姜寨仰韶遗址的第三墓区，发现一座M158 的母子一次性合葬墓，母亲的年龄为20 岁左右，孩童年龄6～7 岁，可推算出母亲的育龄才不过14 岁上下。同墓区M181 母子合葬墓，为一位30 岁女性和一个13～15 岁的孩童，母亲育龄也是15 岁左右。《礼记 · 内则》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墨子 · 节用上》云：“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韩非子 · 外储说右下》云：“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①]

在“文明子宫”里也能寻找到它的古老答案，比如中东的“处女女王”登基时间就是这个年龄，一般在15～16 岁。但在中国似乎神话中更喜欢“16 岁少女”——中国是不是总比西方在年龄计算上多出一岁还是个疑问。因为我推算“黄帝”是“约瑟”的时候也发现“黄帝”比“约瑟”大1 岁，可能是中西方“虚岁”、“周岁”计算方式上的恒定差异。不过中国人认为少女成人一般是在14 岁，有“天癸之年”的说法。

在今天的尼泊尔共有三个“处女神”分处在三个大城市。这些“处女神”一般在初潮时被剥夺“神性”成为普通人[②]，而女性初潮一般多在15 岁前后（随着现代社会初潮

① 自宋镇豪《夏代婚姻》之《鲧禹时多态多婆的婚制婚俗》。

② 不过偶尔会有神妻一生都没有月经，那么她们就可以终生为圣，其神圣地位几乎等同我们常见的活佛一样。不过一旦失去神力降为普通人，则她们连普通女人的生活也过不上，因为据说神妻配偶会不得好死，所以一般人根本不感考虑与那些下岗的神妻来往，她们的处境会一落千丈成为悲惨的女人。

时间似乎有提前倾向）。这些都可能是15岁现象的来源。中国倒是从周朝起，女子年满15岁便算成人，可许嫁，谓之“及笄”。这些都可能对于整个神话体系的影响。

祆教规定“15岁”为“成年”，15岁之前皆为未婚处女。

我认为安徒生的《野天鹅》更接近中国的《毛衣女》，因为“人”、“鸟”之间的直接变化被保留了下来。《野天鹅》里面还有个情节，说11个王子受到后母的迫害，一年之中只有一次可以拜访父亲的家，不过只能在那儿停留11天。这与织女的“七夕”每年只能会见一次的悲伤情节也很相似。

假如常用的物品在故事里出现我们还可以用巧合来解释的话，如“苹果”与“玫瑰”，甚至包括“15岁少女”现象，那么罕见的东西频率很高地出现在不同的童话里就不好如此解释。丹麦《野天鹅》里的公主取“荨麻”为哥哥织披甲，而这个“荨麻”与“牛郎织女”其实也有关系。不过实际上在中国的故事里已经看不到“荨麻”了，但是我们在与有关的“七夕”社会活动中还是有“荨麻”出现，这个根本性质的转变形象地说明了这个信息传递的变化。中国“七夕”节里妇女们拿“荨麻属”的“苎麻”做以下的用途：“乞巧会”上“7位姑娘”聚在一起成立一个“乞巧”小组，取“苎麻”织成“7尺”布幅，各剪一尺以遮目观牛女双星，然后据所见景象预知婚姻等。这些流传于两千年内的神话可能都来源于一个两千年前甚至更古老的一个或者接近的几个同源的宗教！拜火教中的“不死药”就是用豪麻制作的。拜火教的发源地波斯正处在中西方的交汇处，它东西逢源，所以有关的细节被神话传播至全球也是可以想像的事实。富产大麻的印度更是这一神话的源地之一。在原始萨满教以及拜火教或者印度教中，迷幻药在古代一定使用非常广泛。另外古代医药缺乏，大麻类的迷幻药也能部分缓解人类的痛苦，所以大麻药在古代的使用或许可能就如今天的阿司匹林一样广泛吧。

牛郎织女

这一特定的“麻”情结肯定有其共同根源。德国童话《井边的天鹅姑娘》里也有“麻”：当巫婆赶那少年背她走路时就使用“麻秆”抽打他的腿；格林的《少女玛林》里也有“（荨）麻”，并且处于很突出的位置，公主两次对“荨麻”讲话。另外，“荨麻”（或者苎麻）的出现，都说明了神话的古老。因为苎麻是古老的纺织材料，并且是两千年前非常普遍的纺织原料。中国的棉花是东汉时期从印度引进的，之前应该只有丝绸、麻、毛纺织品。而作为迷幻药的广泛使用当然也是在医药不发达的远古了。

在这些童话或者宗教传说中除了“绿色”就是“金色”出现得最为频繁。“金色的”荨麻、“金色的”玫瑰、“金色的”头发，它们对应的是希腊神话中的“金色的羊毛”、“金色的苹果”、“金色的太阳车”、“金色的箭”等。“金色”实际上就是“黄色”，中国的皇

帝、埃及的皇帝都在某些时间独独挑选黄色作为尊贵的颜色，而还有许多僧侣袈裟也有在某些时段选择黄色。

格林童话《少女玛林》与《野天鹅》还有一个雷同的情节，两者除了国王、王子、公主、爱情、委屈、教堂这些元素构织的情节外，美丽的公主玛林同样迫于情势在婚礼上不能讲话，只能被迫装哑，与《野天鹅》里的公主被迫失语几乎一模一样。最相似的部分在最后：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也出现在希腊神话里。希腊文明距离红海文明不远，因为它们之间共同联系是海。有人说几千年前的苏伊士运河那里本来就可能是连通红海与地中海的通道，只是后来瘀塞。不管有没有这条通道，红海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肯定有联系，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红海两岸的人物与事迹出现在希腊神话中。

总体来看，北欧（丹麦与德国）神话中的情节更接近希腊神话原版故事，这说明中国由于地理距离的不方便，文明传播确实受到了影响。拿圆量一下，以希腊为中心出发，不论地貌，到丹麦的同等距离圆内基本可以包括埃及、部分苏丹、一半的阿拉伯半岛、一半的红海、全部的两河流域、以及里海周围的中亚地区和东欧；中国，尤其是中国的核心区域，都在距离希腊 3 倍远的地方；所以中国的神话走型也当然应该是“三倍”才合理。假如把希腊作为地震的中心，那么“地震波”的传送肯定是越远的地方传播得越晚、而且“震级”也大为削弱。文明的传播同理。

中国也有《灰姑娘》

“仙女星座”里那位在海边即将被海怪吃掉的可怜的埃塞俄比亚公主叫“Andromeda”，欧洲的《灰姑娘》 名字叫 Cinderella，她们命运同样因母亲的缘故而处境艰难，但最终都有幸福的结局。她们的名字也有些接近，同样的 4 个音节，an-cin 是第一个音节对应，其他三个音节为：dro-de，me-re，da-lla。从语言角度来看，这两个名字的联系嫌疑不能排除，每一个音节都发生了关联。《灰姑娘》是一个因为失去亲生母亲的灾难而受到磨难、最后又获得幸福的少女的故事。

欧洲的《灰姑娘》家喻户晓，所以省略原文介绍。我们知道“萨巴王国”通过“Andromeda”与欧洲的（希腊）文化发生了可能的联系，他们的某种同源交流是很明显的。那么与中国的神话关系如何呢？

前两年英国举行过一次童话电影投票，最受欢迎的是《灰姑娘》与《白雪公主》。有中国记者看到这个报道后愤愤不平，说：“《灰姑娘》的故事中国也有”，“尽管 17 世纪的法国作家夏尔 · 佩罗被公认为《灰姑娘》的作者，但是在公元 850 年的中国唐代，便有了与《灰姑娘》情节极为相似的《酉阳杂俎 · 叶限姑娘》，比《灰姑娘》早了近千年。《酉阳杂俎》是唐人段成式所著的笔记故事集，西方的童话研究者也认可它与《灰姑娘》之间确有某种血缘关系。但是，现在中国的小朋友早已只知灰姑娘而不知叶限了。”[①]

① 《中华读书报》，2004-7-28。

这倒是有根有据，正合我意。不过要论根源“灰姑娘”更可能是舶来品。很明显记者把“童话”当作创作作品，实际上很可能有着非常古老的超过中国唐代的根源。

接着我在网络版《中华读书报》检索到一篇无署名文章①，其中提供了中国版的“灰姑娘”，摘录如下：

故事一：从前有一个叫叶限的姑娘，父母双亡，后母虐待她，常常叫叶限到危险的山上砍柴，到深溪边取水。一天，叶限取水时得到一条美丽的小鱼，红色的鳍，金黄的眼睛。叶限很喜欢，就偷着养了起来。鱼越长越大，越长越美丽，后来被后母发现了，后母骗走了叶限，把鱼杀死吃了。叶限伤心地将鱼骨收藏了起来。以后，叶限需要什么，鱼骨都会满足她。

节日到了，后母带着亲生女儿去参加节日舞会，让叶限留下看家。叶限见后母走远了，就向鱼骨求援，让她穿上翡翠的服装，踏上金色的鞋子，也去参加舞会。叶限在舞会上的出色表现，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也引起了后母的怀疑。在慌忙回家的路上，叶限丢失了一只金鞋。后母回到家，看见叶限正在睡觉，就不再怀疑。后来，邻国的国王得到了那只金鞋子，下令让全国的女子试穿，都没有人适合。国王最终找到了叶限，娶叶限为王后。后母和她的女儿都被飞石砸死了。

故事二：有姐弟两人去看外婆，途中迷了路，遇到一位老太婆，说是他们的外婆，特意来接他们。晚上睡觉时，老太婆偷偷吃掉了弟弟。姐姐听见吃东西的声音，问：“这是什么声音？”老太婆说：“我在吃枣子。”姐姐也要吃，老太婆给了她一颗。姐姐发现是人的手指，心中大惊，借口要上厕所，想偷偷溜走。老太婆不肯，她用肠子做绳子，系在姐姐脚上，防止她逃跑。姐姐机警地解开“绳子”，爬到树上藏起来。天亮后，被路过的人救了下来。路人将衣服蒙在树上。不一会，老太婆带着两只老虎来了，指着衣服说：“人在那里！”两只老虎折断树枝，发现只是件空衣服，以为老太婆故意捉弄它们，就一起向老太婆扑去，把她咬死了。

第一个故事很像格林童话的《灰姑娘》，却见于中国唐代段成式（公元803年～863年）的笔记故事集《酉阳杂俎·叶限姑娘》。第二个故事很像格林童话的《小红帽》，见于中国清代黄承增编撰的文言故事集《广虞初新志·虎媪传》。段成式的记载在公元9世纪，比格林童话早了近千年，应该说，《叶限姑娘》是世界范围内“灰姑娘型”童话的发端之作。而且有趣的是，段成式还曾明确指出叶限姑娘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虎媪传》的记载时间也比格林童话中的《小红帽》早两个世纪。在格林童话之前，差不多与中国同时代的法国，有一位叫贝洛的童话家，是她第一次用文字记录了《小红帽》，也因此贝洛版的《小红帽》被视为欧洲童话的发端。不幸的是，中国版的“灰姑娘”和“小红帽”却没有很好的命运，不仅没有能传遍世界，而且也没有在中国的儿童中流传，压根儿不知道我们也有《灰姑娘》《小红帽》那样优秀的童话。其实，中国古代的童话资源是十分丰富的，像《山海经》、《列子》、《庄子》、《淮南子》、《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述异记》、《酉阳杂俎》、《广虞初新志》、《聊斋志异》、《西游记》等古代典籍中，就有很多适合儿童心理特点的幻想故事。我们应该多做些整理与介绍的

① http://www.gmw.cn/01ds/2001-10/31/23-AFC8BE5A6F77AE0448256AF60007471B.htm

工作，把其中适合今天孩子阅读的故事推荐给孩子们。……

以上这两个中国版的《灰姑娘》与《虎外婆》，我自己只听过《狼外婆》的故事，并且是地道的"豫西版"，童年时在老家听老太太讲的，只是其中的"红枣"被换成了"红萝卜"，有"绳子"但无"肠子"，有"树"，很精确地描述为"椿树"。这些变形依稀可以看到基本原形，比如"红枣"与"红萝卜"保留了"红色"，"肠子"与"绳子"皆为软体长条状物品。

《汾河湾》和《武家坡》的希腊色彩

薛平贵（或薛仁贵）的故事以《汾河湾》和《武家坡》而广为传唱。2004年《寻根》第三期刊登了一篇杨宪益先生的文章《薛平贵故事的来源》，杨先生认为薛平贵故事来自格林童话。

《汾河湾》剧情：唐代薛仁贵投军多年未归，妻柳迎春生子丁山，长大后打雁奉养母亲。薛仁贵立功受爵，回乡探亲，行至汾河湾遇丁山打雁，见其好箭法，正在惊讶，忽遇猛虎，薛急发袖箭，不料误伤丁山，仓皇逃回家中。夫妻相会时，薛见床下有男鞋，疑妻另嫁，柳告系子丁山所穿，薛欲见子，始知是在汾河湾射死的孩子，夫妻悲伤不已。

《武家坡》主角为薛平贵。王家有三女，金 玔、玔银、宝 玔。最小的宝玔，嫁于平贵，后薛平贵出征，以血书为证，分别18年后重逢相认。

杨先生认为《汾河湾》可能是根据《武家坡》改编的。薛平贵故事有民间传说色彩。京剧《武家坡》由秦腔改编，其事不出于正史而附会到唐代，且提到西凉，故事可能是唐宋间西北边疆的产物。

他提出，在格林童话里有一个非常相像的故事名为《熊皮》。主要情节为：一军士在困苦中遇一妖人，给他一张熊皮，叫他七年不得沐浴修饰，此后便可赢得极大财富终身无忧。军士来到一人家，当地有三姐妹均甚美貌，大姐二姐都嫌他丑陋，惟有三妹因他援救了她的父亲而情愿嫁给他。婚后熊皮军士将一指环剖分为二（又一"指环"传说），以一半交他妻子作为凭证，又去漫游四方。他的妻子穿上敝衣，守节数年。七年期限满，军士衣锦荣归，取出指环，认了妻子，大姐二姐羞愧而死。

杨先生认为这个童话实际上是薛平贵故事的原形。"由欧洲经西域古道传过来的，当时回鹘在西北边疆为中西文化交通的媒介，所以薛平贵是回鹘人传过来的欧洲故事。" 不过我却想起盘古变人的情节。

此故事大约起于唐宋，与《灰姑娘》等故事可能属于同一批舶来品。对于语音方面的论证，杨先生说：这两个故事必出自一源。"熊皮"（The bear hide）的译音在古代北欧语里与"薛平贵"三字的音竟完全相同。the 字古文作 Se，相当于中文的"薛"音，bear 在现代冰岛与瑞典文里还作 bjorn，相当于中文的"平"音，hide 在冰岛文里作 Huo，丹麦文里作 Hiurn，古希腊文作 Kutos，可见古代当读若 Kuid，相当于中文的"贵"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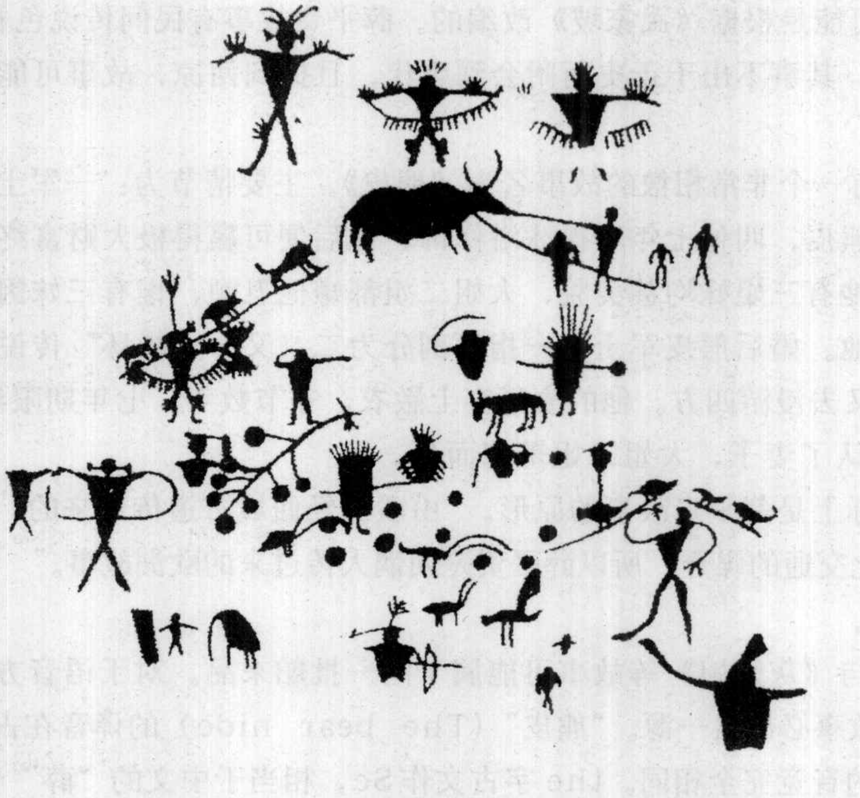
所以Se Bjorn Kuid也就是“薛平贵”。

我认为这个故事依然与希腊神话故事有关。首先是，从“古希腊文作Kutos”中才最终推出的“贵”，则应该说就是希腊版的神话故事，或者是希腊化时代的作品，甚至是希腊化时代传入中国。“熊”的形象也多出于希腊与星座有关的故事，指出了《熊皮》的来源。另外希腊神话里也大量存在着类似“父杀子”、“子杀母”的情节。

误解“神”“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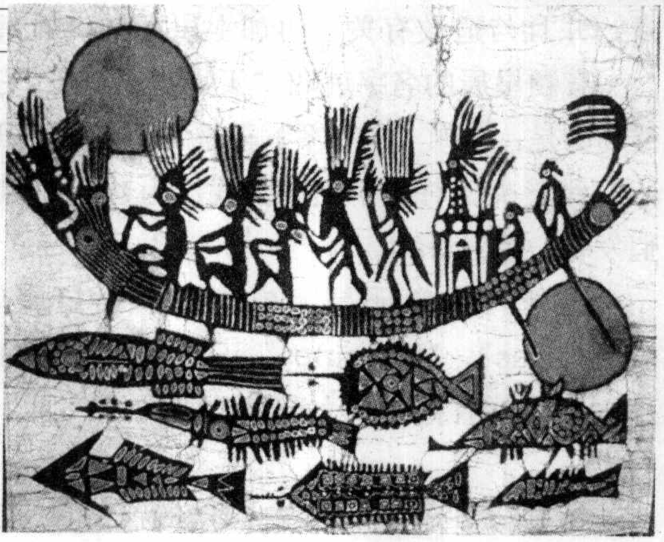
从美洲印第安“熊人”神话到中国的“毛衣女”，再到欧洲的神话（如安徒生采集的民间故事《野天鹅》），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现象，“熊人”的故事与“鸟人”或者“天鹅”的形象紧密相连。这个关联从上面的诸多神话中更容易看出，“毛衣女”或者“熊人”的形象很可能因为“毛”的关系而给混淆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鸟”，有时候看到的是“熊”。这里有几种可能，一个可能是古代语言上的高度简约造成的。

比如中国的“𤣪(瑟)”假如是指“毛人”的话，我们无法判断这是个“鸟人”还是个“熊人”。这个人两肋羽毛，从“羽”自然可以称呼它为“鸟人”，转而为“天鹅”形象；但是假如是完整的一个人，全身是毛，从人形看可为“熊人”或者传说中的“野人”。既然在神话里“7兄弟”可以转化为“7姐妹”，所以神话里“鸟人”与“熊人”的贯通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后来，头上插羽毛的习俗很可能与这个早期的“羽人升仙”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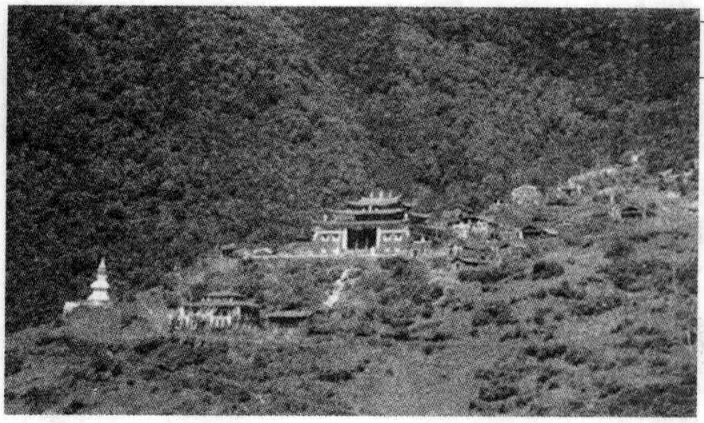
这幅云南沧源的石刻壁画许多人身上明显装饰着长毛，并且他们不像在进行一般的狩猎活动，其中的某些动物似乎正沿着某些方向在升天。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身上“毛”多的人多处于最上方，然后是只是头上有羽的，最下方的人身上少毛或无毛，很可能他们身上“羽”或“毛”的多少表示了他们的三个等级。

▶ 云南蜡染壁画——羽人打鱼



“神仙”可以说是中国独有的一个概念。按照汉人刘熙《释名·释长幼》的说法，神即“不食者不死”者，仙“老而不死者”，“迁入山”者。西方从概念上可能没有分这么细的，因为他们很早就从宗教上一神化，萨满教只有在东方才得到了深入发展。

在道教中，“羽化”就是“成仙”了。这个结局是一个“境界”，需要修炼，由于“迁入山”才能成“仙”，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但凡有点成就就想成仙——“迁入山”——把自己“隐居”起来。西方很少有这样的思想体现出来，只有一个住在瓦尔登湖的梭罗是个例外。即便住在城外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将其行为解释为“出世”的姿态。西方人相信命运，比如希腊神话里许多英雄被告知他们的命运，他们都欣然接受。中国人以“修炼”来软对抗这个不变的世界。这些最初的文化小差别成为日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大差别，整体西方人要比中国人“入世”一些，因为起码主动要求“隐居”避世在西方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一“隐居”团体假如还不算阻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力量，起码他们消极地成为人力的巨大浪费。



◀ 公元2世纪就已经建立的昌都寺

“仙”（xian）这个字也有可能是从“神”（shen）发展出来的。在中国汉语体系里从不同的方言之中是可以看到“x”与“sh”的转化的。“神”从字型上看是受崇拜祭祀的，比较尊贵；这个“仙”就是“山人”。“仙”字有两个古字，其中一个字接近今天的“仙”，只是把“人”挪在“山”上：[古字]。这个造字思维与希腊神话有些接近，希腊那里的众神都住在奥林匹斯山上，并且只住在山上与天上。所以中国的“仙”同样在“山上”。也所以，中国的道观几乎都只建在山里。“仙”字出现的时间大概与“不死药”出现的时间比较接近，估计是同一类宗教里的两个概念，所以他们基本同时出现在中国，这个时间大约在东周时期。

我甚至还怀疑“圣”（sheng）也来自同一概念的发展。

无意中在《说文解字》中查到另外一个词，“僩”，念“xian”，意思为“武儿”。或许“仙”字是从这个字转化的？尽管目前的权威并不这么认为，但是我们不正在全面颠覆权威嘛，那就不妨更彻底一些大胆一些，连辞源也重新怀疑一番。

这个“僩”在金文里是个门，里面有个“月”：[古字]。可以考虑此字有“月神”崇拜背

景，并且与道教有关，再加上星宿知识看看就很有意思了。

有颗星辰的名字就叫“天大将军一”，它在古代是不是就是这个“武儿”之“僩”？碰巧的是，这颗“大将军”正是属于“仙”星座——仙女星座（Andromeda）。这是巧合？不，我坚决反对这个说法。我认为这个“僩”就是“仙”，或者说同时是“仙”，并且它们发音一致：xian。

另外一个旁证是，中国的一个星座叫“武仙座”，而它的英语与拉丁语却是“Hercules”，“Hercules”正是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大武夫：赫拉克勒斯！这说明，在中国本来就有把武夫大英雄称呼为“武仙”的传统，在一些情况下“武”本身可能即为“仙”。

还有一个怀疑线索在《诗经》《国风·卫风》的《淇奥》：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
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如箦。
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传统的解释[①]说：

卫武公为周平王卿相，年过九十，深自儆惕，有文章，能纳人规谏。卫人颂其德，作此诗。

淇：淇水。奥（音玉）：水边弯曲的地方。绿竹：一说绿为王芻，竹为萹蓄。猗猗（音恶，平声）：通阿，长而美貌。匪：通斐，有文采貌。切、磋、琢、磨：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均指文采好，有修养。

瑟：庄严貌。僩（音县）威严的样子：宽大貌。赫：威严貌。咺（音宣）：有威仪貌。谖（音宣）：忘。琇（音秀）莹：美石，宝石。会弁（音贵变）：鹿皮帽。会，鹿皮会合处，缀宝石如星。箦（音责）：积的假借。茂密的样子。绰：旷达。一说柔和貌。猗（音以）：通倚。重较（音虫觉）：车厢上有两重横木的车子。为古代卿士所乘。戏谑：开玩笑。虐：粗暴。

我认为其中的“瑟兮僩兮”可能有与传统理解完全不同的解法。这个“瑟”不是做“庄严貌”，而是表示“羽毛”或者羽毛；“瑟”从《说文解字》上看就是一个人两勒长了

① 参考：http://eshijing.myrice.com/page/qiyu-1.htm

② 岳麓书社，《说文解字今释》，1811-1812页。

羽毛，（ ），是个典型的象形字，就是一个“羽人”[1]。不知道为什么汉许慎不把这个字解释为“羽人”而非要说成乐器。这可真耽搁了武公“羽化”升天。还有，“毛传：瑟，矜庄貌。”我认为假如这首诗歌真的是献给“卫武公”的话，那么“僩”这个字是想通过“仙女座”里的“大将军”而转化为“仙”的。我的意思是说，留下了“仙”音，后造了一个“仙”字附会了。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这句话的意思是“祝愿大将军羽化成仙”。当然，当时还没有完整的“羽化成仙”的概念，但是人们肯定已有这种意识，只是在汉代才被作为一个宗教用语提炼出来。并且这个早期的概念很可能与希腊神话里的众多英雄一样，就是死后被点化升天为神。

这个“ ”准确的意思应该是“毛人”，其实就是神话故事里常见的“熊人”。它在我们的词典里无一例外地被注解为“古乐器”，再查，多了“轻微的声音”、“形容颤抖”，无他。

假如我这个偶然发现是正确，那么说明我们以前的《诗经》解读多是误解。这个可能是存在的。因为如果用我的体系去理解中国的史前史，中国普通的历史教科书都得重新改写，改写《诗经》注解那就再正常不过了。从这里也可看出，史前史的研究绝非无用，许多人劝我停止这项工作，认为没有意义，离今天太远。我说，我的研究离今天实际很近。只有理清史前史才能清理纠正中国古代那些影响至今汗牛充栋的典籍。中国今天的传统文化是在解读这些典籍的基础上成立的，假如这些解读从最基础的地方都是错误的，那么我们今天还有坚持它们的必要吗？史前史的许多结论会影响昨天、今天和明天，范围可及历史、文学、天文、语言、美学、哲学。

◀ 山东沂南“将军冢”汉墓中的羽人像，需要注意的是此“羽人”明显脸部不为人形，会不会也借鉴了古埃及度人上西天的阿努比斯常有的“豺狗”形象。或者他是熊人？

精卫鸟是什么鸟？

中国有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叫“精卫填海”，形容一个人坚持不懈、顽强不息的精神。以精卫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动画片时常翻新。

一般查来，其基本故事是这样的。

炎帝（或曰神农氏）有个小女，名叫女娃。女娃聪明伶俐，美丽非凡，炎帝十分喜欢。一天，女娃游于东海，忽然风起浪涌，将小船掀翻。女娃就这样被无情海水吞食。女娃痛恨东海吞噬她的生命，怕别人和她一样被大海吞没，于是她变成一只头上长

① 岳麓书社，《说文解字今释》，1811—1812页。

着花纹、白嘴、红爪的小鸟。她发誓一定要填平可恶的东海，报仇雪恨。

由于这鸟飞翔时嘴里叫“精卫！精卫！”，故被称做“精卫”鸟。精卫鸟住在发鸠山上，她每天从西山衔一根树枝或一颗小石子投入东海。

大海嘲笑她：“小鸟儿，算了吧，就算你干上百万年，也别想将我填平！”

但精卫回答：“就算一千万年我也要将你填平！”从此，精卫鸟填海不息，代代相传。

还传说，一只小鸟的力量有限，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精卫和海燕结成配偶，繁衍后代，以继续填海的事业。精卫和海燕生下的孩子，雌的像精卫，雄的像海燕。

精卫填海的事惊动了天神。水神共工很佩服精卫的精神，于是就降下洪水，把高原上的泥沙冲进大海，海水也变成黄色。于是，人们把东海北部发黄的海域叫做“黄海”。共工降下洪水，也为天下带来灾难，就产生了鲧和禹的治水故事。

当大海发觉自己真有被填平的危险时，赶紧采取措施，把那些泥沙用潮汐推向岸边，泥沙在岸边沉淀下来，就形成了海涂。海涂厚了、大了，人们就把它匡围起来，改造成良田。

实际上这些故事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古代由于海平面波动，东海与黄海沿岸的土地渐渐在向大海拓展，越临近现代裸露出地面的土地越多。他们如同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一年下来就能长出几千亩甚至上万亩。但传说中却归于“精卫填海”的结果。

“精卫填海”的故事在《山海经》这部战国前后的作品中有所记述。《北山经》：“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①。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精卫的传说看来很久远，起码在汉代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能够看出来主要与中国东部地区有关，应该在沿东海与黄海一带。可以考虑为水上民族的神话，甚至可以考虑与南岛文化的可能关系。

我认为这个“精卫鸟”实际上就是现实中存在的一种鸟类“几维”，在英语中既叫“Kiwi”，也叫“Apteryx”，又名鹬鸵（Snipe）。港台地区称呼此鸟为“奇异鸟”。

证据：1. 中国与几维鸟所在地新西兰人同样因为这个鸟的叫声而将其命名，在中国为“精卫（jingwei）”，在新西兰为“kiwi”，他们的发音非常接近。2. 两者外形同样，像斑鸠一样色暗，几维鸟棕色较多，有些有斑点。3. 几维鸟翅膀萎缩，基本上等于无翼，视力奇差，因缺乏安全感总在夜间出来觅食，海边的几维鸟被水溺死应该是常事。4. 其他特征也基本接近。5. 鹬鸟为候鸟，有些品种可从澳洲经中国飞赴西伯利亚。

但需要说明的是，几维鸟之间在鸟爪与喙部有一定差别，有的色白，有的色暗。今天存在于新西兰的几维鸟有三个品种：北岛中部的普通“棕几维”、南岛西北的“大斑几维”、卡皮提岛的“小斑几维”。仅这三个品种再加上他们的雄雌就是两个不同样子，所以到底是哪种很难说。

---

① 注释：(1) 柘木，桑树的一种。(2) 乌，乌鸦。(3) 文首，头上有花纹。(4) 自詨，“精卫”，这声音是自己呼叫自己。

成年几维体重约2000克，与一只母鸡大小差不多，但是，蛋的重量却高达500克。几维鸟的脾气很大，愤怒时可以把一只同类踢到5英尺以外的地方。

不过，关于几维鸟的一个趣事是，新西兰还有一种名叫“几维果”的植物，并且风靡天下，而这种植物竟然是100年前才从中国引种过去的。新西兰人爱几维鸟，而这种毛茸茸的本来名叫猕猴桃的水果外形像几维鸟，所以就被当地人命名为“几维果”了。

几维鸟是新西兰的国鸟。新西兰人到处都是“Kiwi”的名称，甚至他们新西兰人也自称“几维”，这都是“几维鸟”的功劳[①]。

世界其他地方都无几维鸟发现，或已经绝迹，目前只有新西兰存有少量，并且已为濒危动物。“几维鸟”据说是当地土著毛利人的称呼。那么，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精卫鸟”（kiwi）的传说难道是毛利人传送到中国来的？中国人与毛利人是什么关系？

有人说今天的毛利人是1千多年前从波利尼西亚地区迁移过去的，这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其实这些复杂的话题涉及的只是一个问题：南岛文化的范围。

或许这一切并不奇怪，本来中国的南部与东部沿海与“南岛文化”之间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精卫鸟”使这一关联更加神秘。

几维鸟从什么时候在其他地方绝迹，以及什么原因绝迹，尤其是什么时候从中国绝

① 本节部分内容参考郭耕《科普考察新西兰十篇》。

迹，这些生物问题成为重大的人类史前问题。

另外，从“Kiwi”的翻译音我们联系到产生“精卫”的《山海经》，这或许是一条新的思路。我想，研究一些古老的植物或动物的名称对应音可能是一把打开典籍的钥匙。假如能初步打开《山海经》的缺口，我相信更多的远古曙光将向我们展现出来。

“中青在线”上有个叫僧觉远的网友认为“精卫鸟”是“秧鸡”，甚至就是“董鸡”。但董鸡头上无纹，雄鸡其他外形都接近，头上是一个冠，并且一般鸡类叫声为“咯咯”的多，董鸡是否有“精卫”的叫声还是个疑问。查了许多，都是部分接近，但有一项或两项错位，完全符号“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 ”，一个都没有。还有一种名叫“关岛秧鸡”的品种我也很注意，不过已经绝迹。估讠谈继续查下去一时也不会有结论，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工作量会大得惊人，仅只看到的一些相似的，再加上雌雄，假如运气不好估计得查阅几千份资料，仅秧鸡就有180种，还有几维鸟的鹬类也是个无底洞，而且多数还不能对证他们的叫声。所以，我准备把这个问题以这样“半成品”的方式抛砖引玉了，希望有动物专家能够看到此文，并得出准确的结论。

第六部分“酒神”与“萨巴”、“萨保”

葡萄种植的传播

在本书结束之际，我们以“欢乐酒神”的讨论作为结尾。

提起“酒神”肯定得说“葡萄”。葡萄的最初发源地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圣经》里出现过500多次“葡萄”这个词汇，第一个种植葡萄的人似乎就是挪亚时代前后。我认为这是葡萄酒出现的标志，起码是文献中的第一次暗示此时已有葡萄酿酒的可能。挪亚在《圣经》里的醉酒故事家喻户晓，想必酿酒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了。

古代中国把“葡萄”叫“蒲桃”或“蒲陶”等，很明显属于外来词汇，有不同的音译。我推测这个词汇应该具有阿拉伯或阿拉伯半岛附近的区域色彩，熟悉阿拉伯文化的人会知道“蒲”这个字所具有的阿拉伯色彩。①中国最早记载葡萄的文字据说是在《诗经》。另外《周礼·地官司徒》中也有记载，如“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 、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

也有人认为最早栽培葡萄的地区是小亚细亚的里海和黑海之间及其南岸地区。大约在7000年以前，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据说已开始葡萄的栽培。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伊朗地区才是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国家。最近的考古发现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在埃及的古墓中发现的大量文物清楚地描绘了古埃及人栽培、采收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情景。欧洲最早开始种植葡萄并进行葡萄酒酿造的国家是希腊。3000年前，希腊的葡萄种植已极为兴盛。中国新疆一带在这期间也有葡萄种植出现。我推测葡萄进入中原是在周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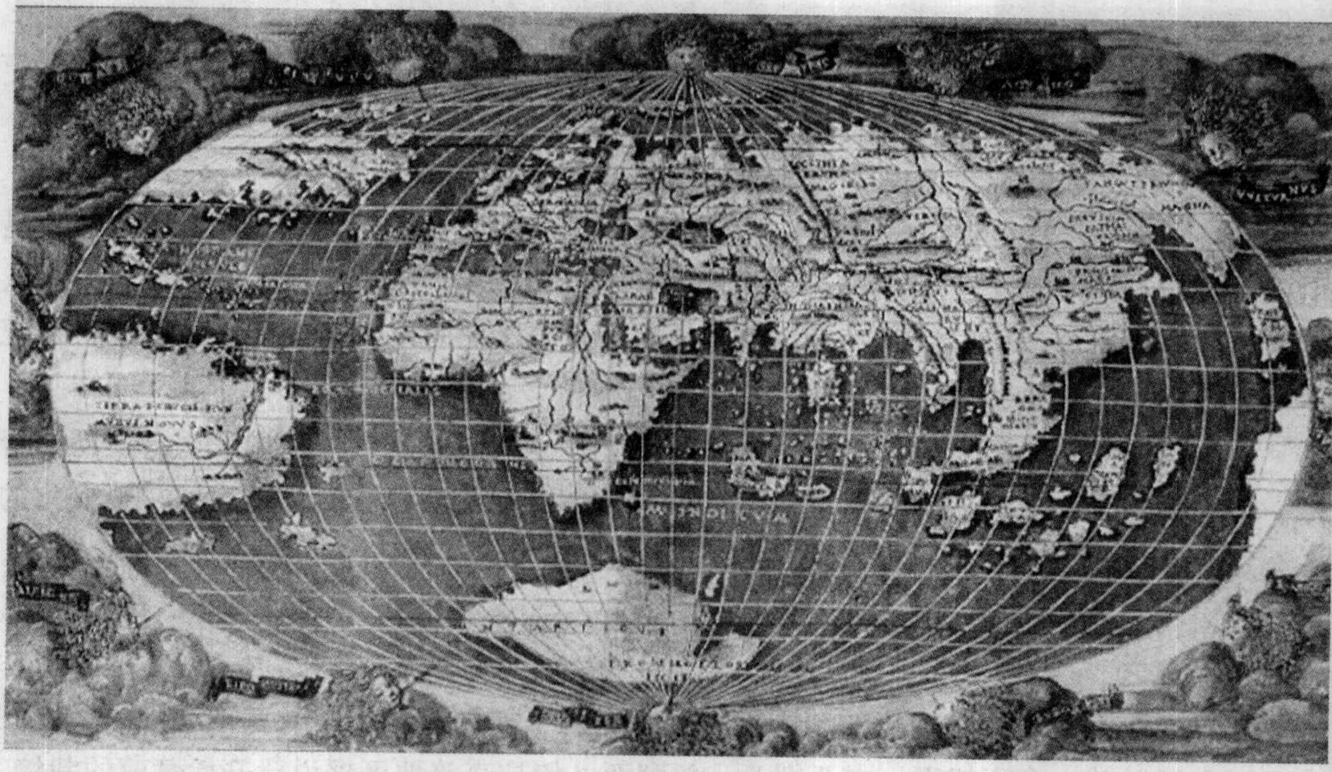
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把小亚细亚原产的葡萄酒通过马赛港传人高卢(即现在的法国)，并将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技术传给了高卢人。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学会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技术后，很快在意大利半岛全面推广。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技术迅速传遍法国、西班牙、北非以及德国莱茵河流域地区，并形成很大的规模。

15～16世纪，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技术传人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朝

① 本节中葡萄的历史以及酒神的历史多有参考李华《葡萄酒的起源与传说》一文。

鲜和美洲等地。现在，南北美洲均有葡萄酒生产。

我之所以愿意摘取如此多的“葡萄”以及“葡萄酒”技术的传播，实际上是想借机演示中东文明的传播模式。总体文明的传播与特种文化的传播路线与时间都会基本相同，无论是美味的葡萄还是葡萄制作的美酒从一开始都是人类喜爱的饮食，其散播时间与规模会非常近似。甚至这个葡萄文化的传播特征还提醒了我非洲神话系统为什么相对独立于全球的问题——葡萄的繁殖与酿造都较晚传入南非，提醒这里确实有值得研究之处：很可能文明人多喜欢具有广阔天地的北部，南部非洲是条“死胡同”，所以文明很少主动向这一地区流传；另外，已经习惯于北部星空指引的人们到南方去会难以适应，原始人比今天更依赖于星空知识，而人类的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在“北回归线”附近发展起来的。



这是一幅绘于公元1508年的世界地图。人类对于地球的认识日趋科学完整。

酒神文化

酒神狄俄倪索斯(Dionysus)在罗马神话中叫巴克科斯(Bacchus)，又名常春藤（Kissoi)。他是宙斯与凡人公主塞墨勒(Semele)所生的儿子。赫拉故意诱惑塞墨勒让宙斯显示他的威力，结果凡人无法面对雷电的威力塞墨勒当即被烧死。宙斯劈开烧死的塞墨勒身体，将未足月的儿子救出，他就是酒神狄俄倪索斯，也是“欢乐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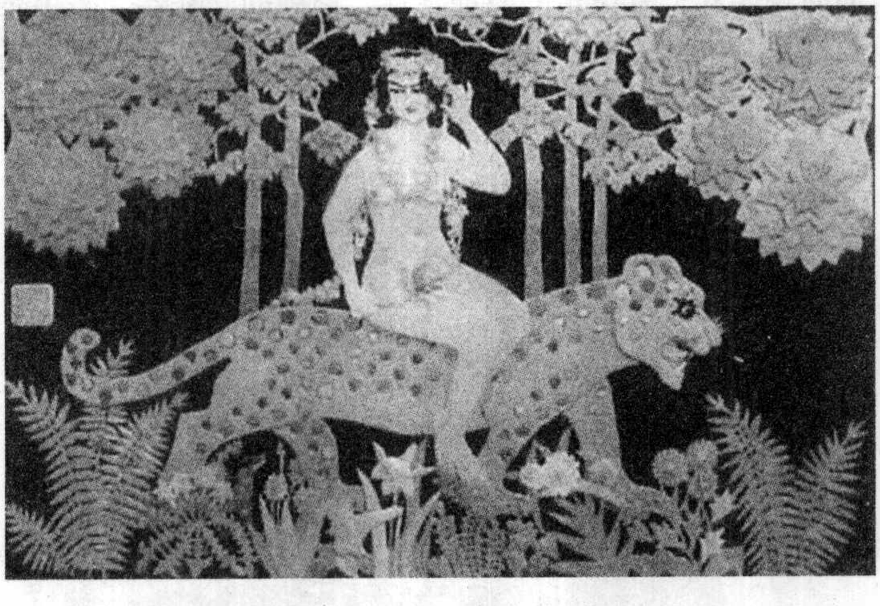
宙斯将这个孩子缝进自己的大腿继续让他发育，宙斯在这段时间里成了瘸腿，三个月后宙斯将儿子娩出。“狄奥尼索斯”， 意思是“宙斯瘸腿”。

◀ 酒神 卡拉瓦乔 油画 16世纪 在《希腊神话》中酒神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女性气质的人，据说他看来象女孩子一样，所以在中国的山鬼中将其描绘为一个女性形像并非完全没有根据。酒神头上的叶子是葡萄叶，他去那里一定有这个标志。

传说酒神在印度长大，看来他是个具有国际背景的男人，后期的绘画里他又具有一些女性特征，这一点与印度的一些神在性别上变来变去一致。这一特征也与中国的“酒神”有着一定的关联。请看苏雪林女士的解说：

“《九歌·山鬼》的歌主，旧谓山中木石精怪如‘夔’、‘枭羊’、‘罔两’，容貌是奇丑的，近代楚辞学者又指为巫女神女，其实这位歌主含睇宜笑，是个美少年，披萝带荔，乘豹从狸，则与希腊酒神狄倭仪苏士（Dionysus）有非常相似处。那个酒神原是年轻美貌的神道，他头戴葡萄枝叶编成的冠冕，身上及其武器车乘等也缠满了长春藤及葡萄藤。长春藤即是薜荔，至于葡萄则西汉张骞通西域始入中国，屈原无法描写，只好以同属藤科植物“女萝”代。豹子与山猫乃酒神爱兽。[①]”

在中国神话里山鬼总是与山猫呆在一起，事实上这也有《希腊神话》的根据，在有关底比斯王国[②]的彭透斯国王的故事里，那些本来想欺骗并抓捕酒神的人们突然发现他们的船上出现了许多狮子老虎与山猫，这些当然是酒神所为。中国的“山鬼”全部出现于森林，这是酒神与彭透斯国王对抗的第二幕，受迫害的酒神信徒从监牢里出来都奔向山林，在森林中他们与酒神一起愚弄并杀死了彭透斯。由于《希腊神话》里比较明确指出了松树与橡树的存在，所以酒神的许多画里都有“松塔果”的出现。其中还有一个神奇的对应在于，就是这个与酒神有点亲戚关系的底比斯王国里，他们既是腓尼基人同时又自称为“龙的传人”、英雄的后代，而中国人也有称呼自己为“龙的传人”的传统。腓尼基人这样称呼他们为龙的传人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就是海洋民族，但中国人这样称



△ 中国吹塑剪纸《山鬼》 由于中国的“山鬼”皆为女人，而希腊神话中的酒神是女性化的男人，但这个原形却是从亚洲传到希腊的，所以我们或许可以猜想酒神本来在亚洲是个女人，到了希腊神话才转为男神的。

① 苏雪林《屈赋之谜：八，中外文明互相发明例证数则》，信息自网络获得。

② 此处并非埃及的首都，而是一个腓尼基王国，在希腊北部。

呼自己却很怪异，因为“龙”实际上是水上动物，而中国文明多属于农业文明，其实这个矛盾只能从失忆的远古中去获得答案。

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就有了“大酒神节”(Great Dionysia)。每年3月为表示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敬意，都要在雅典举行这项活动。古希腊的悲剧、喜剧都源于“大酒神节”。“酒神”对人类文化艺术的发展可谓功莫大焉。但酒神的“奉献”非此一例，他还是某个宗教中崇拜的主要角色。中国的传统社会也在3月一般有大型集会，如三月三，不知是否与“大酒神节”有关。

古埃及的酒神是奥西里斯(Osiris)，他是葡萄树(Vines)和葡萄酒(Wines)之神。对奥西里斯的崇拜遍及埃及，而且往往与丰产神和阴间诸神的崇拜相结合，他也是冥王。埃及酒神与希腊酒神之间的联系还是个谜。但毫无疑问，希腊文化的一部分就直接来于古埃及。

罗马帝国时期的“酒神”改名为巴克斯（Bacchus)，他是葡萄与葡萄酒之神，也是狂欢与放荡之神。在罗马宗教中，有为“酒神”巴克斯举行的“酒神节”(Bacchanalia)。这个节日从意大利南部传入罗马，起初秘密举行，只有女子才能参加，后来男子也被允许参加，举行的次数多达一个月5次。节日期间，信徒们除了狂饮外，还跳起狂欢的酒神节之舞。罗马元老院于公元前186年发布命令在全意大利禁止了“酒神节”。

酒，从某个角度看实际上是一种麻醉剂。当然，酒更能乱德。从表面的资料看，商朝似乎就是因为“酒”而失去了人心。罗马的“酒神节”狂欢不知道是不是“酒池肉林”的荒淫。由于酒神崇拜从公元前2000年前就流行于小亚细亚地区，所以可以怀疑中国晚商时期实际上有一定的酒神崇拜，商朝的“礼器”多半是酒器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其实商朝就是因酒而亡，所以周朝伊始就下令禁酒——这是正统的说法，我们何尝不直接把这看做是一种禁止“酒神崇拜”的政治或宗教行为呢？

但是在《希腊神话》中酒神之所以受到迫害，原因是酒神具有大批的信徒，已经威胁到政治。而他的具体罪名是冒充神灵、妖言惑众，实际上这意味着不同宗教之间的斗争与迫害。

即便在今天也能推测出“酒”与祭祀与宗教与崇拜的必然关系。

◀ 酒神归来

宗教联系

首先闯入的神秘宗教词汇是“萨巴神”（或译“萨巴教”，Sabazius）。

有关这个词汇的翻译大意如此：“萨巴神”是个佛里吉亚神或者色雷斯神（a Phrygian or Thracian deity）。佛里吉亚在今天的土耳其，历史上夹在希腊与波斯文明之间。色雷斯几乎是今天“保加利亚”的古文明代名词。请注意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波斯， 建立起了西起希腊、东到印度河流域、南跨埃及、北抵中亚的大帝国，他曾经努力推行东西文化合流，使这些地方都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这个期间的文化混合严重，难分你我。“萨巴神”正处于希腊文化与波斯文化的核心影响区域。

“萨巴神”这个词汇与“酒神”经常联系起来，或者它们几乎就是同义词，另外一个与“萨巴神”有联系的是“宙斯”。对“萨巴神”的崇拜与古代小亚细亚的自然女神Cybele也有关系，她的身份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瑞亚（Rhea） 和阿提斯（Attis）。她作为冥王出现时的主要特征为蛇，意味着大自然每年都焕然一新。在这里注意埃及的酒神也同时具有冥王身份；中国的吴刚实际上也是“酒神”，他也在月之“阴”。把所有这些联系起来时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凡是与冥间有关的神（仙）同时似乎也是酒神，或者与酒神有牵连。

一个古希腊雄辩家曾经描述过这个宗教的一些神秘仪式，比如把一条“金蛇”以某种形式传来传去是其重要内容，他认为这个宗教在古代与犹太人的一种宗教有渊源联系(the Jewish Sabaoth 或Zebaoth)。这个描述让我想到中国的一个文化片段，“舞龙”的起源，“龙”就是“蛇”。而且中国的舞龙一般就是红色的龙与黄色的龙（金蛇也）。中国还有现代人做的“传统”乐曲：《金蛇狂舞》，不知道是不是类似宗教活动的模仿或者只是传统遗存。

希腊历史学家Plutarch 则主张，犹太人本来就崇拜酒神Dionysus。而所谓“Sabbath”实际上是“萨巴教”的节日名称，这就是说它们其实是一回事。它是否就是小亚西亚的海神Sozon 也是个疑问。有人说这个名字与古代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区伊利里亚人的“sabaya”这个词汇有关。尽管公元前139年第一批定居在罗马首都的犹太人因被禁止传播“萨巴神”（Jupiter Sabazius）而受到驱逐，但是这个神秘的宗教在公元2世纪时还是在罗马扎下了根。

在“摩西十诫”中一星期中的“第七天”是安息日，现在却等同星期六（Saturday，Saturn's day）。“Saturn”是土星，论“辈分”是宙斯的父亲，酒神的爷爷。在印度“土星神”叫Sani，看起来他们有辞源上的联系。

Sabbath的希伯来语是“ shabbath”，来自 “shabath voluntary repose”。汉译本的《圣经》将这个词译为“撒保斯”。更深一层的含义里，“Sabbath”意思是静修或者涅槃。它不再指“第七天”，而是等同“七天”的这个期间以及组成“七”的任何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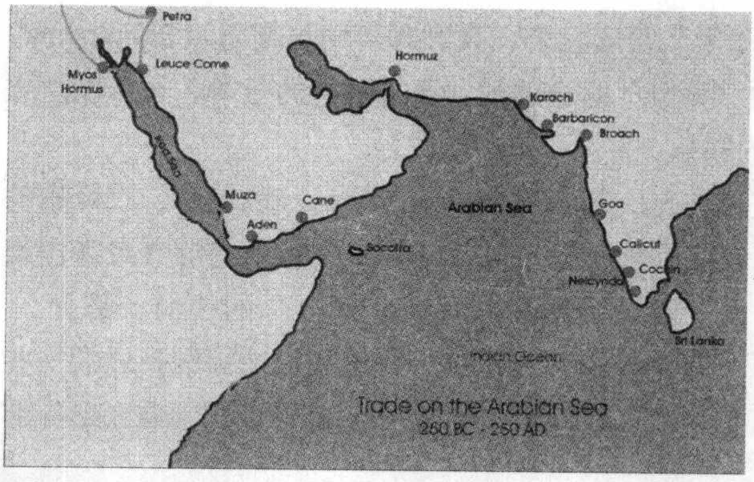
从辞源上很容易就能发现“萨巴神”（Sabbath）与本书一开头我们就接触到过的一些词汇是同源的：Sabean，Sabaean,还有Sabian，Sabianism 。它们都一样是闪族人形容那

些信仰宇宙中万物有灵的人（来自希伯来语的“tsaba”）。或许这暗示了示巴女王的治下都曾经是萨满教的信徒。由于天体是所有之中最显著的存在，这个信仰可能与天上的神灵结合为一体，我们前面也说过，萨巴这个地区是星象学盛行的地方，这就不奇怪了。“萨巴信徒”（the Sabeans）被直接称呼为“天体崇拜者”或“星斗崇拜者”，毫无疑问这些信徒都相信他们中的一些特殊人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中国古代正是如此。这个“萨巴”（the Sabeans）就是阿拉伯半岛我们曾经讨论过的“萨巴”，但是在这里它多指一种更广泛的“萨巴文化”，示巴女王所生活的国度也在这个“萨巴文化”之下，并以其为主要特征。不过萨巴信徒信仰的并非真的是那些物质上的天体，而是精神实体、威力以及他们赋予这些天体的神灵。

中国新疆北部地区的阿尔泰地区曾经发现过大量规则的圆球，有大有小，无人可以解释其来源及含义。许多人认为它们具有宗教的神秘意义，我猜想或许那是“萨巴教”的早期传播痕迹。因为所有的星斗基本上都可看做圆形，每个圆球代表了一个神灵或者一个逝去的生命？我记得报道里说那些圆球在一个地区就发现了上万颗。数量或许反映了时间的积累，而其中的大小差异或者真的是对应了大小天体的神灵。

词典里说，“萨巴”（Sabean）这个单词主要是通过希腊与拉丁文的作者遗留给我们今天的，但是这个以天体或宇宙神灵为核心的词汇是如此深入了犹太人的宗教文本，以至于《圣经》中充满了类似的天体信息，甚至一些基督教神学家也混淆了它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古代与现代的犹太教，甚至基督教教义里也充满了古代萨巴教的思想——难道萨巴王国与以色列国的交流达到了这样深的程度？这是不是由于示巴女王与所罗门带来的影响呢？这是个疑问。

“Sabeanism”无疑是古代占星术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古代亚述人的信仰，它同样是所有历史上伟大民族的伟大宗教的奠基石。根据犹太学者Maimonides的看法，学者们一般认为那些主要宗教为星斗崇拜的古代“萨巴人”与巴比伦人和叙利亚人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萨巴不属于一个民族，而是指古代所有信仰神圣占星与天体崇拜的人们。看来这个范围要比我们前面理解的“萨巴王国”要广泛。也就是说曾经在某一历史时期中东的广大区域有一个群体都被称呼为“萨巴人”，并且有明确的记载这些萨巴人曾经生活在叙利亚这里。假如是这样那么这些“萨巴人”距离中国西域实在太近了。一些起源于叙利亚的宗教就曾经很快传入到中国，比如基督教的一个教派Nestorian Christians(聂斯脱里教或景教)。萨巴文化从西北进入中国应该是非常方便的吧。



这是对两千多年前海上商业交流的描绘，但最早交通开始于何年呢，这是个问题。

假如有人过分迷惑于这个“萨巴”那么我可以给颗短效止晕丸：这

个“萨巴”很可能与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一个群体“腓尼基”有着密切的伴生关系，或者他们干脆在某个时期就是一个群体，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大概就叫海上民族，其共性是：以商业为主，善水上工具，游历广泛，喜欢冒险，信仰星象学与萨满教。

穆罕默德在《古兰经》里曾经提到一种介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名字为“Sabi una”的宗教与“Sabeanism”也有关系。有些穆斯林神学家承认“萨巴教”的教义对他们曾经有过启发。并且，“曼德恩人”（the Mandeans，诺斯底教派之一）就直接被归入“萨巴教”，今天伊拉克依然有部分这样的“萨巴教”信众。另外一种多神崇拜宗教“the Harranians”也与“萨巴教”有关。它们都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遗存，星斗崇拜在该文化体系里具有突出的地位。这很符合中国商前后的历史，中国的星斗崇拜通过道教等形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有阿拉伯人把“萨巴文化”称做“天文学”，显然与今天所说的天文学不一样，我们今天所谓的“天文学”只是古代“天体崇拜”的一部分。他们还认为古埃及的塞特（Seth或Set）是“萨巴教”的奠基人，金字塔就是埋葬塞特或Agathodaimon的地方。从许多方面看，主管商业交通以及科学的希腊神赫耳墨斯与埃及“塞特神”的角色非常相似。另外，中国的星斗崇拜或许也与“塞特”有关，因为塞特本身与“风伯”有关，中国道教特别注重“风伯”，或许是对“塞特神”的崇拜。中国那些善观星斗的神汉一般也是呼风唤雨之人，星斗与风雨之间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类似人物是诸葛亮，这个三国时期的宰相实际上更像是个大祭祀与神汉。

印度的梵语里有一个词汇“Sabha ”，表示汇集、神圣集会，或者集会的地方。

梵语里另外一个词汇“Sachchidananda”（ saccidananda）是个抽象概念，但这个词汇也表达与上面接近的一些含义，它有关宇宙的第一大神梵天（Brahman）。我曾经推测过这个印度神可能与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亚伯拉罕（Abraham）有关。

总部在美国盐湖城的摩门教自称属于基督教的一个流派，以一夫多妻的奇怪体制著称。其《教义和圣约》第95章第七节中有这样的话语：“为了这个缘故我已赐给你们一条诫命，你们要召集庄严集会，使你们的禁食和你们的哀伤，能上达撒保斯之主的耳中，撒保斯之主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第一日的创造者，是最初和最终。”这里的“撒保斯”就是我们关注的核心词。

中国历史中的“撒保”

从“酒神”到“萨巴教”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甚至两河流域以及印度教的联系，在地理上从埃及到地中海一直到阿拉伯半岛，都被“萨巴文化”所覆盖，并且他们与宗教和星斗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我们前半本书探讨的一个国家就叫“萨巴”。该文化以星斗文化为核心，以商业与海洋文明为载体，形成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体系，其时间下限为大约1800年前，上限则一直可达古埃及的塞特神话传说（极其古老，因为按照《圣

经》塞特是亚当的孙子）①。

我们或许永远理不清这个文化体系的来龙去脉，但是我们起码看到了浓重的疑云。就像干旱中我们期盼着一场大雨的降临，现在还没有雨，但是阴云密布才让人更加兴奋。“萨巴”自身所具有的广泛传播性已经说明了它们传播到中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必须”的。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流动的一种文化，我猜想它一定是个固定的商队的杰作。

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很容易就找到了有关这个词汇的大量对应。先前已经介绍过一些，比如商周时期的“西伯”、“西亳”等都应该看做是类似体系。但是过了大约1000年，名称发生了变化，并且与前者可能也发生了质的改变，也或者只是翻译上的差异，那就是，唐以后在中国频繁出现了这样一些词汇：“萨保”、“萨薄”或“撒保”等。

开始查阅这一问题时，我很奇怪地首先在台湾发现了“撒保”，它是鲁凯族人的问候语，意思是“你好”。这太有趣了。该部族目前还有许多比较原始的祭祀活动。百合花、百步蛇、灭绝性的大洪水的故事、山猪牙齿、陶壶等是他们神话或者祖先传说中的一些主要元素。他们也有一个与宙斯出生时表现石头与孩子间关系的情节的故事，叫《黑米的故事》。另外一个主角叫“巴嫩”的爱情故事主人公变为白鹭鸟让人想到全球的人鸟神话系列。不过总体看，我认为台湾故事与非洲神话体系多有接近，与希腊体系却有一定的差别。蛇、鸟、射日、洪水故事，人变鸟等，与我们曾经探讨过的神话体系也有一定的共同文化痕迹，同时能够看出鲁凯族人明显的南岛文化特征。假如“萨巴文化”是一种“海上族群”，并且他们是商人，他们来到中国腹地，台湾海峡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1999年，中国山西省会太原发掘了一个古墓，这个墓主叫虞弘的古墓震惊了中国和世界考古界，并且成为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据推测虞弘的人种可能为“印度－地中海高加索人种”，他们主要分布在伊朗高原一带。

这个墓穴的考古主题就是“撒保”文化。墓中有文字介绍说：公元579年前后，虞弘曾统领代州、并州、介州三州的检校萨保府。“萨保府”就是专门管理西域胡人的机构。墓主的身份被确认是一位“撒保”，并且是阿拉伯特色的西域人。

我认为，有关的考古事实证明或暗示了这样几个事实：1、古代来到中国的西域人很多，需要专门的机构去管理他们；2.这些胡人来华的通道是一直存在的，而这些来华的胡人曾经长期与“萨保”文化有关；3.这些人基本上可以肯定与拜火教有关，所以北方的“萨保”当与波斯文化有直接联系；4.“萨保”与“粟特人”的神秘关系让人猜测“粟特人”的起源是否为更古“萨巴”商队的驿站发展起来的部族后裔；5.“萨保”（sabao）就是“萨巴”（saba）或商周时期的“西伯”（xibo）。

其后这个“萨保”现象曾经引起许多争论。我看到一篇作者为韩伟的《北周安伽墓

① 我一直怀疑《圣经》中的塞特（Seth）就是埃及神话中的塞特。在埃塞俄比亚的古老史诗《王者的荣耀》之中，“And SETH died, and Henos (ENOS) reigned”，这里复述的《圣经》故事中“Henos”很可能正是“Heros”。并且在古埃及神话里确实也是“Henos”打败了Seth而获得了胜利，所以他继位是合理的。而《王者的荣耀》尽管记录的是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但却是由埃及的考普特语写成并且在埃及发现的。这些联系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①]，其中论证了粟特人的葬俗实际上是融合了拜火教与汉人传统，而最初的拜火教葬俗中不仅有我们熟悉的让鹰吃死者的“天葬”传统，而且还有让狗吃死者的传统[②]。波斯东部地区是天葬与火葬并存地区，所以“粟特人”也结合了这一特点，但到中国后最终汉化。

3000年前就已经开国的“萨巴王国”就是以商业发家的，其海上贸易与陆地骆驼队天下闻名，这与该国的香料生产有关。示巴女王时代就有规模巨大的商队从北部穿越大沙漠远行经商，他们的骆驼队还给女王Magda带来了许多趣闻，这就是为什么示巴女王会远行到以色列的诱因。他们经常给女王讲述旅行见闻，而所罗门王的事迹恰恰引起了她的好奇心。示巴女王当时一个最大的商队的规模或家产是这样的：520头骆驼和73艘大船[③]。所以他们的远行能力会是非常强的。库克船长仅有两条大船就折服了近在18世纪的太平洋小岛，高级文明不费一枪一弹就几乎掌握了当地的主动权。假如这样一个萨巴商队在三千年前到达东亚，那会是什么局面呢？我认为他们能够很容易站稳脚跟。但假如粟特人就是萨巴人的一支，那么这个历史事实将更有深意：安禄山（公元703～757）差点进入中国的皇室，安禄山就是个“粟特人”。安禄山一旦成功，实际上在大约1300年前中国人差点就是萨巴文化的臣民。从逻辑上讲，安禄山的失败不过是偶然罢了，这个可能完全存在。实际上李姓唐主就曾经被人考证为“回民”——有“西方”或中东之根。或许唐之前的人都该叫回人才准确。“回”文化就是“萨巴”文化。汉文化，就是一种本土化。

以色列只是示巴王国大商队的一站，历史记载中没有提到过他们的终点，我相信萨巴商队肯定进入到过中国西北，而伊朗、叙利亚都应该有他们的驿站。假如这条线路是长期的，时间久了这些驿站就会成为一些“少数民族”，时间再长最终他们甚至会建立一些小国家等，中亚以及中国新疆等地生生灭灭的许多小国在汉前就存在，恐怕其主务多为商业。从中亚而来与中国西北有着广泛联系的“粟特人”是我长久怀疑的一个重点。“粟特人”与历史上的“萨保”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许是准确的对应关系，或者他们是具有部分逻辑重合关系的部族，两者皆有可能。而“萨保”毫无疑问与“萨巴人”或者“萨巴神”也是部分逻辑重合的关系。

比较多的人认为中国历史中的“萨保”是个与西域人有关的一个职位，简单讲就是专门管理西域人自己事务的一个官职，没有其他的含义。但一位名叫芮传明的人写了一篇《“萨宝”的再认识》，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他反对“萨保”只是个拜火教职位的简单看法，他认为“萨宝”不仅是官职，也是一个族群。

关于“萨保”的语音方面他总结到：

> 较早的一种观点是认为“萨宝”乃是叙利亚语“sǎbâ”的音译，义为“长者”。……古代中东的

---

① 安伽墓在2000年5月于西安发掘。安伽为粟特人，曾经做陕西同州萨保，公元579年去世。

② (一般有固定的院子把死者放进去让狗吃，结束后把剩余烧掉收殓)。在袄教里狗是神圣的动物粟这就是盘古为什么是“狗皇”的根源。

③ 引自《王者的荣耀》。

村落都由saba来管理，中国景教碑叙利亚文诸僧名录中有一僧西蒙（Simeon），他的职称就是saba。为什么师子国中会出现这一叙利亚语名称呢？也可能是一些叙利亚人东来贸易时，一部分人在师子国留了下来。

另一种看法是将“萨宝”视作中古波斯语“š θ –p ā v”或“xš θ –p ā v”，而该词又可追溯至古波斯语xša θ ra–p ā van”，其意思是“地区的保护者”，即，xša θ ra，义为“权力”、“领地”，p ā van义为“保护者”。此词的梵文同义词为kšatrapa，乃是“总督”之义（现代英语中的satrap即源于此）。……

现代学者比较普遍接受的一种说法是，“萨宝”源自梵文的“s ā rthav ā ho”，义即“商队之长”或“商主”，且和见于佛经中的“萨薄”乃是同名异译。……有的学者虽然并未否认“萨宝”之原义为“商队首领”，但却并不认为这一汉名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译自粟特文“s ā rthav ā k”。

杨宪益曾经力排众说而独创新说，认为萨宝之语源即是印度神祇湿婆的梵文名Sarva。Sarva译为萨宝亦合于唐代音译的原则。祆即天，故祆祠亦即天祠，天祠亦即婆罗门教，此有早期佛经及佛国记西域记等记载可以为证。

在这篇2万多字的文章的结尾，芮先生认为：我们似乎可对主要见于南亚次大陆的“萨薄”的身份作如下定义：通过海道或陆路，进行远程贸易的较大规模的商团的首领。所以，他与一般的商人有着相当的区别：无论在财富拥有方面，还是在社会地位方面，抑或在领导才能方面，前者都远胜于后者。

芮先生还说：在汉文史料中，更多地不是直呼“粟特人”，而是以“昭武九姓”称呼之。这一名称见于《隋书 · 西域传》，它说“康国”（以今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一个地区，是典型的“粟特地区”）国王本姓温，早先居住于祁连山以北的昭武城，嗣后因遭匈奴攻击而西迁，遂度越葱岭而定居下来。王室的各支后裔均在康国附近建立政权，为了纪念其源流，故各国都以“昭武”为姓。所以，凡以“昭武”为姓的民族，都被目之为粟特人。“昭武”之姓有康、安、鏺汗、米、史、何、乌那曷、穆、漕、曹、石、火寻、戊地、东安等。鉴于古代汉人多以域外政权之“国姓”为该国居民个人之姓，故诸如康、安、米、史、何、穆、曹、石等姓的域外人，往往被视同于粟特人。

上面的“昭武”突然让我意识到一个有趣的切音可能：“周”，或者干脆就是“Jew”。很可能在先秦时期他们就是同根，后来被表述为两个不同部族：“周”和“昭武”。“周”是“西伯侯”建立的。假如“西伯”就是“萨宝”，那么“周”也就是“粟特”人或者“昭武”了。

很意外芮先生不同意“拜火教”与“萨保”有关。这点与多数学者的观点相冲突。他强调这是一个群体，是个行业或行政职位。

“萨保”犹如无数闪亮的珍珠，洒落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古老文明之路上。它的真正根源到底在哪里？只要努力，我们终有一天会找到“萨巴”或者“萨保”或者“酒神”或者“萨巴神”之间的联系秘密，届时我们将成功串起一条珍珠项链。这是一条迷人的文明之链。我为之迷。

全书初稿始于2004–11–9

结束于2005–1–19

修改于2005–3–16

附：香港归来有感 (2004/12/8)

之一."挪亚方舟"与"亚若方彝"

2004年底我应邀去香港参加一个团体的会议，开会很顺利，并且很意外地得到一些发现，也有一些感想记下来。

香港"创世"是一个具有基督教背景的电视台，他们先前组织了一个小组到土耳其的阿拉腊亚山去考查"挪亚方舟"，因为《圣经》上说挪亚一家最后就落脚在一个叫阿拉腊亚的大山上，至今已经有无数的人去那里考察过"方舟"的行踪。关于"方舟"的考古结论我已经看过好几个了，这次"创世"的人也说他们也发现了"方舟"。我对此没有研究，不能判断他们的发现是否属实，自然无权置喙。据说他们还要继续这次"方舟"探险。

我这次去香港主要是与他们谈我的作品在香港的出版以及拍摄这个"全球同源"的系列记录片。不过他们邀请我顺便在有关"方舟探索"的大会上即席发言，我说或许我可以谈谈有关全球"洪水"的神话痕迹，这个我倒是有的说呢。

我在2003年冬开始研究这个课题之前，对于全球的洪水神话系统确实做过一些了解，可以说部分原因是这项工作促使我开始转入中国的文明探索。当时我发现世界上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大洪水"的故事。这是不是很不寻常？由于那些故事太接近，所以我当时就怀疑全球文明同源，大洪水的故事来自一个版本。比如中国的女娲传说，与《圣经》的挪亚故事就很接近，然后是美洲的玛雅文化也有洪水传说，并且挪亚方舟在美洲变成了"方箱子"。我就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大会上就此做了大约15分钟左右的发言。

在2004年的最后几天里，东南亚发生的罕见海啸造成了一场大灾难。这给了我一个启示：那场历史中的"大洪水"会不会就是一场类似罕见的大海啸？海啸里的一个奇怪事实是，岸边或者恰好在岸上的人更危险，而在大海上的人其实只能看到快速变色的海水在上涨，最终却没有岸边的危险大，水涨船高。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自述案例，说他们本来看到天气有变海水发生了急剧变化想靠岸，结果因故被挡了回去，他们被迫在海上飘荡，过了一会海啸就扫荡了海岸，那些靠岸的人们反而被海啸吞没，他们在海上却安然无恙。挪亚一家假如当时就在大海上恐怕也同样生还的可能性会大大超过岸边的人们。因为海啸带来的水位快速上涨，所以方舟最后停靠在山顶也是合理的。假如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可能就不能推测大洪水的故事起源于一个民族的拘谨"同源"，而是一个相对大的范围的"同源"，比如这次从非洲到亚洲的整个印度洋的人们都会有一个几乎相同版本的"大洪水"故事，而挪亚的那次"大洪水"到底发生在哪里现在却是个问题，是在红海还是地中海，抑或在本来这两个地方就相通的海区呢？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地方离阿拉伯半岛不会很远。这个洪水故事各个大洲都有流传，但却都与一个奇怪的"方舟"相连，不得不说他们依然有可能同源。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神话传说尽管与《圣经》有许多接近的地方，中国民间故事里却没有方舟的踪迹。这些我都在香港的大会上实话实说了。

自从我开始这个研究以来，得到了基督教徒们的各种热心支持，其中一项是无偿赠送我许多研究资料。这次到香港去，一个读者热心地给我带去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创世记与中国汉字》(Genesis and the Mystery Confucius Couldn't Solve)。这本书是由两个外国人论述中国甲骨文与《圣经》之间的关系的，这是一本久负盛名的著作，似乎在中国没有看到过翻译，严谨的中国人大概会认为他们胡说八道吧。封面上是一个红色的中国甲骨文"帝"字，我想说出我对这个字的第一印象：这是古埃及帝王的一个标志物——安克(ank)。

书中列举了大量证据说明中国的甲骨文与《圣经》的《创世记》有关。其中分析的一个字就是说"船"字，"舟"就是"船"。中国的"船"字：一个"舟"加上"八口（人)"就是"船"。为什么是"八口"呢？他们的解释是：因为挪亚和他妻子加上三个儿子与三个媳妇，正好是"八口"。这样就解释了挪亚全家避难的事实于中国的"船"中。我暂时没有仔细研究，很难判断这个起源，不过我认为这一解释确实很有意思，因为无论如何"八口"除了这个解释似乎很难找出其他的理由来。关于这个方向的拆字书里还有很多，确实让人感叹，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在12月6号那天，下午2点之前没事，就到处乱逛。我住在YMCA，一抬脚就是"香港艺术中心"。其实我本来不想去那里，因为觉得"艺术"

与我无关，由于太近就溜达过去，想顺便长长见识。去了才知道，这真是神的旨意啊！原来那里三分之二的展品是古代文物，并且多是私人捐献的真品，许多都只在书上见过的精品，在香港见到它们真是有说不出的惊喜。那里的展品详细地分为金、玉、瓷、青铜、玻璃等几个展厅，并且展品数量之大超出了我的想像，起点远在殷商，使我大饱眼福。

我必须得指出香港这个“文化沙漠”的一个难得之处来：门票极其便宜：10 块。并且票撕过后参观者出去吃饭或者喝茶再进去人家还认！这在国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那天实际上是上午下午都在馆里又看又抄的，收获不小。馆很大，在快走的时间才上到 3 楼看见最要紧的夏、商、周青铜器展，并且在那里发现了下面这个宝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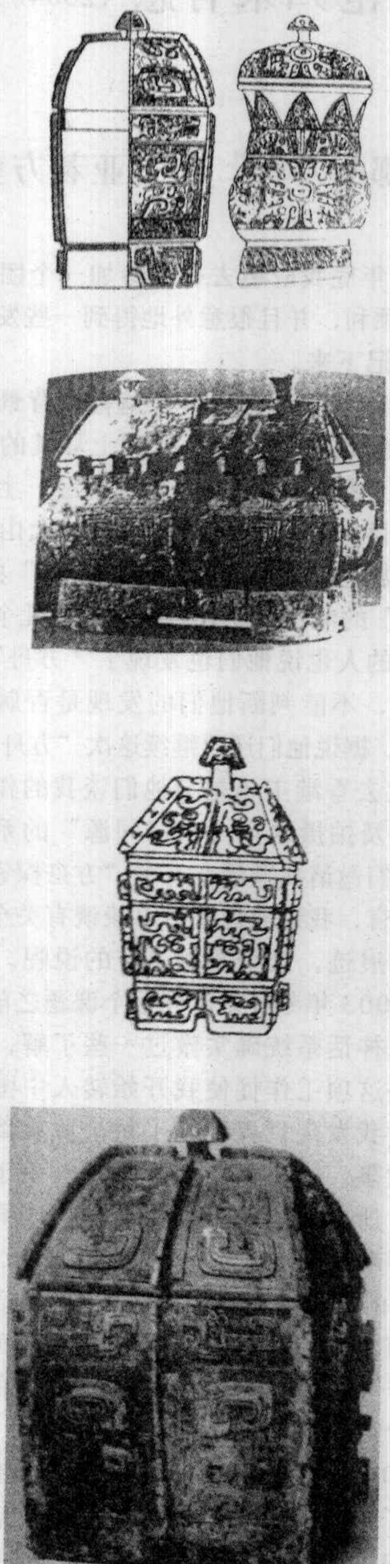
一个叫“亚若方彝”的物件极其精致珍贵，造型奇特，装饰繁华，一看就是非常重要的礼器，大约35 厘米高，毫无疑问是方型。我以前在书上见过图片，曾经认为这个名字可能有误，应该为“若亚方彝”。这次因为方舟会议的展开，我突然开窍，这个物品确实应该叫“若亚方彝”才合适，其实就是“Nuah 方型器”的意思，也就是“挪亚方箱子”、“挪亚方舟的仿制品”！“若亚”就是“挪亚”，是不同时期音译的差异。

基本理由如下：

1. 这个物品的年代鉴定为3300–3100 年前，属于晚商时期。这时的甲骨文尽管多数排列有一定的方向，但从发掘情况看，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方向都有，这就给“亚若”实际是“若亚”提供了可能。“挪亚”是现代人们接触《圣经》文本之后的又一种音译，与3000年前的称呼肯定有差异。

2. 这个器皿的铭文是一个大约长宽各 3 厘米的文字团，我当时急着去“创世”开会，没有仔细描摹下来，只是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十”字刻在这个字团中。这很不寻常，我认为这很可能是个带有宗教意味的礼器。

3. 这个三层的方型器或方盒子与“挪亚”联系在一起是不是过分巧合？另外，它恰恰不是“船”而是“方箱子”这一造型才更让我更怀疑它就是挪亚方舟。一般认为美洲土著文化确实与商人有联系，而在他们的传说中躲避洪水的用具恰好就是个“方箱子”而不是条船，所以商人自然只会把这个纪念物造为“方盒子”而不是别的形状。这个“方箱子”很可能是当初洪水避难时的救急之策，并不是一个现代人理解的大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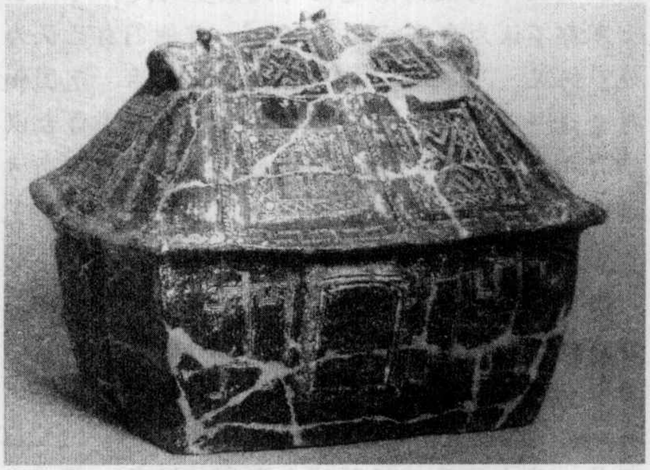
▲ 商朝众多的“彝”

我马上把这个信息传给了电视台，并且在他们预先准备拍摄的一个采访里我把这个推测给说了出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这个神奇的青铜器。我也会继续关注它。到底事实如何研究以

后才清楚。

回到北京后，我开始查找“方彝”的资料，发现商朝的“方彝”并不只此一个“亚若方彝”，我相信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常用礼器。在《走进殷墟》一书中我看到了一个“偶方彝”。与香港的“亚若方彝”不同的是，这个“方彝”是对偶型的，即两个“方彝”连在一起，所以被今人命名为“偶”，其他与“亚若方彝”一看就是同概念、同时代系列产品。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外表极其华美庄重，非寻常实用物品。在“偶方彝”上沿处还多出了“7个”明显的对扣装饰，可谓《圣经》渊源的又一直接证据，西方“7崇拜”的痕迹。“亚若方彝”中的“十”当然也属于“7崇拜”。因两个“方彝”平行偶接，故整体俯视平面为长方型。书中在照片旁描述说：“造型像一座殿堂”。

一个方型青铜器具为什么如此庄严如殿堂？因为这是重要的祭祀祖先的物品，而且是最古老



▲ 来自意大利半岛北部的“方彝”，公元前9世纪产品，目前收藏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博物馆。这个方盒子的功能很清楚，是个骨灰盒。与中国“方彝”不同的是，这是个陶质的“方彝”，相同的不仅有他们的外形，而且他们上面都有“十”字符号。发现这个“方彝”的附近倒是更有资格叫“亚若方彝”，因为就在它的所在地有一条大河叫“亚诺河（Arno）”，这条大河穿越意大利的比萨与佛罗伦萨两座城市。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目前我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我相信最终我会得出相对清晰的答案。下本书里看到这个照片大家就不会惊奇了。

以上的两个“方彝”的最上面都有一个“龟头”形状的装饰物，我曾经认为它可能是表示出气儿的地方，后来仔细考察了几个以后我认为这个推测不是很可靠，它应该是男性生殖器，代表“祖宗”，也就是说带类似装饰的礼器确实具有祖宗崇拜的含义。其实按照我的理解，《圣经》本来就是一个对于祖宗崇拜的具体体现，这些“方舟”就是祖宗崇拜的礼器。

西周早期的麦方尊上有铭文：“王乘于舟为大礼”。这个“王”是哪个“王”，这个“舟”是哪个“舟”，这个“礼”是哪个“礼”？它是不是与挪亚方舟的故事有关呢？

之二·“夏甲人”与“客家人”

这次在香港，人们提到“挪亚”或者“女娲”的次数特别多，我意外地发现在（香港）粤语里“女娲”的发音比普通话更接近“Nuah”。

尽管我现在还是听不太懂粤语，不过粤语的发音规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互借现像之广泛远远超出我的想像。归根结底，那些互借实际上是一种古老原始的语言表现，“以少胜多”是古代语言的特征。现代语言越来越细致和繁杂，也更加规范，这是可以想像的。

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几千年来一直在北方，这使北方语言文字发生人为改变的可能性极大，比如普通话的推行就是一个行政命令。但是南方的语言却因为“天高皇帝远”而保留了一些相对的原始状态，所以说粤语等南方语言是古老的化石语言是有道理的。

我观察到，（香港）粤语中的一个“ts”竟然可以“通分”掉我们普通话中的j、k、g、z、q，也就是说，上面5个音其实也是可以转换的（起码是特殊情况下可以转换的）。我随便还记下了几个可以转化的声母“w、m”，“h、x、k”。最后我说：这太“随便”了吧！

q与k在粤语中也可以转化，“儒教”之“儒”在粤语中近于“于”，似乎与“犹”更近了一步。

我曾经分析过夏商周出现的共同祖先“qi”，假如他们曾经是岭南人的祖先，那么这个“qi”（启、契、弃）就很可能也是“ki”“ji”“gi”“zi”之一。我重新回到《圣经·历代志》，在其中看到有几条线索可以重新考虑。

首先是亚伯拉罕先后娶过三个女人，其他两个我们都很熟悉了，现在是第三个“基土拉”，按

照中国人喜欢以第一字取代全称的习惯她因为“基”（ji）这个音是应该得到怀疑的。然后是“夏甲”的两个孙子：“基达（Kedar）”、“基底玛（Kedemah）”；“基达”是第二孙，最可怀疑，按照顺序只要老大逝去老二就可上台。“基底玛”排序第十二孙。最小的是孙女玛哈拉，她嫁给了撒拉的孙子“以扫”。不过这个怀疑一时不会有答案，只能是缩小包围圈而已。

说到“基达”，我有一个疑问。中国东北临近渤海湾的地方有一个曾经很特殊的民族“契丹”，与“Kedar”（基达）是否有族源关系还不清楚，他们与著名的“红山文化”是否有牵连呢，目前证据不足。但知道他们属于“炎”族，而且名“阿保”（疑为Ab）者众多，他们的生理特征之一是“小眼睛”。前两个特征同时与“契丹”和“Kedar”（基达）的怀疑放在一起，相当具有挖掘潜力。并且我也曾经分析过他们的奇特发型与埃及某一时期的人接近。

古埃及人的一种发型

我们在《圣经》中很轻易地就能发现人们喜欢以名字命名家族的习惯，比如“以实玛利人”。在中国是否有类似的习惯呢？在历史时期，中国人或者“中国汉人”有几次大的南迁。所以，最古老的人种很可能被压在最南地区，包括福建、台湾、香港一带。“客家人”就这样从香港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古代客家人“尚兰”、“尚黑”，犹太人也尚黑、尚兰的，同时他们也尚白。我在香港历史博物馆里还看到“客家人”割稻子的捆束习惯，与我在甘肃、青海深山里看到的一模一样，却与我河南家乡的收割方法差异很大，相隔几千里的人们是怎样达到相同一致的？我很迷惑。

一个叫 whalle 的网友在网络上提醒我，“客家人”可能就是“夏甲人”。以下是她的留言：

你在《向东》中提到，以色列后来在迦南征战的支系中竟然有“夏甲人（音 Hagar）”，不知道您对中国南方语言发音熟悉不熟悉，在中国南方现在一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民族“夏甲人（音 Hagar）”。尽管我们中国的书面文字一直称其为“客家人”，但天地良心，你只要与广东地区任何一个“客家人”相处，你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称呼自己为“Hagar人”，发音如此的准确，跟《圣经》称呼某民族的读音相比竟然没有一丝一毫变化，由不得人不生疑。

我不知道那个民族为什么要叫“客家人”，有人说是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中原地区迁到南方，所以自称“客家人”，意思是做客异乡的人，但是中国五胡乱华由北向南迁徙的民族多的是，为什么大家都不认为自己“做客异乡”，就他们自己认为呢？何况，“客家人”从晋代开始南迁后，范围相对来说并不算太广，有没有可能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叫“Hagar”？后来中国的文字也许根据南方读音将其附会为“客家”，然后又从汉字的字面上作出一番似是而非的解释，而实际上与“Hagar”的本意已经相去甚远。“客家人”是五胡乱华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大举进犯中原的时候南迁的中原贵族，血统相对来说比较单纯，他们认黄帝为自己的祖先，现在基本上已经被当做纯种的汉族人。我现在想找一些中国民族问题的专家重新探察一下“客家”民族的起源，想搞清楚他们自称“Hagar”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是湖南人，在广州住十几年了。跟广东“客家人”特别是梅州地区的“客家人”有过广泛的接触。从一开始就发现他们自称“Hagar”，当时也没怎么在意，但是印象是很深刻。所以最近读你的书见到您提到叫“Hagar”的民族，立即就联想到“客家人”也自称“Hagar”，或者有点渊源，因恐您是河南人，未必能知道这些，所以想提醒你一下这件事情。

另外，粤语与客家话尽管有差异，但对“客家人”的叫法却是一样的，只是重音不同而已。想必是粤语遵从客家话的习惯也说不了。

第二天，这位“世界人类惟一起源论”的坚决支持者继续给了我一些资料，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whalle：《史记卷二·夏本纪》上是这么说的：“汤封

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

苏：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在河南这个地域啊，夏朝本来就在河南啊。看来你很严谨。其实关键的要看客家人具体是从什么时候离开河南的，这才重要，并且为什么离开。

whalle：现在都说“客家人”是五胡乱华时离开河南的，但我觉得可能更早。杞县离开封很近。太巧合了，看了地图，杞县离开封真是太近了！是开封的邻县。世界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哈哈！

苏：开封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市，另外一个是县。我查了地图，开封地区包含杞县，开封市距离杞县的直线距离大约60多公里。

whalle：基本上就是一个地方了，“客家人”应该就是夏的遗民，还能错到哪去？

苏：所谓“客家人”来自开封的说法，实际上是指宋朝南迁。最早的西晋“五胡乱华”那次应该是第一次。历史上总共有好几次呢，并且广布于中国的四面八方，甚至海外。朱德、郭沫若都是客家人。有意思！我本来不是特别在意这个，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条线索有价值了。一旦坐实一个线索，其他的就是连环扣，一环开，环环开。

这条信息的主要价值在于，我又找到了一条可以用具体证据证实的道路，比如可以试用中国的“客家话”与古代阿拉伯语进行对比，尤其是红海东岸的阿拉伯语进行对比。

考虑到“夏甲”的特殊背景，她是埃及人，同时是希伯来人的妻子，也应该对同期的古埃及语和希伯来语拿来与客家话做出对比。很遗憾我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对这三种语言我都是门外汉，短期之内不可能掌握。不过在“文明同源”的前提下我拿粤语（代替客家话）和英语（代替古代地中海东岸出去的古语）对比，发现它们之间的接近程度远远超过了摩登的中国普通话与英语之间的联系，这说明他们之间的根系联系更紧密，也很说明问题。比如，粤语说“踢”，实际上接近“ki”，英语是“kick”；“他”粤语接近“ki”，英语为“hi”，但粤语实际上“k”“h”之间的转换发生频繁，所以两者依然可以被认为有联系；无论英语、埃及文还是希伯来文“7”的第一个音节都是“se”，粤语发音也与其接近；粤语里说“崽”（zai）指“儿子”或“孩子”，但我怀疑它实际上与“son”同源，粤语与普通话里“s”、“z”的可转换说明怀疑的通道存在；中国人说“衰败”或“倒塌”为“颓”，而同样意义的希伯来语中则可表现为“tel”；中国人说的“魁伟”或者“巨”英语里有接近的“great”；粤语里的“船”（接近ʃuan）与“ship”也有嫌疑；中国人说“精灵”、“精神”，在阿拉伯语中“精灵”（jingling）拼写是“Jinn”；某些中国南方地区称呼“父亲”为“阿爸”（aba），而希伯来语恰好为“ab”；中国汉字形容“被太阳照射”为“晒”（shai）在中东诸多语言中（尤其是希伯来语）“太阳”可以被拼音为“shamesh”，在古埃及语中这个词汇稍加修改可延伸为“夏天”和“热”；埃及的月亮神为“yah”，我们中国人将其称呼为“yue”，实际上中国有一个同样读“ya”的字正是与女性的月亮神有关，这就是甲骨文的“雅”字。

英语的上线是拉丁语，拉丁语再上可以找希腊语，越古旧的语言可能与中国的语言越接近，比如尽管英语单词“love”可能与中国的“爱”（ai）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拉丁语的爱却是“amare”。以前人们说粤语里的“茶”（ti）直接被英语国家拿去了从而有了“tea”，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怀疑渠道：从头他们就是同源的。人类的茶叶历史根本不是如一些历史书中说的那样，它的根源要比中国人知道的长得多。

以上只是一个根本不懂粤语的人在偶然的出差途中的总结，相信懂粤语的人会有更多的体会，希望我这里是抛砖引玉。

在本书完成之后修改本稿的时候，我看到一位名叫“余以为”的网友在“苏三客厅”发表了一个名为《仰韶文化属于中亚新石器文化》的短帖，其中说到一些非常有趣的语言现象，摘录部分：“国产考古学家们把彩陶的主人定为藏缅人，这是站不住脚的，藏缅人很早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上，可是在远离河西走廊地区很少发现彩陶遗迹。彩陶文化的主人，几乎可以断定为西方人，以及被其同化的藏缅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深入到中原地区，是由于从西方带入了西亚的旱地农业，旱地农业无疑是西亚最早发源的，米和millet音近，不是巧合。仰韶人还带进来羊ewe、羔goat\kid、豕sow、马mare、驹horse、车（轩辕）chairot、犬canine、鸡chicken、鸭duck、鹅goose，成为汉文化的主源。为什么这些词和英语都有点像？因为华人祖先是最早一批东进的西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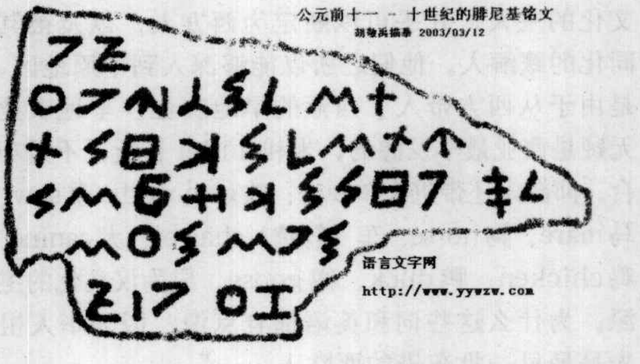
我们即便用摩登的普通话也可以找到与外语之间的某些奇特联系，比如中国的“颂”通英语的“song”，犹太人的“诗歌”（shir）不正是中国人说的“诗”（shi）嘛。中国人对于父亲的称呼“爸爸”、“爹爹”，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多是“papa”、“dad”，有人奇怪这个对应却不能大胆地问出来，有了这么多的线索，由我说出来再合适不过了：全

球的语言就是同源的，其中的差异是后来分化的结果。“母亲”、“妈妈”与“mother”、“mum”当然就更是一奶吊大的同根后代了。

还有一些语言现象值得探究。比如，埃及古语中没有L这个发音，但是犹太人希伯来语中有，希伯来语中的许多L都被埃及人翻译为相应的R。在中国恰好也有“L”、“R”问题：南方人与北方人对于这两个音有明显的差异，北方“L”、“R”很清晰，南方“L”、“R”不分，甚至有将“R”全部倾向“L”的习惯，比如“Mary”就不翻译为“马瑞”(marui)，而是翻译为“马丽”(mali)。那么这个南北方的差异可能反应了中国内地的什么差异呢？有可能真的暗示了北方多犹太色彩，而南方多埃及（实际上是红海？）色彩。不过，这只是猜想，是否真的如此划分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考证。

英语与希伯来语都属于腓尼基语系，它们之间的渊源很深，尽管大胆用英语替代希伯来语，这样会有许多疏漏，但总比你现学一种新的语言要“经济”得多，况且今天的希伯来语已经不是古代的希伯来语了，只是放宽你的误差度就可以了，基本的形态是肯定可以看出来的。我是说，假如要做宏观初步判断的话，这样已经足够，但假如你是历史语言研究者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最理想的方法是使用地道的“客家话”与古阿拉伯语和古希伯来语进行对比，但恐怕最好是用古腓尼基文字直接与客家话进行对比才妥帖，假如条件不具备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我只是求了最次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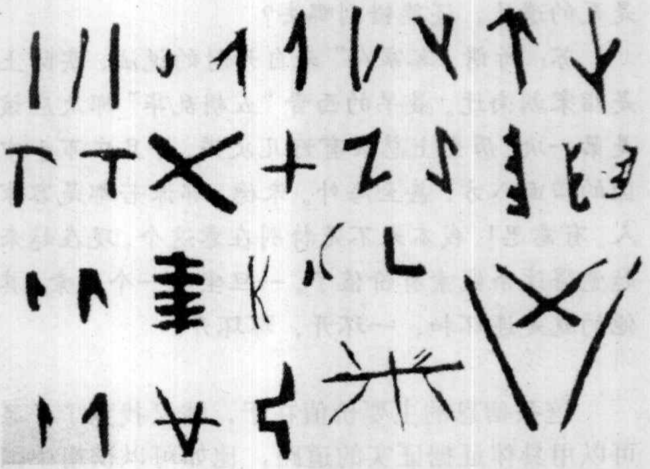


▲ 腓尼基人的文字汇编

这个对比意义之重大，足以与甲骨文和原始“南阿”文字比较的工作相提并论。它们惟一的区别是，这个对比是属于夏朝的文化对比，而甲骨文与“南阿”的对比是属于商朝，并且前者属于语言的对比，后者则属于文字的对比。它们同样重要，一旦证实都可以说明同一个问题：文明同源。

另外，大约2000年前后北方有一个黠嘎斯(Kirguiscs、Kirghis)的游牧部落，据说为匈奴之后，也有人说他们发展为今天新疆的柯尔克孜族，同样也可以考虑与Hagar部族之间的可能关系。不要忘记h、g是相通的。

古代黄河流域的人们自称“华夏”，多指夏朝时期，我猜想“华夏”(Huaxia)也可能与“Hagar”有关。当然，这纯属猜想。



▲ 夏前后的文字汇编

现在语言的对比多在语法和单词的内部研究上面，并且这项研究花时费力，从外型上判断又嫌疑草率，我在想我们一定在将来会有更加科学与便捷的方法来鉴定语言问题，比如利用计算机科学，录制全球各民族的典型方言，或许在他们的发音习惯中间能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寻找到另外一个语言比较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一定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同样利用科技的手段还可以运用各民族的音乐，为什么我们能够从音乐中较易识别出民族特色，就是与音素结合规律的概率有关。这个方法应该不难理解。

之三．古滇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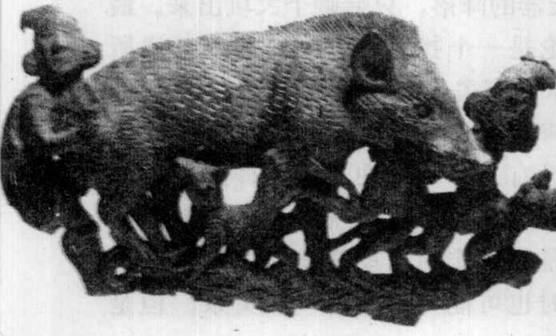
12月8号上午，闲着没事，决定到“尖东”的“香港历史博物馆”去看看。有人告诉过我那里可能没意思，最好别去，因为香港只有100多年的历史。结果我去了发现完全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实际上那里从40亿年前的地质构造谈起，一直到史前阶段都清楚介绍一遍，很详细，并且使用了各种现代化手段，看得很舒心。

除了正馆还有一个专题展，竟然是“云南古滇文化青铜器展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一直想一睹“滇文化”真容而不得，没料到这里碰上。不幸的是，我第一次是星期二去的，该馆偏偏每星期二闭馆休息。这叫好事多磨。第二天我约了一对夫妻一起去，一直看到我被电话给叫出来——我离开香港的时间到了，要去飞机场。不过这次参观也很有收获，粗略心得如下。

整个“滇文化展览”的重点是“战国－汉”时期，主要是青铜器，约有近百件。其中的“三多”印象深刻：第一是人像多，第二是储贝器多，最后是牛像多。展出物品的产地似乎多是云南滇池与昆明附近的。

中国先秦期间人像实物比较罕见，整个中国历史和史前人像都比较缺乏，暂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猜想周朝“犹教”使然，但东周就稍有放开。但滇文化里的青铜人像却比比皆是，我粗略估计了一下，大约可以在那里看到近百个人的造型。非常明显这个文化与中国北方汉文化有很大区别。

这给了我一个观察古代“滇人”的机会。这些滇人的特征几乎毫无例外地呈现出非“汉人”特点：高鼻深目。根本无需任何专业技术与知识就可以判定这些“古滇人”属于欧罗巴人种，一目了然。但器皿上的文饰（依我的个人经验）与内地同期的并无大的差别，回纹与S纹很常见，“三角”与“圆圈”符号也很多。



◀ 滇文化青铜雕塑

看到展馆里有对“滇人”起源的解说，有些是“正统”的猜测：有说是长江bo人，有说是古越人，还有说是北方羌氏族，也有说是古代欧亚一带活动的斯基太人。当然还有人认为这些“滇人”很有可能是中国自产的文明人类，因为在旁边的资料馆里播发的影片资料正在说云南“元谋人”呢。但是，毕竟正统面对这些用青铜保留下来的“高鼻深目”不敢忽视，他们本来的法宝是中国人的特点“铲型门齿”什么的，但欧罗巴人一般是不会有铲型门齿的，所以不得不给出一些其他可能来。三星堆假如不是有人面造型后果也可以想像，肯定被某些正统一口咬定是中原黄河文明的流散，实际上已经有人在那么说了。

▲ 滇文化青铜器

为什么滇人种与后来的中原汉人差别如此大，而文化上却很接近？因为这里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同源来于中东，他们在中国境内即便没有经过交流，他们都可以给人一个是在中国境内交流的错觉。

古滇文化多牛而少羊给了我另外一个启发，这里与中原可能属于不同的文化分支。中原的周文化我认为是比较偏“羊”的，或者说“羊”在中原比较常见，留下了“犹太教”（甚至是苯教、袄教）的宗教痕迹。“羊”与“（太）阳”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重要象征。而“牛”在这些宗教里只承担了牺牲与祭品，它的出现在这些教区应该少于“羊”才是合理的。一旦“牛”出现的非常突出，而“羊”却不多见，则可以初步判断，这里肯定为非犹太教地区，即所谓“异教”地区，甚至有可能是古埃及来的“金牛教”崇拜，也有可能是印度人对牛的崇拜。

滇文化中还大量出现了“祖”器，可以肯定有原始崇拜痕迹，或者是祖先崇拜，这些都是“犹

太教”严禁的，但一部分拜火教、苯教等却不排斥这些。同时这里出现了许多星号，显示了可能存在的星宿崇拜，这是否属于我们讨论过的“萨巴文化”？

上面来自正统学者的诸多起源猜测给了我一个可能的结论：所谓“bo 人”、古越人、北方羌氐族、欧亚一带活动的斯基太人，他们与古滇人的文化特色的接近，让许多人猜测与之有联系，实际上都暗示了所有这些人群都来自一个文明根源。他们来自一个大的文明区域，那些共同的文明特点经久不衰地显示出了他们的本来联系。这是最好的解释。

今天在云南怒江一带与外界缺乏联系的深山老林里，依然可以找到一些面相比较“洋气”的人，他们就是没有被混血掉远古特征的古欧罗巴人。并且这些人与牛的关系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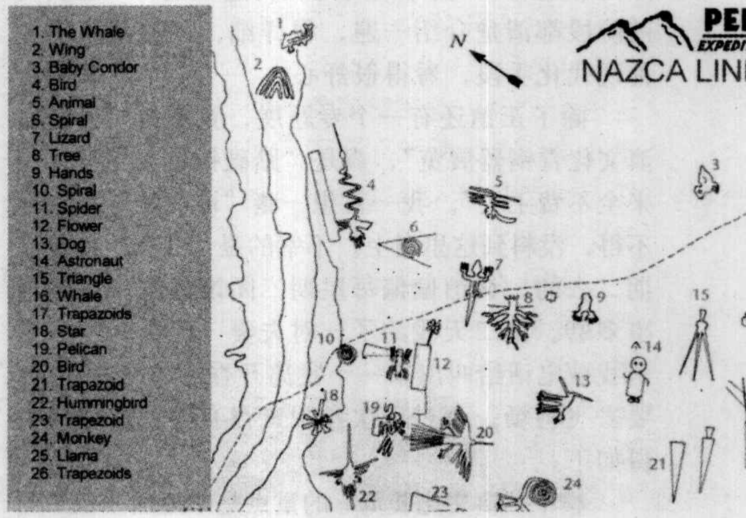
在云南的“苍山洱海”之中其实处处都是闪族文明的遗迹，仅一个“洱海”为什么叫“洱”就够让人遐想无限。闪族上古时代最著名的神就叫“El”，其实这个“El”神文化遍布整个红海两岸与中东核心地区。假如我们愿意就可以把中东的“El”翻译为“洱”。

接着看到“香港历史”专题，发现与滇人同期的香港居民面貌上已经趋向于今天的汉人。从墓室壁画上看，甘肃等地在这期间也是五官平和和“汉人”占主流了，大鼻子人很少见了。这说明了地理上的隔绝可以对人种的原始特征做出一定保护，一旦到交通发达地区就都被汉化掉了。中国东部地区多是平原或大海，交流远远大于西南高山丘壑地区，所以云南滇人才保留了原貌这是个浅显的道理。

之四.在文明同源中猜想纳斯卡

在港期间，碰巧看到一些秘鲁纳斯卡(Nazca)的资料，也可以说说我的看法。

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被人们在飞机上看到以来，纳斯卡线条图就成为一件争论不休的世界大事。之所以是世界大事因为它可能牵涉到人类起源问题，比如有人猜测它是天外来客所留，那些无法想像的长线条不过是航天器的跑道。又因为它起源时间在大约2200年前所以还牵涉到文明起源：这些线条与图形的制作者是什么人遗留？为之研究争论的人很多，还有一些人为此献出了一生的年华，比如德国数学女教师本来是到南美做别的工作的，结果为这个着迷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她最终以95岁的高龄在纳斯卡旁边逝世，她被尊为纳斯卡的守护神。今天纳斯卡线图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纳斯卡线条画的大致相互位置

纳斯卡文化主要包括几十个巨型动植物图形以及近千条巨型几何图案，最长的线条达15公里。那些动物图案，小则几十米，大则可达600多米。站在普通的陆地上是看不到这些图案的，只有站在4层楼高的地方才可以看到一些，这就是为什么上个世纪30年代才有人发现他们存在的原因，因为只有这时候人类才有飞行器并恰好能有人飞过那里。

这些图案的奇特在于这样几个方面：谁制作的？制作的目的是什么？几十年来人们争论的就是这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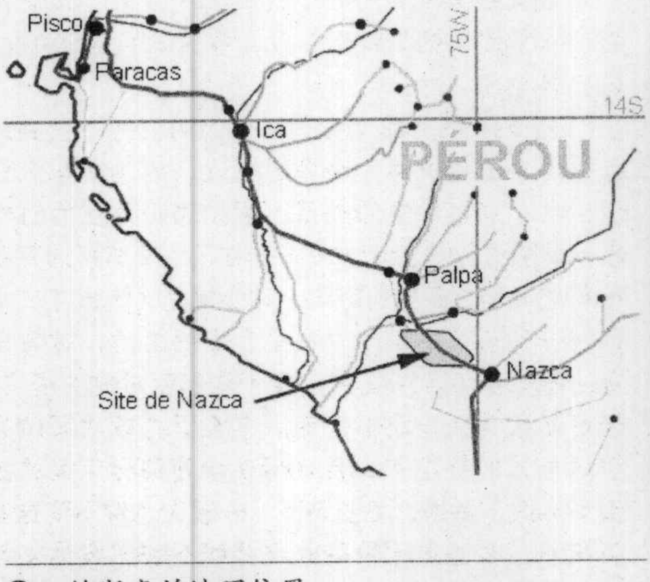
所有的争论都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受到最猛烈攻击的是外星人制作的提议，因为科学家们说，具有穿梭星空的外星人假如真的存在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些原始的方式“导航”，而那里的荒漠也承受不了航天器的降落，只会砸个大坑出来。最近的一种新理论是一个找水专家提出的，他说所有的图案都与水源有关。我不全部反对他的提议，但是我认为他肯定不正确。全世界寻找水源的人多的是，但是没有人会兴师动众画那样巨大的图画来标识。另外，即便画了，一般人也看不到这些图案啊。我还是比较赞同这些线条和图案为宗教祭祀而作，同时也可能与天文有一定关系。但是

这个说法为另外一些无法解释的背景所困惑，当地土著人有那样的先进技术画这些线条吗？

我认为现在所有的人们在解读这些现象的时候都是用各大洲文明处于文明隔绝状态为背景来研究的，并且以现在的社会形态去套当时的社会形态，这就把问题拉进了死胡同。把纳斯卡现象放进全球同源体系问题就有一线希望。很可能在古代自由迁徙时期，常常有发达文明地区的人到处游历，在许多地方留下他们存在的痕迹（并不限于这些巨画）后，他们会继续前进。尤其是美洲这里的文化，曾经有迹象表明有些白人到他们那里总是留下文明就离开了，而一些土著人也总是期待着这些神人再次光临。这里的图画会不会又是类似的另外一例呢？

那个找水专家之所以认为这些图案与水源有关，他是顺着一种“暗渠”找到规律的。而这样沙漠里的“暗渠”中国新疆就有，叫坎儿井，并且中国四川也有，阿拉伯地区也有，并且中国使用的最初时间都确定在大约两千多年前这个时段，使用人集中在羌人或者西北匈奴人身上。这条线路上的人与波斯附近有着广泛的联系。而恰好在纳斯卡地下发现了这些独特的美洲“坎儿井”。这个几地之间的这一文化联系也不可忽视与这些线条画的联系。

这个地区临近大海，应该考虑古代外来迁徙的可能。美洲土著人尽管居住在沙漠高山但却明显属于善水之人。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南岛文化”为所有沿太平洋地区的频繁迁徙找到了很好的证据。这个地区临海，说明建立纳斯卡文化的人们是海上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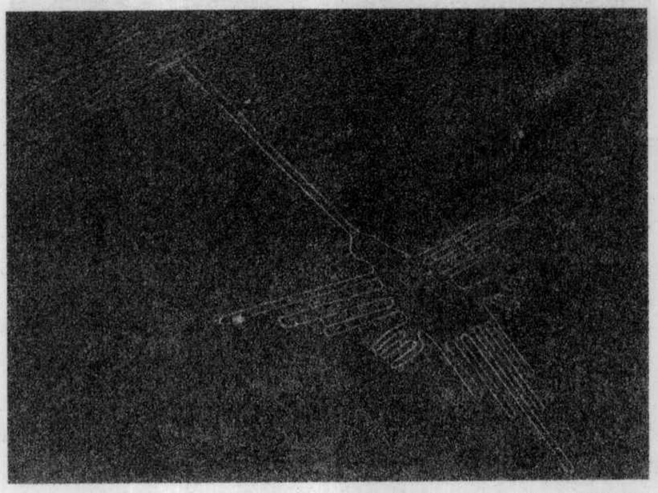


纳斯卡的地理位置

制作这些线条的技术问题，只要回头看看希腊与波斯在2500年前所达到的科学高度，尤其是希腊人这个善水的民族在几何与三角学方面的巨大贡献，他们甚至开始计算太阳与地球的距离，类似这样的线条不仅不是难题，简直是等闲小事。我甚至认为，这些图案的制作除了具有宗教祭祀功能之外，很可能有以炫耀“高科技”震慑旧有土著的作用。只要搭建一个足够高的简易了望塔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土著看看他们画在地上的杰作，那些对于几何与放样根本不懂的土著人就会对这些新来的人五体投地。

除了那些成千上万的直线条与几何图案，那些动物或许能提供给我们最直接的答案。线条画中最显眼的动物有鹰、猴子、鱼、鲸鱼、狗、牧羊人、蜂鸟、蜘蛛等。这些动物不是美洲独有的。鹰与猴子是其中比较突出的，还有狗与鱼的出现尤其提示着我一些可能：纳斯卡文化的制作者很可能来自亚洲乃至欧洲，甚至非洲。我甚至在图案中还发现了一个复杂的灯具，颇与中国汉前后的“十五连灯”或者三星堆里的神树类似。假如说这些动物图案不能全部准确地对应我们已知的某个宗教，其实更可以说明这是一个主要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萨满教群体。可以集中于大约2500年时期的波斯或印度有关的人。假如给我一个猜测的最后机会，我愿意把起源画定在印度洋里的阿拉伯海，并且是靠北地区。

亚欧科学技术发展的轴心时代开始于大约2500前，在此之前出现这个文化于美洲将是不可解释的，但是纳斯卡文化的开端是在大约2200年前，一切就好解释多了。通过时间与地理的结合，欧亚文明传播到了这个遥远的地方，之间肯定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纳斯卡线条画中的长喙鸟

这些图案最让人惊讶的其实不在别的，而在

“巨”，而这个“巨文化”实际上我们刚刚研究过，在希腊，在中国，都有过一个未知的谜一样的“巨”时代。另外，老实说，它们再“巨”也没有巨过我们庄子的“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比较盘古的“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这里的画就更不算什么了。

建设这些线条并不需要多少劳力，只是拿开一些小块的砾石就可以了，需要的只是发达的几何学与放样技术。所以这些建设者人数并不要多，或许只要三几个人就可以，或许只有一个指挥者就行了。

或许，那只是一群从欧亚出来的智人，他们本来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却不料被风暴卷到这个不毛之地。面对警惕的土著，他们向他们匆忙献技，土著首领高兴，所以这群人就终生以此为业，就这样留下了他们生命的痕迹给我们今人破解。或许这漫漫荒漠中有着无数远离家园的心伤与眼泪，但是那一切我们都找不到了。如今留给我们的只是无限的猜想。

古代英国不止一个地方有巨画，这是Wandlebury地区的一个人脸。英国也以麦田怪圈闻名。

我相信这确实是“同源”过去的文明痕迹。全世界出现的巨型麦田怪圈假如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我认为那多是许多人在玩弄我们的好奇心），那么英国巨石阵不远处有一个著名的白马山或许可以说明问题。那是一匹用石头镶嵌在斜坡上的白马，人们从远处就可以看见它。纳斯卡的线条画里其中一幅也是这样镶嵌在斜坡上的，并且同样是动物图案。有人将这个巨型白马线条视作当地英国古代文化的一种象征，据说它具有宗教含义。

中国西北地区也有一些碎石积累的不明图案。

附"三代"王表[1]

夏王：
鲧
禹（公元前2070年）
启
太康——仲康
相
少康
杼（予）
槐
芒
泄
不降——（户同上下）
廑——孔甲
皋
发
履癸（桀）

商王：
契
十一代祖先
主癸
汤（公元前1600年）
太丁——外丙——仲壬
太甲
沃丁——太康
小甲——雍己——太戊
仲丁——外壬
河dan甲——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南庚
阳甲——盘庚——小辛——小乙
武丁（公元前1300年，甲骨文出现）
祖庚——祖甲
廪辛——康丁
文武乙
文武丁
帝乙
帝辛（纣）

周王：
弃
十一代祖先
古公dan父
王季（季历）
文王
武王（公元前1046年）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恭王——孝王
懿王（壬）
孝王
夷王
历王
（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
宣王
幽王
平王（东周始，公元前771年？）
桓王
庄王
厘（繁体）王
惠王
襄王
顷王
匡王——定王
简王
灵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定王
哀王——思王——考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显王
慎靓王
赧王

① 参考张光直，《艺术、祭祀》。

附：有关人类非洲起源新闻3则

《科学家称人类起源非洲将成定论》（摘录）

“关于人类起源地问题的争议将会结束。”剑桥大学遗传学系，理论与分子人口遗传学实验室的进化人类学家弗朗西丝.巴罗克斯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人们将很难再对这一事实产生疑义，就是‘现代人类的祖先来自非洲，而后他们占领了全世界’。”

关于人类最早的起源地，学术界一直充满争议。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所有现代人的祖先都是来自东非，他们在大约10万年前离开了故乡，冲出了非洲，走向了世界。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取代当地的原始人，占领全世界。这一理论的最有力证据，就是非洲人相对其他大陆上的人类在基因上极为多样化，这就意味着他们具有更久远的历史。另一种相对冷门的理论认为，现代人是在各个大陆上古人类各自发展起来的。

巴罗克斯的新发现为“非洲起源说”提供了新的有力支撑。这位科学家发现，埃塞俄比亚在地理位置上和全球51个地方的距离与该地区人类的遗传多样性有关，离埃塞俄比亚越远，遗传多样性越少。他由此推论，人类在离开埃塞俄比亚后，一些基因在迁徙的路上渐渐丢失掉了①。

巴罗克斯说，“开始这项研究的灵感，来自于我们对于人类免疫基因多样性的研究，我们想知道，是否被更多疾病困扰的地区的人类，在这些免疫基因上拥有更多的遗传多样性。”

巴罗克斯进一步发现，随着距非洲距离越来越长，遗传多样性的衰退程度，正好沿着人类早期迁徙的路线慢慢增大，如果人类起源于不同地区的话，就不可能有这样严格的规律。“人类的外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出这么大的变化，确实令人惊讶，但是大多数生物学家还是接受这种变化的。”巴罗克斯说。

我们的祖先在到达世界各地后，开始散居在当地的原始人类中间，并逐渐取代他们的优势地位，最终迫使他们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我们祖先最大的武器，就是他们的工具制造技术。

（《瞭望东方周刊》 于达维）

《研究证实北京猿人并非中国人祖先》（摘录）

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是不是中国人的祖先？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争论的一方为古人类学家，他们认为，中国古人类的进化是连续着的，同时附带了少量与境外人群的杂交。也就是说，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是中国人的祖先。而争论的另一方为遗传生物学家，他们认为，北京猿人并不是我们的祖先，中国人的祖先是大约6万年前进入东亚的非洲人。

金力教授说，对东亚人群的遗传背景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们的祖先都来自非洲，时间大约是6万年以前。通过和美国多家研究机构的合作，他们采用Y染色体上一系列简单核酸多态位点和微卫星多态位点作为遗传标记，对代表性东亚人群的遗传背景进行了分析，以期追踪东亚人群父系的起源和迁徙。他们分析了来自全世界的近1000个男性个体Y染色体的19个SNPs。其中，80%的个体来自东亚各国各地人群，不但包括北方汉族、藏、回、蒙古、朝鲜、日本人等在内的东亚北方人群，而且包括南方汉族、土家、瑶、壮、侗、台湾原住民、柬埔寨人、泰国人、马来人和爪哇人等在内的东亚南方人群。研究结果表明，东亚男性的Y染色体单倍型均衍生于目前仅在非洲群体中存在的祖先单倍型。这个研究结果完全支持东亚人非洲起源假说。

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比较发现，东亚南方人群遗传多样性非常丰富，而北方人群则相对较少，在Y染色体单倍型上仅拥有南方人群的一部分。从而，他们得出现代人在东亚的最早迁移是由南向北。

通过计算，他们还指出，我们的祖先从非洲到达东亚的时间大约是6万年以前，首先居住的地方可能包括中国南部在内的东南亚一带，而后逐渐向北迁移，最后跨过长江、黄河，北及西伯利亚。

金力教授说，他们对东亚人群进行了大规模的遗传分析，共分析以东亚为主的亚洲和大洋洲男性个体12127个，包括来自于中亚、北亚、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163个人群。他们一个个去看，看他们的遗传基因上是否有非洲人的遗传标记。查下来的结果是，所有人都有这个非洲直立人的遗传标记。即所有人都是非洲近几十万年前

① 这个证据对于本书的一些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牵涉到“伊甸园”的可能所在；考虑到人类大规模有效的迁徙发生于大约6–4万年前，相对清晰的记忆还是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直立人的后代。

金力教授说，他们用的是排除法。也就是说，从遗传学来看，找不到现在人当地起源的任何证据。在东亚地区的现代人对当地早期直立人的替代是完全的。所以，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并非我们的祖先。

金力教授告诉记者，30年代“北京猿人”的发现曾经轰动世界。近年来，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不断有令人振奋的新发现，成为质疑单一起源学说的重要化石证据。然而，在我们仔细地查阅现有化石的年代以后，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断层。这个断层从大约10万年前至4万年前，持续6万年，在这6万年中没有任何人类化石出土，尽管早于10万年或晚于4万年的化石比比皆是，并相当连续①。

金力教授说，他们推测，生活于东亚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在最近一次的冰川时期，由于恶劣的气候而绝灭。取而代之的是从非洲不远万里迁徙而来的现代人种。“非洲移民”可能首先定居在气候较为温暖的东南亚地区，而后随着冰川的逐渐消融，开始向北扩张。地质学的研究显示，第四纪最后一次冰川于大约7.5万年开始融化，逐渐向北退缩，于1.5万年左右全部消融。

（《竞报》文／张星海／2005年01月13日）

《基因研究揭示人类迁移 中国人祖先源于东非》

科学家们一直在尝试着用DNA分析和电脑技术研究人类历史，从而确定人类种族及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目前，一项庞大的人类寻根计划在全球展开。新华社4月18日的一则电文说，为了全面了解人类的起源与迁移过程，以及人类数千种语言的形成，在未来几年内，我国科学家将和美国等国的科学家一起，通过研究基因的变异以绘制出一幅“人类迁移图”，从而填补人类历史认识的空白。

这项为期5年的项目被称为“人类迁徙遗传地理图谱计划”。这一项目将通过分布在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地的10个实验室和大学的专家来共同完成。科学家们将在世界各地采集不同人种的10万份DNA样本进行分析。

金力教授的实验室助理钱吉说，现代人是单一的物种，而各地的猿人差异却很大，属于不同的物种，并没有都进化成为现代人。只有东非的猿人走上了向现代人进化的道路。所以，北京古猿人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先。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在查阅中国现有化石的年代以后，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断层。这个断层从大约10万年前至4万年前，没有任何人类化石出土。经推测，生活于东亚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HomoSapiens)在最近一次的冰川时期，由于恶劣的气候而绝灭。取而代之的是从非洲不远万里迁徙而来的现代人种。

但仍有科学家支持“多地区起源说”。中科院古脊椎古人类所的吴新智院士细心比较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和现代人的骨骼特征，发现70%的中国人在头骨上有3个特征和北京猿人是一致的。所以他依旧觉得北京猿人可能是中国人的祖先。但他的学生刘武去非洲考察时，却发现有30%的东非人在这3个头骨特征上也和北京猿人相一致。

2001年，金力的学生柯越海和他的研究小组对主要以华人为主的东亚人群进行了大规模的遗传分析。柯越海共分析12127个男性个体，发现那些Y染色体的YAP、M130和M89上都会有其中一个位点发生突变。它们是基因树中的三根树枝。它们汇拢到一根叫M168的树根上。这个M168就是非洲人体内的突变位点。也就是说中国人与生活在东非的非洲人有关。

领导“人类迁徙遗传地理图谱计划”的人类基因组科学家斯宾赛－威尔斯说，“我们都曾属于同一个祖先，仅仅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分离开来。”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现代人，无论是亚洲人、美洲人、欧洲人，都是由东非直立人进化而来。他们在5万～10万年前，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

大约15万年前，在东非分化出了很多人种与部落，其中就已经包含了现在的黑、棕、黄、白四

①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会促使我们在考察在中国的人类活动时间先要倾向于去掉大约4万年之前的干扰。人类学家估计，人类的语言能力是从大约3万年前开始的。实际上，从一开始出现于中国的最后一批现代人来看，他们已经携带了文明过来。结合由南而北的总体迁徙态势，人类早期的航行能力应该得到极大的重视。同时，这一论证将使中国几代考古专家苦心建立的旧石期早期到新石器的发展“序列”全部遭到质疑，说明有些“序列”本身建立的就有问题，他们可能根本不属于同一个“序列”里。根据这篇文章，假如是探讨文明的话，应该从大约5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开始算起，更远的化石“作废”了，以往的许多看似铁证不仅动摇了，而且是彻底坍塌了。

个人种的祖先。Y染色体上的M168是目前发现的一个很古老的突变位点，这是人类在要离开非洲时产生的突变，大约发生在10万年之前。那些棕色人、黄种人就是带着这个古老的突变开始向世界扩散。除了非洲以外的现代人都具有这个位点的突变。

黄种人走出非洲的时间要比棕色人晚了近5万年。但他们的扩散速度很快。他们只用了棕色人1/5的时间就到达东南亚。

最早提出汉藏同源的是中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原本在语言学界认为南方的侗傣语和汉语最接近，后来发现与汉语最接近的是藏语。藏语中大多数字的发音在中国东南部的方言中都能找到，而且字义相同。藏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的不是一般意义的对应关系，而是系统性的一一对应。在语言上，汉族和藏族表露出非同一般的关系。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于1996年在DNA中找到了汉藏同源的证据。他发现汉人和藏人在M122以及在其分支M134上都有相同的突变。宿兵通过对Y染色体主成分分析，发现藏族的突变频率与汉人最接近，这意味着在藏缅语系的诸多民族中，藏族和汉族最接近。他们分化的年代约在5000年前。

藏缅语族群体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向南迁移，最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下来。在迁徙的过程中，这个群体就像细胞在不断裂变，分化出了藏、羌、彝、景颇、土家。

华人在渭河流域磨砺出一支骁勇善战的秦人，他们盘踞在关中，积聚着统一中国的实力。还有一部分华人则出了潼关，受到夷人龙山文化和苗瑶文化的影响，分别形成了齐语支和楚语支人群。

秦汉时期，四分五裂的中国被统一，从语言、文字到货币、计量单位等文化层面上，汉族的整体意识真正形成。加上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之后汉族就没有再出现分化。而文化上的强势让汉族像是一滴浓酽的墨水滴在了中国的版图上，他们带着M117突变迅速地向四周渗透。

……

闫宏 2005年05月10日 新京报

代跋：从“严谨”说起

看过我书的人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不严谨”、“牵强附会”、“胡说八道”，另外一派却看到“极其严谨的推论”、“名垂青史的创新”。我并没有两套不同的文字给两派不同的读者，很明显是读者中间存在着两套截然不同的脑筋。一套是与我相同的，另外一套是与我不同的。我倾向于认为前者是属于新的，后者是“固守传统”的。

时代不同了，“严谨”不一样。或者说，从一开始我就主动选择了抛弃传统的“严谨”，但是我肯定是为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严谨”。我觉得俗常所谓“严谨”在这个领域的广泛已经窒息了史前研究的生命，所以我只有另辟新径。

水清无鱼、至谨无证。在传统生活里我们经常使用筛面的罗，一般有大孔的罗与小孔的罗，这些不同的“罗”是对应于具体不同对象的，当有人告诉你大孔的罗“不道德”，而“小孔的罗”应当受到赞扬时，你是不是觉得很荒诞？然而这正是许多人对于“牵强附会”与“严谨”给出的判断。“牵强附会”就是大眼罗，“严谨”就是小眼罗，他们是两种不同的逻辑方法与手段，但是很明显其中一个倍受诋毁，另外一个则受到无限赞美。假如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革年代，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在一些特殊学科的方法论方面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变革。

很多人把史前研究当作“历史”研究，根本不知道“史前”就是“没史”的意思，所以它的研究需要的自然也不应该是一般“历史”研究的手法。非常之事不仅需要非常之人，更需非常之法。这个“法”在我来说很简单，就是要敏感、敏锐到“牵强附会”的地步，研究者要养成“听风就是雨”的习性，要借鉴“宁错三千不可错过一疑”的严密。但是反过来看，这些方法与手段恰好就是“牵强附会”。“牵强附会”在史前研究中不仅不应排除，而且应该是追求的。

不过或许做出这个说明也是必要的：我并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我只是一个文化阐释者、呼吁者。这个特殊的身份定位也指明了我承担的职责不同于一般学者，也必将预示着方法上的一些不同，视点上的不同，并且也肯定会影响到我对于“严谨”或“不严谨”的异议。

史前史是匹“死马”，几百年过去了基本上还是老样子，无论你用“严谨”还是“不严谨”只要能医活它才是硬道理。事实是，人们一直使用“严谨”来医它并不见起色，但见危难歪曲，愈见这匹“死马”苍白虚弱，我“被迫”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我想我使用的大概属于残酷的“电击”，看似在残害，实际上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强刺激有起色。只要能够真正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担当个“牵强附会”又如何！

无论怎么说，我作为一个仅只是受过外语系的西方文学和经济学的熏染而进入历史学话题的人，我从上到下都透着不可否认的“新”。不过我一直认为我的“新”没有太多“新手”的弱势，反而这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为什么如此说，这是历史学界人才能深刻领会的公开的秘密。而我只是把这个“新”发挥到极致就可以。“牵强附会”是我的“新”中之“新”。

“做学问首先是做人”，这是中国学人经常讲的一句话，我也要重复这句话，不过我的意思是，要想做开拓性的学问，你必须要做开拓性的新人。假如你一面想做中国传统认可的谨小慎微的好人，又想做开拓性的学问，那肯定一无所获。面对种种的类道德意识侵入学术领域，我几乎觉得那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老调，学术已经饿死，太注重“做人”恐怕是其中的要因。我终于不能继续忍受这样的道德了。

我作为一个外人来搅这潭浑水，即便不能说马上就浑水有鱼了，但确实我知道搅浑水是件善事。我当然也知道许多人还是喜欢看“清水”。当初我就意识到会有很大的道德压力存在，所以我最先准备好要破的就是“道德”。我首先衡量的并非是我有没有“学术”能力，而是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引爆这个话题并承担这个道德压力。我觉得我做到了，并且不是特别困难，毛泽东说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事实如此。

我遭遇到的第二个“道德”问题是：用脑子记忆还是用计算机。我被许多人蔑称为“网络学者”。

在我所做的这个领域，以前的著名学者常常是记忆超强之人，说到某些典故往往可以一字不漏倒背如流，甚至某些人连页码版本都记得一清二楚。记忆力好什么都说明不了，那不过是一种天生的自

然禀赋，甚至是一种低级技艺，与街头杂耍的技艺区别并不大，但它的好处是可以应付考试，怎么也扯不到“道德”上去。但有人还是更欣赏这种传统方式积累起来的知识，觉得更有道德感，就像许多人喜欢吃“手擀面”不喜欢“机擀面”一样，这叫偏好。但是将这样的传统偏好引入学术体制，就会有些问题。“记忆力好”已经是一个首要的选择，“创新意识”成为次要选项。所以，旧学问是“记忆”学问，它整体上的迟钝与缺乏创新似乎是必然的。

在今天这个电子时代，新人们往往使用网络搜索方法解决许多知识问题，一个google瞬间就可以解决以往人们花数月甚至数年才能积累的知识。知识与学问不再是积累问题，甚至不再存在“更新”问题，知识成为一个科技工具的使用问题。计算机网络应用到史前研究领域必然要掀起一场革命，因为资料获得的途径与处理方式全部得到了革命。

新技术必然促进新道德，新道德必然产生新思想。这个新型知识工具进入学术，必然要掀起一场革命，必然会产生出一批与以往旧时代完全不同的新人、新事物、新方法、新思维，它也必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垮旧有的许多成规。历史上马匹与马蹬的出现怎样改变了世界，活字印刷与纸张曾经怎样改变了这个世界，今天的计算机网络就会对包括史前领域在内的学科带来怎样的革新，对此我丝毫没有怀疑。否则，计算机以及网络的出现就不成其一场革命。假如我的研究没有彻底推倒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的话，那么通过计算机实现的DNA技术已经推翻了中国独立人类起源的传统结论已成事实(见书末附文)，中国人类学新的篇章已经在计算机辅助下迈开第一步。

我坚信中国与整个世界都在面临一场正在加速的深刻的文化革命。它的意义与深远不亚于一场“文艺复兴”。我所骄傲的是，我不是被动卷入这一洪流的人，我是自觉而主动的挑起者。并且我觉得挑选史前史这一学科更具有釜底抽薪的决绝意义。

在面临这一急剧变革的中国，在已经着手建立一个开放、宽容、科学、现代化的国度里，重新深刻了解她以及她周围的以往历史是必要的，更何况那是一个极其开放的过去。在这一重新认识之上，中国人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文明观、文化观、科学观以支持它充满希望的未来。

2005年2月17日初稿　2005年5月10日修改

苁三于北京王府井

susanxuxu@126.com

http://bbs.163blog.com

http://bbs.culstudies.com

参考书目及感谢网站：

(东汉) 许慎原著，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2002年版

陈初生编纂，《金文常用字典》2004年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缩印本) 1999年版

张光直著，《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版

黄秀莲、沈文轩，《最新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

张芝联、 刘学荣，《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

张光直著，《商文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张光直著，《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陈德中译，《希腊神话故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郭宝华，《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黄振，《列国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杨孝柏，《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阿拉伯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鲍会园，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更新传道会，1997年简体初版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拉尔夫·伊利斯，《所罗门 示巴女王之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年版

周烈、蒋传瑛，《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

王铁铮、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版

马歇尔·萨林斯著，张宏明译，《“土著”如何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马歇尔·萨林斯著， 张宏明、黄向春、刘永华译，《历史之岛》，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李先登，《商周青铜文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江森、文逊，《圣经家谱1纸通》，天智出版社

李汉平译，《祖先的声音－非洲神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吴天明，《中国神话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月

石玉新、徐俊元、张占军，《华夏姓氏考》，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

刘婷 任刚，《朝圣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王树声 张亚南等，《地理参考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

文物出版社编《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文物出版社 2004年2月版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出版社，1996年版

何新，《诸神的起源》，时事出版社，2002版

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地图出版社编，《世界分国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

崔银秋著，《新疆古代居民线粒体DNA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年9月版

戴尔·布朗主编，《安纳托利亚 文化繁盛之地》华夏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戴尔·布朗主编，《苏美尔 伊甸园的城市》华夏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尤斯伯恩彩图世界史 史前世界》成都地图出版社 2001年9月

《尤斯伯恩彩图世界史 古代世界》成都地图出版社 2001年9月

托马斯·斯瓦尼／帕里斯·巴尼斯著，《海洋世界》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4年9月版

“Genesis and the Mystery Confucius Couldn’t Solve” By Ethel R.Nelson / Richard E. Broadberry 1993 Version

“The Discovery of Genesis” By C.K Kang and Ethel R. Nelson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9 Version

感谢网络及参考网页：

文化研究网站、新浪、网易、中青在线、凯迪网络、文化部落、世界手册、新华网、西藏热线、中华文化信息网、洪恩在线、中国道教协会网、天涯在线书库

http://www.163blog.com/index.asp
http://www.pcchong.com/index.html
http://www.arableague-china.org/chinaese/embassise/djibouti.htm
http://www.cass.cn/xiyafei/GJGK/show_flag.asp?flag=3&id=11
http://www.stnjx.com/bbs/dispbbs.asp?boardID=21&replyid=21239&ID=21239&skin=1
http://www.kepu.net.cn/gb/civilization/chinaware/kernel/tao/200212190049.html
http://www.greatchinese.com/ 中华人
http://www.gb.taoism.org.hk/default.htm
http://www.pcchong.com/index.html
http://mudgame.myrice.com/menpai/mingjiao.htm
http://starryskies.com/sitemap.html
http://www.scol.com.cn 四川在线 (2004-10-29 11:16:24)
http://www.ntsf.edu.cn/dy/kexue/kexue1.htm
http://ganymede.lamost.org/operation/view_category.php?cat_id=2
http://academic.emporia.edu/aberjame/map/h_map/h_map.htm
http://www.theosociety.org/pasadena/etgloss/sa-sal.htm
http://www.face21cn.com/fuxifuxi.htm
http://www.yzbj.com/new/22.gif
http://www4.7show.net/tms/index.html
http://www.huaxia.com/wh/zsc.html
http://www.peru-expeditions.com
http://www.mysteriousetruscans.com/history.html#origins
http://www.cctv.com/history/special/C13382/01/index.shtml
http://www.hanaga.com/gbjc/tc/tc.htm
http://www.usask.ca/antiquities/Collection/Etruscan_Art.html
http://www.mysteriousetruscans.com/art/pottery.html#aryballos
http://www.china10k.com/trad/history/1/11/11b/11b11/11b1101.swf
http://ancienthistory.about.com/od/neareast/
http://falcon.jmu.edu/~ramseyil/mesopotamia.htm
http://www.auslane.com/newzealand-diandi-answer.html

说明：本书与以往一样采取了来自各方面的资料与图片，个别因为来源不详，有关者看到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在再版时得到纠正并获取适当的报酬。

36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44CK6ZSB5a6a57qi5rW3LS3lpI/jgIHllYbjgIHlkajkuI7nuqLmtbfjgIHlnLDkuK3mtbfnmoTlj6/nlpHogZTns7vjgItfMTIwOTI2MzEuemlw",
  "filename_decoded": "\u300a\u9501\u5b9a\u7ea2\u6d77--\u590f\u3001\u5546\u3001\u5468\u4e0e\u7ea2\u6d77\u3001\u5730\u4e2d\u6d77\u7684\u53ef\u7591\u8054\u7cfb\u300b_12092631.zip",
  "filesize": 120101982,
  "md5": "177ac6adb724ec8c3cbcb0bfe678200b",
  "header_md5": "11c5aad1dc9b04a6dc3a552cea2d3a36",
  "sha1": "43f37e5862c2d4113a4b3621185ce1d2a7317d1e",
  "sha256": "eaf1ec52a89f3fcf803e19d3ff0bf93e5900edaf9d1974dd0b0ce224895e6bb6",
  "crc32": 3451756020,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23569528,
  "pdg_dir_name": "\u300a\u9501\u5b9a\u7ea2\u6d77--\u590f\u3001\u5546\u3001\u5468\u4e0e\u7ea2\u6d77\u3001\u5730\u4e2d\u6d77\u7684\u53ef\u7591\u8054\u7cfb\u300b_12092631",
  "pdg_main_pages_found": 246,
  "pdg_main_pages_max": 246,
  "total_pages": 258,
  "total_pixels": 145115712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